

温相自选集

第二辑

原创作者：温相

1.刘项原来不读书

几年前，推特中文因一个商人而爆火，引发许都八十三万水军的围攻，观者如潮，人心似水，到处都是湿的。这倒令人想起章碣章丽山的那首诗了——“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商人原本也起自山东（自然不能与秦汉之际的山东等量齐观了），偏偏也不读书，只念过初中，却把营造的“大好河山”说得乱七八糟，也把“江南七怪”批得狗血淋头。

我们都知道，劳动党起家的法宝是挑动群氓，蔑视知识，毛泽东自己就很赞赏“不读书”的榜样，他说过：“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特别是对章丽山的这首《焚书坑》情有独钟，在发动浩劫之际，还专门对该诗做了“御笔批示”——“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一般理解，这里所说的“知识”只是泛指书本知识或者理论知识一类的静止类产品，其实不然，毛所指知识实则为“底线”。在盐碱地历史上，凡是得逞的都是底线低的，得逞时间越长，底线越低，如果想一直得逞，那就干脆抛弃底线。

因此，在盐碱地就会形成一条乖戾的风景线，那些毫无底线毫无节操的专制政体最终不是覆灭于内部的改良也不是倾颓于外部的请愿，而一定是完蛋于另外一伙更无底线更加无耻的势力。当这股势力坐稳江山后，新一轮的无底线赛跑就会重新开启。

简言之，“跟着流氓走”是这片土地，这个种族几千年来最佳也是最终的选择。在上奸狡成性，在下傻X成群，其结果也必然是死局一个，玉石俱焚。

2. 不忘初心

新时代出了一个新词儿，叫“不忘初心”，到底啥叫不忘初心呢？或者说什么是初心呢？我们不妨来看看。

既然说劳动党的事，就必须要先请出劳动党的几个祖宗来，看看他们当初是如何定义这个初心的。

彭湃，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号称“农民大王”，他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农民是没有法律的，刀子就是我们的法律。”

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是徐向前回忆的，具体文字刊登在劳动党自己办的刊物《革命史资料》上。

现在再来看一下邓子恢的有关回忆。

邓子恢在总结闽西工作经验时曾经说过：“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直接枪杀，有些则用借刀杀人政策，有些则伪装他自杀。”

这位曾经在农村问题上同大毛颇多争论，被党内尊为“邓老”，号称“直声”的人所说的这些杀气腾腾的狠话比照眼下的某些做法，大家不觉得耳熟能详吗？特别是这句“有些伪装他自杀”已然被转化为新的三字经——被自杀。

什么叫经验？其实就是绝招。他们的绝招就是如何高明地杀人。

有意思的是，邓子恢的这段自述的特殊遭遇，邓子恢的自述一度刊登在1982年出版的《革命史资料》上，但到了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款的《邓子恢自述》时却把这段话整段删除。如果继续保留这段内容，有些话或许可以不说，一旦它们删除了，那也就一切都在不言中了。毕竟祖传的绝招是不能外流的。

最近一段时间里，有关所谓民营企业即“超级富豪”的归宿成为热门话题，引发一串串不敢形诸文字的热议。事实上，关于对付这些赚了劳动党大钱的人的来处和去处，祖传绝招也是早有明言的。李子健在《中共鄂豫边党艰苦年代创业纪实》中这样写过：“经费来源主要是拉土豪罚款，群众叫‘经济案子’，就是把民愤不大，出了钱也不致倾家荡产的地富分子捉来作人质，令其为队伍提供经费……”

有些傻X们总是喜欢把文革挂在嘴边，每每看到不平现象就会猖言道：“这不是回到文革时代了吗？”然而，当我们回顾劳动党的大佬烈士们的初心时就会发现，文革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文革之前是文革的初级版，文革之后是文革的新常态。文革只不过是一座承前启后的桥梁。

所有的内容本来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的，只是傻X们不自觉而已。

3.新款铡美案

赵家皇帝为了提升个人威信，准备搞个大动静，琢磨来琢磨去，半夜时分把女儿给喊来了。

老赵：“孩子啊，现在只能找你出来帮忙了。”

女儿：“爹啊，啥事，你老就说吧，孩儿豁出去帮你老到底”

老赵：“别哆嗦，一不牺牲你的生命，二不牺牲你的财产，三不牺牲你的面首，四不牺牲你的色相，你就放心吧”

女儿：“爹啊，有这四不准，爹让干啥就干啥。”

老赵：“你吧，去找个鸭子，活儿好不好无所谓，记住，要有几个特点，第一，纯草根；第二，纯傻逼；第三，纯文凭；第四，纯穷鬼。”

女儿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找到了，然后问赵家皇帝咋办。

老赵：“我跟你奶奶都考察过了，行，你就跟他结婚，快点把喜事办了，要大操大办，礼金你爹我一分回扣不要，全归你。”

女儿：“啥意思啊爹，真跟他过啊？”

老赵：“就过几个月”

过了几个月，公主的荷包就意外地鼓起来了，还在辽国的地界上开了分店，高丽国也有分店，西夏国还有分店，总之就是四面八方啊。朝廷有人议论了，说驸马爷陈世美太不美了，太不像话了，当然都是偷偷说，但老赵听到了，于是，包拯就到位了，秦香莲也到位了，连杀手韩琪都到位了。

最关键的是，狗铡到位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哥四个就聊上了。

王朝：“龙铡是专门铡皇亲国戚的，但从来没用过，灰都可以盖楼了。”

马汉：“王哥，你几把能扯，龙铡在哪儿呢？我根本没见过。”

张龙：“马哥，你也挺几把能扯，照你的意思是说好像还有虎铡？”

赵虎：“只有狗铡，那铡刀隔几天就得换，都铡崩刃了。”

哥四个聊着天就把陈世美给铡了，大宋朝的人都看到了，服了，皇帝万万岁啊，包公千千万岁啊。

公主的床上又来了新姑爷。至于秦香莲嘛，担任了开封宣讲团副团长，到处给大家讲铡美案的经过，团长当然还是由包公亲自兼任，把握方向。

4.编外特务邵式军的下场

特务这个词儿本来是个中性定义，比如当时军队里专门设有特务连特务营等，即便劳动党自己也成立过特务科，且是在人家国民党“特务处”成立之前就存在了的。然而，后来出于政治动机或者说管控的需要，就必须将特务一词污名化。不但把这个词搞臭了，而且把戴着这顶帽子的人也给搞死了。

为什么呢？因为特务是政权的“功狗”，既然是狗，那就必然是死忠派。因此，劳动党建政后对于前朝特务身份的人往往大开杀戒、几无噍类。例如徐经济，本来已经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处理，只因早年混迹于特务系统，最终在1952年被枪决。再一个沈醉，名列起义人员，可仍旧单独开

列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至于其人后来成为政协委员做了帮闲，那就是另一层面的需求了。

劳动党自己的组织系列中最高层的设计有四大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络部。其中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都可以简称为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但统战部却绝不可以简称为中统部。原因不言而喻。

特务有在编和编外之分，一般说来在编的都是嫡亲子弟，编外的则属螟蛉义子。可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编外特务常常比在编特务更敬业，下面我们就重点谈谈劳动党的编外特务的某些政治轨迹。

今人听到邵式军这个名字一定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是，这位邵式军头上戴的这顶“编外特务”的帽子或许还能引起部分注意，这也就使我们这篇短文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

胡风分子贾植芳被劳动党关押期间有位狱友叫邵洵美，此人是新月社的创始人之一，算是鲁迅的半个对头，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滩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物，他有个把兄弟更有名，叫张道藩，是画家徐悲鸿的“同情兄”，官至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撤离大陆前夕托人给邵洵美带过话请他至少要去香港暂避，不知是带话人没带到还是其他何等原因，总之邵洵美没有走，和王秋赦们一道迎来了“解放”。在王秋赦这些流氓无产者们来说，那场所谓的“解放”也许真的是一种解放，但对于邵洵美这些人来说，无疑则是枷锁。

应该说，清算的风暴是逐步升级的，这倒不是劳动党多么的有耐心，而是迫在眉睫的工作是要先把嗷嗷待哺的傻X们给忽悠住。不知大家看过老电影《陈毅市长》没有？那时节的劳动党人多半跟陈毅差不多，最关心的是米价和盘尼西林以及发电厂。等到这些东西忙出个头绪以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收拾这批曾经如旱苗盼甘霖一样的二货文人（大名叫左翼知识分子，原名改良知识分子，现名公共知识分子）了。

1958年，在肃反的“回头看”运动中（可见三讲回头看也是师承祖训的，只不过不比老五那般原教旨主义狂热），邵洵美落马。之前邵洵美还跟曹操身边那位梦中人差不多的挨家蹭饭吃，还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毕竟当年帮过劳动党，帮过像夏衍这类的劳动党的兵团级干部。可惜，劳动党的祖宗们日理万机，哪里还记得这许多，他们只是依稀记

得邵洵美有个把兄弟叫张道藩的，还有个姓谢的把兄弟在境外大骂劳动党以至于惊动了教皇都出面为之站台。恼羞成怒的劳动党自然不能派孔原辈将张道藩绳之以法，也不便空运水军去梵蒂冈痛骂教皇。于是，邵洵美这个替罪羊就必须被押上台来，作为祭祀的牺牲。

其实，邵洵美已经很“幸运”了，他的老弟邵式军，曾经的劳动党亲自任命的山东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被监视居住，并早于邵洵美被捕。邵洵美被关押三年后释放，苟延残喘至文革中嗝屁。而他的老弟，半生为劳动党奔忙的编外特务邵式军于六十年代初便已死于劳改农场，他的妻子蒋某则十年前就被劳动党用查抄逆产的方式给活活气死了。

所以，回头再看咱们用的这个兄终弟及的小标题貌似并不完全接吻，似乎叫弟终兄及更准确点，好在盐碱地一部通奸史下来，谁在上谁在下都是个操X，也就无需更多地计较了。

5. 隋炀帝们的末日

封建集权统治最怨怼的就是废长立幼，用他们自己的行话说就是：“鲜有不招乱者”，隋炀帝的末日也就是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脚。

然而，集权统治的怪圈又无法避免废长立幼这一怪胎的生长，所以，总是会出现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又忙不迭地重演历史闹剧。包括推翻隋炀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何尝不是踩着他们这位表弟、表叔的脚印走过去的？

隋炀帝杨广因为得位不正，就需要强化自己的权威，他的或扰攘四方、或营建浩繁，归根结底都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核心地位，摆出一副强梁的样子给天下人做装X范儿。

宋人叶适说杨广“炀帝以巡游亡天下”，什么是巡游，说穿了就是乱花钱，透支几代人的财力物力来完成他这一代人的荣光。

如果仅仅是这些动作还不足以让隋炀帝完蛋。因为盐碱地历来就有一大批听话的猪狗牛羊，他们直到被压榨出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也不过嗷地喊上一嗓子而已。

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内部。

杨广后期出现的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反对派行动的领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隋朝的核心层或者“杨二代”。第一次的李密，李密是公爵后裔，很早就受到杨素杨玄感父子的知遇，瓦岗军充其量不过是他麾下的水军罢了，不过，李密还只是攻其外；第二次的杨玄感是典型的“杨二代”，他的起兵造反比起早期的汉王叛乱影响大得多，以至于杨玄感被平定的消息送到杨广面前时，老杨居然痛哭流涕；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亲家宇文述的宝贝儿子宇文文化及兄弟的“谋逆”，这把终于鼓捣成功了。假如把颠覆隋朝的李渊父子长安易帜算在内，那无疑又是一场更大的窝里斗。

李密、杨玄感、宇文文化及、李渊父子为何屡仆屡起呢？原因还是在内部。

杨广用人惯于搞小圈子，这是这些予智予雄的独裁者们的最大脾性。杨广身边有个常委班子，号称“五贵”，即苏威、裴蕴、裴矩、虞世基、宇文述。他们这五个人中除开苏威，并无一人有三省长官的头衔，既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唯一表明宰相身份的是四个大字“参掌朝政”，这四个字是临时性的东西，类似于领导小组。这么一个非驴非马的嚼子套在他们的嘴巴上，他们便登堂入室了。

苏威其实是象征性产物，几乎被忽略不计，实际上这五贵中难得有点看法的还算是这位老滑头，可惜并不见用。裴矩、裴蕴、虞世基分别代表杨广的三个兴趣取向，裴矩专门擅长搞大工程，包工头一个；裴蕴卧底出身，擅长搞艺术舞蹈，文艺逼一个；虞世基擅长搞书法文字，贪污犯一个；宇文述擅长搞宫廷政变，老打手一个。

由于这几个人霸占了不该霸占的位置，因此很多权贵们的上升通道也被堵死了，他们的怨毒情绪可见一斑。最糟糕的是这五贵并无什么超世绝伦的本领，其中裴蕴、虞世基最为贪婪，而这二位都是隋朝江南新军的头面人物。

最搞的是，杨广的命运彻底覆灭竟然也与五贵中人密切相关，五贵中宇文述的儿子宇文文化及是主谋之一，裴矩临时上了贼船。当然，他们做的这些功夫也都是给另外一个隋杨王朝的核心子弟李渊父子打开砸锅的

通道。

6. 一曲“励精图治”的挽歌

专制政体发展到后期，因其磨盘体积过大以至于再有若干倍的驴们也无法推动它前行一丝一毫。于是乎，这时就有一头驴王跳将出来，表示要“励精图治”，发誓把磨盘转的飞快。他一面踢死一批懒驴，一面提拔一批勤驴。然而，不论它如何玩弄花招，在最后它会发现，除了它还在继续拉磨外，剩下的驴要么观望，要么嬉戏，要么睡觉，要么偷吃。就这样，它不得不仰天长啸，吐血而亡。

这种类型的驴实际是不存在的，但这类人却是大把。

历史上的王安石、张居正、奕訢何尝不是如此？即便身当亡国重任的朱由检（崇祯）也是如此。

他们上台之初，往往踌躇满志，豪情四射；上台之后，又往往举步维艰、四顾茫然；下台之际，已然筋疲力竭、精尽人亡。

虽然摆在他们面前的疑难杂症多如乱麻，可道理却简单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们坏了规矩。

专制政体维系其运转的核心观念是10个字——有例不可改，无例不可兴。自然，谁都清楚，按照这10个字搞下去，必然僵化乃至僵硬。然而，如果试图改变这10字方针，其带来的后果则是远远超出设计者的承受能力，说穿了，最终要让所有人付出最惨烈的代价为之埋单。

可是，专制政体因为是人治。所以，所谓兴利除弊这类狗屎话题却又常吃常新，连老百姓也都乐此不疲。因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王朝在维护僵化体制时尽管缺胳膊断腿但至少可以蹒跚爬行，一旦“励精图治”，反倒先行送了“卿卿性命”。

凡除一弊，必先除掉一批官员；凡兴一利，必先提拔一批官员。除掉的官员固然是乌鸦，可提拔的官员也未必是荷花，甚而比乌鸦还黑还狠。即便身居高层者如王安石、张居正辈也是一屁股狗屎擦不干净。并且随着兴利除弊的动作的加大，权力斗争也日益白热化，各种渠道都放大眼界去窥伺对手的阴暗面并快速曝光。久而久之，兴利除弊也就成了一堆

垃圾，一个笑柄。而最糟糕的还在于这个兴利除弊给本已难以撑持的专制政体自身打开了新的缺口，对立面伺机反扑。

总之，励精图治唱响的不是王朝复兴的主旋律，而是地地道道的一曲挽歌。

7. 亡国者的共享

朱由检死后南明给他上了一个庙号叫“毅宗”，之前北京城里满洲人给朱由检拟就的谥号中也有“敏毅”的字眼，后来这个敏毅还一度被讹传成“果毅”。不论怎样，大家公认一点就是这位亡国之君很“坚毅”。事实上，“坚毅”是盐碱地专制政体亡国者的共享。

“坚毅”翻译成白话就是“一条道走到黑”。明万历以后，最受诟病的便是“辽饷”，属于官方明抢的证据。可朱由检在这个基础上又添加了练饷和剿饷，合称“三饷”。在明王朝最困难之际，朱由检和朱家王朝的其他主要成员们仍旧做到了“一毛不拔”或者“九牛拔一毛”，朱由检虽然自行掏过腰包五十万两银子，可比起三饷的合计约两千万两白银简直连个零头都不到，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查抄内库所得银两据《甲申纪事》和《甲申核真略》中记载，大抵在三千七百万两之上，另据明兵部职方司郎中张正声回忆说李自成搜掠库银九千多万两。朱由检的亲叔叔朱常洵也不次于侄子，李自成抓到他后曾骂道：“汝在藩王中，富甲于天下，当此兵荒，汝不肯以一丝一粒赈济百姓。汝奴才也。”离休在家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形容这些权贵、缙绅们是“一筹不画，一钱不舍，一言不听”，这个“三一集团”日后多次在明亡的过程中重演，张献忠进攻武昌，世袭楚王朱华奎在离休老干部贺逢圣痛哭流涕下才把一个裹金交椅拿出来说是朱元璋祖传下来的，充作军饷，贺逢圣大哭不已。张献忠拿下武昌城，车载斗量运送楚王府的金银，一边运一边骂：“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

朱由检到了最后关头也想过追赃助饷的办法，可他首先拿远亲李国瑞开刀，从未想过要在朱家人自己身上想辙。他们老朱家收刮老百姓的那点子皮毛给他们朱家江山维稳，而他们自己的金银财宝宁可坐烂城中也不会拿出一分一毫。可惜，花旗邦和英吉利夷生也晚，没有给他们提供资本外逃的根据地，否则即便有了所谓甲申之变，朱家人仍旧可以海外称雄。也许这才是甲申之变留给他们后代统治者唯一能够吸取的教训吧？

“我的是我的，你的，你们的，都是我的”，这种坚毅的思维连同那坚毅的政体直到覆灭的那一天也没有丝毫改变，奇怪的是底层的屁民同样坚毅，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着一代又一代的亡国者走进坟墓，而他们自己甘当墓道。

8. “破五”

盐碱地一直有个传说，说男性举凡是农历初五出生的，都容易为官做宰，甚至飞黄腾达。但是，如果宰执以上级别特别是最高当局要是出生在农历初五，那就等于摊上大事了。这种说法是否客观是否科学，没有验证过。然而，唐明皇李隆基，宋徽宗赵佶倒真是农历初五那一天出生的。

到了清末，又出来了两个农历初五出生的大人物，而且都是正月初五出生的。他们分别是李鸿章和载沣。

抛开所谓初五生日这一说，客观地讲，李鸿章、载沣都是大清朝的掘墓人，尽管他们主观上没有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这么重。

有清一代，尤其是三藩之变后，自明末以来的手绾兵符、盘踞一方的现象归于绝迹。特别是汉族官员的角色在核心层的地位被大面积地淡化。然而，太平军兴，这一切又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打破了成例，兵为将有，财为将有的现象开始出现。到了李鸿章时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换代，淮系集团不仅超越了湘系集团，还开启了近代军阀专制的摹本。

可是，即便如此，李鸿章本人仍旧不失为大清朝的“脊梁骨”。

这么说的理由也很简单。政府同民众之间的博弈和角斗，说到底就是一个“让步”的尺度。政府是强大的，民众是弱小的。对于弱者可以盘剥，但不能覆没，懂得了这个道理的盐碱地的统治者往往会开启让步的闸门，让步尺度大一点的如贞观、开元以及清初、中期的康熙，这就是被吹捧为盛世的所在；让步小一点的可以称之为庸常。拒绝让步或者退步的被称为末世。

李鸿章主导下的淮系政治还是把让步放在首位的，当然，这首推是对外的让步。因为他们很清楚只有外部没有强大的压力，内部的耸动才会失

去动力。对内，李鸿章虽然对于那些调皮捣蛋的毫不手软，可毕竟分步骤分种类地笼络一批愿意与政府沟通的各派人士，即便是对于康梁，他也没有表示出强硬的姿态。

但就连这点可怜的让步到了下一个“破五”——摄政王载沣上台时也给废弃了。醇王府的老人们都知道一件事，每逢农历正月过年，醇王府上上下下都不准说“破五”这两个字，因为载沣的生日是初五，初五就是初五，不能破，更不准说破。

一个不准别人说破自己的统治者却在大肆地残破别人的“初五”，载沣和他身边的爱新觉罗权贵们认为若干年来让步让的太多了，他们既然有了枪杆子刀把子，为毛还让步？对国人让步倒也罢了，到底人家牛X。可对自家的猪狗牛羊再让步，大清的江山还怎么守？于是，他们收回了他们的让步，于是，下层也收回了让步，他们不准备侍候这些大爷了。

9. 鲍叔牙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春秋之际，鲍叔牙有过一句名言，叫做：“君使民慢，乱将作矣”。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君主使气任性，民众懈怠高慢，由此可以知道大乱将至。

自古以来，人治社会幻想的最标准形态是上智下愚。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有什么样的民众也就会有怎样的政府，而有了这样的政府只会更加强化那么样的民众。民众和政府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

一般说来，君王都是使气任性的，但有的君主为了相对长远一点利益或多或少地克制一下，当然这样的君主本身也是凤毛麟角和始乱终弃的。更多的君主则是选择了任性和极端任性。这样的君主非常需要一群懈怠高慢的民众来托举。而这些懈怠高慢的民众也同样需要有使气任性的君主为之撑腰，两者一拍即合，国家民族也就在这种一拍即合下一拍两散了。

总体看上去，几乎没有例外。只不过，一类是局部摧毁，一类是玉石俱焚。

10. 鸣金收兵

遥想当年喧嚣一时的反击南韩商铺乐天的举动戛然而止，以爱国自诩的地赖们也忽然被捕或被臭骂，不少人一时间还不过神来。

也难怪，早晨还满脑瓜子冒热气地冲锋陷阵，一袋烟的功夫居然给鸣金收兵了，大家不免同问，我天棚大元帅到底何意啊？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闹腾最热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反导系统本身进入敏感地带，而是南韩女统领受到追查的关键时刻。

我们都知道女统领出身保守派，是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师承她亲爹。而反对派文在寅则是男版默克尔，出身北部，苦孩子那种，天生仇视西方的。当初文在寅竞选之际，某个基金会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看他。可惜一击未中，以至于让女统领得了势。

资产阶级左派的弱点在于总是喜欢用人的思维考虑野兽的言行，试图引导野兽归化变种。哪知道畜类从不买账，这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们屡屡遭受重创的原因所在。

在人治者的眼中，什么系统都不重要，关键在人，祖宗斯大林强调过“干部决定一切”。所谓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第一步一定要把女统领给干了，把保守派干了。

女统领前脚下台，怨怼之声后脚停息，岂非偶然？

海外央视凤凰网迫不及待发声说文在寅呼声如何如何之高，又不免透露了主子的一点子意思，马英九、梁振英之流的孪生兄弟们很快就要投胎半岛了。

可笑的是，傻X奴才们还在乐天店里等着主子们吹集结号呢。

11.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古人常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今人似乎不太理解，殊不知，这句话不但适用于个人，也一样适用于国家。

什么是节？在古代可以理解为节操，在现当代则可以理解为阶级立场。

什么又叫阶级立场？其实就是政治利益。

那么什么叫政治利益？说穿了就是“老大的利益”。

盐碱地两千多年的历史演绎下来，无非就是重复地做着两件事，一件是争当老大，另一件是维护老大。

而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内政外交也必然是在这一主题下展开的具体行动。

比如朝鲜的勾当，很多人都义愤填膺地认为朝鲜是包袱是炸弹是危险等等。但有的人却不这么认为。

且不讲朝鲜的政治模式、地缘优势之于盐碱地的重要性，我们只需要看一个结果。

我们都知道前苏联解体以后，几乎全部政治遗产都被俄罗斯接收，虽说是改朝换代，可基本上没流血，属于比较完整的那种。然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前苏联的国家档案陆续被部分解密，解密后的很多东西对有的国家的成因构成了局部的威胁。

这还只是和平演变的结果，如果是外力强行介入后的朝鲜，必然走向崩塌，崩塌后的朝鲜的国家档案将落入谁人之手？

集权类型的国家都是意识形态立国，意即站在道义道德的制高点上愚弄群氓。一旦因为档案的公开曝光，这样的装X优势也就不复存在。所谓节操碎了一地。

由此看来，什么这个弹，那个核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是一般的大，是天地悠悠唯此唯大的大，是老大的大。

套用辫子兵的那句话说就是：“保朝鲜就是保我大清”

12. 人民的名义

每一朝都要有个“神曲”，第一朝的是东方红，第二朝的是春天的故事，第三朝的是走进新时代，到了第四朝因为是自媒体时代，大家的眼珠子不太容易锁定在某个几把歌曲上了，于是开始换新招。如今这一朝，当然也不例外，只是神曲暂时免了，神剧开始横空出世，比如曾经热播着的《人民的名义》。

跪舔文人周梅森的作品反腐系列如《忠诚》、《国家公诉》、《至高利益》包括这部《人民的名义》都不脱这几轮“八股”。

第一，要有一个关心党团利益的老同志站在局外指手画脚，比如国家公诉里的老陈主任，比如忠诚里的钟超林。说起这个钟超林的名字也有点来头，本来老周的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里的原名叫姜超林，被“捣眼”胡玫搬上荧屏后改成了钟超林，理由很微妙，那时代正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换届之际，一口一个姜书记，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于是改成了钟超林，在这点上，胡玫完胜周梅森，这倒应了骆宾王的《讨武曌檄》里的那句话“狐媚偏能惑主”。

在这部《人民的名义》中也有一位老同志，就是陈岩石，岩石一方面是言实的谐音，一方面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寓意，特别是选了白志迪这个老演员出来，老白当年是扮演电视剧《包公》的，这里演的是一个退休的副检察长，也算是得其所哉了，难得这些人如此费心地揣摩上意。

第二，要有一个高大全的书记形象，比如忠诚的高长河，比如至高利益的李东方，再比如这部戏里的沙瑞金。说起沙瑞金这个名字，不知道吃瓜群众有何想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的名字，因为他们那个圈子在某个特定的年代里喜欢用地名做人名，比如昊苏、丹淮、小鲁，也比如延东、延北、延河，自然这个“瑞金”显得更牛一些，更正宗一些，所谓天下出自江西，江西出自瑞金，其来有自。说穿了这也是一个标明统绪的好名字。如果把瑞金和老五的名字再对比一下嘛，就只好呵呵了，用心何其良苦。

第三，要有一个反面群体，这个反面群体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贪腐的，一个是保官的，比如至高利益的赵达功常务副省长就是官位第一的，国家公诉里的小林市长也是这一类，现在这部剧里的省厅厅长祁同伟大抵也不脱这个成色。由此反衬出书记的高大，书记的卓越和书记的不容易。

沙瑞金甫一到任，一边斗倒了秘书帮，一边整肃了政法口，这形象，这基因，这两百里山路走下来真的是不换肩啊。而作为看了两千多年的循环场的观众们也很高兴，看着眼熟，好就一个字。

说起来这部剧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例如名字就起得很好，人民的名义，在盐碱地，人民真的就是个名义啊。

13. 狼崽子们的复活

自2013年起，校园暴力事件成逐年上升趋势，有些地方甚至平均一年打死一个未成年，而后还要宣布这类事实是谣传。曾几何时，泸州发生的一起类似的恶性事故，仍旧被认定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而且，地方当局出动之迅速，镇暴力度之大，显然是扛了“尚方宝剑”的。由此，倒是令我们不由得不想起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

早在浩劫拍板之际，执政当局就放出明话：“工农、革干子弟掌权是一个方向。”其实，所谓的“工农”不过是个修饰，免得赤裸裸太过直白。作为当局的小狗腿子的清华附中的校长老万就曾对革干子弟、革军子弟们半公开地交过底：“将来就是要你们来接班。”而这些子弟兵们也自恃血统高贵，他们自己说过：“我们是自来红，你们生下来第一声喊的是妈妈，我们生下来第一声喊的是毛主席万岁。”

在他们随后组建的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种种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掌权后的实质。何谓政权？文革战车的二掌柜林彪说得很清楚：“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盐碱地的掌权者的两大基础素质，一个是恨之入骨，一个是心狠手辣，他们早已具备。举一个小例子，当时他们殴打右派的子女是用烧红的铁签子在后背捅个血窟窿，然后往里灌酱油，这样的招数即便今日的横霸校园的小衙门们也要望尘莫及了吧？

奇怪的是，普罗大众对此安排情绪非常稳定，鲁迅说：“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当年的狼崽子们虽然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暂时沉寂一时，但很快在盐碱地上大面积地复活了，不仅复活，而且还大面积繁衍开来。作为当年被凌压的普罗大众的后裔们也想通了，正如鲁迅比喻的那样：“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

竟已等于牛马了。”

蜀中男生赵鑫坠楼依旧未能逃出这个窠巢。只不过不同以往的是，身兼二职，一个人把不了了之和谢主隆恩都演遍了。可惜了那些个造谣者，他们几乎就是一手好拳棒的“义哥”的下酒菜了。

如果说一定有所谓“千年大计”的话，那么肉体上的施暴和灵魂上的奴役就是千年大计。

14. “鸿毛泰岱早安排”

这次搞了雄安陪都以后，人们翻出一段毛的语录：“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顺便又把毛小规模地膜拜了一下，只是他们数典忘祖，全然忘了毛还有另一段语录。

据参与第一部宪法起草的董成美回忆说：“毛主席在宪法起草中是不同意规定迁徙自由的，他认为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得有制度；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不能随便来回移动。”

套用郭老沫若的诗便是：“鸿毛泰岱早安排”，那些个轻如鸿毛的只配呆在乡下，只有重于泰山的才可以进京赶考。

于是，雄安的意义就破题而出了。

集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固化。

只有堵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二逼幻梦，才能保证泰岱安稳如常。

如果嫌固化二字难听，换成维稳也行。

依稀记得毛时代，进京是需要介绍信的。某些戴罪之身如张闻天辈由于年老祈求回京小住，眼珠子尚未拆线的毛让凤姐读了来信，亲口回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

这八字方针实际上早就是屁民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剑，只是屁民们浑然不觉罢了。

郭老自况的那首诗在“鸿毛泰岱早安排”之前还有一句，叫“四十六年余一死”，屁民们可以掐指算一算第二次洋务运动距今到底多少年了？

15. “反腐永远在路上”

反腐永远在路上是今天说的话，而“革命的人永远年轻”是昨天的话，“六亿人不斗行吗？”是前天的话，这三天说的三句话其实是一句话，这样琢磨下来，他们明天要说什么或者要做什么，都已经很清楚了。

什么是革命，就是折腾，折腾别人的命。所以，这种人当然永远年轻。

小到一副肌体，中到一个团伙，大到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新陈代谢，不能吐故纳新，那就必然要提前完蛋。也所以，就有了“六亿人不斗行吗”这类的纶音。

内讧是常态，反腐是新常态。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五毛和脑残的伪命题，盐碱地上生长出来的几乎所有的猪狗牛羊实际上已经跟这个组织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如果他们看不到常态，或者常态更新不到新常态，这“六亿人”本身都是不答应的。他们管平静叫“平庸”，管反腐叫雄安。

因此，毛才会说：“这一次补足20天，也是40天，满足你操娘的要求，操够，大鸣大放。”

16. 包龙图为何敢铡陈世美？

一部《铡美案》成了多少代盐碱地的屁民们的精神追求以至于都追成了精神病而不觉，只是他们没想想包龙图为何敢铡陈世美？而这样的狗血剧情何以能够流传多年？

盐碱地是宗法社会，讲的是血统论，既然血统论，排行顺序是一定不能搞混的，兄弟子侄，侄子在古代叫从子，女婿呢？根本不在其中，刘备说得有多好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女婿本来就是“半子”，做不得数的，宰了也就宰了。

正因为女婿可以说宰就宰，所以，包龙图才会铡了陈世美，赵家损失的不过是个草根出身的陈姑爷，换来的是民众的山呼万岁，何乐而不为？至于公主啊，太后啊，都出来站台，那就是演给屁民们看的，只有打死的是老虎，才能彰显武松的力度，否则武松灭鼠谁还爱看？

圣旨可以不听，太后可以不理，胸中只有吾皇本人，如此忠君的包龙图到哪里去找？当年安禄山不就跟唐明皇说了嘛，太子是啥货色，俺根本不知道，俺就知道大家（皇帝）一人而已。听听，这颗红心的跳动是多么的热烈啊。

古戏今唱也好，老戏新唱也罢，万变不离其宗，他们想要告诉屁民的就是下跪磕头喊万岁，屁民回报吾皇的也就只有任劳任怨任囮屁。

因此，不管包龙图改了啥样的头面，稍有人脑的都不该去入戏，看戏不入戏，才会让热闹越闹越大以至于收不了场，让演戏者自己兜着走，而且是抬着龙虎狗三部铡刀满场绕着走。

17. 铺垫

魏源吹捧满清在解决西北问题时说了一句话：“故知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云”。抛开这些肉麻的副词，老魏表达出了一层真理，那就是铺垫。

当初那场浩劫同样也是铺垫而成。

有人喜欢单独将其拿出来谴责，却不知它也是循序渐进而非一气呵成。如果没有1957年的夏季，如果没有58年的夏季，如果没有59年的夏季，如果没有1962年的夏季和1964年的夏季，那么，1966年的夏季又怎么会轻易到来呢？

他试水试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决定开掘，滔天之水终于来临。

而这些同样也是受益于铺垫，如果没有前221年便开始的秦政制，如果没有朱重八朱棣父子的“王政复古”，如果没有1644年的辫子兵入关，如果没有孙逸仙的三大政策，如果没有所谓的五四运动，等等，又岂能有后来？

即便今天的这副模样同样也是铺垫而成。

如果二毛不藏私，如果三毛不师法，如果四毛不祭拜，今天怎么会有人公然峰回路转？即便如此也不会走的这么急这么快。

但他们同样也是承铺垫之功。

不妨想想看，在这片盐碱地上，为什么那些专制的黑暗的残暴的东西一旦来临便会很快地同这块沃土有机密切地结合起来且一搞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总是有无数的人即使在旧的套鞋烂掉以后还要时常捡起来瞻仰遗容？以至于在下一双同款的套鞋出现后立刻忙不迭穿上去，重新走过长征路。

说到底，铺垫能够持续，原因就是根子烂了，土壤坏掉了。

而这，目前看，恰恰是无解的。

18. 时代的烙印

我们常说历史就是当代史。同理，同一时代下产生的文艺作品无一例外地会被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新版电视剧《林海雪原》就验证了这一点。

新版同老版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杨子荣上山以后如何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和发挥。老版按照原著所描述的那样，很快就得到了座山雕的青睐并委以重任。而新版则将其改编为座山雕几乎至始至终都在怀疑杨子荣，包括最后栾平的出现仍旧未能让座山雕完全释疑，按照新版中座山雕的解释，栾平没挺住，要是栾平挺住了，也就没杨子荣老九啥事了。

从表面看，这个细节的改变增加了一些看点，但究其内里则反映出这个社会底线的基本变迁。

小说《林海雪原》虽说是一部文艺创作，可同时也是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该小说开宗明义地就说这是献给战友高波杨子荣的。可见其自传性质很明显。尽管在书中对劳动党的所谓英明神勇做了适度的夸大，然而整体还比较正常地维持了历史的原貌。特别是再现了那个时代中的风土人情。

说得更通俗点，那个年代里的人，即便是身为土匪，也没有今天这么坏，没有今天这么没有底线。座山雕之所以能够轻信杨子荣，根子也就在这里。比如我们都知道关东土匪的著名的“八不抢”，包括老幼妇孺不抢等等，即“盗亦有道”。但时下打着冠冕堂皇的执法名义的城管们还有这个“道”吗？历史上座山雕被捕后之所以没有处决，原因很简单，他手上没有血债。所以，关到死。

但是，这样的安排在礼崩乐坏、良知丧尽的时代里，其谁能信？普通人之间尚无起码的诚信，更何况他们眼中的两个阶级的对立了。因此，编导们便要绞尽脑汁将座山雕和杨子荣之间的关系重新编排，这点其实和多年前陈凯歌改编《赵氏孤儿》一样，今人已经不能理解，也不能承认公孙杵臼会傻X到把自己儿子献出来代替赵氏孤儿。

浩劫中，大军阀唐生智、大“右派”章伯钧都曾经拒绝在诬陷刘少奇的专案上做伪证。那位因《红岩》而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徐远举被专案组提审后回到里面告知同伴说：“他们竟然没证据就敢给人定罪”。据此我们应该知道国民党的完蛋的远因是什么了。

一个社会的崩塌实际就是人心崩坏的过程。新版《林海雪原》无意间将其折射出来。由此可见，劳动党的文艺座谈会有必要重新再开一次。

19. 多磕头少说话

有清一代，汉人是被严管的，朱明伪朝的“朱”被改成了“硃”，用一块石头压着，显示“永不翻身”之至意。但也不乏一大批汉族官员官运亨通的，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多磕头少说话”，即便说也一定要说诸如“吾皇万岁”、“皇上圣明”一类的。

官员们身居官场，自然清楚那里的险恶，尤其是高级官员更清楚“伴君如伴虎”，所以磕头的频率也就更高了。只是有的升斗小民，因为全然不晓内中的沟壑，满以为仅仅山呼万岁何以表达自己一腔忠悃？于是便闹出了很多幽默且悲惨的结局。

清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字贯案发，原本江西巡抚海成已经将王锡侯处理了，但这件事被弘历知道了，特别做出批示要求比照大逆律处决王锡侯，并称王锡侯所作所为“深堪发指”。那么，王锡侯到底做了什么让党和人民如此愤慨的事情呢？

原来王锡侯考虑几位皇帝老儿的名字，即所谓御讳很多屁民是不清楚的，很容易冒犯君威。于是，他自己编了一本《字贯》，里面专门开列玄烨、胤禛、弘历这爷仨儿的名字，让屁民睁眼看清楚，别他妈随随便便的撞上找死。没想到他自己本身就是去找死，一门好心思不仅被当成了驴肝肺，连子孙都不保。清代的大逆律处罚很严酷，仅次于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首领凌迟处决，男丁十五岁以上斩决，十五岁以下发给功臣家为奴。

王锡侯这样不开眼的嗝屁了，但没挡住又是一大批“喝甲醇油的命，操养心殿的心”的傻X们乌央乌央地前赴后继。《字贯》案发后两年不到的时间，又一个叫智天豹的傻X自己送上门去。

智天豹是响应号召的赤脚医生，当然是老中医了，有执照没执照不知道，可却有一颗五毛的心。他给朝廷编了一本《万历书》，说咱们大清合该比周朝的八百年还要长久，这是其一；其二，他说当今吾皇也就是弘历应该在位五十七年。在智天豹来说，这两个数字已经是他能够臆测的极限了，但在弘历来说，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首先，弘历在巡游祭祖时途经萨尔浒旧战场，他发出的最高指示是“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也就是说，咱们大清要亿万年才行，八百年算个毬啊。再有，弘历即位之初曾经默祷自己能够在位六十年，一甲子。哪知道智天豹给少算了三年。就这样，智天豹完全属于不知情犯罪，被从宽斩首了事。

鲁迅当年写过一篇《隔膜》：“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后来从网上看到某地区有个哥们儿说领袖应该干三届才行，而仅次于领袖地位的“崔龙海同志”要啃硬骨头了。结果被判拘留七天，警方的结论是“发布政治谣言，后果一般”，看来也属于“从宽斩立决”范围内的，只不过比起王锡侯、智天豹之流的真不知幸运几何了，由此又让那些没有被拘禁的傻X们的内心继续泛起意淫的涟漪。

20. 反攻倒算，卷土重来

最近盐碱地头号大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文革犯了方向性错误。那么，文革到底犯了什么样的方向性错误？它又为何失败呢？

一言以蔽之：文革的失败在于得罪了左派，文革的方向性错误在于动了红一代的奶酪。

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诸人都是左派，而且是响当当的左派，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阶段的利益阶层，尽管尚有部分分歧，但总体思路是一致的。而那些已经被打倒的左派也无不以他们作为希望的起点。所以，文革的命运注定是左派之间的撕逼，也就是以一场宫廷政变开始，必然又会以另一场宫廷政变结局。

文革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字，夺权。

对于上层，夺取的是控制权；对于下层，夺取的是生存权。

文革的构架是将上层彻底变成高级奴才；将下层彻底变成猪狗牛羊。且世袭罔替。于是，江山永固，社稷无虞。

但在整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打击面，甚至掀翻了红一代多数人的饭桌，引发众怒，虽有毛一人之力，但终究难以回天，这也就是大毛一旦撒手，局面很快复原的缘故。

邓之后，江、胡接掌大位，红二代虽然在经济领域中逐渐占有优势，但在政治领域中尚有各种不足，这样他们仗着财大气粗、“血统高贵”，势必向政治伸手。于是，他们就要推戴一个人出来，做天下共主，通过他完成反攻倒算，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他们注定不会再犯“方向性错误”，整个团体抱成一团。

一句话，他们要把印把子刀把子钱袋子一律都抓在手中，完成绝对控制。

只有把这一点看明白，才会洞悉之前的反腐，之后的关门。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屁民所能做的只有引颈待戮，坐以待毙。

21. 王政复古，大道独行；猪狗牛羊，一律进圈—2017早知道

2017年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系列中最为关键的一年，或许就从这一年开始，很多人的实质性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他们注定要被拉进深深的黑洞而不可脱身。

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对于每一个政治人物同样是不可抵御的诱惑。就川普而言，他的青少年、青年时光是在里根时代渡过的，那个时代留在他脑际间的划痕应该是永恒的。同样的道理也产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的青少年乃至青年时代是在毛的阴影下笼罩着，但他不认为那是阴影，相反他认为那是霞光，那是营养，那是指授。

于是，追求王政复古成了东西方两个不同制度下的国家都需要走的路径。一个要走向里根时代，一个要走向毛时代。

现在看来，走向毛时代几乎成了他的必选项。道理很简单，在他的眼中，如今已然是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外患，就必须要把内忧先行解决掉。而解决掉内忧的最好办法就是消除流动性。

消除流动性的具体措施即八个字：猪狗牛羊，一律进圈。

流动性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资本的流动，一层是人员的流动。所谓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罢，想要生生不息，只有增强流动性。

然而，流动性在相当一部分的统治者眼中却是典型的洪水猛兽。因为有了流动性，很多东西变得不确定，说白了，就是不那么容易控制了。

盐碱地历史上集权统治日臻成熟的三个王朝代表—元明清三代都被流民问题严重困扰过，其中元朝、明朝最终栽在了他们的手中，满清虽然极力避免，但也被其重创。

在总结前辈们的经验教训之后，有些人因此得出结论，如果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果断地掐死流动性。让一切重归静止，让一切掌握在手中。

2017年的所有工作都将围绕这个中心召开，各位自求多福吧。

22. 缓冲带

之前那场意外的地震有些人在网上说是因为缓冲带被08年的那场灾难给破坏了，这才连续导致了后来的雅安以及今天的九寨。其实，不独地理现象中会有缓冲带一说，就是政治生活中也不例外。

目前度假中常读的一本书是隋朝史，不很厚，出版年头也很早，但很有意思。在这里，可以发现杨隋覆灭的各色原因，其中比较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缓冲带的破坏和消失。

集权社会靠的是人，有影响有威望有谋略甚至有阴谋的人本身就是缓冲带。一旦他们成批凋零，这个体制也就逐渐开始走向尽头。

以杨隋为例，它的缓冲带分别有杨勇、高颎、薛道衡、牛弘、梁毗、苏威、张衡、樊子盖、杨玄感、沈光等。

杨勇是嫡长，他虽然本人有些不堪，但命在法理之中，他合法身份不容置疑。然而却被父母抛弃，这是乱阶始萌。

高颎是创业之首，功大德高，即便冷处理，只要活着，就是个门面。薛道衡虽不能与高比肩，但他是一代文宗，他在一天说明这个王朝还有点文化上的活气息。

牛弘、梁毗则是技术官僚，尽管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可他们各自品行摆在那里，很容易忽悠一大批傻逼不至于掉队，跟着走。

苏威是摆设，但这样的摆设真的不多见，他和他老爹苏绰那是北周杨隋两代的人气标识，此类古董陈列在馆才能招徕各方傻逼投怀送抱。

杨玄感是杨隋功臣第二代，且属领军人物，他的父、叔都为杨广上位费劲心血，最后都不算好死，这已经很过分。但只要安抚得法，或者即便不安抚，只要内外变乱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杨玄感还是会一直跟到底的。杨玄感在一日，杨隋的二代们也就安稳一天。

张衡、樊子盖、沈光这是功狗级别的，而且，各自身份不同。张衡算藩邸旧人，此公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执政时就以敢言著称，以忠贞无贰闻名，后来李渊不以其弑君的历史否定他的历史，仍旧赠给“忠”的谥号便说明问题。樊子盖、沈光都是不同层面的警卫员，他们是老大最后的贴身铠甲。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人的结局：杨勇、高颀、薛道衡、张衡都是赐死；苏威闲废；樊子盖被冷藏、杨玄感被逼反、沈光被弃置，只有牛弘、梁毗算是枕上死，但也是死在大业初期。

缓冲带也是隔离带，它不能消弭风险，却能让风险来得晚一点。

正是这些缓冲带一个又一个的被故意废杀和自然淘汰，杨隋和杨广父孙三代的结局才会那样的悲催。而与杨隋同类的政治团伙同样也逃不出这个铁律。

23. 汉武重用外戚

宫廷政治说穿了就是“裙带”二字。自古以来举凡致力于集权的主儿最终都会把外戚这面大旗举起来，原因也很简单，玩核心层只能让圈子越转越小，必然归于枕边。

盐碱地外戚政治的鼻祖无疑要把汉武刘彻算是老大。

汉武本人就是通过裙带上位的，如果不是他妈用心交结他姑，并把表亲许配过来，何来太子之位？这是汉武得位不正的根本。

惟其得位不正，所以才要极力摆脱。第一层摆脱的是老妈这边的外戚，舅舅田蚡，汉武给他的悼词是：“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田蚡虽然仅以身免，但老牌外戚窦婴却先行一步。后人以为窦婴之死源自于田蚡的排踏，殊不知汉武对于窦婴也并无好感，借田蚡之手除掉也未可知，正如后面玄烨并不以为鳌拜诛杀苏克萨哈有多么的不地道，只是谴责他不该跟皇帝老儿争签字的权力而已。

第二层摆脱姑妈一流的桎梏，将表亲废黜。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然而程序上比较麻烦，废后往往是“盛德之累”，好在汉武从未强调“以德治国”，因此做起来也就轻车熟路。

作为后世烜赫一时的官衔——侍中，其发轫时代就在汉武，卫青最初的职务就是侍中，本职工作是负责给汉武端尿盆，侍中换作今天可以解释为勤务员或者警卫员，往大了说也就是一生活秘书。

可生活秘书居然成了舅子，成了大将军，成了骠骑将军的长辈，成了托

孤大司马的远房亲戚。这是汉武外戚政治的发端。

汉武三大将，无一不是外戚，李广利、霍去病、卫青。三人的结局也很搭，李广利叛逃变成李彪，霍去病恶疾身死且绝后，卫青虽安然嗝屁，子孙却牵连在案。

如此反映出汉武的为人，善之者超生，恶之者抵死。大杀伐配合大决断再配合大换血。

汉武能玩出废后杀子杀孙的把戏，也能装X到轮台思过的境界。后来者如爱新觉罗·弘历也是要学汉武的，外戚政治也玩的很嗨的，例如傅恒例如福康安，但到底技不如人，留下若干笑柄。其实即如汉武本人，他留下的外戚政治终于要了西汉王朝的老命。

今人若学汉武，恐怕连后学者乾隆都要在泉下笑出声来了。

24. 汉武操弄政治的两面手法

汉武重用外戚，自有其远因近因。

远者如汉初异姓王翦灭后扶持起来的同姓诸王俨然成了独立王国，汉文汉景两代致力于中央集权但效果都不理想。汉武自己很清楚，他在刘氏诸多公子群中并无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之所以得立，不过是阴差阳错而已，他上面既有老迈年高的奶奶，也有“妾身不明”的老娘以及飞扬跋扈的娘舅，还有同床异梦的老婆和岳母兼姑母。他能够驱使的亲信微乎其微，此又为近因者。

汉武本人虽是贵族出身，却对贵族本身“敬谢不敏”，从他这代开始，平民出身的公孙弘诸人得以窜身宰执行列且得以封侯。另外一大批平民子弟纷纷鸡犬升天，这在后代被胡乱解释成什么汉武重用中小地主阶级对付大地主阶级云云，其实都是风马牛不相及，扯狗蛋而已。

说到底，平民出身者并无根基，全靠依赖汉武一人的权威，因此可以做到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汉武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是出身微寒，其中卫青、霍去病甚至都是私生子的身份。所以，即便后来身为大将军、骠骑将军，显赫一时，也不敢招权揽势、吸纳人气，卫青自己说的很好，交厚士大夫，争取天下的名誉那是老大的专利，他怎么敢越俎

代庖？

一旦这样的白手套用旧了，主子完全可以丢弃，卫青一门绝后，李广利、公孙贺族诛，也都是这个道理。包括刘备的那位祖宗之一的刘屈氂虽以宗姓之尊（是刘彻兄弟中山王刘胜的儿子）也只是沾了外戚的光才位列丞相，当然最后也是因为外戚的缘故被灭了门。

汉武帝死后，霍光秉政，汉宣覆灭霍家，没有半点犹豫同样也是基于上述的原理。两汉四百年天下，外戚屡仆屡起，白手套常用常新，其来有自。

而对于同姓诸王，汉武帝采用推恩令的手段，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用肢解的办法把王变成县团级，把侯变成乡镇长，表面上允许他们在经济上保持一定的特权，实际上则不准他们染指高层政治，不准越雷池一步。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各色人物时常对其进行必要的敲打。江都王刘非是汉武的同父兄弟，竟然被佞幸韩嫣捉弄，尽管汉武对韩嫣教育了一下，可亲王们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难怪中山王刘胜等人席间落泪，正如后代讥讽南齐武帝肖赜一样——“陛下重羽毛而轻骨肉”。

汉武帝操弄政治的两面手法为后代所借鉴，今人能够看到的某些大戏其实何尝没有汉武当年的痕迹呢？

25. 汉武果于杀戮

秦皇汉武的徒子徒孙比比皆是，为啥？因为他们对于盐碱地的形成“厥功甚伟”，自然香火绵延，世世不绝。

即以汉武而言，这是一个残忍阴狠、果于杀戮的头子，他一生所营造的其实就是恐怖统治。

“制造恐惧”是统治者的利刃。但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敢常年佩戴和使用，在这点上，汉武做的最为“出类拔萃”。

卫青、李广利这是汉武的顶尖亲信和亲属，但卫青的儿子被诛杀的不知凡几，李广利更是给搞得灭了门。在汉武一朝，动辄族诛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减卫、霍一等的公孙贺、公孙敖、赵破奴这些功臣宿将一旦获“罪”，立刻捕杀，绝不留情。比如公孙贺，同卫青一样与汉武帝都是实在亲戚，拜相时知道前景不妙，长跪不起，连汉武帝本人也暂时落了泪，可还是让他勉强上任，一任十一年，是汉武帝一朝任期较长的首相，但最后还是灭门了事。

既然果于杀戮，那就必须豢养大批鹰犬，而这些鹰犬虽然猎捕非常卖力，但最终也还逃不过被刑杀的结局。义纵、王温舒这些小角色就不论了，连张汤这样的大头目到头来还是百喙莫辩、屈辱嗝屁。

杀到后来，连老婆儿孙子都不放过了，汉武帝仅此一点就足以“藐视群凶”了。

然而，汉武的统治却空前巩固，即便到了晚年，民间稍有反弹，可一经轮台思过又很快拨乱反正。道理很简单，比如屁民，因为恐惧让这些人只能做驯服的猪狗牛羊，再不敢作为人一般的思考行动，一天下来只为三个饱一个倒，绝不敢再有任何非常欲望。而且，这种恐惧不仅针对屁民，也同样针对高层，百姓恐惧，官员更恐惧，你们不要以为做了官，或者封了侯，便可以优哉游哉，便可以不再常吃常新般表态效忠，正是通过不断的清洗，让官员队伍始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官场成员们才可能无限度地盲从紧跟。

说到底，只有你们都恐惧了，高高在上的老大才会为所欲为。

假如由于弓弦绷的过紧，稍微宽松一下，大家又都欢欣鼓舞三呼万岁，此是为“轮台诏”。应该说，汉武帝吃透了国人的根底，他才会将恐怖政治发挥到极致。也惟其如此，后代对其膜拜才会乌央乌央的。

26. 推倒重来

赵本山的电视剧代表作包括《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系列》等。这些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留待争议，这里要谈的是他的剧作中的某个共性所折射出来的要点。

在这三部作品中有一个非常集中的特点，那就是“推倒重来”，这点在《刘老根》的第一部中还不够明显，在第二部已经完全显露出来，至于《马大帅》几乎又是山寨版的“刘老根”。而《乡村爱情》拍摄到第八部

时，扮演王大拿的赵本山再度“沦落”，成了剃头匠。

可以这么说，每当在剧情无法持续的时候，“推倒重来”就成了必然。如果仅仅是一部作品这么搞，或许是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但每部作品都是这么个路数，那就值得关注了。

我们所关注的并非赵本山为何如此操弄剧情，而是这样的现象一旦同历史上某些相似的场面联系以来以后所反映的深刻背景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赵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另一位跟他一样出身的农民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完成了一个更大的转型，甚至将这个种族带进了一个貌似从未经历但却似曾相识的环境中去。而且，还是这位农民也在剧情进行了十七年后，突然玩了一把大反转，“推倒重来”，把已经成型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并有“大乱才能达到大治”，“七八年来一次，尔后还要多次扫除”一类的“理论”。

从那位农民的历史往前看，这类推倒重来的把戏绝非“独一份”，那拉氏执掌天下初期，搞出来所谓“同光中兴”，可“庚子”前后则是典型的“推倒重来”，不仅早年她亲自支持的“洋务运动”否定了，连她本人推出的“儿皇帝”也不得善终。

那么从那位农民的历史往后看呢？事实俱在，恐怕也不用多说了。

由此可见，在政治舞台上的“刘老根”们的统一表演也绝不是兴之所至、心血来潮，而是统一编剧统一导演甚至统一剧组。

什么叫“推倒重来”？在高层上讲，把一个位尊权重的人推下台去，变成了狗彘不如的罪犯，他每天只有请罪磕头的份儿；在底层来说，把一大批刚有温饱或者勉强度日的人们推到饥寒的边缘，他们唯有求生的欲望，再无任何抵御和需求。

什么叫“推倒重来”？说穿了，就是循环场，两千多年来之所以剧场不倒、观众不散，就在于循环播放，就在于循环宣教。

什么叫“推倒重来”？说到底，就是忽悠不下去了，只好重打鼓另开张。

只要盐碱地继续存在，只要这种灭绝人性的宗族文化继续把持空间，那么，“推倒重来”是大势所趋，也是民众喜闻乐见。

赵本山及其作品不过是这个根子所弹射出来的一个符号而已。

27. 一个人的盛宴

斯大林一开始运作他的大戏的时候，也是装满了一车人的，那里甚至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不用说布哈林这些人了。

这俩战车的目标很纯粹，就是要撞向托洛茨基，结果如愿以偿，托洛茨基先是被撞出局，最后被撞死（暗杀）。

随即这辆战车开始卸载，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面的布哈林、李可夫都被卸了下来，送进了肉联厂。布哈林至死都没搞清楚，为什么“柯巴”要将其置于死地呢？

柯巴是斯大林的呢称，布哈林给斯大林最后一封求饶信的开头就是用了柯巴这个名字，这封信据说一直被斯大林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时不时的他会拿出来看一看。

这时候战车上剩下的几乎都是斯大林的人马了，伏老（大毛拉一直尊称伏罗希洛夫为伏老，可惜这位一直不服老），叶若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日丹诺夫。

然而，这里面的人还是有可疑分子，还是有可以进一步卸载的必要。

于是，叶若夫被甩下去了，日丹诺夫也被甩下去了。新上来的是贝利亚和米高扬、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以后又增加了布尔加宁。

这样看起来，此时战车是符合了主人的要求的，做到了清一色。但是，主人还是不满意。

斯大林生平的最后一次权力大运作，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把旧日的亲信们又划成了三六九等，伏老、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米高扬都先后被点了名，莫洛托夫的老婆也被抓进了集中营，新一轮的清洗即将开始。

由于主人的心脏的骤停，一切貌似都停止了。

事实上，当吃人的聚餐最终成为一个人的盛宴时，结局就会不请自到。

28. 逆流中的几朵污浊浪花-明嘉靖宠臣考-（一）.拿死人压活人

曾国藩说，做大事以找替手为要务。同理，干坏事也以找帮手为第一，尤其是干大坏事，要团伙作案方显“英雄本色”。

历史长河在流淌的过程中往往遭遇逆流和倒退，最终演至浊浪排空，不能不说是群体的力量，但首功一定要推那几朵特别之大的污浊的浪花，正是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翻不起几尺浪的时候，其偶然性的能效将趋势的内在或必然完全显露出来。

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承大统在他之前也不算新鲜事，明太宗朱棣就是用刀把子叩开了金陵城的大门，明代宗朱祁钰也是在土木之变惊魂未定外族进逼京师的前提下登上皇位。

这三位外藩成就的帝王都有不同程度的难言之隐，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朱棣而言，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娘是谁？因为朱元璋立下的规矩是嫡长子继承制，朱棣的亲妈不是皇后老马太太，甚至连中国人都不是，而是朝鲜人，现在我们常说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这实际并不完整，应该说是由脐带捆扎而成的，至少从朱元璋、朱棣父子就开始了。

事实上，如果严格按照朱元璋自己的嫡长制的设计，他的二十五个儿子都不合格。皇后老马太太并无生育，死后被谥为懿文太子或兴宗康皇帝的朱标也只不过是由马皇后代为抚育而已。但是不是嫡长子要由朱元璋说了算，既然朱元璋夫妇都说老大是嫡出，那么剩下的就都不好讲了。

因此，朱棣给群臣派的活儿便是要把自己的身世同马皇后联系到一起，这件篡改历史的勾当完成的并不好，其马脚在明代已然露陷。

接下来的明代宗景泰皇帝朱祁钰要解决的是儿子是谁的问题。

本来明英宗朱祁镇的立了太子的，即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朱祁钰自己也有儿子，朱见济。朱祁钰上位以后按照礼法仍旧是要继续维持太子朱见深的地位的，可这样一来，将来一旦朱祁钰嗝屁，他的侄子怎么会让他那么风光的“血食”（俗称吃冷猪肉）呢？所以，必须换成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如此才能名正言顺，惜乎朱见济自己死得早，朱祁钰后来也被乃兄给翻了案。

朱厚熜与上述两位遭遇的难题有所区别，他的核心是爹是谁，貌似难度也更大一些。因为朱棣不管怎么说他爹都是没啥疑问的，就是朱元璋了；朱祁钰也是一样，他老爹便是明宣宗朱瞻基。然而，朱厚熜的老爹朱祐杬那是一天皇帝都没当过的，不折不扣的藩王而已，且封地是远在湖北的安陆。

假如不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朱厚熜势必在高层中始终“低人一等”，不仅上面要服从张太后的管教，下面还要听从杨廷和一般人的指挥。所以，所谓爹是谁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革命的领导权到底在谁手的问题。

朱棣、朱祁钰、朱厚熜三个人面临的三个问题，核心就是血统论，玩的又都是拿死人压活人的勾当。可见，专制体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认贼作父”，谁是爹谁是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抓住了权柄谁的嘴巴大，那么，他说谁是亲爹谁就是亲爹，谁是亲娘谁就是亲娘。

29. 逆流中的几朵污浊浪花——明嘉靖宠臣考-（二）.作恶的成本

朱厚熜在与杨廷和等人的较量中，一开始是落了下风的。因为资历浅、学历差、经历短，但这个时候，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他们陆续跳了出来，给朱厚熜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更主要的是点醒了朱厚熜，皇帝的权威是无上的，既然可以认贼作父，自然也可以指鹿为马，谁不听招呼，大棒伺候。

杨廷和刚刚申请退居二线，朱厚熜是挽留的，一半是虚应，一半也是实情，毕竟离不开这位“定策国老”。然而，由于有了张、桂等人的指点，朱厚熜很快醒悟到，地球离开谁都照样转，立马批准杨廷和退休，尽管如此，在退休待遇上还是给足了杨的面子。等到朱厚熜逐渐品尝到老大的滋味后，这位原安陆县委书记很快翻了脸，不仅将杨廷和变成了农村户口，连带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也给轰到了山青水绿的洱海度假村。

古代给张璁、桂萼他们的定义是“逢君之恶”，这个词儿有一半的意思是好的，至少说明君王也有恶的一面，但也有一半仍旧是跪舔，君王根本就不存在好的，而逢迎者，不过是替君王做了抹布或者说出了心里话而已。

有了张、桂这几朵污浊的浪花开道，后面的大戏很快便开锣了。这是由于自朱厚熜算起，大家都发现一条真理，在盐碱地，原来作恶的成本这么低，作恶的酬报这么厚，作恶的后果基本没啥。

初期，对待不服从大礼仪调子的官员们还是呵斥，后来就改成廷杖，再后来直接开杀。而且，还把这些丑行编成了著作颁行天下，彻底搞臭对立面。

在朱厚熜的主持下，针对大礼仪问题一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大礼集议》，此后发现收集的内容不全，就扩大为《大礼全书》，等到该书告成时，朱厚熜亲自改了书名，叫《明伦大典》，这本书说白了就是嘉靖朝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另一本书叫《钦明大狱录》，也就是嘉靖朝的中央反腐教材汇编。

有了这两本书做底子，反对派很快土崩瓦解。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朱厚熜将自己从安陆县委书记的角色成功转换为“朕即国家”，不仅出手狠绝，且还有发明创造。比如陈洸案，三法司不能按照老大的意思走程序，朱厚熜立刻换马，以张璁兼任都察院工作，桂萼兼任刑部，方献夫兼任大理寺，张桂诸人原本都是宣教战线的骨干，如今都安排到了政法战线中去，并很快发挥了奇特的作用。

古法说“刑不上大夫”，张璁不过是兵部侍郎的缺分，可一旦口含天宪，居然在刑堂之上给刑部尚书公开动刑，搞得刑部尚书也公开管张璁叫“爷爷”。而有明一代，公开屠戮部长会议主席的先例就是从朱厚熜这一代开启的，公开杀戮上书妄议朝廷的谏官也是从朱厚熜这代开启的。

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零八个月，约等于四十六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的前期主要内容是大礼仪，在他统治后期主要内容则是玄修。前者是保他的身份，后者则是保他的生命。

在前期斗争中，张璁、桂萼等人于兴献帝一事上出尽了风头，也受尽了宠幸。可接下来的这一回合，即将一天皇帝都没做过的朱祐杬直接上位

到称宗祔庙的高度时，张、桂等人落伍了，他们这样的佞幸也从未想过，“原来还可以这么干？”于是，新一波的宠臣队伍又出现了，夏言、严嵩成了新贵。等到大礼议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玄修成了嘉靖朝工作的重中之重时，夏言又落伍了，徐阶之流又出现了。再后来连严嵩也被甩了出去，剩下的只有嘉靖朝三个自信理论的创始人徐阶了。（徐阶名言：“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相当自信。）

尽管宠臣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屹立不倒的永远是皇权，也正是因宠臣的不断更替，才基本保证了皇权的屹立不倒。可以说，在嘉靖朝之前，明代或多或少还出了点所谓能臣，可到了朱厚熜亲自执政后，没有出现任何一位能臣，出现的泰半都是宠臣，也就是所谓的佞臣、奸臣。

随着朱厚熜权力的稳固，作恶成了一种趋势，更成了一种习惯。《国榷》上说：“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

随地吐痰的赏钱，那就会有随地便溺的了；随地大小便的升了官，那就会有当街操逼的了；当街操逼的留名史册的，估计只有公开杀人才能与之匹配。

国人喜欢讲果报说，讲老天爷报应云云。其实，盐碱地何尝有过什么老天爷？即便有，那也一定是和他们一伙的。即以朱厚熜而言，他作恶四十余年，却万幸成为自朱元璋、朱棣以来第三位长寿的明朝皇帝。他的孙子朱翊钧继续学他的样儿，竟然也创造了下一个纪录，在位时间最长，四十八年。

本来，嘉靖朝隆庆朝万历朝天启朝都是以不办公为荣的，一俟朱由检的崇祯朝准备振作朝纲、中兴天下时，大明朝就完蛋了。所以说，盐碱地是没救的，谁救谁先死。

30. 魏明帝生加庙号

庙号、谥号在封建王朝是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意识形态的核心层，换作今天的方式约等于追悼会和告人民书以及纪念堂。所谓“谥以表行，庙以存容”。

但这套玩意儿在嬴政看来是“不务正业”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子议

父、臣议君”，所以，秦始皇要求后代以二世、三世等等作为标杆传世。

秦完蛋，汉承其后，为了表达自己立国的自信，允许庙号谥号颁行天下。不过，西汉一代，对于庙号还是比较慎重的，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这等待遇，比如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身后就没有捞到庙号。再比如秦皇汉武的汉世宗武皇帝刘彻，在他死后若干年，居然被起哄要求拆掉他的世宗庙。由此可见，秦政的隐忧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于是，有人为了防止“苦迭打”，提前做了防范工作，把死后应该享用的待遇活着就搞掂了，此公就是魏明帝曹叡。

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报：“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在这份奏报中，曹叡死后应得的庙号“烈祖”竟然提前给确定了下来。试想一下，如果有司不是事前得到类似的暗示，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如此“不顾大局”。

要说皇帝生前营造坟地（他们管那叫万年吉壤）的算不得稀奇，但活着确认庙号的真是蝎子拉屎头一份儿。或许也正是因为曹魏三代而亡。因而后代皇帝便没有继承曹叡的这项新时代伟业，继而付之阙如。当然也不是一个都没有，例如大名鼎鼎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尽管没有让有司奏报庙号，但私下里却认定世宗是他隔屁后应得的尊崇。

正是由于曹叡玩的有点出格了，包括孙盛这样墨守成规的老实书生都看不过眼去，发表议论道：“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昔华乐以厚敛致讥，周人以豫凶违礼，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孙盛一老实疙瘩，自然不敢开骂曹叡本人，只能把屎盆子扣在“有司”的头上。但“违逆祖制”这顶大帽子也的确不小，即便指桑骂槐，也算是骂到家了。

其实，什么祖制什么家法，在专制者看来那都是糊弄下边人的把戏，这点还是杜周说的清楚：“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法为何物？不过是老大的意志而已，用孟子夸孔子的话讲“圣之时者”，识时务的，用当今的语言形容即“与时俱进”。

据此看来，即便没有曹叡的暗示和默许，有司也一定是摸透了老大的心思，才做出这样一番不同寻常的举动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与其活着不孝死了乱叫，不如直接给老大戴上几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什么家之类的冠冕，如此才显得与众不同、标新立异。

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看，除了孙盛发表异见外，历朝皇帝似乎对此都不很在意，明嘉靖还暗中师法。倘若追从以前的历史看，有司的做法正是搔到了曹叡的痒处。

吕布部将秦宜禄的儿子秦朗是曹操的干儿子，同曹叡的关系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曹叡直呼他的小名的程度，曹叡即位，秦朗担任内官，充当办公厅主任和警卫局局长这类要害职务，曹叡还专门给秦朗修了大宅子。曹叡本人特别喜欢听小报告，喜欢下面人检举揭发那些妄议朝政的“匪类”，秦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正是秦朗这么“圣之时者”这么识相，才会受到非常的信赖，“富均公侯”从这么一个小旁证也可以看出曹叡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主的能效是纠偏和补漏，专制的结果必然是重复和健忘。曹叡虽死，其魂犹在；殷鉴不远，重在复制。

31. 商君虽死法未变，秦皇终奏统一功

少年时代看过一本连环画，叫《商鞅变法》，这本连环画应该算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余孽”，里面充满了所谓儒法斗争的套话。只是这本小画书的结尾页留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源自于一句话：“商君虽死法未变，秦皇终奏统一功”。

满清囫圇以后，腾挪出来的巨大的权力空间环顾域内，一时还没有哪个人或者团伙可以完全填充。袁世凯携北洋诸将最多也只是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盘。南方则立宪革命各有分野。这一时期，表面上看大家都被统一到一个认知下面，即帝制同共和势不两立。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帝制仅仅表现为称皇帝这一项上，如果皇帝换作大总统，哪怕大总统世袭，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老袁偏偏不接受。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袁虽说口头上对立宪君主很向往，可实际上接受的还是家天下的理念。且盐碱地也只承认这一种理念。同样的道理在同盟会方面也不是没有过，二

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等人逃往日本另起炉灶曰中华革命党，孙文意见是这个党的党员必须按手印承认只服从孙文一人，经胡汉民等人调解，改成只服从党魁一人，却遭到陈其美的硬性反对，而孙文终究听了陈其美的意见，孙黄就此分道。由此看，不仅在朝的袁世凯要搞一人一姓，落败的孙文也未能免俗。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盐碱地众多屁民所能适应所能理解的也只有一人一姓。这玩意儿最对胃口。

举个例子，比如第一次文革期间，号称“宁吃社会主义的窝头，不啃资本主义的面包”，这句话在当时便于民间引发反弹，因为屁民再猪狗也能琢磨明白，窝头肯定不如面包。梁家河大队书记用面包（据说是过期的）喂狗的事迹一直成为后来书记本人接受采访时首先谈到的话题，于此也可见一斑。

可是，倘若把这句话换一下行头，比如改成“宁给祖国当牛做马，也不为洋人鸣锣开道”，或者宁做中国人的右派，也不当外国人的洋奴。怎么样？立马一多半人都含糊了，觉得有道理啊。

再换一下门面，换成“宁可砸烂国宝，也不让洋人买去”，这样估计全体傻逼都会举手赞成了。

因此，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只要有人不称帝，只是把老大的名字改一下，或叫大总统，或叫党魁，或者叫总秘书一类的，人们自然可以接受。假如还适当地饲料精加工一下，即常说的经济搞一下，那简直算是天上人间了，不跟着跑才出鬼呢。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副对联活生生地刻画出老袁玩完的深刻背景。

老袁称帝失败绝非教科书中所说“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在盐碱地能深入人心的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主子我为奴”，哪里存在过什么共和国观念。

举凡要搞大事，都要搞小团伙，林立果给它起了个好名，小舰队。老袁的小舰队有两个，一个外宣办，即筹安会，一个内务部，即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

老袁很清楚，他要称帝，首先不服的是段、冯。这样也才有了模范团，有了陈宦出京等等。可惜老袁父子太着急了，起码应该让后起之秀再起一起，让先入关者率先囮屁才对。

不过，老袁虽死，却留下了一个庄严的课题，接班人到底是谁？别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老袁的死证明了一点，左右大将都靠不住。也证明了另一点，尽管左右大将靠不住，但也还是能做到“活着不孝死了乱叫”的地步，老袁送终礼数最大，连一贯看不惯段祺瑞的袁克定都承认“得亏总理”。

老袁死了，可衣钵犹存，后继者又都在重复老袁的功课，有半途而废的，例如孙总理中山，也有完成但仅仅及格的比如蒋总统中正。当然，还有完成一半却被洋人给掀了桌子的蒋总统经国等。

然而，他们各自的法术和力度比起大毛来，实在不值一提，深得盐碱地传统文化渗透的两千年来首推秦始皇嬴政，这爷们属虎；其次则是毛，这爷们属蛇。

正所谓，虎头蛇尾。

32. 古已有之

盐碱地12月的日历上是颇有些日子值得所谓纪念的。

比如12月12日，是一个诞生所谓“千骨功臣”的日子；比如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的日子；还比如12月25日是抵制西方反华势力渗透的日子。

只是不知道是否还记得12月16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想来是记不得了，因为记性差是这个族群的基本标识。更何况这个日子并不具备任何高大上的资质。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人心不古”的慨叹，貌似很多事之所以搞不好，只是由于人们的“心变了”，变得不那么淳朴了。貌似人们也因之怀念起从前，貌似从前应该就是很好过的样子。据此就有了恢复传统文化的理由，据此也就有了走回去的呼应。

但有谁愿意深究一下过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想来都看过一个互联网上传的视频，卖鱼人往鱼肚子里注水，大家看过不禁痛骂，自然也包含人心不古的意思。可是，我们从《南明行纪》这本书的《中国志》中可以了解到，早在明代，往鸡肉里注水就是卖家的基础勾当。

既然说起明代，就不由得想到臭名昭著的“厂卫制度”，不由得联想到明朝的天下或许就是给这个锦衣卫东厂败坏了的。哪知道，所谓厂卫其实不过是吴大帝“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玩剩下的“校事”的后身而已。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典范。

前些天，寒冷的冬季降临之初，一个城市把很多扣上了低端字眼的闲杂人等驱离，让不少人出离愤怒了，显然这些人认为不应该这么明目张胆地搞事。然而，他们竟然也不记得还有着12月16日这一天。

1996年12月16日，盐碱地股市大跌三天，除开胶带股份等极个别一两只股票外，其他的一律跌停，连续三天跌停。原因就是一篇《正确看待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笼的要义是一个疾呼“一百口棺材”的叫朱镕基的人认为股市过热，投机盛行，需要制止。于是乎，打着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旗号发动了跌停战役，在跌停的日子里，受害最深的就是这些中小投资者，或曰低端人口。

而这也不过是朱镕基信手拈来的随意一笔，在这之前他发动的国企减负战略，让很多人从就业的岗位上下来，“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一夜之间成了“低端人口”。而这些，想必人们应该是都忘掉了。也正是因为忘掉了12月16日这一天，也才会有后面的那些节目。

至于朱镕基这厮在很多人心目中仍旧不改其伟岸的印象，包括今天痛骂驱离低端人口的人群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傻缺在盛赞这厮的所谓政绩。

但是，如果仅仅把板子落在朱镕基的屁股上，问题就忽然明朗了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耳熟能详的湖南湘潭韶山冲的口音呢？他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这句话不是说在所谓解放后，而是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在窑洞的时候。而这分明是喂猪的节奏。

所以，不要抱怨了，以前是喂猪，现在管你们叫低端人口，不管怎么说，已经承认你们是人了的，尽管低端。而且最难得的是，他们终于说了

一句实话。

33. 明朝末期的“三不知”

明万历二十五年，明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在议论朝政时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当今事势，其不可知者有三，天意不可知、民心不可知、气运不可知。”老戴的级别并不高，也就是个县团级，但因为一则人在组织部门，二则给事中不比旁人，属于可以犯颜直谏的主儿。也正因为这样，他说出的这个“三不知”在当时便很有些影响。而随着明朝的日渐衰亡，“三不知”遂在盐碱地历史上治乱之道中占有一席之地。

所谓天意不可知，通俗的说，就是老大怎么想的不知道；所谓民心不可知，就是老蔺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所谓气运不可知，就是老天怎么想的更不知道。

我们常说血液畅通，四体通泰。人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高层只有同下层保持互动和理解，整体运行才能保证在良性的轨道上，否则就该出问题了。而且，一出还就是大问题。

盐碱地自古以来逢乱必有三部曲，第一步曰民乱；第二步曰民变；第三步曰民反。

何谓民乱？说白了，就是不听招呼了，一句话，猪狗牛羊会哼哼了。你说的对与不对，大家都不信了。社会信用体系的瓦解必然会导致下一步，即民变。

何谓民变？也就是社会群体事件。会哼哼唧唧的猪狗牛羊们不满足哼哼了，开始学会尥蹶子了。等到他们发现尥蹶子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出现了民反。

我们都知道，万历二十五年上距张居正改革才过去了十五个年头，何以戴士衡就如此“危言耸听”了呢？

一般的看法都归结为明神宗朱翊钧的昏聩和颀顽，不郊、不庙、不朝，数十年如一日，的确罕见。可是，祸根却并非在朱翊钧一人身上，或者说，祸水的流淌其实早已开始，只不过到了朱翊钧这里属于“横流”的那种。

所以，我们说戴士衡用“当今事势”实在概括的不够全面和准确，应该用“从来事势”四个字。

天意不可知，封建帝王本身就秉承“法在不可见，道在不可知”的信条，神秘才会产生所谓神圣，天天见面的不是大皇帝，是大宝SOD蜜。而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身为老大，其实也是心中无数，自然也就“不可知”了。

民心不可知，从秦皇汉武算起，哪一朝哪一代的帝王将相们真正关心过民众想什么？这就譬如主子们会去探究猪狗牛羊们琢磨什么吗？

气运不可知，盐碱地根本就没有未来，如何有什么气运可言？

戴士衡们讲出这些道理的同时都抱着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梦幻，殊不知，接下来的惊涛骇浪把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卷了进去。等到下一个平静出现时，倏然已百年有余。

34. 猪华

研究历史的关键操作方式有两种，一曰归纳；一曰总结。

具体就用冯小刚的两部电影做例子。（一个是他主演，一个是他导演）

一部是《老炮》，一部是《芳华》。

先说《芳华》。该电影最能体现冯小刚之流的核心意识的便是刘峰被打出假肢的那段。

刘峰的车被无理扣押，交罚款一千元，明显是讹人，刘峰气不忿，动起手来，当年的假肢被打了出去。这时，女人出现了，破口大骂打人者，说这是英雄，你们把英雄的假肢都给打出来了。然后，打人者几乎齐声说不知道这厮是英雄，再然后，女人替刘峰交了1000元罚款，说是先把车弄出来再说。

类似的情节也在《老炮》开局之际出现过，也是城管打人，老炮挺身而出，代交罚款，把钱扔在地上，接着给了叫他六哥的城管一个小嘴巴。

对比《老炮》给了一小嘴巴，《芳华》显然“进步”了，只是骂了句“妈的”，交的罚款也比《老炮》多。看起来，九大没白开。

为什么说这一段情节彰显冯等人的核心意识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杀人不过头点地，罚款可以罚，但不能打人；打人也可以打，但不能打我哥们；打我哥们也行，但不能把假肢打出来。

允许你把大家当做猪，也允许你惩戒猪，但不允许你虐待一只曾经为你战斗过的猪，特别是不能把猪蹄随便打掉。

所有的反思，所有的主题一定是围绕在前提“我是猪我甘心当一头猪”的背景下展开。

于是，剩下的就都可以讨论了。

于是，冯记一部又一部的公映，虽然名字叫的天花乱坠，忽而大地震忽而吹大号忽而装老炮忽而扮芳华，总体都是一个字：猪。

35. 朕兼厂臣

朱由检上台后，钱嘉征揭露魏忠贤若干罪状，其中第一条是“并帝”，说白了，就是与皇帝并列。

其实，这不是魏忠贤的发明，而是内阁拍老魏的马屁。内阁票拟时，用“朕与厂臣”的字样，这就比之前刘瑾这些人更进了一步。

按规定，明代的官宦是皇帝的家奴，见了皇帝要称“皇爷”，自称“奴婢”。可到了魏忠贤这时，对皇帝改称“皇上”，自称“臣”。虽只一字之差，却也表达出奴婢的权威已然如日中天。至于“朕与厂臣”更是朱明伪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勾当。属于“创新”。

一般说来，干坏事的主儿通常爱用一个字——新。

因为这个“新”字特别具有蛊惑的效应，傻X们一看到“新”便误以为是跟“旧”的决裂，殊不知，这是一个更大的坑。

这里做的最绝的是王莽，干脆把国号都改成“新”，推翻王莽的更始帝等人也是托名“新”，与民更始，本意就是创新，从新来过的意思。

魏忠贤也有创新，他制造的几乎所有的冤案，都是以惩治贪污为名，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人算起，几乎每个人都被扣上贪污犯的罪名，即便死后也要被追赃。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案件办成刑事案件，这样一来，案犯不但活受罪，名声也臭了，不明真相的傻X们对魏忠贤更是山呼九千九百岁。

不过，魏忠贤好歹还拿了一层遮羞布，叫“朕与厂臣”。等到日后他的徒弟徒孙们上了台，连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打出“朕兼厂臣”的大旗。真叫傻X们情何以堪？

36. 洪宪梦

类似于努尔哈赤、袁世凯这样的团伙作案的黑社会集团最终发展的趋势都是“吃独食”，老袁只不过口有点急，提前完蛋了。

从满清退位算起，每一桩事都是合着老袁的心思的。比如首都改在北京，比如宋教仁突然遇刺，比如所谓二次革命，这都给了老袁收拾不从命的各种理由，且恰到好处。其中“二次革命”的硕果最大，不但孙黄瓦解，连黎元洪也不用再躲在湖北装X了。

接下来又有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段祺瑞也挂了。又有了政事堂，内阁也就彻底玩完。《临时约法》没了，代之而起的是袁记约法，总之，路子铺的太顺了。

袁世凯法定年薪三十六万元，居世界元首之冠，还派给每年公费四十八万元，交际费三十六万元，合计一百二十万元。此外，崇文门税务报效袁世凯家族“化妆费”每年十万元。袁克定主管模范团，住在团城，公开挂出“大爷处”的招牌。而且，下一任大总统的人选由袁本人指定，发展到帝制前夕，居然大家公认大总统可以世袭罔替。

有人用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为老袁开脱，谁信谁傻逼。袁克定伪造消息其实质不过是迎合了老袁的胃口而已，充其量就是个逢君之恶的罪名。如果老袁自己没有脏心眼，谁能伪造得了？谁又敢伪造？名曰《顺天时报》，如果不“顺天”，那还叫个鸡毛的时报？圣，之时也，这么断句就能听懂了吧？

浙江督军朱瑞去见袁世凯，总统府跟班的叫他换便服，朱瑞一穿上总统

府送过来的“便服”，长短合身，完全就是量身定制。见了老袁，老袁也是便装，寒暄过后，老袁问朱瑞：“介人，你如反对我就该宣布独立；你如效忠我，就该宣布出兵。何以孙黄暴动，你宣布中立呢？”朱瑞吓得半死，期期艾艾说不上来。

朱瑞好歹算是半个“武人”，诸如熊希龄这样的“老凤凰”，袁随随便便搞两篇文章，比如什么热河行宫盗宝案了，就足以吓死他们了。

正因为这一步步如此地顺遂，老袁终于可以迫不及待了。可还是有人看出了毛病，梁启超在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有一段话写得最“贴心”——“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真正做到了“如泣如诉”，可惜还是打动不了老袁的心。

北洋团体尊奉老袁当老大，哪怕干到死都没毛病，根子在于攀龙附凤，也就是将来大家都可以捞一票干干，所谓皇帝轮流做。一旦老袁打翻了那个狗食盆子，大家就都不干了。

这种苗头实际上在袁称帝之前就已经有了。李纯授江西都督，王占元就不满意，公开骂座，老袁赶紧奉上一个“帮办军务”的头衔，王占元骂的更凶：“老子帮了你一辈子，还他妈的帮办？”张作霖以师长的名头受封子爵已经是特恩了（张作霖受封二等子），但张作霖骂的更难听：“他妈了个巴子的，我咋能给人当儿子？还他妈二等？”老袁对于这些全是装聋作哑，这也就难怪段祺瑞虽然靠边站却仍旧实权在握，冯国璋表面站干岸实则煽风点火。

老袁的落败不是什么教科书逼逼的“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也不是以论代史的“帝制不得人心”，根子在于窝里反。为什么会窝里反？这也是必然。当初为了反击孙黄，北洋团体目标一致。一旦目标达到，大家各自的小算盘就开始南辕北辙了。段祺瑞长陆军，胃口不止于此；冯国璋领封疆，目的更上层楼。而火力的瞄准点就在袁克定，“大爷”上位哪儿还有段虎、冯狗的缺分？既然没有了段虎、冯狗的缺分，王占元、张作霖之流的位子又如何安排？

“总统梦”一定是“洪宪梦”。而“洪宪梦”一定是噩梦。噩梦醒来是早上还是晚间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肯定会醒来。

37. 狗年

2018年是狗年，很快就到了。历史上有很多狗年，但今天所要讲的是1970年这个狗年。

四十八年前的1970年的春节也是姗姗来迟，也是过了立春之后才有了除夕和初一。

这一年的元旦，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提出两项任务，抓紧整党、抓革命促生产。

在这一年的元月里，很多事情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比如发表对苏联侵占岛屿的强硬声明，比如筹办了五七艺术学校，比如消灭血吸虫病，比如反对铺张浪费和投机倒把。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春节过后甚至还提出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口号，要把国民经济搞一个新飞跃。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好日子是不是又要来了？

就这样到了三月上旬，宪法修改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也就从这时开始，下一个多事之秋开启了。

这一年的七、八月发生在江西庐山的事已经不用复述了，陈伯达自1945年被主公提名蹿升中央委员到此二十五年鸿运结束。而这一年的年底，他同斯诺的谈话隐含的将林彪与刘少奇等同起来的机锋直到若干年后才被少数人读懂。

换句话说，1970年这个狗年是大戏的铺垫。

38. 家天下

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曾描述洪杨之流“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这番话算是道出太平天国起反初期能够获胜的主要原因。

所谓“情同骨肉”，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首义诸王，杨肖冯韦石，五个人，都算“皇族”，亲属一律称“国宗”。而且，即便首义诸王中也有等

级，杨是一级，肖低半格，冯是三级，韦是四级，石达开只不过“羽翼天朝”，并不具备管理“方面”的权限。即如秦日纲，本名秦日昌，因为要避讳韦昌辉的名字，就改名叫秦日纲。等到冯、肖先后噶屁，韦昌辉、石达开却没有依次递补，也是由于之前的严格排定名次所致。

可是这些表象仅仅维持了五六年就毁于一旦。一场天京事变下来，“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而且，这种现象越到后期越严重，“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有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内中除了外甥、姑爷就是亲兄弟。

后人总结这段历史喜欢用“任人唯亲”来作为教训提出。事实上，这样的体制发展到后面，任人唯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洪秀全之后又有袁世凯，老袁小站练兵起家，三大将，龙虎狗，王段冯。王士珍负责统率办事处，段祺瑞做了陆军总长，冯国璋出掌江南。北洋大家庭一时间都很和睦。结果还是好景不长，先是搞出来个“模范团”，这是“新小站”的概念，一上来就夺了段祺瑞陆军部的大权，接下来，筹安会也备上了。

老袁对冯国璋说过一番“心里话”，他说他的儿子一个残废了，一个要做名士，都不成器，不会去做皇帝的。后边这句话是假的，前面的话都是真的，因此冯国璋一开始就相信了。但接下来上演的一幕又一幕，让冯国璋义愤填膺，他这种义愤是由于接不了班引发出来的。他背后管袁克定叫“曹丕”，袁世凯自然是曹操了。

在冯国璋看来，捧老袁上台，“牺牲了自己的主张”，其实冯国璋有个狗屁的主张，无外乎捞权。然而，老袁不够意思，用冯国璋的话讲，“传子不传贤”，很明显他冯国璋就是“贤”，天下既然不能中分，至少也该分一杯羹，结果还是替人家老子儿子当垫背，冯国璋自然不干了。

此外，冯国璋给袁克定起的外号“曹丕”也有讲究。那年代不比后来给曹操翻了案，好像曹丕跟他妈大英雄似的。实际上，历史上的曹丕名声很臭，不光是“正统”因素闹的，主要是此人奢华无度，比杨广也强不到哪儿去，否则传了一代也不会给司马懿父子坐大。说穿了就是败家子。

老袁强出头要当老大，惜乎强干弱枝，儿子太差，顶不上去，这才让段

冯有了机会。

小团伙时为了一个大目标，大家摽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问题。等到闹大了，形势变了，果子成熟了，摘桃的就应该紧着自己人了，谁是自己人呢？无外乎老婆孩子了。

我们常说，形势比人强，洪秀全袁世凯走到那一步，不全是个人性情使然，根子还在这个形势发展上。家天下是注定的归宿。

39. 郑孝胥

章含之不理解义父章士钊为何那么维护“汉奸”梁鸿志。在章士钊的眼中，梁鸿志“很有学问”，对于他的落水，章士钊认为是“一念之差”。由梁鸿志想到另一个有学问甚至是相当有预见性的人，此公便是郑孝胥。

以前感觉郑孝胥的“三共论”没有今日这么深。而且，常常把内中的“共和”的“和”读成“he”，实则应该读成“hu”，即麻将桌上的“和牌”的“和”。

所谓“大清亡于共和”是对家天下覆灭于团伙作案的一个精到的总结。在郑孝胥之前的两个例子已经给郑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位便是袁世凯。

看看李秀成自述就会明白，李秀成这些功狗、鹰犬们最痛恨的不是他们自身的体制，自然他们也意识不到。他们最感到愤懑的是洪秀全要把太平天国建成洪姓天国，任人唯亲。最初，太平天国搞了个“八位万岁”，东王、西王“与有荣焉”，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逼封万岁”一说，杨、韦、石的家属一律称之为“国宗”，也就是都算成宗室贵族的意思。这样一个体系到了天京事变以后就给打破了，不论军功，只论血统，“共和”成了“清一色”，因此牌打不下去了。

满清消灭了这伙人，可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老路，皇族内阁就是很好的教训。袁世凯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才得逞的。偏偏老袁自己一样重蹈覆辙。

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他们管北洋叫“团体”，团体团伙都是一层意思，说集体也行。老袁偏要强出头，传位给儿子，段、冯当然不干，这也就有了洪宪帝制的破灭。

老袁之后，还有两个人也做了同样的迷梦。不过，老蒋的梦是在窃号自娱之地“草山”完成的，时间略比郑成功父子多一些而已，最后也是彻底终结。大毛拉的事尽人皆知，无须再提。

郑孝胥的“一念之差”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就在于他错误的理解了自己提出的理论的核心。所谓共和、共*、共管，名称虽不同，实质却一样，这是一枚走不出去的浑元圈，这是一条始终缠绕的循环线。

因而郑孝胥自以为可以超越时代发展，可以一下子从共和跳到共管，也因而发出“满洲国不再是小孩子”一类幼稚的言论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人重读郑孝胥，不为别的，只为不要同他一道幼稚便可。

40. 作伪

造假其实就是作伪，现在网上叫的好听多了，山寨，仿佛各个都是寨主似的。

有人吐苦水说现在人心不古，造假作伪的多了，且手段很残忍云云，不像民国时代如何如何。

也仿佛他们真的见证过所谓的民国时代似的。

俞芳回忆鲁迅的小册子中提到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北京的秩序混乱，……假银币充斥市场。那些假银币的制造者，手艺之巧，实在惊人，以致真假难辨。买东西时，一不小心，找进假银币是常事”。俞芳回忆的年代是1923年，是不折不扣的北洋时代。

宋云彬的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件事。他们所雇佣的厨子买的生油中被商家给掺杂了桐油以至于大家集体腹泻，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告痊愈，事后向当地辖区公安局（注意，不是警察局。）报告，公安局对商家拟处以300元罚款。时间是1940年3月19日。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时代，还是个法币尚未贬值的时代。

举两个小例子不是说只有民国时代才开启了作伪的大门，用大毛拉的那句话形容，“由此上溯到……”，大约公元前221年便已经开始了。

作伪的核心是虚荣所致，这是盐碱地惯有的东西。为何要有虚荣？因为大家整体丧失了创新的能力。为何失去了整体创新的能力？因为身在盐碱地。

且作伪的内容一直也很宽泛，从伪币到伪史不一而足。发展到最后真相成了传说，传说成了真相，倒也应了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

比如传说袁宫保能救大清，结果袁宫保一出山，大清就嗝屁了；比如说大救星能力挽狂澜，结果大救星一到位，浩劫就来了。

前几天由于是邓的死期，有人如丧考妣追思不已，也仿佛真有个所谓的邓时代似的。细想起来，毛时代鼓噪人们追求的政治进步，实际不过是自保，罔顾他人的自保；而邓时代号称追求的经济利益何尝不是另一种自保，另一种罔顾他人的自保？两者异曲同工，何来什么毛邓之分？“百代都行秦政制”而已。

然而，话又说回来，作伪说到底还是保留了一层遮羞布，有朝一日，就像杜蕾斯广告那么直白，“干两次是不够的”，人们真的要仿佛怀念这些个作伪的时代了。

41. 乾隆四十三年

有人一看标题，望文生义，以为这篇文章或许是袭《万历十五年》的故智。但这么想的爷们儿肯定会失望了，此文与“万历”那篇连半点关系都没有。

言归正传了。

清乾隆四十三年，爱新觉罗·弘历67岁。

年初，正月初十，弘历老儿心情看来不错，忽然发布上谕，给年深日久的“多尔袞案”宣布平反，追复多尔袞睿亲王王爵封号，并指定后裔世袭罔替。同时又搞了一个大手笔，把胤禩、胤禳的名字给恢复了，之前这哥俩被他四哥改成了阿其那和塞思黑。总之，局部翻案。

与此同时，开国军功诸王的封号一律“率复旧章”，比如代善原封和硕礼亲王，到了孙子杰书是改封为和硕康亲王，这次恢复礼亲王的旧名。另

外，还专门推崇了一下“扬州十日”的刽子手多铎，称之为开国诸王军功之最。并且给这些军功王爷增加了配享的最高待遇。

一则是翻案，一则是复古。

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表面上看是慎终追远、敦念亲亲。实际等于大家，咱们爱新觉罗家里再闹也是闹家务，即便闹下炕的那也都是好汉来着。也都必须缅怀，不准瞎逼逼。

其实，爱新觉罗·弘历玩弄的这套把戏也不算什么创新。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的金世宗完颜雍就搞过类似的玩意儿，追封了一大批开国老家伙。而且，完颜雍与弘历一样，都非常鄙视占领区民众，都以血统傲娇示人。弘历对满语骑射的重视远超过康熙雍正两朝。所谓复古，说到底就是原来的东西开始玩不转了，但又玩不出新花样，咋办？只能被迫怀旧。

在这一年中，还发生了另外两件大事。

一件是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这个案子在当时影响很大，办案的和涉案的都是一时的名人。主要办案的是刘统勋的儿子刘墉。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用在刘家父子身上真的很贴切。刘统勋当年查办胡中藻案时连女人的行头都不放过，被弘历称之为有想法有能力的好干部。如今轮到儿子当了文教主管，功夫也是铁杵磨成针的架势，很快闻出了异味。

只是很奇怪的是这对父子祸害了那么多人，居然在他们死了若干年后分别成了两部励志大剧《天下粮仓》和《宰相刘罗锅》的主角，成了被讴歌的对象。仔细想一下张献忠身后的待遇，也就迎刃而解了，窝囊惯了的族群都有“恶神崇拜”的情结。

弘历原来有位忘年交，叫沈德潜，老沈本来以为这辈子基本没啥希望熬出头了，没想到碰到弘历以后，一下子蹿红了，红到什么程度呢？沈德潜退休之际，大臣们奉命写诗祝贺，其中一首诗写道：“帝爱德潜德，我羨归愚归”。归愚是沈德潜的字号。

可谁也没想到，沈德潜被牵连到了徐述夔这个案子里，其时，老沈已经囫圇十年了，但还是要追究刑责，帝当然不爱“德潜德”了，更没人羡慕“归愚归”了，因为连坟头都给刨了。

徐述夔案是八月份查办的，到了重阳节，又一个脑残撞上门来，请立“太子”，那还用说，直接“加恩斩立决”。由此引出另外一件事，就是弘历宣布交班的日期，任满六十年后传位给下一波。

追复多尔袞等宗室亲贵，这是开恩；追杀沈德潜、徐述夔，这是立威。对皇族要开恩，表示跟着走继续有好处；对民间要立威，表示不跟着走就要玩完。

而这两件事都为了烘托一件事，那就是屁股到底坐多久的问题，兹事体大，朕说了算。

剩下的就散了吧，洗洗睡好了。

顺便再多说一句，乾隆四十三年也是戊戌年。公元1778年。

42. 甄嬛传

前一段看了个视频，是袁腾飞说历史剧的话题，没看完，就看个开头，老袁对《甄嬛传》很愤怒说是准备用吊瓶将电视给开了。他的观点是“形似都做不到，神似怎么可能呢？”，还有一个观点是：“编谁不能编清朝的皇帝，清朝的皇帝编谁都不能编雍正。清朝的皇帝都是职业皇帝，雍正是一年只给自己放一天假的主儿。”

老袁的这段话貌似很有理，估计肯定又忽悠了不少不懂历史的傻逼。其实，从这段话里也可以看出，袁腾飞本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大抵也是半吊子的模样，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当代懂历史的在我看来只有两位，一个是高华，一个是章立凡。余皆泛泛，不值一提。

历史和文学不是泾渭分明的沟壑，他们是统一的融会贯通的长河。历史是说不出来的文学，文学是说出来的历史。因而，鲁迅当年才会对《史记》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

记得以前央视有个傻逼写了本关于秦始皇的书，开篇就说“司马迁骗了我”，这种傻逼也真是高抬自己，诸如他这样的五毛，充其量也就是让纳粹党外围给骗骗而已，配太史公这样的人物骗他吗？傻逼文革时连小

学都没毕业，能看得懂《史记》吗？

话扯远了，就说《甄嬛传》吧。这部剧的原著我翻过，原著中没有点明是哪一朝代，而这部剧之所以走红，高明处恰恰是将其安装到了清代，特别是安装到了雍正朝。说清朝皇帝是什么职业皇帝，毋宁说都是职业杀手。中国自清代开始，最高统治者开“团伙作案”的先河，也就是说中国的皇权完成走向极权的涅槃是从清代开始的。

老袁的意思应该是说清代的皇帝很敬业，但这并不影响清代的皇帝同时也很精液啊。朝鲜的使臣当年就记载过，爱新觉罗·玄烨10岁起就已经过性生活了，这比元代的皇帝过性生活都早，北魏最年轻的老爹也才14岁，过性生活时也才11岁。所以说，前台敬业，后台精液，并不矛盾，不是说职业皇帝就不瞎搞，没这么一说，貌似越是激烈紧张的政治状态下，几把的撅起概率越大，否则长征走一路生一路的现象怎么解释？

而且，清代的皇帝“情种”和“性种”的也很多，比例也很大，开国的皇太极，为了宸妃，一个蒙古女人，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入关后第一代皇帝，其实也算是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为了一个来路不明几乎可以算是乱伦的董氏也到了近似癫狂的状态，他亲弟弟襄亲王的死就跟这件事有关吧。这种柔情即便到了末路时代也还继续绽放狂花且结果，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死于天花梅毒并发症，这是李德立生前冒死留给子孙后代的一个活记录。一边为革命斗争终身，一边患有杨梅大疮，这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有先例，比如萧克回忆林彪，刚上井冈山那会儿就有性病，这是公开回忆并且出版的，这么多年了，好像也没谁否认过。堂堂“无产阶级军事家”（林彪系中共中央军委评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尚且如此不能免俗，职业皇帝咋了？凭啥啊？

具体说到雍正，挺雍正的这一派如冯尔康等人也都承认雍正死于丹毒，而道家的核心技术是什么？不就是房中术吗？雍正在53年那一年患重病死里逃生，转而过了不到两年，产下一子，55岁生育记录的历代皇帝有多少？舍身信佛的梁武帝萧衍自己说过，他年过五十就不过性生活了。隋代，隋文帝给重臣高颍介绍公主做老婆，老高担心自己的小蜜受辱，拿别的理由给推了，后来老高和小蜜生了孩子，隋文帝派人祝贺，独孤后知道了就说高颍装逼，当初推三阻四的好像对亡妻如何留恋，如今这孩子又是咋来的？杨坚一听就没动静了。尽管独孤后是挑拨，可她说的是事实。五十几岁的人生育，尤其又是诞育儿子，这在科学技术发达的

今天，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德国科学家用小白鼠做过实验，生育雄性动物的比例主要来自于交配双方中雌性动物的发情概率。“孤掌难鸣”啊，兄弟，雌性发情了，雄性无动于衷能行吗？那都得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才行啊。按说老袁一结过婚的人，不会连这个朴素的唯物主义都不懂吧？

说了这么多了，就做个结论吧，免得太过冗长。电视剧《甄嬛传》的好就好在把皇帝老儿给毒死了。拍了这么多的宫廷戏，皇帝戏，皇帝老儿几乎个个英雄豪杰一般，别说死于床榻之间了，就是死于办公室里也还都是那种壮烈殉职的。老版的《三国演义》，编导们不想撇开《三国演义》的原思路，可又不敢开罪主流精神（主流精神就是曹操必须翻案，必须是高大上，这是大毛钦定的，鲁总司令生前也说曹操是英雄来着），只好折衷一下，派鲍国安这么个浓眉大眼的扮演曹操。

真正能把皇帝给写死了，而且死的这么龌龊的，只有一部《甄嬛传》。而且也并不离谱，雍正的死因至今未明真相，至少张廷玉在自己自订的年谱里的那四个字说明老皇帝距离正常死亡有点差距，鄂尔泰的屁股上的痔疮流了一马鞍的血也间接说明了当时的凌乱。《甄嬛传》将受害者锁定在果郡王胤礼身上也不离谱，胤礼甫一听到四哥即位的消息，策马狂奔，“有类疯狂”，这是上了大清朝中央文件的。特别是有关年羹尧之死，《甄嬛传》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年既不是死于所谓的贪污，比如五毛剧《雍正王朝》里瞎编的那样；也并非是什么专擅，而是死于“不识相”。剧中说年跟敦亲王搞了一起，而史料中则晦涩地提出了年羹尧曾为胤禩求情不果的往事。

此外还有一点，五毛剧《雍正王朝》透过唐国强（那演的根本不是雍正本人，就是唐国强自己）和胤禩吃饭那段，唐国强连菜汤都喝了干净，表明四爷的朴素作风，这更是离题万里。反倒是《甄嬛传》中将雍正的部分原型做了真正的修补。挺雍正这一派的杨启樵教授写的《揭开雍正帝神秘的面纱》一书中转引清代宫廷“活计档”的第一手资料向人们披露了雍正的奢侈。事实上，雍正所处的时代，清军入关已历三代，雍正和他的兄弟们都是长于深宫，成于妇人，怎么会有俭朴的生活习惯？那不是扯蛋吗？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看到他爷爷刘裕忆苦思甜的摆设就破口大骂说：“种田老混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曹操的孙子曹叡大兴土木，连王朗这些铁粉们都看不过眼去。圆明园是从谁手里开始带投搞的？这还用翻历史书吗？

电视剧《甄嬛传》只是借用了雍正这么一个非典型，囊括了一少部分的宫廷的内幕，这是多年以来拍摄的宫廷戏中唯一可以看得进去的一部好戏，我看了三遍，《我爱我家》诠释党史，至少要看五遍，《甄嬛传》诠释历史，至少要看三遍。

最后补充一点，老袁说什么形似做不到如何做到神似，试问，关羽在历史上用的是青龙偃月刀吗？青龙偃月刀是何时才出现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三国演义》一样没做到形似，怎么数百年来流传不衰呢？袁腾飞自己说过自己巨不爱做考据工作，一个研究历史的，同时还教书育人，不做考据怎么能得出结实的结论？信口开河的胡编乱造，凭一己好恶定终身，终归是玩不久的。四十岁上下的人搞历史，正经该做的是多去看书多去做了解真相的扎实的基础工作，而不是整天埋头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为自己频频露面而鸣锣开道。

43. 红绒结顶

在大清朝有个俗语，“官不到二品，戴不得红顶”。这个红顶指的是红珊瑚顶戴，二品以上官员才允许有的规格。而还有一种红顶则是官员终身无法望其项背的，那就是红宝石顶。所谓红宝石顶、三眼雀翎，这是满洲贵族的重要象征。

但红宝石顶和三眼花翎比起另外两款顶子，那就立马矮三截。

先说第一款，“红绒结顶”，俗称“红线疙瘩”，就是用普通的红线结成一个花状的结，看似很普通的顶子却仅限于现任皇帝老儿的儿子孙子们使用，即皇子服饰。

爱新觉罗·弘历的儿子成亲王永理嘲笑铁帽子王礼亲王昭槤：“吾帽冠祇值清钱百文，然胜汝辈数百金之顶多矣！”昭槤还补充道：“”时红宝石顶价甚昂，故王以为戏云。”

弘历的玄孙载锡降生，弘历打破惯例允许载锡也戴红绒结顶，以后遂成为定制。

北京老百姓之间开玩笑，爱说这么一句话：“你别看我是白顶子，那可是跟老爷子一样的。”

“老爷子”是对皇帝老儿的戏称，所谓老爷子的“白顶子”是另一款牛逼帽冠规格。

康熙朝皇帝喜欢用一枚特别珍贵的珍珠用冒顶，以后规定凡是继任皇帝都要用这个珠子，这颗珠子是可以从帽子上取下来的。溥杰回忆溥仪行囊匆匆之际还念念不忘要把这颗珠子带上，有一次因为走的太急了，居然没找到这颗珠子，溥仪就跟丢了魂似的，派人反复搜求。这就是“白顶子”的来历，颜色远远望去跟民间杂役低级官员的顶戴几乎无异，实则相去万里。

曾国藩那么大的功劳，也就是赏给双眼花翎，李鸿章最后比他老师强，混上了三眼花翎，已经顶天了。可史料上记载，早在康熙在位时，儿子喜欢花翎，康熙居然赏给他一个五眼花翎戴着。可见，在统治者眼中，只有他们家的孩子才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

诗人北岛晚近写回忆录说他六十年代上第四中学读书时，一些特殊家庭出身的子弟的穿着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通常都是带汗碱的破背心，带补丁的半新衣裤，有些人穿了新球鞋还故意往墙上踹，一定要把脚趾头露出来才算行。北岛说：“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

前几天陈正国他爹死了，有人回忆他爹生前也是推着一辆破自行车住着单位分的旧房子，套用北岛的定语，也应该是“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

如果愿意多看两眼，想想那个耀眼的白顶子和红绒结，想必我们都应该会心一笑，历史从未走远。

44. 伏笔

1838年11月，林则徐来京陛见。1839年1月上旬离京南下，前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时还只是总督关防，走时已经佩戴钦差大臣的大印了。

这一年（1838年）是闰年，到了1839年2月才进入“新年”。因此，林则徐离京的时候，还在戊戌年尾。

林则徐要去办的事，只有一件，即“决裂”。所谓禁绝鸦片就是“决裂”。

但是包括林则徐在内，对这个决裂究竟带来多大的后果，明显估计不足，更没有想到这次决裂居然一举改变这个国家近代史的进程。

所以，我们用了“伏笔”一词，林则徐去广州是禁绝鸦片的伏笔；禁绝鸦片是此后对外战争的伏笔；对外战争又是洪杨内乱的伏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实还有一个伏笔也要交待，那就是此去广州也是林则徐个人生命的伏笔。1850年11月，林则徐再次以钦差大臣身份进入广东后不久就病故在普宁了。根据一些史料依稀可以判断，林则徐的死因是由于有人雇佣了厨师在粥糜中兑了巴豆汤所致。而“有人”的身份则是当年因禁绝鸦片深受其害的广东十三行的商人。虽然林则徐的死亡真相还不能完全落实到“毒杀”这一层面，可这种说法始终无法完全证实为无稽。

倏忽六十年，1898年，康梁师弟再度上演决裂大戏。那拉氏本人也从幕后走向台前。她操弄的决裂大戏无疑走的更远，不公开建储已经成为自雍正以来清皇室相沿不替的“祖制家法”，可从那拉氏开始给打破了，“乙亥建储”引发的一系列灾难连老太太自己也差点完蛋。

1958年的“狗”来的也很晚，也是到了二月才算“新年”。这一年里发生的两件大事，恐怕已经无需多言了。成都会议上对相信和服从的重新诠释（相信成为迷信，服从成为盲从）已经由点缀演化成为开端。

纵观这三个戊戌年，它们留给大家的记忆都是伏笔，都有决裂。好在它们已经成为历史，好在还只是伏笔。怕就怕它不是历史，怕就怕它不再是伏笔。

45. 韦祖思

读过五胡十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夏国的开国君主叫赫连勃勃，这厮很凶暴，而且很长时间里，周边国家没有人能够控制住他，连称霸黄河两岸长达二十多年的后秦姚兴也无可奈何，甚至还被勃勃给咬过几口。“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刘裕一生戎马，活捉过两位僭主，可他留下的北伐军却被赫连勃勃一举击破，手下几个大将都身死人手。

今天要说的是赫连勃勃遭遇名士韦祖思的往事。

其实，这段故事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韦祖思是名人，名士，是见了姚兴都不跪拜的主儿。但赫连勃勃一旦召他入京，他不但乖乖去了，且去了就下拜。

赫连勃勃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大怒，他说：“吾以国士征汝，柰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说完之后就把韦祖思给宰了。

在勃勃看来，他比姚兴强，你韦祖思见了姚兴都不拜，为何见了我就拜？可在韦祖思看来，正因为你牛逼，所以，我不拜姚兴可以，却一定要拜你。

产生于勃勃与韦祖思之间的误会，鲁迅早就用《隔膜》一文做过解释，恕不多说。

姚兴毕竟准备把自己装扮成为中原共主的模样，不得不搞了一下礼贤下士，是为弱势独裁，惟其如此，才有了韦祖思可以不下拜的理由；而勃勃则不同，他是要做天下共主的，是为强势独裁，惟其如此，韦祖思拜与不拜，都难逃一死。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对勃勃一顿臭骂，说他“虽弄神器，犹曰凶渠”。但是，不经意间我们会发现，勃勃这类人物真正算得上后继有人。他把近支亲族定位为赫连氏，远支亲族定位为铁伐氏，后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就有宗室、觉罗与之相呼应。

即便到了今天，有人放着祖宗起好的名字不用，偏偏要用“赫连勃勃大王”这类狗名在网上招摇，岂非勃勃的孝子贤孙？不过，梅毅辈说到底也只是勃勃们的不足数的粉丝，其真正嫡传的后裔往往另有其人。

既然有了勃勃的子孙，韦祖思岂可绝后？因脑残而噶屁的李敖可谓韦祖思的嫡系后裔了。

46. 琦善

有两部老电影，一部是《林则徐》，赵丹主演的；另一部叫《鸦片战争》，鲍国安主演的。两部剧中林则徐的扮演者都属于朱时茂似的浓眉大眼型。而对应的则是琦善这个反面人物，《林则徐》中琦善的扮演者

是韩非，典型的丑角儿；《鸦片战争》中琦善的扮演者是林连昆，《茶馆》里扮演捕快吴祥子，坏的留有的主儿，《水浒传》里的蔡京，一样的奸贼。总之，琦善在上述两部老电影中已经被定义为不折不扣的坏蛋。

不过，两部戏一道看下来，还是会发现前后两个琦善也有了些许不同。

《林则徐》里的琦善，一上来就是坏蛋的模样，因为林则徐外放钦差大臣，他气得直搓手，还说要找老爷子跟皇帝理论理论，也不知道原作中这位没出场的“老爷子”是谁，难道会是琦善他爹？按：琦善他爹成德，最高做到热河都统，哪里有跟皇帝老儿理论的资格？后来琦善也外放了钦差大臣，到接官亭时，穿着黄马褂，得意洋洋地叫着林则徐的字号毗牙，完全一副小人得志的派头。更有意思的是，到虎门炮台危急时，琦善在电影里被安排成“不发救兵”，直接导致了“关军门”的“殉国”，可谓坏的够可以的。

《鸦片战争》这部片子拍摄于1997年，是所谓“湔雪国耻”的年代，因而有了点所谓的“雍容”，自然琦善也连带沾光，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但到底派了林连昆来演，说起来还是底子太潮的缘故。

这部片子的导演叫谢晋，一个传声筒级别的，电影演到接官亭林则徐下船那段，字幕中打出关天培的头衔居然是“军门提督”，令人不禁傻笑。

稍微有点清史常识的都应该知道，清代提督的尊称是“军门”，军门提督这种称呼仿佛可以跟“公公太监”有一拼，如果这么叫李莲英，不知道老李会不会答应？但谢晋肯定答应了，也同意了。所以，接下来，林则徐一本正经地管关天培叫“关将军”也就不足为奇了。（按：有清一代，对关羽崇拜至极，演戏中如果出现关羽，连皇帝在内都要临时站起来，假装走一圈，以示尊崇，关羽的代号之一“关将军”是绝不敢行诸官场的。）

但这样烂的历史知识并不妨碍让这部《鸦片战争》在琦善的台词中出现了一个空前的亮点。

有一段戏是描写琦善和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怡良躲在小屋里说私房话，林则徐怼道：“当年我就是井底之蛙”，琦善立刻杀了一步说：“你以为你现在就不是井底之蛙了吗？”接着，关天培说自己不怕

死，琦善又叫板说：“你不怕死没问题，关键是你能有胜券的把握吗？”关将军也无语了。

最后，琦善嚎道：“说句掉脑袋的话，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我们至今还有人在骂琦善是汉奸是卖国贼，也就是俗称的叛徒。《历史的天空》剧中人张普景政委告诉我们说：“叛徒不就是因为说了实话吗？”

在《鸦片战争》的结尾处还故意安排了一场戏，是林则徐与琦善共同被发配偶遇在海边的场景，琦善这时又当了一回“叛徒”，他说他和林则徐虽然都没有在同英国人达成协议这件事上栽了，可结局不一样，他琦善是千古骂名，而林则徐则流芳千古。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已经用事实为琦善抹去了不实之词，大量历史资料证明，琦善并没有“卖国”，也没有受贿。相反，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却有很多不为人知（应该是故意不愿意让人知）的笑话。

然而，林则徐和琦善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因为证据和真相而改变，他们仍旧保持着他们在银幕中各自原有的形象。

由此，我们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林则徐纷纷地跳了出来，忽而大豆，忽而汽车，忽而飞机，琦善们便只好默默地在微博上小声地嘟囔两句：“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47. 齐白石的点心

当年齐白石收新风霞做干女儿，把自己积攒的钞票和点心都拿出来，让新风霞随便挑随便取，新风霞不要钞票，就吃了一些点心。据吴祖光后来回忆，齐白石的这些点心因为存放太久，都长了毛，可新风霞出于对老人的尊重，还是硬挺着吃了。

几乎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是袁二公子袁克文的。

有一次，袁克文陪老头子吃饭，他年轻吃饱了，这时候老袁又递给他一个大馒头，袁克文不敢推辞，只好强吃，吃不下咋办？暗中把热馒头往袖子给塞，活生生烫掉了一块皮。这是袁克文的妹妹袁静雪回忆的。

其实，这两件事都在说明一个道理，即《礼记》中强调的“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简约的说便是“长者赐不敢辞”。

因为是长辈给的东西，即便长了毛也要吞下去；即便已经吃饱了，还要接茬塞。

袁克文出身那样一个家庭，《礼记》是少不得学的，新凤霞文盲，但在江湖上混，也知道这个老理儿。简言之，这个东西实际已经融化到了这个族群的血液里了。

如果仅仅是给了长毛的点和热馒头，倒也不见得有多难，至多恶心两天或者像袁克文那样烫掉一层皮。假如赐你一顿打或者直接赐死呢？

由于前面有了长毛的点和热馒头做铺垫。所以，即便挨打或者被杀，也就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而且，进一步想想，这个“长辈”的“长”倘若不仅限于家长，如升格为首长、首长乃至秘书长（俗称总书记）的话，那也就更不敢辞了。

于是，一茬又一茬的奴隶和奴才们产生了。

48. 弄璋之庆

古时候，有人生了儿子，这叫“弄璋之庆”，典出《诗经》。今人读诗经的不多，但古代举凡有点文化水平的不读诗经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居于庙堂之上，要说谁不能读诗经，那基本就跟二逼差不多。

但二逼的时代总要来临，所以，就需要一个大号的二逼做领军人物。

就这样，还在所谓开元盛世时，李林甫便应运而生了。

我们都知道，唐宋两朝是盐碱地封建文明达到顶峰的时期，诗词歌赋至今还是不肖子孙们吹牛逼的剩余资本。而有唐一代的宰相，泰半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甚至还是学界泰斗级的。

即便如此，也没有挡得住李林甫的喷薄欲出。

史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意思是说文化程度不高，大抵跟工

农兵学员差不多。

他主管组织工作时看到有一句评语叫“杖杜”，就问组织部副部长韦陟：“这个为啥叫杖杜？”把杖读成了杖。韦陟当然不敢回答了，因为他知道李林甫“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老大都能读错的字，你怎么敢认识？

可接下来的这件事就更热闹了。

李林甫能够晋身全靠舅舅姜皎的栽培，姜皎的儿子姜度是李林甫的表兄弟，家里生了个儿子，李林甫照例去祝贺，祝贺就祝贺呗，这次居然还动了笔，上书四个大字“弄麇之庆”，（又作弄獐之庆）看见这四个大字的人“视之掩口”，实在不能不笑了。

之前的杖杜一词也是出于诗经的，可见李林甫根本就没读过诗经，不知道他的学习生涯是不是也是给“四人帮”起根上耽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不过，把杖杜读成了杖杜还只是限于口误，且限于他和韦陟两个人之间，等到后面的“弄麇之庆”是形诸于文字，且错的太过离谱，璋是玉的意思，而麇（獐）则是动物，这等于骂人家生了个畜生。

由此李林甫多了一个外号，叫“弄獐宰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林甫不学无术倒也罢了，他提拔重用的也都是“弄獐之流”，比如主管唐朝财经工作的萧灵就将“伏腊”读成了伏猎，人送外号“伏猎侍郎”。

因嘲讽李林甫、萧灵念了白字的严挺之、张九龄等先后都被李林甫赶出了朝堂。李林甫对大家指着外面的立仗马说：“看见没有，它们都吃的是三品的饲料，可要是谁瞎逼逼，立马就给赶出去，后悔都来不及。”大家听完都明白了，“由是谏争路绝”。

立仗马这个典故意义有点深远，林则徐在《驿马行》中还悲愤的写道：“君不见，太行神骥盐车驱，立仗无声三品刍”。

老实讲，李林甫闹出的这桩笑话，遍观史书，还真没看见哪个李林甫的

铁杆粉丝出来给他洗地。

因而，当有人用鲁迅的《孔乙己》中回字有四种写法来为今人念错字、白字作为回护的盾牌时，顿有一种“梦回大唐”的感觉，因为李林甫、萧灵他们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不学无术居然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49. 误导

英国派马嘎尔尼使团到大清国造访时，爱新觉罗·弘历就说过这样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爷们儿我啥也不缺，但考虑到你们离开茶叶不行，所以，勉强给你们点面子，让你们挣扎着活下去。

弘历在今人的教科书中尤其是他同英使的这个对话被视作“闭关锁国”的重要证据。然而，在弘历死后几十年，一个号称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同英国人抗争之初也说过类似的话，且内容更进一步。

林则徐给爱新觉罗·旻宁写的奏折中提到两件事，让弘历的这位“爱孙”印象深刻。第一，英国人不善陆战，道理很简单，他们的腿不便打弯；第二，大黄和茶叶是英国人须臾不能离开的物品，一旦离开，他们的生理机能将无以善其后。

所以，稍后在抗英斗争中，林则徐始终坚持这两条方针，针对英国人所谓“不善陆战”，他在以戴罪之身帮办浙江军务时甚至建议总督裕谦大搞“坚壁清野”，好在裕谦的脑子那时候进水的速度还比较缓慢，到底没有接受。不过，这也就成了日后爱国人士低调批评裕谦之所以很快噶屁的主要原因。

而第二条的影响就更加深远，几乎可以说是“抵制外货、张扬国货”的张本。总之，在国人心头就此埋下这样的念想——离开我们，你们根本活不下去。这其实也是爱新觉罗·弘历当年的“遗训”。

可是，后续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们知道这两条没有一条站得住脚。英国

人不但善习海战，也善习陆战，大清国的北洋舰队离开了英国总教习就变得越发颓败，英国人在浙江的偷袭成了日本人甲午陆战集中学习的标本。同时，英国人包括其他外国人也没有因为盐碱地不给他们输送大黄和茶叶进而完蛋。

然而，这种误导并没有完结，它还变本加厉辐射到其他层面上去。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近代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说，假如一直任用林则徐这样的人，就不会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假如一直抗战到底，就不会有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云云。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貌似客观的反思，比如外人船坚炮利，我们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等我们有了世界第六大亚洲第一大的北洋舰队后，才发现那些个舰船不过是为新兴国家开路而已，根本就是人家演练现代海军的靶船。比如祖宗之法不足恃，但等我们推翻了大清之后呢？迎来的是灾难多还是喜悦多？答案不言自明。

这些个误导还穿越时空活到了今天，可否算作“超级误导”？简称“超导”？

主持这些误导的人，比较高级或者最高级的通常也被称为“导师”，“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他们都愧望尘了，我们这些人呢？真的只有跟着人家的屁转了，也只好简称“屁民”。

其实，误导还有个医学名词，叫“果导”，便秘的时候吃可以疏通大肠，只是吃多了，一定会拉稀。（医嘱说：“果导不能长期服用，一般不能连续使用超过三天”）

50. 三元里

老电影《林则徐》是一部悲剧，但这部剧却有一个喜剧的结尾，那就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特别是那段旁白：“外国侵略者输入的鸦片，非但没有麻醉中国人民，反而促醒了他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这一天开始了。”中国人民是不是醒了，到今天为止，想必大家都心中有数，至于什么“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就只有呵呵了。

不过，由此我们倒真的应该好好地了解一下包括三元里在内的三场斗争的结果以及相关的内容。

根据茅海建的考证，三元里一战击毙英军5-7人左右，击伤23-43人。与之前中方的歼敌数百人之说相去甚远。即便如此，茅海建也说，三元里抗英如果仅仅按照英国方面的记载，也足以排在镇江、乍浦、广州三场战役之后，名列第四。这至少说明三元里抗英的成果是中外都予以认同的。

接下来的“乍浦之战”也令人瞠目，小小的乍浦，英国人付出了比三元里更大的代价，战死9人，55人受伤。而1842年夏季开始的镇江之战让英国人的损失较之前更大。镇江一战，英军战死39人，受伤130人，3人失踪，其伤亡总数为英军在虎门、镇海、吴淞、厦门等地的总和。

为什么三元里、乍浦、镇江这些小地方反而更能“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呢？为此，茅海建有过一个论述，不妨照录如下：“他们（指八旗官兵）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事实上，之前的三元里抗英的起因也是因为英国人动了民众的田间地头上的“奶酪”才引发出来的。

换言之，这里所激发的是“保家”的热情，由于这个家的所在，已经让这些人退无可退，正如陈胜、吴广等人所说：“等死，死国可乎”，这也才有了上述“壮烈”的一幕。清帝爱新觉罗·旻宁在披览镇江战报时重点批示：“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更属离题万里，奕山、奕经岂止满洲官兵，简直就是宗室觉罗，结果还不是闻风二百里？这跟血统根本搭不上边。

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时下的某些现象，明明大气的污染和食品的作假已经危害到全体民众的生存，可鲜有人公开出来号召大家一起与之搏斗，更不要说“壮烈牺牲”了。然而，因强拆家园派生的流血事件却层出不穷。人们一方面对于整体的沦亡漠然处之，另一方面则拿起可以拿起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小家”。其实，这才是盐碱地最真实的写照，每个人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独百姓如此，权贵也如此，例如吴三桂，国家亡不亡，无所谓，但李闯要搞我的家，搞我的小蜜就不行，就必须怒发冲冠。到后来，南明活不活，永历死不死也无所谓，但大清要逼我交出云南就不行，就必须起兵造反。

正是有了上述的基因，才会让循环几千年下来从未停止。有人或许要把板子打到制度的身上，这也不全面。

华人在国外，最关注的不是事关民众福祉、政治权益这些头等大事，而是津津于炒房、买车和酷炫。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白左们如何横行霸道他们不在意，可一旦涉及到房价的波动，维权活动一波胜似一波。

说到底，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永远都有一个跨不过去的“三元里”，他们注定只能在三元里抗英，三元里之外的事，老子管不着。这也就是“一盘散沙”的来历。

自私自利的沙们建造起来的豪宅和家国，叫“沙聚之塔”；而高据在沙聚之塔上的也只能是“沙皇”。

51. 羁縻和威慑

自古盐碱地对付蛮夷的做法无非两条，一条是羁縻，一条是威慑。玩这套把戏比较到位的是满清。

先说羁縻，所谓羁縻就是笼络和控制的意思，套现代语言，便是“忽悠”。有清一代，属于能够被羁縻的包括蒙古、前后藏以及西南夷。蒙古算“满蒙一体”，跟满洲上层联姻是既定方针。蒙古王爷那也是一景儿，封了不少，可质量有限。有的蒙古王爷号称是王爷，年俸也才2000两银子，比起正牌的满洲多罗郡王年俸5000两甚至汉人的军功诸王年俸6000两的都不可同日而语，说到底还是忽悠。

再说威慑，清军在民族边境要冲都派驻大量军队，时而还要大搞征伐，涌现一大批名将，确实慑服了很多“蛮夷”头领。

正因为搞的很成功。所以，历代满洲皇帝都为此而自豪，以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奉之为圭臬，臣属只有遵照执行的份儿。

然而，问题来了，洋人打了进来，咋办？

英法这些先打进来的，打不过人家，就用羁縻，订了若干条约，开了若干口岸，在大清看来无非是花点钱办事而已；那么，对于类似日本这种新兴的国家找上门来，就用威慑了，北洋舰队就是威慑的产物。

可是，我们都知道，不论是羁縻还是威慑，最后都没起作用，好好地一个北洋舰队还被东洋人给打沉了。

毛病出在哪儿呢？

首先要搞清楚一点，以往这些个羁縻和威慑为啥能起作用？因为你大清朝对于那些个蛮夷来说，体量够大，所以，你怎么招呼都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本钱有啊。可外国人就不同，人家的体量比你大，凭啥被你忽悠？被你收拾？你只有被人家忽悠和收拾的份儿。

其次，羁縻和威慑都是止痛药，不是消炎药，没有长性。人家之所以搞的你团团转，是由于人家有了新思想，有了新思想才会有新人才，有了新人才才会有新物件。你以为你换了个跟人家一样的新物件比如铁甲舰，就可以牛逼了？没戏，因为脑瓜瓢子还是带着辫子的。

李鸿章晚年同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他说当初曾国藩问他怎么跟洋人打交道，他回答用痞子腔。这个痞子腔其实也就是忽悠。曾国藩不以为然，说了以下一番道理：“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跎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原本李鸿章也是以为老师的教诲有点子“迂”，但到了后来他承认还是这个办法好。他说：“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

举个例子，马嘉理事件，学过近代史的都应该知道，马嘉理借探路为名窥测清朝的地貌边情，这是间谍行为，按照国法收拾没毛病。但毛病出在岑毓英身上，他本可以一开始就明确拒绝，他偏不，还搞“诱敌深入”，给他合法手续，等人家进去以后派手下把老马给暗杀了。这套阴招露馅以后，岑毓英还是老套路，栽赃给下属，临时工干的，却没想到被洋人收集了证据，统统摆到明面上了，这回赖不掉了，索性充起硬汉来了，能打得过吗？又打不过，白白赔了一堆钱，而且连逼脸都赔进去了。

李鸿章背负“李二先生卖国”的骂名却也知道一个“诚”字能够办实事。而那些高大上的爱国主义战士们则愿意去学岑毓英，这倒应了那首

诗：“江山代有傻X出，各领风骚好几年。”

52.心硬

元明清三代都有一个并非巧合的巧合。即王朝的末期均出现一位在位时间很长的帝王。比如元朝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比如明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比如清末的那拉氏慈禧太后。

元顺帝在位时间同元世祖不相上下，别说在短命扎堆的蒙元帝王中属于翘楚，即便盐碱地二百多帝王加在一起，他也是名列前茅。明神宗朱翊钧则刷新了明朝皇帝的执政年限。而那拉氏一个女流，居然也能执掌天下长达四十八年，同明万历几乎一样。且不同的是，元顺帝、明万历都有懒政、怠工的不良记录。但那拉氏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完全掌控大权。

再有一点，那拉氏虽属于“僭主”。可她成功地摆弄了三帝两后。其中，两帝一后死于她的手中，清德宗载恬就是被她直接毒死的，这点目前已经被现代科学证明了。同治帝载淳和慈安太后也都是因为她的拖延治疗导致非正常死亡。

帝后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人了。就以宗室而论，她和奕訢联手剿灭顾命大臣，一次就杀了两个铁帽子王，公开处决黄带子肃顺，按照薛福成的记载，肃顺在死前，备尝苦楚，两条腿都被打断。同盟者奕訢、奕譞兄弟轮流被她操弄于鼓掌之间，远支亲贵如世铎、奕劻更是驱使如同奴隶。老醇王府的人回忆，溥仪的亲奶奶只要一见到那拉氏，立刻双股战栗、大惊失色。

世袭礼亲王昭槿曾经犯事被嘉庆帝圈禁。后来嘉庆帝发现祖宗时代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有过量刑记录，比照昭槿一案他自己明显处罚过重，随即改正，把昭槿降低惩罚程度。这样的“德政”在那拉氏一朝已成为绝迹，那拉氏仅仅略施小计，就把贝子奕谟老两口的性命活活断送。说起来，昭槿之于嘉庆帝是早已出了五服的。奕谟却是咸丰帝的堂兄弟。

满清不同于明朝，是靠着家族的力量拿下的江山。因此，对本支亲贵都一向很重视，卷入宫廷内讧而被处决的屈指可数，特别是入关以后，除开顺治朝赐死了阿济格，斩杀了锡翰、巩阿岱，如此大规模地处决宗室贵族已不多见。即便在康雍两朝活跃的皇八子、皇九子也未便径直推上

断头台，不过是采用了掩人耳目的暗杀手段。这至少说明当时的执政者尽管也是狠角色，到底还需要穿条裤衩。

那拉氏则不同，她公布她的信条是：“谁让我一时不快活，我就让谁一辈子不快活”，她不但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

于是，就有了问题出现，为什么那拉氏能够牢牢地掌握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上人”的命运呢？

我们都知道，清朝正式定鼎中原后有过十个皇帝，最出色的莫过于康雍乾三代，这是指他们各自的政绩而言。如果就掌控权力的严密程度，这三位皇帝其实也不如那拉氏。首先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死因就不太明白，康熙帝基本可以判断为非正常死亡，谋杀的嫌疑一直未能脱掉干系。其次，三朝都有明显的“朋党”。再有，即使是清世宗，担负“弑父、逼母、杀弟”三项帽子，差可比拟那拉氏的两次宫廷政变，可毕竟没有那拉氏执政时间那么长。

换句话说，那拉氏的对权力运作的水平其实是清朝入关后首屈一指的第一人。

那么，我们就回到原来的命题上来，那拉氏靠着什么样的本领维持她的体系呢？这点那拉氏自己陈述过。有一次，光绪帝向她请教执政的秘诀，老太太一时高兴，露了点绝招，一共两个字：“心硬。”

也就是心狠。

有人或许问了，玩弄宫廷政治的有几个不是心狠的？没错，但层次不一样。

通常说来，乾隆以降，皇子们都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极少同外界接触。例如奕訢这种被吹捧为“贤王”的，在他的亲信宝鋆等人看来也不过是“漂亮王子”，不谙世事。那拉氏就不一样了，她尽管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女，可她老爹惠征时运不济，家里名义上是官儿，其实已经陷入中下层，那拉氏进宫前很是饱尝了人间底层的种种是非，这对磨炼她的眼界和手段起了足够的作用。换句话说，正是这十几年的底层（相对于王公们）的生涯让她有了比别人更没底线更心狠手辣资格。纵观历代王朝，凡是这类角色一般都是阴狠自雄。

53.“耗子扛枪——窝里横”——由桓温废立说起

桓温刚出生时因为嚎哭声音不同凡响，被当时的名臣温峤夸奖，因之取名“温”。而后他的地位远在“恩相”温峤之上，贵为“九州伯”（桓温儿子桓玄有一句发牢骚的诗句“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死后的桓温甚至还获得了“宣武帝”的伪号。

当初桓温准备灭掉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很多人都感到这事有点悬。但刘惔却认为可行，他说：“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桓温少年时代非常好赌，下手也很重，故刘惔有此说。而后来桓温果然灭掉成汉，也果然像刘惔说的那样，掌控朝廷的用人行政。

正因为成汉这一豪赌的赌局中，桓温险胜，因此等到他掌握大权之后，他盘算着下一场赌局——建功河朔，北伐中原。可惜这次赌局以完败告终，也算是桓温生不逢时，他遭遇的前秦的苻健、苻坚和王猛，前燕的慕容垂，这都是割据风云中的顶尖级人物。

枋头之败令桓温讳莫如深，史家准备秉笔直书，桓温就威胁他的后人。这还在其次，问题在于如此败绩让他无法“更上一层楼”，说好的桓温时代已然泡汤。咋办？幕僚给出了个主意，废立。

自古以来的废立被看作是“不祥”，只有少数人如伊尹、霍光才可以受到后世的谅解和称许，究其根本是因为这两个人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但桓温显然跟他们不是一个团队的。

东晋立国初期，王敦称兵犯阙，被视作反贼。可桓温走到王敦的墓前发出的感慨居然是“可人可人”，有惺惺相惜的意思。

废立历来的范围囊括荒淫无度、刚猛难制、次不当立这三种，唯独没有桓温发明的这一款，阳痿。海西公被废的理由就是委顿不能举，说起来也是历史上的一桩著名笑闻（实际也是诬陷，海西公被废后还有生育，只是不敢生养，暗中弄死了事。）。

听到桓温举行的“不世之举”，前秦君臣颇有议论，苻坚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方更废君以自说，六十之叟，举动如此，将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谚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其桓温之谓矣。”

软的欺硬的怕，不独桓温，适用于一切野心家阴谋家。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反之亦然。

54. 奴才

演员李成儒曾经对采访者说起这么一件事。有一年他导戏，让道具去给他准备一把“白虹刀”，结果道具就拿了一把普通腰刀充事。

有点清史常识的都应该知道，“白虹刀”不是寻常物件，是清初豫通亲王多铎传下来的，道光皇帝曾以此赐给老六奕訢。李成儒气愤所在是指历史戏情节可以编造，但行头必须逼真，否则观众要笑话的。

其实，不光是行头，语言也要逼真。电视剧《甄嬛传》播出已经六年，至今还有热度，它在处理一些细节问题时还是多少照顾了一下历史本源。不过，也有一些显著的错误或失误。

比如在剧中，甄嬛等后宫嫔妃们见到皇帝时，都自称“臣妾”。这个自称如果放在明朝或者宋朝的背景下，大致不错，但放在清朝就错了。

按照清宫立下的规矩，皇后虽然“母仪天下”，可见了皇帝，必须自称“奴才”。这么说吧，在大清国，除了皇太后见了皇帝可以不自称“奴才”，剩下的宗室贵族不论辈分多大，都得自称“奴才”。

举个例子，末代醇亲王载沣，见了亲儿子溥仪，也要自称“奴才”，只是因为属于亲爹，溥仪对他格外不同，称呼他“王爷”，而且给载沣的东西，不能叫“赏”，只能叫“送”，这就算是有清一代三百年天下唯一“开恩”的地方了。

“奴才”这个词儿从来就不是个褒义词。可在清朝，它的含义比较模糊，满洲官员对皇帝都自称“奴才”，含有“满洲世仆”的意思，是一种亲近的表现。汉族官员则要自称“臣”，自然也有想套近乎的，比如清雍正四年，四川布政使给皇帝上奏折，就自称“奴才”。皇帝却并不领情，直接批了五个字：“书臣字得体”。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你一八竿子打不着的跟朕套什么瓷？

有跟皇帝套磁的，自然也有不开眼的。乾隆朝的直隶布政使周元理就算

一个。

周元理与满洲官员西宁、达翎阿等人联名会奏，满洲官员自称奴才，周元理列在他们后面就自称“臣”。弘历老儿一看来脾气了，发了一通议论，这篇议论全文载于《乾隆朝东华录》。

弘历的批语是这么写的：“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

皇帝老儿的话说的很清楚，称臣和称奴才是一码事，给周元理一百个胆子，谅他也不敢标新立异，只不过借机耍个小把戏。周元理是方观承推荐上来的。所以，或多或少有点撒娇的意思，弘历的判断很准确。更主要的是，弘历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臣仆本属一体”。

《诗经·小雅·北山》中有句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臣”应该读作“奴”，所谓王臣的“臣”就是奴隶、奴才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周元理的确“矫情”了。

那为啥满洲皇帝允许汉族官员自称“臣”呢？道理也是明摆着的，忽悠而已。而为啥忽悠呢？因为汉族官员愿意被忽悠，愿意被麻痹。

清在关外时叫金，皇太极改金为清，不过也是易笔而已，金、清在汉语发音中略有不同，但在满文中则是一个字，所谓改汉不改满，金梁的《光宣小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此外，清末摄政王载沣在儿子溥仪、溥杰等出生前都给他们起好了名字，叫金耀之、金俊之，以后耀之和俊之都作为各自的字号传世。可见在清室内，金清也是“本属一体”的。

陆游死前有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后来王师的确有北定中原的那一天，只是这个王师是女真人的王师。其实，陆游也是和周元理一样“矫情”，不论哪家的王师，如何北定中原，他和他的子孙作为“王臣”的性

质何尝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

名字是可以改的，但道理不能变。

55. 远望

1964年秋，叶剑英在大连棒棰岛期间，写了一首诗。

诗曰：“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这首诗于第二年的10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受到毛的重视。毛本人在这一年（1965年）的12月26日专门诵写了该诗给毛岸青夫妇。并把诗的名字由《望远》改名为《远望》。

今天，大连棒棰岛宾馆附近的山石上还刻有毛的手迹，供各路群“雄”瞻仰。

1975年5月3日，在毛处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要叶剑英当场背诵辛词《南乡子》，当叶背到“生子当如孙仲谋”时，毛指点左右道：“此人（叶剑英）有些文化。”毛评价叶的诗是“酣淳劲爽”，可见其看重的程度。

这首《远望》虽然几处用典，但出处都在曹阿瞞一人身上。众所周知，曹阿瞞是毛最喜欢的历史人物，这还在其次，主要在于叶巧妙地将曹诗和曹阿瞞对刘表父子的评价嵌入诗词之外的国际大背景中，搔到毛的痒处。

诗中“逝翁”所指为列宁、斯大林辈，红旗飘渺自然指的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而“赤道射虎”、“椰林屠龙”又自然是革命输出。最精妙的在于结尾处，“景升父子皆豚犬”，所谓景升父子暗指苏共前后两位总秘书即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劳动党内部对其评价很低，认定其“仅为看门犬耳”。至于“旋转还凭革命功”，旋转是翻天覆地的代名词，革命则是伟大领袖的代名词。

56. “直把杭州作汴州”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少年时代背诵这首诗摇头摆尾的样子还依稀记得。而且，传统的说法往往把这首诗同宋高宗君臣卖国求荣的事例联系起来。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简约吗？

赵构的想法很直接，就是要当皇帝，不论这个皇帝对外如何装孙子，对内则肯定是君临天下，说一不二的。至于说皇帝管辖的疆土是仅限于东南半壁还是一统江山，其实也要围绕赵构能不能当皇帝或者能不能当稳皇帝这个主题展开。

由此，我们就想到了岳飞的“精忠报国”。什么是“精忠”？

关于这一点，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倒是有过一段精彩的论断。他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那么，什么又是“国”呢？有人说，国自然是国家，可国家一定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肯定是有所指。

曹操准备收杀杨彪，孔融为之劝阻，曹操说：“此国家之意也。”胡三省为此注释称：“国家，谓帝也”，（这里的帝名义上是汉献帝刘协，实际则是曹操自己。）胡三省同时在西晋元康元年专条注释中还指出：“国家，谓天子也，自东汉以来皆然。”

由此可见，国家在古代就是天子，就是老大。精忠报国，就是一心一意为天子服务的意思。

于是，问题就来了。

如何叫做一心一意为老大服务呢？或可说，服务态度服务精神到底到不到位，是不是应该由被服务的对象即老大来判定呢？显然是这样的。

所以，宋高宗给岳飞的服务水平定义为不合格，赏赐给他一个风波亭。文征明说秦桧不过是“逢其欲”，就是迎合赵构的意图，这算是定评，而邓广铭囿于书生之见以为岳飞终是死于秦桧之手便显得颇为幼稚。

即便在南宋时期，对于赵构杀害岳飞父子，朝野都是不满意的，延至后代更有人将南宋甘于偏安一隅，苟且颯颜视作非常大的耻辱。

可是这种看法也有不周全的地方。

“王业不偏安”的前提是皇帝陛下的地位不能有丝毫动摇。哪怕有一丁点的征兆都不行。而誓师北伐之于老大地位的稳固，在赵构看来，当然有危险。

首先，北伐成功以后，中兴诸将如何安置？其次，如果金人把赵桓（宋钦宗）送回来咋办？第三，谁能保证以上这两件事都能处理得不留痕迹风平浪静？

我们前面说过，国家就是天子。天子靠什么当天子？古人说：“唯祀与戎”，祀就是装神弄鬼，戎就是武装部队。所以，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直白地指出：“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中兴四大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只有岳飞是赵构亲手培养起来的，但岳飞考虑的不仅仅是老大的安危，还突然想到了老大身后的接班人安排。用姜昆的话说：“人民万岁也是你能喊的？”这还只是偏安时代，倘若“痛饮黄龙府”，岳飞考虑可能面积会更大。这点不需要假设，“苗刘之变”便是很好的前车之鉴。

金人能不能把渊圣赵桓送回来？这是假设，历史不容假设，我们也不必耗神。然而，明朝的土木天子明英宗朱祁镇和弟弟郕王朱祁钰演绎的“夺门之变”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哥哥嘴上说只要回来，安排个道教协会会长也行，可一旦尊为太上皇，想法就多了，想法一多，底下就有人该忙乎了。一忙乎，自然而然就出事了。

北伐不是关键，关键是北伐对谁有利？宋高宗赵构不北伐，为的是隐忧不成为现实；反之，宋孝宗赵昚坚持北伐，为的是摆脱干儿子的地位。有人感叹高宗朝“有兴复之臣，而无兴复之君”，孝宗朝“有兴复之君，而无兴复之臣”，纯属隔靴搔痒。

据此说来，岳飞的风波狱也冤也不冤，冤的是岳飞的确是死忠；不冤的是岳飞也的确“不解风情”，隔膜了老大的意思。相传岳飞死前还在企盼后命，狱吏告诉他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若臣疑于君而不反，复为君疑而诛之；若君疑于臣而不诛，则复疑于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棘寺，岂有复出之理！死固无疑

矣。”

这些话是否出自于狱吏之口还是《三朝北盟汇编》作者的画蛇之笔，已无从查考。但是，宋高宗赵构与岳飞君臣之间的这种游戏却仍旧没有绝迹。

57. 说一说石达开

南大的王彬彬纪念他老师潘旭澜的文章提到这么一件事。潘旭澜生前收集最广的资料当属有关吴敬梓的，可以说潘旭澜写吴敬梓基本是手到擒来了。可潘生前没有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吴敬梓传，倒是编了一本《太平杂说》，主要是聊太平天国的。这是一本小册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这本小册子应该算是整体颠覆传统太平天国史论的力作。潘旭澜从头骂到尾，除了对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稍存恕道外，剩下的全给灭了，尤其灭洪天王最狠。

同样在李秀成死前的自述中，对太平天国高级领导人的才能的评价上，李秀成也就对石达开表示了足够的尊重。

对比这两部作品看，石达开其人的轮廓也就出来了。

事实上，石达开一生最引人瞩目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天京事变中扮演的角色；一段是大渡河的悲剧。

以前，我同镛非在网上聊过一件小事，就是石达开被处决的刑罚。自然是凌迟极刑，这个出典就不用提了。我当时引了一下作家鄂华的小说《翼王伞》中的情节，即石达开他们被活剐的同时还要给烧红的烙铁烙一次，每割下一片肉，就用烙铁烙一次。我之所以相信这个小说家言，还是在于历史。

明清两代对于大逆罪最喜欢用剐刑，一则以儆效尤，二则吸引眼球。鱼鳞剐最讲究时间，要犯人活到最后一刀才能噶屁。比如明武宗朱厚照杀刘瑾，中间还允许放下来喝口粥养养精神，为的是下面的活儿能继续。

所以，烙铁烙伤口也有止血的作用，自然也是因为要让石达开活到三百六十刀结束的那一刻。

且不论有没有烙铁，就这几百刀下去，围观的都晕菜了，可石达开愣是一声不吭，曾仕和受不住了，惨叫不已，石达开还让他闭嘴。脑子多清醒。

这就涉及到石达开的死因了。

传统论述太平天国一般都是把太平天国事业的毁败归结到四个人的脑袋上，第一是杨秀清的居功自傲；第二是韦昌辉的野心勃勃；第三是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第四是李秀成的变节叛卖。

现在看这四顶帽子尽管是事实，却不是结论，更非结果。

其实，说到石达开，原本不光骂他分裂，也说他变节，就是最后大渡河这段，还有引文说石达开曾乞活，还对押解他的清朝官员封官许愿。

其实，只要看看石达开临刑之际默不作声、气场始终不变的这个细节，就知道什么变节啊投降啊，都跟他无关，因为一个要变节的人怎么会忍受这么残忍的酷刑呢？

但是，很长时间里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症结在于阶级分析论的破玩意儿毁了好几代人的脑子，脑残自然是想不出来的。

举个例子。比如石达开的出身问题，始终说法不一。这个说法不一不是说后来太平天国史研究者说法各异，而是在当年抓捕石达开过程中各种说法就没统一过。

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说石达开是献金封王，就是拿钱买官。可骆秉章则说石达开出身寒苦，就一地赖。等到现代研究太史（太平天国史简称太史）的又差不多都说石达开并非富裕家庭出身，理由是他自己还要下地干活。

这几种说法基本反映了阶级分析这套东西的根深蒂固，而且这套东西也并非劳动党贩卖过来的，而是早已有之。

骆秉章为啥昧着良心说石达开出身寒苦差不多等同地赖呢？这是由于在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的，他们要是造反就等于朝廷洗脑工作等于零，工夫白搭了。所以，骆秉章说石达开狗屁不是就等于

说石达开属于贼坯子，天生就是造反的料，给朝廷补上了脸面。张德坚说石达开献金封王也是诋毁石达开没啥本事，同时顺带着骂了一把太平天国，你看，给钱就封王，什么玩意儿。

等到现代版评价太平天国就又不一样了，太平天国成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之一，太平天国的首脑们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既然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怎么可能出身地主或者富农呢？必须是工农联盟里面的。所以，石达开绝对不准出身富裕阶层。

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有点常识，或者稍微梳理一下有关石达开出身的证据，就不难看出他们苦心编造谎言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东西。

骆秉章之所以是石达开是痞子是地赖是无知的群氓，回避的是石达开读书启蒙自觉投身这场大闹剧的本质；而另一截然相反的观点即石达开不是富农不是地主，而是农民出身的观点同样遮掩了石达开读书明理的核心。

换句话说，作为底层游走的石达开是没资格自我觉醒的，更不可能通过读书和实践去主动参加一场新款游戏的。这也就等于警告其他人，不准随便读书，不准随便实践，不准随便觉醒。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石达开的确出身富裕阶层，张德坚撒了一半的谎，献金封王，封王并非全然献金，但献金却是事实。石达开正因为身处富裕阶层，自然而然比普通平民能够看得清楚满清的症结所在，同时也由于石达开源于外乡人，受本地富户的欺凌，这样，远因近因都具备了。也正是因着石达开的自我觉悟，才会有他屡次三番拒绝清廷方面的招降。

石达开是被清方公认的不很附和拜上帝教那套东西的首脑，这也正是后来评论者不敢轻易触及的地方。这也就是石达开比较太平天国其他首脑更值得琢磨的地方。这更是石达开一条道走到黑的原动力。

清廷方面对招降石达开一直是不遗余力的。曾国藩、骆秉章这些头面人物都出动过，李元度还几次三番纠缠石达开。直到大渡河兵败，骆秉章还不厌其烦地“开导”石达开，希望他做个张国梁。我们都知道，石达开兵败的时间是1863年，距太平天国的覆灭仅有一年左右，攻陷天京在清军看来已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他们还这样耐心招抚石达开，目

的只有一个，石达开是一个榜样。

什么榜样呢？一个通过自我觉悟自我觉醒走上对立面的榜样。这种人一般都要具有胆量、才干和义无反顾的决心。我们都听过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石达开这样的榜样投了降，才可能真正让大清朝放下心来，否则有样学样，岂不坏菜？

可惜，他们都打错了算盘。

石达开从起反那天起就看透了满清的内里。所以，他始终坚拒不降。杨韦事件后，他也看透了太平天国。所以，他最后采用“天命”来解释自己的败亡。

说到底，兵败大渡河之际，石达开已经死心了。唯一在他看来还值得一做的就是保全跟随了他这么久的属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抱着赌一把的心理听从了杨应刚、王松林等人的安排。只是这一次，他上了骆秉章的当。当然也不是完全上当，石达开麾下的人马虽然被杀了两千多，可还遣散了一大批，一般认为是三千人，但刘蓉否认有三千之多，不过，至少有一批活了下来。

盐碱地理解的“气节”比较狭隘，也比较单一，通常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评判。即便是这样，在骆秉章给清廷的奏报中也可以看出，石达开一直对清方的招抚嗤之以鼻。因而，“变节”这顶帽子是扣不到石达开的头上。

这里就不得不引出另外一个人的结局，即石达开的老部下李秀成。

关于李秀成是否属于变节，历来都有争论，比较神奇的是罗尔纲的判断，他认为李秀成是诈降，大约是准备模仿姜维。

以前读《罗尔纲传》时，南大的学生见了罗尔纲都说见到了太史的老祖宗。可这位“老祖宗”的史识的确有些“脑残”。

姜维面对的是谁？是钟会。钟会他爹是谁？是钟繇。钟繇是谁？是曹操的恩人。魏明帝曹叡即位初期，曹魏的常委班子排名是这样的：钟繇、曹休、曹真、华歆、王朗、陈群、司马懿。钟繇排名远在司马懿之上。

所以，司马昭兄弟在其他人眼中或许可望不可即，但在钟会眼里不过是同为世家豪门的哥们儿而已。曹氏衰亡，北方的天下理应出在这些世家豪门手中，钟会同司马昭一样有资格问鼎。

况且，钟会起反时多大年龄？三十几岁，正是敢想敢干的，曾老头呢？53岁了。

这么大岁数的历史上有起兵造反的吗？也有，比如西汉的吴王刘濞，比如康熙朝的吴三桂。可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是汉景帝刘启的堂伯，在那时的西汉是宗族的大家长；吴三桂又是谁？是出身辽东武将世家，其本人又是行伍出身，一贯行走江湖。

这两个人的背景又岂是学者官僚出身的曾国藩可以比拟的？

据此看来，李秀成要诈降学姜维，要么是李秀成脑子坏掉了，要么是研究李秀成的人脑子进水了。

曾国藩的后人提供了一条史料，即李秀成劝曾国藩称帝，这也就是学学吴三桂的例子。事实上，这也才符合李秀成本来的面目，他的见识也就到这里为止了。

然而，这条史料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有更多的史料证实，曾国藩兄弟刚抓到李秀成时就准备立刻处决他，只是由于有了那份自述材料，才勉强让他拖了一段日子，最后还是处以凌迟极刑。李秀成临上刑场，写了绝命诗，监斩官庞省三笑话他的诗不合韵律，多少说明了李秀成的方寸已然乱了。

为什么说了这么多李秀成的事情？为的就是说明一件事，石达开在面对自己的结局，要比李秀成清醒的多。此时此地的石达开根本就没有价钱可以跟清方谈，只有就死一条道。既然是就死，那就一定要死出个样子来，不活今生，也要活个后世。

在这点上，李秀成彻头彻尾就是个糊涂蛋。他的那点子心思出发点要么是趁乱再捞一票，要么就是苟活，自然也不排除他准备扶保曾氏兄弟称霸割据的念头，可在曾氏兄弟看来，他配吗？

千古艰难惟一死。在临门一脚上，石达开是看的最透的一个，在他的身

上有些后来瞿秋白的影子，他们都是绝望型的，正因为是绝望，才更令后人生出许多同情。

若干年后，戴笠、胡宗南、汤恩伯暗自结纳，订立同盟，写过一首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事后，戴笠拿着这首诗送给毛子水看，毛子水夸这首诗写得好，可以比得上石达开的“扬鞭慷慨立中原”。可见，尽管时间过去了七十年，在另外一批政治人物眼中，石达开仍旧不脱一个英雄。

我们前面说过，石达开不脱一位英雄。但是，这位英雄的人生之路何以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呢？

石达开在主持安庆工作期间，一改太平天国愚顽、残刻的制度，在太平天国内部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的同时也给清军高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应该说，石达开身上打着一个无法磨灭的烙印，改良。

关于天京事变中石达开扮演的角色，《李秀成自述》中提出石达开是应该参加了杨韦密谋的，而《石达开自述》则否认了这一点。

不过，要从石达开回京后对韦昌辉的那一番指责来看，石达开无疑是参与了密谋的，否则他也不敢那么理直气壮地对韦昌辉的大开杀戒指手画脚。

洪杨起反以来，太平军上层始终维持“三驾马车”的态势，即洪秀全为主，杨秀清、萧朝贵为辅。在这三驾马车中，洪秀全无疑是最有实权的，这同以往所谓洪秀全属于“虚君”的观点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如此，为了遏制杨秀清的“天父代言人”的地位，洪秀全把认在名下的干妹妹洪宣娇许给萧朝贵，称之为“帝婿”（上帝的姑爷子），以萧朝贵天兄代言人的身份阻遏杨秀清的势力。可惜，长沙一战，萧朝贵噶屁，三驾马车成了双峰政治。

定鼎南京后，洪杨出于各自的目的，并没有允许韦昌辉、石达开递补萧朝贵、冯云山的遗缺。这样一来，洪杨之间的矛盾便逐渐升级。根据赫志清的考证，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密议杀掉杨秀清的“黑会”应该在“一破江南大营”之前，这个观点现在看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在密议中的三个角色也是各怀心腹事。洪秀全的如意算盘是推倒杨秀清，利用韦昌辉、石达开，并不真正准备赋予他们取代杨秀清、萧朝贵的地位；韦昌辉的胃口则是以杨秀清第二号人物为目标；石达开同他们都有所不同，他愿意看到的是改良的结局，即杨秀清滚蛋，重新恢复三驾马车的规格，互有补偿，互有牵制，不至于一股独大。

可是，接下来上演的大戏都没有按照三人的既定设计发展，杨秀清固死，杨秀清留下的巨大权力空间却不允许哪一个人随意可以填平，至少在洪秀全看来，韦昌辉不行，石达开也不行。

旧有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一般判断韦昌辉主导天京变局期间发出由洪秀全批准的对石达开的通缉令是迫于韦昌辉的淫威所致，并非洪秀全本意。这种观点既陈腐也错漏，事实恰恰相反，洪秀全本人至始至终大面积地掌握着变局的全面航程。

韦昌辉仅带了三千人的队伍秘密回京，这样的人数最终让两万多人丧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洪秀全手中掌握着另外一支数目可观的武装才是彻底覆灭东王府的主因，也正是因为洪秀全掌握了这样的力量，才有可能在石达开“勤王靖难”的前夕于南京城内一举收拾了韦昌辉。

洪秀全一方面假意允诺韦昌辉“接班”，另一方面准备借韦昌辉之手干掉石达开。在洪秀全看来，石达开的能力和威望远在韦昌辉之上，收拾了石达开，再来对付韦昌辉，属于小菜一碟，事后发展也是基本如此，韦昌辉缺乏基干武装，更没有多少人马愿意死心塌地地追随。

石达开也正是囿于天京密议和洪秀全的假面目，这才冒险从前线返回，险些被韦昌辉杀掉，但家属却成为牺牲品。杀掉石达开的家属，洪秀全不可能不知情，如果他愿意本着三头密议的既定方针走的话，韦昌辉不敢轻易造次，但洪秀全并没吭气，只是惨案发生后顺水推舟地将全部祸水泼到了韦昌辉的头上。

等到石达开起兵靖难，洪秀全趁势端掉韦昌辉以自赎，洗清自己的罪状，继续维持其正面形象。并拉拢秦日纲、陈承谔作为备胎，随时扼制石达开的势力的蔓延。

即便这时，石达开还在坚持改良的做法，坚持杀掉天京事变的替罪羊秦

日纲、陈承谔，这既是给自己局部报仇，也是将自己一边的正面形象整体切入。不论石达开的这一招是否有抄袭洪秀全的迹象，但吃亏很大的明显是洪秀全。洪秀全精心设计的一举捣毁老兄弟同盟的结果居然被石达开给破坏了，而且石达开被拥戴为“义王”、“圣神风”、“通军主将”，等于借尸还魂，成了第二个杨秀清，最麻烦的还在于石达开不同于杨秀清，他既没有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历史，也没有在杨韦事件中沾一点鲜血，反而是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在道德层面上连洪秀全都无法望其项背。

“熟饭给人吃”，这在洪秀全来说，是不论如何都不能咽下，他必须拔除石达开这颗眼中钉，这便有了洪仁达、洪仁发乃至后来的洪仁玕兄弟的出场，洪秀全以不翻脸的表面行使了彻底翻脸的内里，即洪氏江山再不容异姓插手。本来，当初起事时是约定了的，洪杨肖冯韦石都是国之血亲，磐石之宗，所以，韦昌辉石达开的兄弟们一般都被尊称为“国宗”。但到了这一步，洪秀全不准备再承认了。

于是，石达开不得不考虑下一场的改良。

洪仁达、洪仁发封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首义诸王自不必说，秦日纲、胡以晁封燕王、豫王都是因为军功，且一旦出现问题马上降为天燕、天豫。张德坚将天京城内的诸王分为四等：

一等：东王、西王；二等：南王、北王；三等：翼王；四等：燕王、豫王。

史式在其著作《太平天国史实考》一书中举《永安封王诏》来批驳张德坚的看法是谬误，倒是反衬出史式看待史实的迂腐和不通。

虽然永安封王时说了东王以下诸王俱受东王节制，但这也只是表面。西王萧朝贵不同于南王北王翼王的是他有“天兄”附体，即他有同杨秀清一样的宗教地位，“天兄”一旦下凡，杨秀清即便身为“天父代言人”也要跪接圣旨。只是萧朝贵早死，这才成就了杨秀清独尊的局面。

在首义诸王中有一个外人不了解的内情，洪秀全比照耶稣二弟、冯云山三弟、萧朝贵帝婿、杨秀清四弟、韦昌辉五弟。当初封王诏书说的也很清楚，东王管理东方各国，西王管理西方各国，南王管理南方各国，北王管理北方各国，翼王羽翼天朝。可见，石达开的翼王也只是辅佐的地

位，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核心层。

但天京事变打破了这一传统。而天京军民共戴石达开为“义王”更打破了洪秀全的迷梦。洪秀全执意封两个哥哥为王正是为了矫枉过正，这是表层，深层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异姓王必须下课。

下课不意味着下野，在太平天国的字典里，下课意味着下世。

由此，石达开才将天京事变中洪秀全通缉自己的往事与当下排挤自己的现实联系起来，进一步看清了洪秀全的本来面目和自己未来可能做出的选择。

在如此生死系于一发之际，石达开还是选择了改良，即出走，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但却与洪氏兄弟不再相见。是谓惹不起躲得起。

如果说当年金田起反石达开已经踏上了英雄末路的话，那么，天京事变后的出走让石达开彻底在这条末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天京事变后，清军阵营多次给石达开来信请石达开站过去，石达开没同意。洪秀全拿金牌招他回去，他也没同意。因为石达开很清楚，清军是要他身子，洪秀全是要他脑袋。但石达开不清楚的是，他已经别无选择，他已经踏上一条死循环的老路。

石达开不是李昭寿、陈国瑞，更不可能成为吴三桂。李昭寿、苗沛霖这些人，清军也只是用其一时，一旦大事底定，立刻卸磨杀驴，这与清初干掉马逢知、刘泽清是一个道理。但石达开与这些人不同，石达开自奉是有信仰追求的，这也是即便他暂时投靠清军，清军也最终容不下他的道理所在。

至于洪秀全那边，之前已经讲过了。总之，石达开是一个不兼容的重金属。

那么，石达开的抱负追求在哪里呢？在于开辟第三条道路。这也就是石达开尽管率军出走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却并不尊奉太平天国的所谓“革命路线”，尽管敌视清军，却也没有在清军的关键薄弱处采取猛烈打击。

他抱定的宗旨虽然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很清楚，但历史却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在摸索一条改良的逃跑路线。

其实，最后他窜入四川，与其说入川复国，毋宁说是苟安残喘。四川本来就是偏安割据的天然良港。然而，历史还证明了石达开跑错了方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跑偏。

因此，在石达开出走的日子，朱衣点、汪海洋、彭大顺、童荣海这些人才会背他而去，实在捞不到前途了。而一直跟着他跑的除了新兵蛋子就是死忠派。这也就是石达开为何会选择以自己的自投绝地来换取麾下数千人的性命的另一层原因。

石达开是一个英雄，但英雄的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脑残。

在盐碱地，走改良的注定是脑残；走革命的注定是坏X。

因为盐碱地是没救的，谁救谁先死，石达开死的那么惨烈，就在于脑残始终认为盐碱地还是有救的。

后人读史到此，也许没意识到凌迟石达开的那一刀刀实际是人人有份的。

58. 明初李善长案中出现的常识

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不能没有常识；一个社会可以没有真理，但不能没有真相。

朱元璋在干掉胡惟庸以后，又陆续干掉了一大批功臣宿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李善长。

李善长是洪武功臣中排名第一的人物。

明洪武元年正月，李善长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太子太师，国公，徐达副之。随后，徐达出征，李善长一个人单独主持中书省日常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年十一月徐达还京。洪武三年，李善长改封太师，丢掉了中书左丞相的位置，洪武四年，李善长退休。

也就是说，自洪武四年正月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案发，长达二十年的时

间里，李善长已经基本离开第一线了。

杀李善长的罪状公布的是：“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同时还有一个补充材料，“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有人说天变示警，应该移除大臣应变。这个“有人”是谁呢？怎么个来头呢？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当移大臣”这四个字被有人改了一个字，“移”改为“夷”，当移大臣就成了当夷大臣。夷即灭的意思，一字之差，千里之别。只不过，这个“有人”又是谁？谁敢这么大的胆子动了御笔呢？

然后，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给宰了。

李善长死后半年，王国用上奏，据说这是解缙替他写的，为李善长鸣冤。原文有点长，不照录了，就具体解释一下。

王国用奏章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讲的是功名利禄；第二层讲的是疏不间亲。

人活一世，都为了功名利禄，李善长也不例外，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生封公爵，死封王爵，儿子娶公主，女儿嫁亲王，皇帝以下就是他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辅佐胡惟庸打天下，捞到的好处也不过如此吧？那么为毛他还费二遍事遭二茬罪呢？李善长如果缺心眼，可能，问题是他缺心眼吗？

凡是打天下都是冒着杀全家的风险，二十多岁或者四十多岁的李善长没想明白，难道七十多岁了还没想明白？

从古至今，超过六十岁造反的只有两位，一个是西汉吴王刘濞，一个是清初平西王吴三桂。

但要搞清楚一点，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当时起反，他是刘氏家族中最年长的一位，论辈分也在汉景帝刘启之上。吴三桂是辽东军阀世家出身，身经百战，尽管败多胜少，且世守云贵是爱新觉罗家族不敢正面面对的话题。

李善长一老百姓家的苦孩子，他有这份胆量吗？有这种黑色基因吗？

于是，王国用就递进了第二层意思。疏不间亲。

李善长同朱元璋是亲家，同胡惟庸啥关系？

平素里写错了一个字都要挨板子，这次王国用长篇大作，矛头所指，朱元璋居然“不罪也”。没把王国用和王国用身后的解缙给办了。

李善长一案告诉我们的常识是，七十岁以上的普通居民出身的人，尽管爬到了很高的位置，也不可能具备造反决绝的狠心。而凡是利用这个背景下做文章的不是傻缺就是二货。至于听信这类传闻的更是连傻缺都不如。

59. 狼群效应

不知道从啥时候算起，盐碱地对狼开始大谈特谈了。不过，想想匈奴人开始管大头领叫狼主，说明时代并未走远。

有人拍过一张照片，是雪地上狼群的走势，很有意思。

走在前面的三头老病残，接下来是几头比较抗打击的中青年骨干狼，再然后是大队人马，头狼走在最后。

由此被某些脑残解读为头狼最勇敢，居然亲自殿后。

只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问题可能马上就不一样了。

一旦遇到袭击，老病残三头必然被干倒，然后中青年骨干狼顶上，再然后大队人马顶上，而这些狼在厮杀过程中给头狼留下了足够的思考时间与空间，一旦出现不讳，头狼立马掉头转进。

这样的队形，真的很符合盐碱地一贯的风格。

而且，一般说来，老病残通常都很容易被忽悠成为先锋的，比如那什么联盟来着？那什么基础来着？

中青年骨干狼也是难逃忽悠之列，他们误以为前面有老病残顶着，后面有头狼压阵，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行进，结果呢，他们在袭击中一样也是炮灰，且最早中标。

从上个世纪的那场巅峰运动的结局看，只有头狼成功转进逃遁，剩下的都全军覆灭。

盐碱地喜欢狼，殊不知狼群就是他们的宿命，成群的狼做掩护，掩护狼主撤退，每次都上演这样的节目，一演就是若干辈子，还长盛不衰，狼主永远被歌颂，狼群永远当垫背。

难怪人家说：“喂不熟的狼”。

不长记性，咋办？

60. 电视剧《命案十三宗》

二十年前拍摄上演的这部老电视剧《命案十三宗》最近又看了一遍，感触随之而来。

这部剧的题记和结尾都在拼命渲染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必须学会克制，学会冷静。

他们努力绷住掩饰的恰恰应该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十三起命案中，除了第一起属于伤害者个人问题外，剩下的无一例外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

即社会治理。

从拍摄到的这十二起案件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似乎熟视无睹却又经常被有意识忽略的地方，社会治理的低能甚至无能。

什么叫社会治理？简单说，就是减压阀门。社会治理搞得好，就是多几个减压阀门，多几个出气孔。反之，就是缺少减压阀门乃至没有出气孔。

十二宗命案里，家庭伤害的占三起，这三起中有两起是丈夫殴打妻子，而且公婆还极端护短，妻子投告无门，只能采取激烈手段。

校园暴力一起，起因是高三学生高野嫉妒王鹏与女生李莉交好，伙同他人殴打王鹏，王鹏气愤之下，捅死高野。

还有两起是涉嫌抢劫与伤害的，原因都是要账，对方欠账不给，受害者雇凶绑架未果导致杀人。

此外，还有一起是打牌期间，双方发生口角，一方找人殴打另一方，另一方寻仇报复，误伤他人致死。

以上这些案件，在发展发生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忽然之间都不见了，就像他们在收费加码时忽然都同时出现一样，这大抵就是人们常说的“不约而同”吧？

如果所谓的妇联，所谓的乡村一级政府部门能够在妇女遭受欺负的时候出现，如果学校能够在弱势学生被欺压时出现，如果政府管理机构能在交易双方产生矛盾时出现。等等，那么这些惨案还能发生吗？即便发生，还能这么不约而同的导致同一后果吗？

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有两层，一层是监督，一层是制约；这两层不是单向的，而是双边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要遵循这一原则，他们之间是互动的体系。

对照盐碱地目下的情况，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社会治理这个概念，有的只是饲养员对猪狗牛羊们的看管。所以，谁见过猪羔子和狗崽子可以敲登闻鼓的？当然算是“非法”了。也所以，人家才说嘛，建国后的不准成精。

也正因为没有社会治理这一关键环节，其所表现出来的低能与无能便不可遏制地社会生活中制造出大量的戾气和恶气。一旦这些戾气和恶气得不到应有的挥发，那就一定在某一时间段迸发出来。

人们或许认为这种戾气或恶气的冲撞仅仅存在于底层，其实也一样存在于上层。比如刘少奇，他在遭受冤枉时也只能寄希望于所谓历史，挥舞着那本一纸空文的宪法读物向侮辱他的人们进行苍白的说教，旋即被带到该去的地方打疫苗了。还比如林彪，他面临着刘少奇还不如的下场，最终也只能铤而走险投奔敌国，成了匹凸匹的张本。

再比如四人帮等人的作恶，所谓党内健康力量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无能为力。只有等到他们的后台老板囍屁朝凉后，才敢采取连四人帮一般都不敢采取的突破底线的方式解决了他们。当年用“粉碎”这个词用的的

确好，确实是粉碎，几十年下来，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宫廷政变。岂非粉碎？

眼前这两起公共事件中彰显的特征同《命案十三宗》里的表现是一样的。

一直以为，命案十三宗这个名字少了一个字，少了一个亿字。应该叫命案十三亿宗。因为每一个人都已经具备了作案的潜质，也都具备了被作案的可能。或许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61. “深可畏”

正因为缺少常识。所以，每逢重大转折阶段，总要有些江湖神棍跳出来胡说八道、危言耸听，以至于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应该更多强调的是运用常识判断事物。只有把自己的头脑用常识武装起来，才会识破谎言，不至于被人家牵着鼻子乱跑。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期间，即长兴三年，大理寺少卿康澄上了份奏折，里面提到“六深可畏”。原话是“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

翻译过来就是：好人都跑了，深可畏；行业都乱了，深可畏；上下蒙蔽，深可畏；毫无廉耻，深可畏；没有真相，深可畏；真话不爱听，深可畏。

这段话讲在一千多年以前，但它仍旧有保持不变的新鲜，为啥？因为它说的是常识。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人调侃“摸着石头过河”，认为有桥不走为毛摸石头过河呢？诸如此类的吧。但似乎没有人深究为什么会有这个论调的提出，或者说这个论调的大背景是什么？

劳动党起家靠的是宣传。用毛自己的话说：“当曹操的官，做刘备的事”。在民间，管这叫“挂羊头卖狗肉”。

狗肉能不能卖出，不在狗肉本身，全在于羊头。

毛时代最经典的挂羊头营销模式是“抗日救国”，为了挂好这个羊头，连领章帽徽都换了，连名字都改了，甚至准备连名义的领袖都改成蒋委员长。最后很成功的进了城，且还有锣鼓。

但毛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盐碱地内部无论怎么闹，最终都要有一个如何面对世界的阶段，这步棋就由邓来下了。

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做给盐碱地猪狗牛羊们看的，因为他们也看不懂。之所以搞摸论，核心是做给美国人和西方看的，让你们看到哥们我也学好了，准备搞经济了。

配套的措施是不当头，不输出革命，不搞冤大头援助，等等。这套祖宗家法传了三代。终于把摇摇欲坠的江山给包装成了大赢国。

可如今由于越来越厉害了，至少是自己觉得很厉害的那种，不打算继续摸了，也不打算装了，羊头虽然继续挂，可明显露出狗头的模样来，还呲牙。于是，接下来的事情还很难判断吗？

传统社会凡是丢了祖宗家法的，一般结局不用太高的智商都能明白的。

62. 历史上的果报

所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虽然在一些人眼里这是迷信色彩很浓的东西，但千百年来似乎尚无更准确的定义来解读这些历史的巧合。

秦灭楚，王翦杀项燕，殊不料若干年后，王翦的孙子王离却被项燕的孙子项羽所擒。秦国最后的一位天子叫子婴，曾素车请降于刘邦，也不料若干年后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小儿居然叫孺子婴。

汉献帝即位前封为陈留王，日后曹魏末代皇帝曹奂即位前也是封为陈留王。曹魏一生以孙、刘为死敌，魏明帝死前身边宵小竟然一个叫刘放，一个叫孙资，正是这两位将曹魏一半的天下送与司马懿（堵住了曹宇即位的可能），仿佛宇文周时代的郑译等人。司马氏平天下以灭蜀肇始，竟不料，西晋亡于刘聪（僭汉政权，并非汉室宗室，托名而已），东晋亡于刘裕，总之都是死在姓刘的手里。东吴开国鼻祖孙坚封乌程侯，东吴末代孙皓也封乌程侯，以乌程侯始，又以乌程侯终。而“汉中开汉业”，刘邦以西蜀取道天下，最后汉家天下也终于西蜀。

杨坚覆灭北周，杀尽宇文氏子孙，却没想到两代以后，杨家竟被宇文文化及兄弟所除，虽说此宇文非彼宇文。李渊、李世民父子从杨家手里取得政权，传到唐玄宗时也被杨家人所祸乱。朱温屠灭李唐宗室，自己子孙也死于姓李的手中。北宋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攘夺大印，其结局也是孤儿寡母被收入大都。

朱元璋自谓“驱除鞑虏”，妥欢帖木儿北逃外蒙，老朱一高兴谥为“顺帝”。只是老朱没想到的是后来取他们朱明天下的竟然也叫大顺帝，且也姓李。朱棣建都北京，传到最后一代也是木字旁，即朱由检，即便是南明永历也还是木字旁，朱由榔。满清入主中原是一位太后、一位幼主、一位摄政王，清末丢了江山的也是一位太后、一位幼主、一位摄政王。满清用反间计杀了袁崇焕，制造天下奇冤，没想到晚清逼皇帝退位的居然也姓袁。

自满清入关以后，为反清复明，多数人托庇洪武大号，所以会有洪门等人会党组织出现。而满清末造，洪秀全便出来造反，虽然给灭掉，但辛亥年间到底出了一位黎元洪，包括袁世凯称帝，年号也选了一个带有“洪”的字眼，洪宪。有意思的是，满清当年靠的是洪承畴引路，后来却被姓洪的赶上绝路。

事实上，满清末代，民间便开始传说，以“洪范五行，五百年当有王者兴”，朱洪武之后又是一个五百年，“洪荒古国泰阶平”，姓洪的当有天下，只不过，这个洪既没有应在洪秀全身上，也没有应在黎元洪身上，更没有应在洪宪帝袁世凯身上，最后应在了红军身上。

63. 明代的文化专制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喜欢从反面接受历史教训，说起来也是无师自通的“天才”或者“超天才”。元朝因为搞阶级压迫和民族征服所以垮台，而朱元璋则认为元朝之所以完蛋不在于这些，却在于手中掌控老百姓的绳索还不够紧，光菜刀挂号有个屁用？关键在于洗脑，只有文化专制才能让权力一杆子捅到底。

朱元璋掌握天下不久便开始大兴文字狱，直到他死后，一般士大夫都把希望寄托在明惠帝的身上，可惜的是这位比较喜欢知识分子的建文爷只在位区区四年不到就给一位“英果类己”（朱棣即位后编造朱元璋语录，说他爹当初夸他“英果类己”，显示其天命攸归）的朱棣拿下，朱棣用枪

杆子取天下自然看不上笔杆子那么“摇唇鼓舌”，而且因为朱棣上台太不讲究，所以，只能用快速肃反的方式弄死一大批文人墨客。据《明史》记载，连楹刺杀朱棣不果，尸体直立不倒。关于这点后来的史学研究者都认为这是“迷信”抑或“胡扯”，其实这并非迷信也非胡扯，《明史》虽然号称“奴才修史”，但这点上却也说了人话。因为若干年后，《阿诗玛》的作者，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在文革冤案中惨死，其尸首就出现过惨烈的这一幕，在场目击者多达数百人。“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谁要因此再说这是迷信，这是胡扯，显然是要对抗群众了，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切记切记。

朱棣噶屁以后，知识分子缓了一阐，因为接班人朱高炽一向也很同情他的堂兄建文爷，同时也很同情那些被整得七荤八素的知识分子们。哪知道因为朱棣生前对朱高炽管理过于严格，缺少偷腥经验的朱高炽在欢乐之余居然不幸中标，成为封建史上因操蛋而公开殉职的绝少的皇家烈士之首。更让知识分子为之一哭的是接班人朱瞻基是一条披着文化外衣的大灰狼，处处打着“绳祖”的旗号，处处却把文化专制进行到底。

文化专制伴随着明代社会的转型，由于商品社会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文化专制发酵之后所形成的两大趋势始终成为明代中后期的重色调即玄幻小说的泛滥和色情低俗文化的通行。其代表作就是《西游记》和《金瓶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动辄碰壁，知识分子们只能一边向太空要空间，一边向床第展示魅力。至于群众的选择，似乎也在这两点上打转转，毕竟这样更为保险一些，久而久之，也自然上瘾了。所以，明末的士大夫的特点被形容为九个字“改个号、刻部稿、娶个小”。也所以，当满清铁蹄踏入中原的那一刹那，“天崩地陷”也就无法避免了。因为大家早就烂掉了。

64. 底线的较量

高中学《世界历史》，当说到马赫迪大起义中，苏丹义军一举击毙双手沾满世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戈登于喀土穆时，大家都面有喜色。的确，戈登这个名字往往同外国侵华的罪恶史连在一起，比如火烧圆明园。不过，戈登也同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那就是李鸿章苏州杀俘事件。

太平军兴，曾、左、胡、李等人厕身其间，以“道济天下”自诩，湘系军阀阵营中的“宣传部长”罗泽南尤其推崇屠杀，还经常鼓励属下抓到太平

军俘虏要学会“摘心致祭”，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宁可错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罪恶教条便逐渐弥漫在南中国乃至全中国的上空，有学者就专门考证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矫枉过正”说其实从湘淮军阀起家的步伐中已经可以找到脚印了。

因此，当李鸿章大肆屠杀苏州被俘太平军俘虏高达数万人的消息传开以后，他的老师曾国藩居然大加激赏，称之为“眼明手辣”，这大概也是湘淮军阀一向标榜的所谓“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的根本逻辑吧。不过，戈登作为“外教”，作为曾经参与摧毁世界文明史上璀璨一角的圆明园的小歹徒却勃然变色，同李鸿章闹了纷争，甚至拔枪相向。戈登闹事的理由很简单，他指责李鸿章背信弃义。事实上，“杀俘不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直被强调的内容。当然，这里面也应该有戈登自认为洋人的“尊严”受到挑衅这一层面的因素。

不过，这在李鸿章看来，委实小题大做了。因为第一他杀掉的是太平军，太平军是“乱贼”，换言之也就是“不是人”的意思；第二，就算太平军俘虏是人，那也是中国人，中国行政当局杀掉中国人难道还需要外国人的批准吗？第三，孙子兵法上说兵不厌诈，可见在战争中撒谎扯蛋是正常的操作手段，有啥大惊小怪的？李鸿章的观点随即得到了重臣们的支持乃至获得朝廷的认可，戈登脾气更大了，推辞了李鸿章送给他的奖金，意即封口费。一段时间后，经过中间人的斡旋，戈登尽管不再计较苏州事件，可仍旧没有领取清廷赠予他的其他部分的奖金，尽管他收取了其他诸如顶戴花翎一类的奖赏。

李鸿章在苏州到底杀掉了多少太平军战俘，至今也没有详细的数据，《李鸿章传》作者苑书义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就杀害太平军三万人”，他还为此引证了伶俐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及赵烈文的日记，引文过长，这里就不再重复引出了。李鸿章如此大规模的残杀手无寸铁的战俘，休说在今天，就是在历史上，他的前辈白起、项羽等人的做法也从来不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封建史书上的，作为饱读经史的曾国藩、李鸿章之流是应该清楚这一点的。不过，他们也同时清楚另外一点，那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这句话平行移植到现代，也就是“汉奸走狗，人人得以诛之”、“反动派坏蛋，人人得以诛之”。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群人、一批人一旦被扣上了诸如这类义正词严的帽子之后，他们的生命权利可以忽略不计。再有就是，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手握重权、提领重兵的“高人们”看来，中国政府处置中国人，外人无权插

嘴。

当时不仅戈登反对李鸿章的行径，即便是清军内部副将郑国魁也愤而托病不出，后来李鸿章找到太平天国纳王郅永宽（又作郅云官）的脑袋，重新祭祀，并且安顿好郅永宽的儿子，郑国魁这才勉强答应出面主持郅永宽的遗体告别仪式，并当众哭祭郅永宽说哥们我没欺骗你，骗你的是别人云云。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卡廷森林事件”和“南京大屠杀”都是以屠杀战俘以及平民而“闻名”的，主持这两起屠杀的刽子手们至今还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李鸿章呢？

之前力主为李鸿章翻案的是梁启超，如今力主为李鸿章正名的是袁伟时，有趣的是，这两位学者都是广东人，李鸿章本人晚年也出任过两广总督。梁启超因为“受恩深重”并且亲笔回复李鸿章对他的“大恩大德”，吹捧李鸿章固然可知。而袁伟时，大抵则是出于对老父母的“遗爱”？不得而知。只是我知道，举凡在广东施惠于当地的人或者本乡本土的不论他们在其他地区受到何等非议但至少日后都会受到广东地区的学者们的偏好，李鸿章如此，谭甫仁也如此。由此我想到，中国民主思想启蒙运动为何屡屡夭折？或许与他的发源地启于广东不无关系，历来搞山头，闹宗派的多半无此气度撑起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

有学者如雷颐辈通常将李鸿章在苏州杀俘事件的表现归结为“故李、戈二人观念之别非个人品性之别，乃时代之别也。”真的是时代之别吗？雷颐还说：“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李、戈冲突40年后的1904年，已开始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在这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抛弃、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中国是不是像雷颐说的那样“逐渐抛弃、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尚不能确定，但要说“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李、戈冲突40年后的1904年，已开始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应该不正确。至少发生在1904年以后若干年里的宋哲元杀俘较之李鸿章更为惨烈，也更为血腥。只不过，有一点与李鸿章杀俘雷同，那就是没有哪一届政府对宋哲元的这种行为提出过公开谴责，反倒是杀俘的宋哲元今天还在享受着准抗日英雄的待遇。我不知道在李鸿章屠杀战俘的苏州，是否有一个地点明确标有这些冤魂遇难的遗址？恐怕没有吧。然而，李鸿章“高大”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的放在人们的面前，近读钱钢等人所作《大清留美幼童》一书中再度对李鸿章的“苦心孤诣”大唱赞歌，我们并不反对赞美李鸿章的正确，只是应该提醒这些自谓民主昌明的学者，李

鸿章苏州杀俘斑斑可考，你们茶余饭后扯鸡巴蛋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这些？

中国传统政治评价历史人物有个奇怪的套路，小人物犯了章法，往往一言定罪，哪怕是放个屁也被确定为污染环境。而大人物则不同，比如李鸿章，他苏州杀俘这一点如果放在客观、公理的天平上足以让他身败名裂。可在中国的传统史书上，李鸿章苏州杀俘与后来的“洋务引进”活活像两团猪肉瓣子被抛在秤盘子上，左右一对比，好，功大于过，于是，李鸿章“胜出”，至少属于说不清一类的。由此让我们想到当初美帝审判萨达姆时，老萨的获罪只有一条，即屠杀平民。当年，戈登及其同伙指责李鸿章杀俘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让我感到“滑稽”的是，戈登居然“幼稚”的同李鸿章这种中国政坛高层“人士”谈“人性”，真是不知今夕何夕了。

如果说李鸿章杀俘尚处于李鸿章未同西方大规模打交道，未染洋化之初。那么，当他晚年别负使命去俄罗斯联络感情时的一番表演则更进一步说明了戈登等人对他的评判是何等的入木三分。1896年，李鸿章访俄，莫斯科发生严重挤踏死人事件-霍登惨案，李鸿章问俄国重臣维特是否将此事汇报给沙皇了，维特说汇报了，李鸿章旋即不以为然的现身说法教训维特为他讲解“为官之道”-“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这是维特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诸如“可怜的皇帝”一类的用词想必应该是维特个人加上去的，以李鸿章的为人，当着外人何敢用这种词汇形容“今上”？不过，我们仍旧可以从维特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中看到李中堂的那副“得意”，他苏州杀俘是发生在1863年，时隔三十六年之后，在“人性的彻底背叛”上李鸿章并无任何改变。

65. 从万启琛的职务更替看《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的浅近之处

邱涛所著《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一书旨在叫板罗尔纲等人早年就清末政治格局定下的“督抚专政”的调子，洋洋几十万字，又有若干序为之撑腰，但仍旧难掩其浅近和不通，唯一让人能够真实的感到的是作者的哗众取宠与似是而非，关于这本书，在博客中我已

经谈过一次，这回仅就书中所列举的“万启琛职务更替”一事做简单的评述。

在书中，作者花了四页多的字数来论述万启琛的职务变动是清廷基本完胜曾国藩的旁证。原文可以从该书第127-131页读起，此处不赘。我在这里可以按照作者强加给历史的意图为万启琛的任职更替列一个简要的说明。

- 1.清咸丰五年，曾国藩向清廷保荐万启琛（时任江西候补道）协运江西省盐运，清廷为控扼曾氏计，任万为湖北督粮道，隶官文名下，曾氏反击，清廷改任万启琛留在江西办理饷盐；
- 2.清咸丰十一年，曾氏保举万启琛担任安徽按察使，清廷同意，曾氏旋即上书阻止万启琛履行“来京陛见”的规定，清廷照准；
- 3.清同治二年，清廷调万启琛为江苏布政使，曾氏不允，经多次折冲后，清廷勉强允准；
- 4.清同治二年十二月，清廷再度调万启琛为江宁布政使，口气森严；
- 5.清同治三年九月，万启琛赴任江宁。

从以上列表可知，万启琛原本不过是曾氏幕府中人，官位最初不过是“司局干部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根本不在朝廷的视线之内，可为了他的任职，清廷居然多次与曾国藩周旋，期间有退让，有前进，有暗器，有明攻，可谓机关算尽。我们不妨把眼界放宽一点，上溯到道光、嘉庆乃至乾隆年间，区区一个盐运使或者候补道，值得朝廷如此绞尽脑汁吗？又有哪一个封疆大吏敢于如此与中央政府掰腕子到底？这件事本身已经昭示出清廷权力下移，督抚势力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清廷与清同治二年四、五月间关于万启琛任职江宁藩司这件事时，颇费笔墨的陈述了清廷的“黜陟大权”的力度所在，作者认为第一回合，清廷勉强在四五月间保全曾氏的颜面，可转眼不过半年，即清同治二年十二月，清廷再度旧事重提，仍旧坚持万启琛去江宁赴任。而后，作者没有提到曾国藩的表态，只是说“清廷……而是着眼于分化、钳制湘军集团，这从万启琛于同治三年九月赴江宁布政使，四年八月就被免职，……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该书第131页）

作者在讪讪强辩的不经意间为我们透露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清廷同曾国藩交涉万启琛调任的时间伊始于清同治二年四、五月间，而万启琛履行清廷的指派时间则是清同治三年九月。那么，为何清廷下达谕旨的时间是十二月，而万启琛却足足拖了九个多月才去上任呢？

当我们进一步梳理曾国藩的粮饷机构时，就会发现，邱涛所采用的“选择性失明”的方式陈述历史实在是太小儿科了。据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的粮饷机构》一文中记载，“李作士的银钱支应所也随之迁往，安置在停泊于大胜关附近江面的两条船上，专门负责围攻天京的吉字等营的粮饷供应。同治三年九月，上述银钱支应所随曾国藩大营迁往江宁，改名金陵粮台，作为湘军的总粮台，由江宁布政使经管。”换言之，清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总粮台设在江宁，由江宁布政使管理，这才是万启琛被曾国藩同意撒手前往江宁赴任的主要原因所在。说到底，万启琛的去留还是取决于湘军集团的利益走向，决定万启琛个人行止的不是什么清廷，而正是曾国藩及其湘系集团。如此一来，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清廷的绝对威权不再，督抚专政势头难当吗？

66. 列宁同志停止思考了

革命导师列宁死了以后，老毛子们都很难过，当时他们提出了一句话叫做“列宁同志停止思考了”，猛看上去好像不如咱们老祖宗发明的“龙驭上宾”一类的牛逼，但仔细一琢磨，还别说，老毛子的是有一套的，难怪我们说那时候要“以俄为师”。

“列宁同志停止思考了”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思考”，也就是说在硕大的俄罗斯国土内，只有列宁同志配用“思考”二字，作为列宁的战友和部属乃至他的接班人，都不用“思考”，你们只需去完成列宁的“思考”或者说不不断的解释列宁的“思考”，至于老百姓就更不用“思考”了，领袖挥挥手，你们跟着走。有领袖在“思考”，还用你们跟着忙乎吗？

“龙驭上宾”，等于说皇帝老儿是龙，可龙本身就是个怪物，这表面上是夸皇帝，其实是骂皇帝不是人。可“思考”就不同了，谁都知道，只有人才能思考，动物哪儿有思考的？列宁同志停止思考了，这就是把领袖归纳为人。而领袖以下自然就不是“人”了。

67. 胡适是那么容易学的吗？

现在颇有些中年学者喜欢以胡适自命，熊培云在他的《自由在何处》一书的前序中写过有人称赞他的文风像鲁迅时，熊不以为然，却认为有朝一日假如有人称之类似胡适而欣欣然（原文大意如此）。有个叫邵建写了本《鲁迅与胡适》，对胡适极尽吹捧之能事。事实上，毛当初批胡适的时候就曾戏言，胡适在二十世纪末应该会得到平反，不料戏言成真，只是这些人如何学得了胡适？

胡适号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以，高调提倡“自由”的一些人就以胡适为楷模。殊不知，胡适的“自由”本钱极高，眼下的这些人的小本经营要学胡适不过是一种白日做梦的奢望。

科举废了以后，形成“学荒”，一则为学位之荒，一则为学问之荒。在遍地文盲的中国，忽然来了一个美国大学问家杜威的弟子，当然都要高看其一眼。放眼今日中国，有几个准备师法胡适的具备这样的底子？有的人或许要反驳，我们学的是胡适的自由精神。老话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肉体没有精神固然是行尸走肉，但精神要是没有肉体罩着，那还不成了精神病？（如今有人说什么自由的心为肉体所桎梏云云，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了肉体“桎梏”的心不就是酱猪心吗？）

胡适一生提倡“自由”，可也一生清醒自己面临的背景以及背景延伸开来的成败利钝。所以，他死命抓住美国这棵大树，因为他知道在二十世纪的世界，美国无疑是最强悍的，事后证明，胡适这点看的很准确。也正因为此，他可以被人唾骂却不会由此身陷囹圄，他被人责难却能最终走上神坛。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适认为身处中世纪的中国无论如何不能与日本斗到底，于是只能低调。然而，后来他看到美国人的态度变了，再于是就高调。陶希圣形容汪精卫和少数迷途知返的低调分子是这样的：“一杯毒酒，我喝了一口知道是毒酒就不再喝了，而汪先生则硬着头皮喝光。”那么，胡适呢？他只不过用手晃了晃毒酒杯，等美国人的答案出来后，胡适便说那是毒酒。

“崇美”并非贬义，崇拜强者或者说走实权派路线是人类的通病。胡适之前就有梁启超，这跟投机也靠不上边。只是需要眼光，需要定力。胡适有这样的眼光，也有这样的定力，今天的老夫子们是否还能如此幸运呢？其谁能知？

胡适唱了不少反调的对象是国民党，王奇生说国民党政权是“弱势独裁”，其所以“弱势”，与国民党一直坚持摇摆地走上层精英知识分子路线有很大的关联，傅斯年等人可以冒充“大炮”炮轰权贵，冯友兰可以劝诫蒋介石实行宪政等等本身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基调下，以胡适的身份，以美国的荫庇，唱反调是有风而无险的。说的再具体一点，胡适面对的是蒋介石或者说蒋家父子，蒋一生为人所诟病的毒害知识分子的案例大抵有三个，一曰杨杏佛案；一曰史量才案；一曰李闻血案。现已披露的史料足以证明杨杏佛案与政治无涉，李闻血案与蒋无涉，貌似只有史量才一案尚在混沌中。退一万步说，即便三个案子都落在蒋的头上，纵观朱元璋以来的迫害文人的历史，蒋实在是“弱势”的很了。他既没有光大朱棣的“诛十族”，也没有师法弘历的“文字狱”。因此，胡适完全可以放开胆子“异调独弹”。

对于中共究竟如何，胡适既没有像储安平那么傻的行诸于笔墨，也没有像傅斯年那么猛说了出口。当何去何从摆在1949年的胡适面前时，胡适选择了走，这个行动也足以说明了胡适对于中共的态度。而此时毛给胡适开出的价码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尽管今人考证说胡适面对空载而来的飞机放声大哭，但结果则是胡适也没有跟着蒋家父子去台湾，而是先行去了美国。这可以叫“待价而沽”，也可以叫“审时度势”。后来发展的态势证明，胡适的眼光再次看准了，蒋介石需要胡适去撑台面，因为有了这一条的做底，尽管蒋经国破口大骂胡适，尽管雷震一案牵连胡适，胡适仍旧能稳坐钓鱼台。

论对中国本土学问的精深程度，胡适比不了很多大牌的学者，甚至连他的学生吴晗也未必比得上，但论起二十世纪各派力量之于大牌知识分子的计较这点，胡适无疑是最上乘的。

一直以来总是习惯说学习某人在于学习某人的精神，其实这是屁话，真的要学某人还是要从某人的皮毛学起，何谓皮毛，是为盔甲。只有轻易不被人害，才能学习到底乃至学成。胡适的盔甲无外乎三件套，一件外甲曰靠山够硬，一件内甲曰眼光够准，（知道对人弹琴而非对驴弹琴，成语叫对牛弹琴，牛不懂至少哼哼而已，驴则不同，它还不但尥蹶子，还要伤人），还有一件护心甲曰后路够多（三十六计走为上且能走得成）。三者缺一不可，愿意学胡适者不妨对照检查。自然，那些仍旧愿意学习胡适的“自由精神”的例外，安定医院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

68. 自由在梦中

最近不留神看到了一本书，名叫《自由在高处》，作者叫熊培云，是南开大学的一个副教授，还是硕士生导师。这是作者一些散论的合订本，看了一半了，感觉题目应该改叫“自由在梦中”似乎更恰当一些，也更不至于误人子弟一些。

做梦是人人皆有的权利，但要把做梦当成现实去告知别人，多少要冒点风险，告知的人有风险，被告知或者相信的人就更有风险。

举凡谈论类似自由、民主一流的东西都不该离开大背景，尤其是文化背景。何谓文化？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习惯、习性。几千年下来的中国文化中可曾真的有过真的民主、自由？

事实上，非但没有，而且有的都是它们的对立面。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科学、平等的憎恶从骨子里远远超过对专制、等级、愚昧、残暴的憎恶，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想来还应该算是一句实话。而且，如将专制偷换成集中、等级偷换成秩序、愚昧偷换成朴实、残暴偷换成严管，那么接受起来一定是很轻松的。

千百年来不乏为自由而战的人，但这些人细数起来是有分较的，一部分人为之而战与其说为大多数而战毋宁说则是为谋夺个人或者小集团实权而战更确切一些，当然即便目的纯然为此，也一定要打着为大多数人而战的旗号，否则哪会有那么的缺心眼的人跟着你跑来跑去？至于另一部分人是谁，刚才已经说到了，那都是些“缺心眼”的盲从者，最终都将成为垫脚石。

所以，今天如果还要有人在这里大言不惭的地倚着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高谈阔论自由的好处，我以为要么说教者本身有问题，要么听众本身有问题。因为大师早就说过：“没啥悬念了，洗洗睡吧。”

69. 贝利亚被捕的历史复制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嗝屁朝凉以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别取代了斯大林的两个职务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生前的确担任过苏共中央总书记，但那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职务，列宁之后斯大林很快就又称为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名书记，而非总

书记，当然他虽然名列书记，但却是实际的当家人。可是，当斯大林死讯传来，中共方面公开发布的讣告却仍旧称斯大林为“总书记”。

清朝的皇帝的正式称呼是“大清国大皇帝”，到了民国不再叫皇帝，而叫“大总统”，事实上外国自有总统制以来，只听说过“总统”，没听说过“大总统”，可见，“大总统”云云也是从“大皇帝”而来。由是观之，斯大林头衔“总书记”的翻译也并非笔误了。

现在前苏联的一大批档案已经解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最早开始对斯大林破口大骂的并非赫鲁晓夫，而是贝利亚，这位后来被一度形容成为恶魔的贝利亚在斯大林身后的半年时间里做了很多“纠偏”的工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贝利亚的“纠偏”就像后来者反对袁世凯、蒋介石的“独裁”一样，并非反对“独裁”本身，而是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翻版。

可是，很快就有人不让贝利亚玩下去了，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等人将贝利亚抓起来，再后来就是审判和处决。明初开国文臣宋濂因孙子的原因被牵连下狱，孙子问他平素教导我们多读书，多读书为何还有今日？宋濂说那是因为没读过“兔死狗烹”的书，所以才有今日。公元1861年，那拉氏勾结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其原理同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的联手几乎如出一辙。

举凡集权者归西，留下巨大的权力空间需要填补时，一派意欲独大往往其下场总是不妙的。更何況这一派还在设法推陈出新，那就更加速其覆灭。独唱团改为合唱团，要求的是“合”，尽管这种“合”是面和心不合抑或同床异梦，但形式上必须如此。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贝利亚死后二十三年，江青等人再度上演了这一幕，这之后，果郡王又接茬演了一次。贝利亚是外人，“不学之故”是否恰当不好讲，如江青、果郡王之流好歹也是“内人”，竟然也不学。而更不学的捧臭脚的至今还在捧，那就不仅仅是“不学之故”了。

毛在五十年代访苏时，赫鲁晓夫的专车司机后来追忆一个情节，在车上毛忽然问赫鲁晓夫，贝利亚的人头可否留下来？赫鲁晓夫当即急了，秃噜秃噜地解释了一大堆，毛的神情颇不以为然，好歹念在人家是老大哥的面上，伟大领袖没有说起“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肃反政策”。只

是，二十年过去之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可否被留下人头了呢？

前苏联流传一个笑话，列宁问斯大林，你能肯定我走了以后同志们都会跟你走吗？斯大林说我肯定。列宁说你为何如此肯定。斯大林说如果他们不跟我走，我就让他们跟你走。现在看斯大林还是比较客气的，毕竟给同志们留了两条路可供选择。而有的人只给同志们留了一条路，那就是不管跟不跟他走，他都会让你们跟着列宁同志走到底。

70. 戊戌政变的历史教训

我们经常说要吸取历史教训，其实是扯蛋，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从正面吸取过历史教训。所以，这也就是历史悲剧一个接一个的重演的原因。

有清一代，宫廷政变从头演到尾，但大规模的屠杀也仅限于皇太极统治初期。入关后开始装逼，总喜欢弄点“兵不血刃”一流的玩意儿，虽然同样惊心动魄，可第一档案销毁工作做得很好；第二当事人处理结果比较完美；第三时间比较短。总之，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不再轻易上演。包括戊戌政变，名曰政变，其实死的人数非常有限，而且上层一个都没碰到，比辛酉政变还简单。

为啥简单，道理也很简单，实力相差过于悬殊。以前总是说顽固派如何强悍，维新派如何软弱云云。如果跳出这个既定的圈子，有没有想过维新派过于“强悍”的问题呢？也许用“强悍”二字不够恰当，用“冒进”似乎就妥当多了。

在那拉氏而言，无所谓维新维旧，只要大权在握，爱谁谁；在光绪来讲，随着年深日久，他的合法地位只会受到不停的确认；在荣禄，他做的最多的也只能弥缝帝后，和稀泥，换句话说，也只有帝后并存的局面中，荣禄才会一直很保险的活着；在督抚，最不希望看到强干弱枝；在列强，只有中国四分五裂，他们抢起东西来才会格外顺手。总之，形势的要求是必须分着来，谁也不能强出头。

然而，这时候维新派意外的火了，他们不但火了，而且还放出话来说要杀几个大官，变法就可以推行了。事后证明“围园杀后”的计划也应该是这一思想的后身。问题本身不在于“围园杀后”对不对，而在于你能不能完成这一宏大工程？如果你完成不了或者完成效果很差的话，你有什么补救措施没有？显然没有，后来看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三十六计走为

上。而且，我们都知道，搞政变这玩意儿不同于卖大碗茶，不是说谁叫唤的凶残，谁就有市场，相反正如民间所说的“焉狗咬人”，能咬死人的狗往往不随便呲牙。可惜我们看到的是一堆京巴儿的底子的哥们儿不停的向藏獒们流口水呲门牙。

应该说王照后来大约是有有点想明白了，他的回忆录里没有明说但也点出了个苗头，维新派无论如何不该将炮口对准那拉氏至少不该那么早地对准老太太。

事实上，王照还没有说透。维新派最不该的是过早地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幻想通过官办媒体将其意志贯彻到底，因为这样一来，对手们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企图，也很快的抓到了他们的把柄。什么“维新”，一言以蔽之，就是两字：夺权。也就这两字足以让那拉氏转向了。所以，成熟的政治家在没有把屁股坐稳之前从来不露出自己的底牌，模糊是他们那时候最大的本钱。

其次，也是最大的臭棋即在于让维新派唯一的靠山光绪皇帝暴露在各种火力点交织下。光绪是被那拉氏给害死的，不论是口碑资料还是科学化验，这一点今天已经可以完全证实了。可是，最早将光绪推到那拉氏枪口前的正是维新党人，用韩文公的话说：“爱之适以害之。”

维新派的资源本来就稀缺，光绪这个金矿本来也该省着用。可惜的是维新派动辄就把“皇帝”祭出来，光绪即便再有策略，那也是裤裆里露黄泥，不尿（是）也尿（是）了。何况光绪的策略还几乎等于零。

很难说那拉氏不想动光绪，但有一点那拉氏撼动不了，那就是光绪的法统地位。虽然光绪是那拉氏一手扶上去的，可一旦上去了，牌位就立起来了，立起来容易，拿下去难。后来刘坤一不就公开告诉荣禄“中外之口难防”吗？可是，光绪出“错”了，给那拉氏找到了借口，即便废立不成，但光绪完蛋是肯定的。而光绪的完蛋则钉死了维新派合法地位的棺材盖，只要满清在一日，他们就碍难翻案。

历史上的中国用“老大帝国”来形容并不过分，其专制历史之老旧，专制规模之宏大，外人是无法全盘了解的。作为专制统治者来说，他们不断勒紧自己手中的枷锁，明朝中后期尚且出现过张居正这样的权臣，虽说是昙花一现。可这种局面在清朝统治完全确立后却从未出现过。外戚、宦官、藩镇这些曾经侵扰过专制者的顽症在清朝几乎都被灭绝。

所以，在这样一个老大帝国传统日臻成熟的国度里，试图企盼出现些许先知先觉的思想者、思考者来撕开一两个口子，让自由民主权利见缝插针般生长无异于白日做梦。而试图仰赖这种模式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也就注定了他们必然夭折的命运。

像这类老大帝国最终从实质上而非形式上轰然倒塌，只有借助一种途径，那就是自上而下的开始解冻。因为官方的威信无所不在，专制者为群氓设置各种镣铐的同时，群氓也不断的自觉配合洗脑，所谓“不用扬鞭自奋蹄”。惟其如此，也只有在官方权力下移的过程中才可能透出一丝空气。

其实，光绪虽不是这一途径的最佳领路人，但也是一款很好的招牌。只不过跟随他的人或者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责任，盲目地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然，这一机遇尽管在十九世纪末丧失了一次，而后却以另外一种面目交替出现过，可悲的是，它也被丧失掉了。归根结底，这就是文化，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宿命。

71. 闲聊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什么？就跟日本鬼子差不多。

你说说，皇军能不抢粮吗？可能吗？

散民就幻想着三条，一条是皇军不抢粮，自己种点自留地；第二，皇军抢粮时带着他，顺便也捞点；如果前两条做不到，那么最好知道皇军抢粮的规律。

可你这不是做柬埔寨梦吗？中国梦好歹老大说过，跟美国梦还相通来着，你做柬埔寨梦，最多跟鸡巴越南相通，有用吗？

第一条肯定没戏，皇军百分之百抢粮，不抢粮，皇军吃啥？

第二条也肯定没戏，凭啥带着你？你是伪军还是狗腿子？

第三条更没戏，皇军的规律那是机密，你要是整明白了了，地球人还不都知道了？皇军自动失业。

最惨的莫过于你如果真的被鬼子给抢了，好歹还有咱八路军、武工队或者乡亲们给你做主，东挪西借还能帮衬着你点，可要是被上市公司给抢了，不但自己账面拉稀，舆论还骂你投机，最后家里埋怨你傻逼。你说你咋办？

2001年央视播出一个节目，“献给六千万残疾人”的节目，当时股民人数正好六千万，看见没有？送给谁呢？送给你们呢。外国人怎么说来着，“别问丧钟为谁敲响。”

股市早多少年前我就说过，就像我们上中学学的一篇课文《截肢与输血》一样，截你们自己的肢，给皇军输血。

72. 苏共防止斯大林主义复辟的三个关键人物

部队有个思考者叫冯建辉的，他临终前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针对防止“个人崇拜”的，这本书固然对“个人崇拜”到了切齿的程度，却又对曾经为破除个人崇拜立下头号汗马功劳的赫鲁晓夫破口大骂。赫鲁晓夫是挖祖坟的，对他如果不破口大骂的话，真的就会像《我爱我家》中傅明老人忧虑的那样：“我的追悼会还开不开了？”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封建宗法观念和制度如果不遭到彻底的根除，所谓破除“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那只能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像苏共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要破除个别领袖人物的“迷信”与“崇拜”，民间的知识力量和思考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依靠或者只能依靠上层的解决，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道理很简单，民众对于上层的迷信与盲从已经到了相当程度，只有掌握原始资料和档案的人张嘴，民众才可能接受铁一般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说，赫鲁晓夫无疑就是这么一个应运而生的历史人物。

为什么说赫鲁晓夫是“应运而生”呢？因为时间。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一块坚厚的锉刀石，它让一些物质都会在此磨损。斯大林死于1953年，假如没有赫鲁晓夫揭开盖子，让斯大林的形象继续维持十几二十年以上，那时候再想掀盖子已经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了。

正是在斯大林身后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赫鲁晓夫掀开了盖子，让斯大林的形象轰然倒塌，出自一位斯大林亲手培养并送进预定扶植轨道的

苏共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赫鲁晓夫之口的历史资料像匕首一样刺中了多数人的政治心脏。有资料显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甫一曝光，英共便自然瓦解。

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人开历史倒车，将苏共的历史带入停滞阶段。斯大林的老兵们也纷纷粉墨登场要求翻案，布琼尼发表在七十年代初的诋毁、咒骂杜缅科的文章重新问世。凡是看过苏联老电影《第一骑兵军》的都应该知道，在那部电影中，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被美化成为苏联骑兵军的代表人物，而历史则告诉我们，苏联的骑兵军的鼻祖是杜缅科，布琼尼当年也只是杜缅科的助手。然而，在政治清算的岁月里，杜缅科遭到他的助手后成为斯大林顶尖亲信的布琼尼的诬告进而受到极刑的惩罚，在此之后，布琼尼取而代之成为骑兵军的老祖宗。1964年，在赫鲁晓夫的干预下，杜缅科得到昭雪，布琼尼只好一声不吭。可是当1970年被麦德韦杰夫等人称之为“悄悄地改变”的时代的来临之际，布琼尼发表在《苏共历史问题》杂志上的文章再度大骂杜缅科的“叛卖”。

种种迹象表明，苏共的历史倒车的车轮已经启动了。但就在这时，安德罗波夫按住了刹车，他叫停了试图为斯大林悄悄恢复名誉的举动并且影响了苏共中央的意见。惟其如此，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大会报告中，斯大林的名字才被提及一次，惟其如此，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斯大林才会一如既往地当被当做“负资产”遭致苏共中央的遗弃。

继安德罗波夫之后，最后一位破除或者说铲除苏共历史上“个人崇拜”根基的人则是戈尔巴乔夫。记得有一年在红场，一位苏联年轻人被外国记者问及对斯大林的印象时，这位年轻人略带调侃的口吻说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对斯大林感兴趣了，我们如今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轮到列宁？”

而事实上在有的国家里，这以上的三个人物早已成为绝响。所以，即便照抄前苏联，恐怕也是一个梦而已。

73. 儿童节有感

已经在若干年前便不再过儿童节了，因此对儿童节的印象也就自然越来越淡漠。不过，前几年因为当上了亲爹，所以对儿童节的关注便又开始了。

这一关注才发现，原来六一这一天能够这么规模如此之大导致“普天同庆”程度的国家的确不多，万幸的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服膺上选。

从量身订做的新闻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大们都又戴上了久违的红领巾（有的其实在少年时代从未戴过，比如咱们的江爷爷、李爷爷等），又回到被指定的儿童群落中去，载歌载舞，高兴得一塌糊涂。

我记得小时候唱过一首歌《快乐的节日》，就是儿童节那天学会的，其中一句歌词“亲爱的领袖华主席，同我们一起过呀过这快乐的节日！”据我们幼儿园音乐老师说当初他们小时候唱的时候，这句歌词是“亲爱的领袖毛主席”。可惜的是，这首歌学会不久，华主席他老人家就从我们幼稚的视野中消失了，他老人家那一笔写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的“狂草”也被规规矩矩的楷书给替代了。如今这首歌这句歌词已经修订为“亲爱的叔叔阿姨们”，而我倒觉得如果经常在“亲爱的”后面更替不同名字的领袖人物那该多好，多么体现“与时俱进”这一伟大的号召。惜乎、惜乎，我等屁民名卑位贱，如此热忱竟不能上达天听、感格天聪。

在国外的很多日子里，特别是一些欧美国家，还没有哪一个这么热烈的庆祝儿童的节日。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儿童在多半时候都在过节。在这些国家里，对儿童的重视程度不敢说到了空前，至少也该是相当程度，自然儿童本身也没有等级之分，不是说你爹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就玩命尊崇你。

在这些国家里，当然也有阴暗的角落，也有儿童的劫难，例如众所周知的性侵案，每年都有发生。但小学校长或者中学校长多次玩弄幼女或幼男且还能引发各种乱七八糟争议的倒真是少见。而停靠在各色马路附近的高大的校车中也几乎未看到或未听到被撞翻、撞毁乃至一死就是十几个的例子。更在印象中绝无仅有的是还未见哪一个西方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为儿童受害作出重要讲话，想到这里，我等屁民为生活在中国梦的中国孩子们道一声，你们太幸福了。

以前网上流传过一个“爱民月”的笑话，屁民问警察说啥叫爱民月？警察回答爱民月爱民月就是爱民一个月。

那么，我等屁民歪想了一下，儿童节估计永远不会成为“儿童劫”吧？

74. 抗大分校校长的身份验证

韦君宜在晚年所作的《思痛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思痛录》第19页

关于这位韦君宜回忆中的“文革全家惨死”的抗大分校副校长到底是谁，始终存在着疑点。这里涉及到抗大的历史沿革。

按照韦君宜的记忆，这位抗大分校副校长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驻绥德的分校副校长；2.1943年时至少在任；3.文革中全家惨死。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自1938年至1945年，一共创办过十四个分校。这十四所分校中符合驻绥德且在1943年的只有第二分校和第三分校。这两所分校都是1943年归建总校，驻绥德。

而第三分校的校领导名单中根本就不设副校长一职，校长之下只有教育长（张振风，1941年11月离任）和政治部主任（李志民，1941年10月离任；继任者黄志勇，1941年11月离任）。

再来看第二分校，倒是有个副校长，大名鼎鼎，邵式平，他在1943年还在副校长任上。但邵式平本人在文革前1965年即以病故，何谈“文革中全家惨死”呢？更不会“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此外还有一个第七分校，它的确在1943年1月由晋西北迁回绥德。但很快就搬到陇东的合水县建校了。第七分校校长之下设有副校长，叫喻楚杰，此人建国后一直在铁路系统任职，曾历任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铁路工会副主席等职，1984年去世，享年87岁。也谈不上“文革中全家惨死”，喻楚杰全家福照片网上就有，大家不难查找。

由此可见，韦君宜回忆录中这位抗大副校长其实是不存在的。但这不等于说韦君宜回忆中的这件事不存在，因为结合上下文，韦君宜关于这

段“逼供信”的回忆不似作假。但同时也可能由于年深日久，韦老太太将说话人的职务记错了也未可知。

75. 《南渡北归》读后

三大本《南渡北归》，总算看完。不过，印象不深，有点感想就此谈谈。

作者在开篇之际，用调侃的手法写了一下张学良。调侃人物可以，但调侃史实则需要功夫。书中说张学良在1930年底荣升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且说这是因着“中原大战”张学良助蒋的功劳所致（原文大意如此）。

区区几十个字的地方就错了三处之多。而且都是硬伤一类的。首先，张学良担任的不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是“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出处很多，不胜枚举。这里需要说一个常识，国民党军与执政党的军队官称上有些区别，比如人民解放军有总司令、副总司令，但国民党军海陆空军总司令之下就是“副司令”。1930年11月23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报抬头就是“张副司令汉兄勋鉴”。

其次说张学良“荣升”陆海空军副司令也不准确。当时谁都知道，蒋介石是在拼命拉拢张学良。张学良在军阀混战中举足轻重，可以说张倒向谁，谁的胜算就会大很多。本来就是国民政府迁就张学良，何谈“荣升”二字？这里不妨举两封电文为例。一个是国民政府命令发表的1930年6月23日，中央命令发表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再一个便是1930年7月3日，张学良已表示拒绝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从这两封电文来看，张学良是不以就任这个“副司令”为“荣”的。

再有就是张学良就任副司令的时间，作者说是1930年底，其实这个很好查找，张学良传记满大街都是，稍微看一眼就知道了，1930年10月12日。如果硬要说十月十二日算是年底的话，咱也没脾气不是？

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描述傅斯年的祖宗傅以渐时用了诸如“权倾朝野”之类的词汇，不够准确，或者说基本不对。《清史稿》中傅以渐的传记不过区区百余字，内中透露的信息老傅当年也只不过一个高级侍从文人而已，顺治年间，殿阁大学士不过是聋子的耳朵，那时节地球人都知道满清掌权的核心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手中，以后转到了军机处，有清一

代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不谓真宰相，且这还是军机处成为最高政府首脑机关以后的说法，清初入关就更遑论一般了。

后来《清史》编委会搞了一个《清代人物传稿》，分上下两编，目前上编已经出到了第十卷，里面集中了清入关前到乾隆朝几乎全部的重臣和要人，何以不见“傅以渐”，何以不见傅以渐“权倾朝野”？

作者是山东人，对于同属山东的傅斯年多有好感，笔下常有“山东人”如何如何的论调，倒也正常，可史实到底是史实，凭着史料说话的，不能因为你爷们是山东人便可以随便开抡，对吧？

老实讲，写民国这些大牌知识分子的书一个是尺度不好把握，一个是行文难于拿捏。就我个人看法，《南渡北归》这本书的文笔一般，比起章立凡笔下的民国人物差了不少，比如章立凡写的“布衣傲王侯”的张季鸾等便很值得一看。

这种书因为不完全是史料的堆砌，更要有现在流行的所谓“人文关怀”，说白了，就是要“娓娓道来”，仅此而言，该书没有达到这种层面。

另外书中对于李敖的评价很有意思，值得一提，这也代表了作者在内的一批人的风格，同时也验证了“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这句名言。

作者在正文中就对李敖没啥好脸色，注引中借用他人之口说李敖是“政客中的文人，文人中的政客”云云。话语间流露出一层意思，就是说李敖之所以今天这么狂，还能狂下去，委实要拜托台湾的背景，如果放在大陆早些年代注定囫圄朝凉，如此还这般卖乖，实在不值一晒。原文网上就有，大家不妨去参详。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应该如此。

作者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李敖自称他的人生不可复制，也的确是在台湾那种背景下的不可复制，如李敖当年留在祖国大陆，其人胆敢叫板执政当局，其下场不问也知。但这里我们要引申一下，是不是说李敖因为拜托台湾的民主形式便无需这般“翘尾巴”了？是不是就此谦逊做人或者低调八尺便不给人以“矫情任算”的印象了？再或者说据此便不再是所谓的“政客中的文人，文人中的政客”。

港台因为囿于地域狭小的先天不足，人才辈出自然不能与大国相提并论，就此来说，李敖本也不算什么“大师”、“大家”一流人物。但此人从

年轻时代便拒绝与当局撮合，拒绝舔当局的屁股蛋子，两度坐牢出来后继续破口大骂当局，且不论当局如何收拾，就以这种勇气而言，自1949年以来，可有几人与其相匹？包括作者转引的那位叫做何三坡的在内。诚然，李敖的坐牢同中央专案组控制下的牢狱不可同日而语，但既名“坐牢”想必不会与“坐机关”相同吧？

说李敖是一粒“铜豌豆”，我觉得不过誉，至于有人捧之为“天人”包括他自己的自吹自擂，都可以忽略不计。

王学泰说过一句话，在别的国家里都有左右之争，在咱们中国，从来只有左左相争。

左左相争其结果不过是你骂我右，我骂你极左，说到底都是左，都是近亲。这本《南渡北归》的作者也不能免俗。

76. 兴亡遗恨向谁谈？—陈寅恪穷究柳如是

进入五十年代的陈寅恪对柳如是的关注一如既往，甚至可以用“穷究”二字形容。其实，陈为何对柳如是如此关注，多数人并不关心。而有些人则像对待陈寅恪讲解杨玉环入宫时是否为处女一般持“鄙夷”的态度。但也有甚解其意的人，比如吴宓。

吴宓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如下评论：“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历史是一条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的长河。惟其如此，才有“不容割裂”一说。具有卓识的史学研究者往往能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现实的本质，或者通过对现实的顿悟领略历史的风貌。陈寅恪无疑也是这些人当中颇为出众的一位。于此，陈寅恪自己也有感喟。

陈寅恪在给陈述的《辽史补注》作序时写过如下一段话：“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

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中国历史上素来有“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两宋末造，恰逢第一个“亡天下”的周期，其人在当时刻骨铭心的悲愤经过了时空的磨合在下一个周期即公元1644年，俗称的“甲申之变”中得到了回应。

顾炎武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南明士林领袖的眼中，衣冠服饰尚且受到限制，更遑论其他。其人发出“亡天下”的悲鸣较之两宋之间尤烈。事实上，与其说是对所谓“异族统治”的不服，毋宁说是对彻头彻尾的专制体制的号啕。

而日本侵略中国，使“亡天下”的惨剧再度降临，身履其间的陈寅恪的心境在“靖康之变”的轨迹中找到了似曾相似的景象。这也是他发出“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之所在。

那么，十多年后他重温柳如是生平，又是什么样的事情触动了他敏感的历史视觉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这次触动给陈寅恪包括给其他一些尚具良知和良识的人带来的绝不会是“亲切有味之快感”。

袁枚有过一句激烈的话，唤作：“伪名儒，不如真名妓。”柳如是不独为名妓，更为名“将”。钱谦益后半生的些许壮举多半同柳如是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诚为一代名儒的钱牧斋确实不如柳如是这一代真名妓。而当一名儒不如名妓的时候，“亡天下”的厄运是不是已经呼之欲出或者已然降临？

77. 读史的疑惑

读中国历史一直以来有个疑惑。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美梦成真应该是一生的追求；但在中国历史上，噩梦成真倒比比皆是。

举几个例子。

陆游最希望看到的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后来确实“北定中原”，也确实

是“王师”，只不过那是蒙古人的“王师”；

龚自珍最希望看到的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后来“天公”也的确降了不少，把他的二儿子洪秀全、三儿子冯云山、四儿子杨秀清、五儿子韦昌辉、六儿子石达开都给“降托”下来了；

如此等等。很多好梦最后都变成了噩梦。

那么，噩梦般或者梦魇般的预言呢？却总被落实。

例如玄烨老儿说过：“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后来果然成为现实；

例如李鸿章老儿说过：“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后来也成为现实，至今不爽。

满清覆灭以后，遗老遗少们始终有个念想，既然有“前清”，也就必然要有个“后清”。从后来的发展看，袁世凯及其继承人们基本兑现了这一“念想”。

总之，是有点怕什么偏来什么。所谓“逼债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季羨林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1999年4月27日上午接受傅光明采访）

面对这些疑惑或者说困惑，我觉得我们也没啥具体的办法来解释清楚，估计也永远解释不清楚。

78. 等级的光辉

王实味在延安的时候便感慨“食分五等、衣分九色”的等级观念。在这些有着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中，延安这种“圣地”是不该有如此明显差别的。不过，包括感慨并作文的王实味同样不能免俗，他吃的中灶里有点肉，王实味就不停地用筷子挑肉吃，他本人患过肝炎，这么做自然引来同事们的不快。

读国内出版的高干们回忆录，一个最深刻的印象，便是等级的光辉随时普照大地。

回忆录翻开扉页，往往是照片先行。这些高干的照片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同自己亲人的合影，而是同毛、周、邓、刘、朱、江、胡等人的合影。

以《忆邓大姐》这本书为例，该书第一部分是题字，江的字排在第一，李的字第第二，然后依次是陈云、薄一波等。

再看照片，邓颖超的第一张合影照片既不是同父母的，也不是同周恩来的，而是同毛泽东的。

“天地君亲师”这套东西大概已经融化到了血液里。

79. 茅盾家的彩色电视机

中国屁民的彩电情结至今未衰，说来也不免话长。

举一个茅盾的例子吧。茅盾是执政党钦定排名的九位文学家中的第三号人物（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官至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年，由党配给他们家一台24寸的苏联产黑白电视机。至1975年，这台电视机已经“老卖年糕”，出不来图像了。于是，更新，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

接下来，茅盾家的保姆打听到一则消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花外汇为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的高干从西德购进一批24寸彩色电视机，哪知道，副总理以上的首长们家里早已有之。这样下来，自然也就便宜了副总理以下的若干首长们，茅盾家便是其中之一。1975年秋，茅盾家看上了“大屏幕”的彩色电视。【注】（韦韬、陈小曼著《父亲茅盾的晚年》第182页）

减茅盾一等的张光年（曾用名光未然，累官至中顾委委员）家里1977年便已经有了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此后，效果不很好，张家于1980年7月31日购进彩色电视机一台，据张自己在日记中记载，效果很好，同感满意。【注】（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册第185、192页）

从上述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副总理以上首长至少在1975年之

前已经可以看上彩色电视机了，而部长级的首长们则在1975年至多1980年可以看上彩色电视机了。

而我等屁民呢？我记忆中，是1984年看上的彩色电视机，因为印象很深的是，那一年大阅兵。即便如此，这台电视机还是家长们从内部购得。

换言之，在上个世纪，副总理级别以上的首长同屁民的生活待遇仅就彩电一项来说，相差十年。

那么，今天呢？是比十年多了？还是比十年少了？貌似不难回答吧。

80. 没有启蒙，只有起夜

在阅读现当代一批学者撰写的有关思想运动史的书的时候，总会看到“启蒙思想家”这个头盔被分别扣在了梁启超、康有为、胡适、严复等人的脑袋上。

然而，我等屁民不禁质疑道：“他们够格吗？他们真的是启蒙者吗？”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这片神奇的盐碱地上，从未出现过启蒙，有的只是起夜。

梁启超当年说过：“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在这里，梁启超将“权利”列在“生命”之后，也就说所谓“自由”排名要在生命之下。虽然，梁启超也承认：“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但他还曾为之强调地指出过：“主权者，绝对者也，无上者也，命令的而非受命的者也，凡人民之自由皆以是为源泉。人民皆自由由于国家主权所赋予之自由范围内，而不可不服从主权。”

换言之，主权高于一切，自然，一旦谁成为主权的代表，谁也就高于一切，作为驭众的“人民”自然也就“不可不服从主权”。

而我们都知道，早生于梁启超若干年的裴多菲有过一句名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遑论卢梭、孟德斯鸠辈了。

由是观之，何为启蒙，何为起夜，一目了然。

漫漫长夜中沉沉酣睡的人群里，的确有几个人中夜起身，他们不是自然而然觉醒的，而是被尿憋醒的，他们撒完了尿，让膀胱松了一口气以后望着那些始终酣睡并不乏被尿憋死的人们一眼，然后继续回去倒头狂睡。

这是起夜，而非启蒙。

所以，梁启超后来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梁启超还解释道：“专断而以不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野蛮专制；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开明专制。”

一度臭骂过梁启超的国民党人最后在大陆所选择仍旧是梁启超鼓吹的这条路。只不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如果一定要举出启蒙者的例子，那么唯有鲁迅一人而已。可是，朱正给鲁迅写的最新的传记的名字却叫《一个人的呐喊》，让我们扼腕感慨的是，在沉闷的黑夜中一个人呐喊的鲁迅最终居然没有被乱棍打死，实在是二千年以来最为神奇的事情。

81. 晚清亡于立宪派

晚清非亡于革命党，实亡于立宪派。

这么说，首先要搞清楚一点，那就是什么叫晚清的“立宪派”。切莫以为这个所谓“立宪派”是真的主张宪政的。他们最准确的名字其实应该叫“分权派”。

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都是“立宪派”热望中人，载泽考察西方宪政以后说过一句话：“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也。”内中的“君”实则也是“国”。利于国利于民却不利于官，可热心奔走的都是大官僚做推手，岂非蹊跷？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老袁、老张作为“疆臣领袖”，他们所推动的“立

宪”，说到底还是分权，分我一杯羹而已。他们已然不满足同光以来的督抚专制，他们要把这种分权彻底制度化、合法化乃至世袭化。

所以，“立宪派”只是高层政治官僚身上的那层毛，他们的摇旗呐喊不过是为高层分权派开路，做“驱除”。

事实上，满清的最高当局将“收权”始终看作是终极目的。但那拉氏也知道这件事如果火候不到或者不迁就现状，那么只有死得更快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她用“外崇高位、内夺实权”的办法将袁世凯、张之洞内调。割据疆臣做到军机大臣的，袁、张之前只有左宗棠，连曾、李都没有份儿，袁、张虽然了解老太太的手段，却也算是勉强顺口气。

“商君虽死法未变”，能奏统一功的只能是秦皇，而非阿斗、载沣这些人才具较之那拉氏不止十条街被甩，可一时鼠胆包天，说是鼠胆，因为毕竟色厉内荏。南宋的狱吏都知道“君疑臣，则臣必死；设若臣不死，则臣必反。”的道理，惜乎摄政王们不懂。

老袁最初化装逃入租界，后来发现“黄带子”的确没人了，不仅没人，也没种了。这才息影垣上，钓鱼竿却伸得老长。

如果没有后来的保路的呐喊和武昌的枪声，老袁的钓鱼竿也只是“徒有羡鱼情”而已。偏偏历史的偶然性再次按照规律成全了必然性。“收权”的结果是绝望，这种绝望实际早在同治六年夏天的曾国藩、赵烈文之间的对话中已经可以搜寻到端倪了。但是，那时候也只是少数人的绝望，即便如曾国藩者也还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念头。

而“皇族内阁”的出笼则宣示了分权派的破产，破产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诞生。底层的绝望还只是星星之火，而分权派的绝望却相当于原油泄漏。于是，燎原上演了。于是，大清完蛋了。

晚清的覆灭还不是这场大悲剧的结尾，也只是这场大悲剧的开幕。越是集权统治牢固的王朝，一朝倾覆，它所留下的权力空间也就越是难以填补。而难以填补的同义词便是高度分裂和快速分裂。由分裂带来的或许只是阵痛，或许将是永远的痛，其谁能知？

82. 历史的沸点

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王朝的末端，几乎无不同一个名词有着密切的关联。那就是“身体”。而这个“身体”也可以理解为时间，更可以理解为历史的沸点。

西汉后期，汉成帝没有子嗣，汉哀帝以旁支的身份入承大统，但身体不行，由此激发了王莽的复出。东汉灵帝英年早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孩童，为外戚、军阀的争相执政打开了门户。

再来看元朝，从元成宗铁木耳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297年到元顺帝即位的这一年即公元1333年，三十六年的时间里，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换了十位之多，开创了历史纪录。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是元仁宗的8年多一点，最短的元宁宗只有几个月。而这十位皇帝中，有元英宗、天顺帝、元明宗三位皇帝死于非命，有元仁宗、元武宗、元文宗、泰定帝四位皇帝的皇位由政变而来，甚至元顺帝本人的即立也是受益于政变本身。

接下来看明朝，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即公元1620年到明思宗崇祯元年即公元1628年，短短八年时间里，明朝先后有四位皇帝出现，其中最短命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二十八天，连足月都不到，再一次刷新了明朝的纪录。（明仁宗在位八个月身亡，此前一直是纪录保持者。）

明朝的皇帝多数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在位虽然多数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之上，却多半在中年嗝屁朝凉。年龄最大的首推开国皇帝朱元璋，其次为明太宗朱棣（成祖），再其次为明世宗朱厚熜，最后则为明神宗朱翊钧。剩下大都是三十多数四十出头。而满洲贵族从“马上”夺天下，最为骄人的是他们的体格，清朝入关十位皇帝，寿登六十岁的占百分之四十，远远高于明朝的同期比率。像爱新觉罗·弘历甚至刷新了南朝梁武帝萧衍的纪录，以年近九十岁的高龄列在皇帝之首。

然而，被历史无情嘲弄和抛弃的不仅仅是满清王朝的前辈们，他们自己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清宣宗旻宁踌躇不定遴选出来的皇嗣奕訢，即位时年甫二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节，比起他太爷弘历的即位年龄还要小五岁。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位仅仅十年多一点，留下孤儿寡母和破烂江山。其后的两位继承人载淳还不如他老爹，年不及二十便已撒手人寰。而载湉和载淳一样，都是绝嗣。这在一个一直崇尚多子孙的爱新觉罗家族中是特为罕见的。

同疾病不断侵扰身体健康相比，另一个毁掉健康的则是王朝末期的政变，尤其是高层政变加剧。

在专制政权全方位覆盖的历史上，民间的抵抗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时候不过是涟漪一样的水平。而高层的内讧，所谓“权贵厮杀如豺虎”则是最能要了王朝老命的“二陈汤”。

有清一代，自秦始皇以来的皇帝梦终于得到全部实现，皇帝的权力在国度内大到无边。乾隆时期，皇权达到巅峰状态。所以，高层的变乱也被压缩到历史的低点，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都是守而不敢变。可是，清文宗奕訢尸骨未寒，一场满清入关以来所仅见的大政变血腥登台了。在这一场政变中，三位“首犯”，其中两位都是“铁帽子王”，均被处死，其中肃顺还被拉到闹市区开刀问斩，据薛福成介绍，肃顺被杀之前，两条腿已经被打断，想必这也是既定内容之一。

在之前的（指入关后）三次政变中，直接弄死亲王的只有两次，即清世祖福临处死英亲王阿济格，清世宗胤禛处死廉亲王胤禩。而这一次那拉氏的“开荤”则明显“胜于蓝”。正因为那拉氏的“垂帘听政”属于不折不扣的僭主政治，所以，这之后的政坛高层的暗流涌动始终不觉，那拉氏执政的四十八年中，明摆着的大政变有两次，暗中的则超过三次。太平天国起义未能将满清王朝置于死地，但这种高层政变催生的怪胎却有效地帮助爱新觉罗家族放心大胆的走上了黄泉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王朝的崩溃必须有待于历史沸点的形成，而之前基层所做的一切工作无非是修剪边幅，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只有等待时间的召唤，才能完成大幕的徐徐拉开。

83. 《药》

我们学习鲁迅这个小说的时候还是上高中。那时候，有的同学咳嗽了，就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栓，不要这样咳，包好，包好。”

在讲课当中，老师强调最多的就是“人血馒头”，这么多年过去了，记忆也就停留在“人血馒头”上，很少有时间再回头去看看。

最近重读了一遍《药》，忽然想到一点。华家死了华小栓，夏家死了夏瑜。如此说来，华、夏两家岂不是等于绝后了吗？

在鲁迅笔下，华小栓代表着愚昧，而夏瑜则代表着觉悟。可是，觉悟和愚昧都一道死了，算不算玉石俱焚？

那么，夏瑜坟上的那圈白花真的如同鲁迅自己作的那番解释吗？

小说名“药”，顾名思义是救人病困。但事实上，华小栓的病非但没有药到病除，反而一命呜呼，说明他的“病”无药可治，是绝症。

华家听人配药，药引子是人血，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血，是觉醒者的血。那个年代有个著名的名词叫“血花”。用鲜血浇灌自由之花。然而，事实上呢？觉醒者的鲜血浇了也是白浇，最后浇灌者和被浇灌者一起嗝屁。

谭嗣同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可是，流了血又能怎样？血流漂杵、天下缟素又能如何？无非是多了若干个坟头和去坟头哭悼的，或许由此也多了不少康大叔与红眼阿义之流的。

所以，大清江山靠谁守？谁也守不住，根本就是死局。什么叫亡天下？就是觉醒者与愚昧者一道覆灭的过程。

84. 教职人员猥亵幼女的历史镜头

近来颇有一些为恶的教职人员猥亵幼女事件被各种媒体曝光，大家自叹人心不古、何以至此。其实在建国后的历史上，猥亵幼女的教职人员还是大有人在的。

文革前后被树立为样板的“大寨公社”就曾有过这样一幕。

大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光辉的典型，郭沫若死后要求将骨灰撒到大寨，于此可见一斑。而大寨催生的风云人物陈永贵更成为新中国农民的领军人物，同后来央视版的“喜耕田”有一拼。

在陈永贵治下的山西省昔阳县，当地群众发明过一个“四大家族”的说法，即陈（永贵）、郭（凤莲）、王（金籽）、李（喜慎）。

这里的王金籽是从1974年开始主持中共昔阳县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他

有个胞兄叫王金魁，从1963年至1964年在昔阳县杜庄小学任教时先后强奸幼女6人，猥亵幼女9人。经检察机关起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王金魁入狱后，其妻与其离异，后来，其妻同陈永贵结为夫妻。文革中，王金魁一案居然被翻了过来。【注】（《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39、24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80年9月11日，新华社太原讯曾播发《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大家不妨去看看内中的原委。

由此可见，有些事物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多时候，很多事件都能在历史的轨迹中找到他们各自的镜头，而今天发生的这些事也不过是这些镜头的历史回放而已。

85. 健康与权力

前苏联的卫生部部长恰佐夫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健康与权力》。这倒引起了一直以来想到的话题。

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统治者本身一般都在拼两样东西，一则为能力，一则为体力。

拼能力的多半在开国初期，第一代或者第二代，依靠的基本都是能力。但两代以后，能力不再，所谓“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只有拼体力了，即健康。

从明、清两代来看，该王朝有本事的皇帝不超过三个。就如老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有本事的一旦过去，剩下的号称“守成”，其实都是看家狗。而看家狗的本领也是一蟹不如一蟹，家里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少，有的是被盗，有的则是自盗，一般说来，自盗的居多。

再后来，身体也不灵了，明显开始喘了。明后期隆庆、泰昌、天启三个皇帝都是短命而亡。而自称是“吸取”了明朝教训的满清“国语骑射”，身体锻炼得棒棒地，可也出了咸丰、同治这两位短命鬼。

事实上，从蒙元帝国看也是如此，元文宗、元宁宗活的时间都不长，其中文宗本人靠着燕帖木儿已经安了反侧，结果还是没躲过身体的磨难。

如果再往上追溯一下，南宋到了宋理宗，居然连自己的子嗣都没有了。至于两汉末期，不少皇帝都是来自于诸侯，也说明体格明显不支。

恰佐夫这本书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现象，在前苏联覆顶之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是身体健康出了状况以至于前后不过三年便纷纷去见列宁或者马克思了。这才引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中国历史喜欢讲“驱除”的道理，“驱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垫脚石”，圣人出，自然要有“驱除”，恶人出，似乎也要有“驱除”，充当垫脚石的却无外乎健康、权力而已。

86. 史识

作为一个历史票友即历史的爱好者来说，谈论“史识”这么大的题目，有些班门弄斧或者自不量力。但最近因为《没有启蒙，只有起夜》一篇文章引发了一点小争议，涉及到了“史识”、“史学”、“史才”一流的大话题，不禁感从中来，写下些许个人看法。

刘知幾首倡“三长说”，此为不争。关于史识，章学诚进一步阐述道：“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

由此可知，不论是刘知幾还是章学诚，对于史识的论述都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章氏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炼出另外一种高深的要求，即史德。

所谓记诵、所谓辞采，均可以假以时日，惟独见识却需要一定高度或者说相当高度。所以，章学诚说“击断以为识也”，历史上，“好谋无断”是袁绍们的把戏。史学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复原历史找到历史能够给予现实最大的营养和教训，这也就是历史的意义所在。而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主观精神在与客观资料做不断的角斗，由此，章学诚才会说出“史所贵者义也、非识无以断其义”的话，追求史学的极致，依靠的正是这种源动力。

有人讽喻温相的一些作品使用的都是历史的“边角料”。其实，这种质疑早已有之，不独温相这种历史票友、业余分子，即便如专业者茅海建辈

同样受到类似的指责。早在2007年，房德邻就“公车上书”并康有为有关戊戌史实问题就曾对茅海建的旧作提出这样的说法：“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这里所提及的“周边史料”，其实也就是“边角料”的同义词。

关于这一点，茅海建的回答是这样的：“考证与实证不完全相同，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考据学讲究的是曲径通幽，即以间接材料解间接问题，弯曲以达核心。乾嘉之力作，亦有由此途者。这里面为史家所重者乃为,对其直接证明的问题，用的是‘周边史料’还是‘核心材料’。”

茅先生的这段话说出了我的部分心声，引用到此，姑为掌征。

事实上，如没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为之辅助而成的高屋建瓴的识见，即使指掌汗牛充栋般的史料、妙笔生花般的文采，仍旧难逃“拼盘”的定论。“面壁十年突破壁”也正是依赖见识的深浅。

顺便提一句关于史学界常说的“一条史料打翻一船人”的典故。这段话的核心涵义指的是发现史料内在价值的功力，也是“史识”范畴之内的，与什么“孤证不立”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举一个例子，比如42年整风的公开史料，只要稍有志于此的学者想必内中泰半都已阅读且可能熟记在心，但真正能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迄今为止，唯高华一人而已。什么叫“史识”？这就叫史识。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那不过是酸儒的旧套筒罢了，绝非真正的史家所屑顾。

87. 天与道之间的挣扎

文革中有一个敏感词叫做“刚愎自用”。

自信太过往往就是刚愎自用。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何曾想到过“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那一幕？

果郡王威风八面时何曾想到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沙子攥在手里，你攥的越紧，沙子也就松散的越多。

沙聚之国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严复当年说过这么一句话：“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在这里，严复还认为自求富强需用“西洋之术”，殊不知，西洋富强不在于术，而在于道。

天变，道亦变。未尝有天变而道不变仍可臻于化境者。这里的“天”指的是客观历史环境或者发展背景。

然而，不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没有给后世指出一条明路。为什么？因为国人已经太习惯于在砸烂与洗脑这两种极端中循环往复地做游戏。

就以严复为例，他早年鼓吹砸烂孔家店，倾向于西方文明，晚年又觉得西方文明犹有不完美处，遂又重新尊孔。

中国人举凡做一件大事，都喜欢先搞出来一个什么理论体系或者人间指南一类的东西，然后按图索骥。所以，几千年下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样能够拥有宏大的理论著述空间和庞杂的理论工作人员。

而这些所谓思想家或者思想工作者，除开引经据典以外，再无任何创新；而宏大的理论体系说到底不过是两个字：语录。

而几千年所作的理论功夫也不过是寻章摘句，说偏一个字都是“非圣无法”。

这本身就是洗脑。

一旦预感到洗脑了，怎么办？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砸烂。

砸烂以后咋办？接茬洗脑。

为什么会如此周而复始的走不出这个怪圈。

实际上是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毛病。

换句话说，通过自身的纠偏已经很难完成转向，最多不过是重走长征路而已。

中国将来的出路不在于道、术之间的取舍，而在于天、道之间的挣扎。

88. 处决贝利亚的背后

1938年初秋，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这时，上距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叶若夫执掌内务部仅仅两年而已。就在贝利亚的任命下来不久的一天傍晚，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亲信伊里茨基在莫斯科河的船上开枪自杀。随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叶若夫被捕了，叶若夫的大批亲信被清洗，甚至连斯大林的“一担挑”（连襟，即斯大林第二任妻子阿莉卢耶娃的姐夫）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雷登斯也被枪决。贝利亚因之有了一个新外号：“清洗清洗者。”

关于贝利亚的来路，如今早已不是秘密。其实在当年，贝利亚就是不断为人诟病的“骗子”，斯大林的密友、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多次告诫斯大林不要重用贝利亚，但斯大林宁可得罪奥尔忠尼启则也没有耽搁对贝利亚的提拔重用。而且，贝利亚没有像他的前任亚戈达和叶若夫那样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被“主人”抛弃，反而不断扶摇直上。而那些劝诫斯大林放弃贝利亚的人包括奥尔忠尼启则在内，都在不同的年代里用相同的方式“失踪”了。

叶若夫在内务部的两年中是苏联最为恐怖的两年，受到迫害和屠杀的人群不计凡几。贝利亚一上台就拿叶若夫的亲信开刀，这让那些深受叶若夫荼毒的人们很是舒了一口气。十五年后，斯大林刚一咽气，贝利亚就立刻铺陈开了他的“新政”。由于他长期参与斯大林推行的政策，深谙内中弊端，所以，他的“新政”出台很快给人一种“小清新”的感觉。可也就在这时，他被捕了，很快也走上了叶若夫的老路。不过，“商君虽死法未变，秦皇终奏统一功”，贝利亚虽死，但他的某些重要的举措被赫鲁晓夫等人承接了下来甚至比贝利亚走的更远。

如果仅就能力和水平而言，贝利亚丝毫不逊色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而且，众所周知他与马林科夫的关系一直也很密切。然而，就是这

样的朋友却最终帮助赫鲁晓夫一道将其送上了断头台。道理何在？

斯大林生前主持的苏共“十九大”已经昭示了一个基本常识。斯大林身后的权力真空要由这样三个派系所接掌：第一，元老派，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事实上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最后的岁月里已经失宠；第二，干部派，包括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米高扬；第三，新生代，包括马林科夫、贝利亚、苏斯洛夫等。

这三个派系互有联系也互有牵制更互有倾轧。从整体上看，元老派已经不具备先决条件，真正掌握实权的只能从干部派和新生代中产生。不过，不论是元老派抑或干部派、新生代，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已然没有了斯大林的权威和铁腕，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像斯大林那样受到众星捧月般的支持。大家只能“集体领导”，只能“和衷共济”，只能“和稀泥”。

那么，是不是就等于说他们中间不可能产生一个“头”呢？回答是否定的，赫鲁晓夫后来不是脱颖而出了吗？那么，为什么贝利亚没有成为1957——1964年间的赫鲁晓夫呢？道理何在？

很简单的一句话：贝利亚脱轨了。

在强人政治推动下，几十年间形成的这条轨道除了强人本身可以略作改动以外，剩下的人都是“守而不能变”的。如果这时候有谁准备有所更动，那么，他所带给其他人的直观印象则是“脱轨了”。换句话说，那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伙们自觉无法掌握他了，无法预测这个家伙下一步要干什么？下一步要对大家干什么？而大家的前途又是什么？与其这样没完没了的生活在惴惴之中，莫不如趁早解决掉这个不稳定因素。毕竟“大家”已经受够了强人政治带来的恐惧和威胁。

1953年的贝利亚就是这样被他的战友马林科夫等人出卖，也就是这样失去了成为1957年后做了七年总书记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本人也不过是比贝利亚晚了十一年在1964年成为另外一个退休版的贝利亚而已。

苏联的一元化的体制和它伴随而来的体系已经决定了所有人都将生活在管控之中，不论是身居高层的贝利亚或赫鲁晓夫还是底层的莫斯科居民。任何准备和试图通过更改行程或者稍微变动一下路线的作法要么半途而废，要么画虎类犬。作为始作俑者要么像贝利亚那样秘密处决，要么就像赫鲁晓夫那样提前下课。别管他们改变的初衷到底是什么。而唯

有像勃列日涅夫这种安于现状、甘于平庸、勇于维持的人才才会一如既往地受到大家的拥戴，即便稍有想法者如柯西金、安德罗波夫也必须向他低头才能谋求自身的安全。

行文到此，有人或许要为贝利亚、赫鲁晓夫以及安德罗波夫等人扼腕叹息，这又大可不必。像苏联这种体制，的确也只能选择勃列日涅夫，当它一旦选择贝利亚、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时，它也就将自行宣告寿终正寝了。

对于一条既不能前行，也不敢后退又负重不堪、千疮百孔的泰坦尼克来说，船长最好处于假寐状态。

89. 看着我的眼睛

美国人约翰·巴伦曾经说过：“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苏联经常巧妙地改变其内外政策。但是，苏联却始终被一个现在叫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机构统治着，而且苏联一直在努力通过这个秘密机构去统治别国。”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性，约翰·巴伦同时认为：“一旦克格勃消亡，那么，限制苏联人思想、言论、行动的基本手段和管理艺术、科学、宗教、教育、新闻出版、警察、军队的基本手段将随之消失。”

其实，列宁在1918年便已对这一机构的重任做了精辟的说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法律或规章制约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而在列宁作出如此重要论述的头一年即1917年12月20日，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简称“肃反委员会”）在彼得格勒正式成立了，它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作为首任肃反委员会的主席捷尔任斯基，想必不少现今六十岁左右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因为他的鼎鼎大名往往同一部老电影叫做《列宁在1918》中的一句经典台词相伴随——看着我的眼睛！

肃反委员会的确是新生政权的“眼睛”，关于这一点，契卡内部也并不讳言，莫罗兹就公开讲过：“在我们的生活中，契卡的鹰眼无所不至。”

1922年，肃反委员会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次

年，脱离内务部，变成“总局”。1934年，总局领导人明仁斯基病故，继任者是斯大林一时的“宠儿”亚戈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列宁格勒一把手基洛夫遇刺事件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就与日丹诺夫共同致信政治局：“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所有党的干部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随后，亚戈达被处决，他的父母也遭致同样的命运。取代亚戈达的是叶若夫，叶若夫是前苏联大清洗时代的重要执行者，但他的好运也只维持了两年多一点，他的副手号称“清洗清洗者”的贝利亚在1938年年底执掌了内务部，1940年，已经坐了冷板凳的担任了水运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也被处决。1953年，斯大林死了，紧接着他的第三个重量级鹰犬人物贝利亚也追随他而去。1954年3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在各派势力的推动下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实际上还是照搬了当年“肃反委员会”的几乎全部的政治警察职能，只是在规模、人员、管辖范围上更加扩大，更加铺陈。

在前苏联克格勃的历史上，有三个人物对前苏联乃至俄罗斯的政治命运起到过根本性的作用，他们分别是谢列平、安德罗波夫和普京。

众所周知的是，没有人能像谢列平那样被苏共高层一眼看中，并且不次擢拔，一路扶摇。从青年团组织的首领成为克格勃的首脑。然而，谢列平报答赫鲁晓夫的则是积极参与了旨在推翻他的政变，且在政变之后不加掩饰地准备扮演苏共的“储君”角色。当然，他的阴谋很快败露。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谢列平还在为恢复自己的党籍而奔走，作为斯大林的“老近卫军”成员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如此回应谢列平请求：“给他办理养老金退休，已经过分了。”

同样是青年团组织出身的安德罗波夫在五十年代的“匈牙利事件”被赫鲁晓夫等人看中，由此飞黄腾达。安德罗波夫既不同于勃列日涅夫的庸暗，也不同于苏斯洛夫的阴鸷。他有时高昂的论调往往令同僚大惊失色，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有一次对安德罗波夫开玩笑说：“如果您来主持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大家都会失业。”当安德罗波夫上任刚满十天的时候，基里连科被赶回了家。

因为修建胜利纪念碑动用了上亿卢布的花费，安德罗波夫同坚定的盟友乌斯季诺夫吵了起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从七十年代中期便强力推行“驱

逐出境”的政策，将那些公开叫板苏共政权的异见人士从苏联的国土上赶出去，包括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等人。

安德罗波夫不满意勃列日涅夫的僵化、保守，他希望变革，不过，他的这种变革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又有所不同，他所愿意看到的变革是用极小的让步换取更强的集中。尽管他反对给斯大林恢复原来的名誉，可并不意味着他将会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事实上，安德罗波夫统治的一年多时间里，苏联还在从赫鲁晓夫时代继续退步。

毋庸讳言的是，安德罗波夫绝没有像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那样，人走茶凉，他安排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让前苏联寿终正寝，如果安德罗波夫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想？而经他手提拔起来并顺利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叶利钦则彻底钉死了前苏联的棺材板。

如果仅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安德罗波夫的“鹰眼”，他曾经向戈尔巴乔夫交待，一定要让切布里科夫留在克格勃领导的岗位上，不要轻易将他抛弃。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提携切布里科夫进入了政治局，可最终还是抛弃了他，选择了克留奇科夫，这就像赫鲁晓夫选择了谢列平一样给自己选择了掘墓人。

1983年的一天，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在接见若干名克格勃新干部之余，指着一个年轻人说：“他一定会前途远大。”这个年轻人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看着我的眼睛”，到底应该看着谁的眼睛？是看着契卡的眼睛，还是看着人民的眼睛？相信历史自然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90. 被推出去的猴子

有些地区的有些人类喜欢吃“猴脑”，据说程序是将猴子的天灵盖敲开，淋上热油，然后用勺子挖着吃。

因为要保持猴脑的新鲜，就要活吃，即将笼中的猴子挑一个出来，现场干掉。由于条件反射，每当有人选中某个猴子的时候，其他猴子非但不给予同情，反而群起攻之，将这名很快被“临幸”的同胞兄弟（或者姐妹）推出去。也据说场面很震怖。

上边提及的画面都是据说，考证起来貌似也不难。而另外一组画面如今已经凝固成为历史，只要翻开有关资料，便历历在目了。

从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让前苏联很多人送了命，上至中央委员，下到普通百姓，凡是给“主人”点到了名的都不免要被掀开天灵盖。

屁民的贱命本也不值一提。所以，前苏联的史料中至少目前公开解密和披露的很少述及他们当时的心态、感受和只言片语。反倒是那些“王侯将相”们临终前后的嘴脸被详细地记载在史料中。

举凡一位中央委员或者元帅、大将、上将们受到内务部的“临幸”，上送的报告中都签满了他的同僚们的揭发、批示，帽子无一例外的都是“叛徒、可耻、卑鄙、内奸、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建议”也都无一例外的是“枪决”。当然，这样的建议很快都被“主人”采纳了，“主人”的从谏如流和“仆从”的忠心耿耿交相辉映。只是，那些落井下石之辈在墨迹未干之际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于是又一幕循环场开始了。

原苏共中央委员、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卡尔·拉狄克曾被“主人”恩准只需揭发同伙便可以免除极刑，拉狄克不负所望，对于昔日的战友皮达柯夫等人极尽诋毁之能事，在莫斯科的公开审判中，一轮又一轮的枪决判处此起彼伏，而轮到拉狄克时，只有“十年有期徒刑”，列夫·费尔德宾回忆说拉狄克笑了，尽管笑容很难看。只不过，这样的难看的笑容也未能维系太久，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已，1939年，拉狄克在羁押处非正常死亡，当苏共的这段档案解密以后，人们终于了解到拉狄克所受到的“待遇”并不比那些比他早死一年多的“战友们”更“舒服”。

这些一度被冠以各种光环的苏共的原领导干部们一旦被“主人”抛弃，他们之间的撕咬和攀扯乃至集体交江的场面与那些将被活吃猴脑的猴子们之间的距离无形中一下子被拉近了。诚如钱钟书所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高了的新标识。”

这是不是也属于“返祖”呢？

91. 说说“被迫害致死”

少年时代，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儿，叫做“被迫害致死”。那时候理解这

个“被迫害致死”跟枪毙、掐死一类的差不多。后来读书多了，才知道很多“被迫害致死”的并不一定要在刑场和监狱中被执行，往往最后也是躺在床上嗝屁朝凉的，自然这与“正常死亡”是不同的，但与“非正常死亡”也不同，因为“非正常死亡”一般都是针对老百姓这一层面，而“被迫害致死”的多半属于名人，有的甚至级别很高。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段傻逼回复，回复人“气宇轩昂”地质问楼上说文革时期，某人何曾下令杀过谁？或者某人何曾指使谁去干掉谁？近观章立凡的微博上也有人这么质问章先生的，（质问的部分原话如下：“单说这个事情假设真的存在，也未必是斯亲自下令干吧。古今中外，党内外国内外，下属或者下下属做些操蛋的事，领导不知情很正常。这个事情归到斯同志身上，有点过了吧。”）

应该说，提出这种疑问或者质询的人不是缺心眼便是剩傻逼。这么讲，或许有些粗鲁，但话糙理不糙，道理是一样的。

历史上，举凡阴狠自雄的统治者轻易都不会让自己的手上沾血，毕竟他们都是“讲究人儿”。像杨广杀了薛道衡不算还问人家能不能再写出“空梁落雁泥”一流的句子的活儿，委实太糙，也难怪最后被砍了脑袋。

《三国志》里记载了两个第二号人物的“被迫害致死”，是很值得琢磨地。一个荀彧，陈寿落笔三个字“以忧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愁死的”。另一个则是陆逊，“愤恚致卒”，用现在的话就是“气死的”。然而，不论是荀彧还是陆逊，都是“雅量高致”般的人物，何以一个愁死，一个气死呢？陈寿也写得分明——“权累遣中使责让逊”，啥意思，见天派人骂你？那么这个骂能是泼妇骂大街那么简单吗？

雍正初年，清世宗收拾兄弟胤禩，都统楚宗说李绂向他传达了“便宜行事”的谕旨，此后楚宗的话被皇帝老儿和李绂否认了。那么，胤禩的待遇如何呢？李绂将胤禩关在房小墙高的地界里，四面加锁，胤禩本人还带着手铐、脚镣，七八月的高温让胤禩经常晕死，也没听说过得到应有的治疗。忽然一天，李绂向上面报告说胤禩完了，上面说活该（原话叫服冥诛）。

上面所说的这些虽然都不曾见血，也未必都一定是有专门的指示下达（陆逊之死，孙权有了作案的痕迹，这也是孙权始终不如曹操的地方）。可最后的结果却都是人死了，而且死于非正常。啥叫“被迫害致

死”？这就是。

老百姓有句俗语叫做“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可见活人之难、之功德；反过来，要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立马消失却容易得很，完全可以做到“谈笑间，灰飞烟灭”。前一段网上有人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三次故意不搭理他，就会给他造成心理上的阴影甚至可能伴随其一生。而对于一个成年人，即便是经历了多次斗争洗礼的人，只要用五平米的小屋单独羁押他，不让他讲话，不让他看书，只保证他像猪狗一样吃喝拉撒，不出一年半载，这个人便会崩溃。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原上海市《解放日报》社社长恽逸群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他就听看守讲过类似的事情。【注】（顾雪雍著《恽逸群传》第320页）

其实，如果要找出“被迫害致死”的各种办法和例证，公开资料就足以汗牛充栋，而这种问题实际上也同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那么，为啥还有如此之多的脑残反复地脑残般地纠缠不休呢？这便是互联网上的“被迫害致死”，想来以后有志于撰写互联网史的朋友会留意它的。

92. 杨增新治疆

民国新疆历史上有三位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其中，金树仁贪暴、盛世才残酷，惟杨增新“用两执中”，以“渊默路线”行“黄老之术”，以至后人回忆到此，仍以之为特色而不断回眸。

新疆历来是英、俄两大股国际势力最为惦念的地方，杨增新上任伊始也不可能不特加注意。在这方面，杨增新采取了“不即不离、不怯不求”的方针。在同英商、俄商的频繁相处中，杨增新直至遇刺身亡，从未沾染任何一方的贿求，用包尔汉的话就是：“在这方面，当时的省长杨增新却是清白的。”尽管谋求同苏俄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但在基本立场上，杨还是坚持本国利益至上的原则，并没有像盛世才那样卖身投靠。

而对内，杨增新采取“羁縻”和“驭宽”两种手段。羁縻是针对新疆境内少数民族首领和上层人物而言，驭宽则是针对自己麾下统属的文武官员。杨并无金树仁那般疾声厉色，也无盛世才那般残苛险忍，至少在表面上他始终保持了和大多数部僚的“和衷共济”乃至“一团和气”。杨增新对于做官有他自己一番见解，他认为，土著做官是副业，不是主业，“有恒产者必有恒心”，因此不要因为做官而放弃了农商正业。外籍入疆者做

官虽是主业，但如果于做官之外，再无谋求，便易于陷于绝地，陷于绝地，自然要心生旁骛。

杨增新治疆十余年，从不使用家乡人，在这点上，他同民国时代的其他割据代表人物颇有迥异之处，即便同他的后任金树仁、盛世才相比，也远居其上。迨至杨增新统治后期，其云南老家的祖坟也竟因此而不保（此点同老赵有一拼，老赵后期祖坟也被挖）。杨增新死后，其灵柩不敢停留于云南会馆。

有治术，还须有治绩，有治绩更须有治声，杨增新留下的《补过斋文牒》数卷，不独后来治疆者需要诵读，有志于熟思中国未来者也必须涉猎。

这里仅摘取两段，看看杨增新的眼力。

杨增新对于学校教育的观感如下：“中国不论何项学堂，都含有流氓性质，一言以蔽之曰，要升官发财。……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

杨增新对于后来形势发展的预料：“武人之专制，非暴民不能铲除；官僚之专制，非暴民不能推翻。民气郁久而必伸，祸机蓄久而必发。全国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默察今日时局，窃恐武人专制久之必变为暴民专制。”

赵藩写过“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话，方之杨增新，可谓得窍。而后杨增新死于樊耀南、金树仁败于陈中，益说明“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的道理，套用今天的话说，愤青、五毛断断不可派定大用场。不过，既然不准备走正路而是选择走绝路，那么，五毛脑残不用还能用谁呢？

93. 嘉靖给永乐改名

秦始皇反对“谥号”这一做法，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连给后代拍马屁的机会都废除了。好在他的徒子徒孙们学乖了，经过“拨乱反正”，不但将谥号恢复了，还发扬光大了。有的皇帝甚至在活着的时候便得到了死后的待遇，不止一次地被上所谓的“尊号”，更夸张的是三国时代魏国的臣子们居然挖空心思要给仍旧活蹦乱跳的曹叡上“庙号”为“烈祖”，

认为这样一来，同符“太祖武皇帝（曹操）、世祖文皇帝（曹丕）”，尽管暂时中止了这一行动，可曹叡死后仍旧庙号“烈祖”，真正有点永远活在他们心中的感觉。

在汉代，“谥号”必须有，可庙号则不一定，两汉的很多皇帝都没有庙号，像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死后就没有庙号，大名鼎鼎的汉武帝虽然有了庙号（汉世宗），但到了后代竟然有人动议要把汉武的庙给拆了。由此可见，那个年代，皇帝老儿权力还不够大，杆子插的还不够长，这种“怪相”到了明清时代则完全绝迹，皇帝的庙号、谥号不仅好之又好，而且还要经常给儿孙追加美妙的字眼，例如明世宗朱厚熜就给他祖宗明太宗朱棣改了名号。

朱棣囮屁后，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给他上的谥号是：“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到了嘉靖朝，明世宗朱厚熜就将朱棣的谥号改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原来的“谥号”第一个字用的是“体”，还是继承的意思，嘉靖给改成了“启”，这就有了开创的涵义了。后面的“广运”改成“肇运”也是表达同一层意思。特别是庙号“太宗”改成“成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朱棣同他爹朱元璋并列了，所以，明代说起他们的皇帝老儿时，惯于用一个词，叫做“二祖列宗”。

朱厚熜这么做，其实也是用“死人压活人”，他是从湖北安陆进京的旁支入承大统的，一开始就在老爹兴献王的追封问题上碰了大钉子，朱厚熜深恨力阻大礼议活动中唱反调的杨廷和，他谴责杨的话中有这么一句“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

大礼议也好，给祖宗增改谥号、庙号也罢，都是为了给现任的皇帝“找鸡毛掸子”，为他的即任的合法性找到传统的依据。当初他祖宗朱棣也是玩的这一套把戏，朱棣是造反派起家，所以，朱棣一谈到古人，最羡慕和最崇拜的就是唐太宗，因为这哥俩在杀戮亲朋好友的问题上都是“近亲”。同理，朱厚熜也是以“藩王”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城的，因此，他追礼朱棣包括大礼议活动都是打上了上述缘由的深深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朱厚熜在庙号一事上较之曹叡更有花样，大礼议到了最后阶段，朱厚熜的亲爹兴献王朱祐杬获得了一个庙号“明世宗”，朱祐杬一名曰树我，其实不知树何人天皇帝都没有当上，死后做了“兴献皇

帝”已经很夸张了，这时还要加上“庙号”，而且居然是“世宗”。本来这一切也都将实现，不过，在最后关头遭到朱厚熜本人的否决，他认为“世宗”这个庙号只配留给他自己，于是，他亲爹朱祐杭最后获得了“睿宗”的庙号。朱厚熜死后，接班人继承了他的遗愿，将其追尊庙号为“明世宗”。

朱厚熜的作法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绝迹，在他身后，满清的皇帝就给他们的祖宗努尔哈赤改了一回名，将其“太祖武皇帝”的追尊改成“太祖高皇帝”，谥号累加至多达二十五个字，即“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给祖宗改名并非真的尊崇祖宗，正如毛所说：“名曰树我，其实不知树何人”。

94. 割据暴君的末世情怀

苻生赋性凶猛，祖父苻洪并不喜欢他，有个“瞎儿一泪”的典故，想必大家也都知道。苻生自幼“眇一目”（瞎了一只眼睛），祖父苻洪跟他开玩笑说瞎儿流泪也只是流一行泪吧？苻生用刀将瞎眼捅破，流下一行血，说这就等于两行泪了。苻洪气得揍他，说要把他卖去当奴隶。苻生说那不好正好跟石勒一样吗？当时苻洪正在后赵明帝石勒手下，苻生这么说等于“现行反革命”，苻洪就告诉他儿子即苻生的亲爹苻健，让苻健杀了他。可苻健的弟弟苻雄（即苻坚的亲爹）不同意，这就饶过苻生，后来苻生上台大杀诸臣，惟独放过苻坚、苻法兄弟，也就是念了苻雄这一道。

苻健病重的时候，侄子苻菁造反，苻健硬挺着出来站台，下面人一看老大还活着，就把苻菁给抓住了，劈头盖脸地像张成泽一样遭到臭骂后苻菁被处决，也是当天晚上就动的手，都属于“执行指示不过夜”的那种。大概有鉴于此，苻健给瞎儿苻生留下一条“既定方针”，“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司马温公为此发了一段感慨：“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剪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苻生杀了这个、那个，最后跳出来要他小命的竟然是他原本报恩的对象。苻生本以民谣“东海大鱼化为龙”杀了老臣鱼遵，却万万没有想到

此“东海”竟然应在堂兄弟东海王苻坚的身上。

无独有偶的是，南朝齐明帝肖鸾死前也给儿子肖宝卷留了同样一条操蛋的“既定方针”——做事不可在人后。也就是“先下手为强”的意思。关于这点，肖鸾本人体会至深。肖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他和萧道成的儿子鄱阳王萧锵关系非常好，肖鸾生就一张能骗死人的脸，他跟萧锵谈论国事，说到激动处，竟然流下眼泪若干行。此后，肖鸾篡位迹象明显，底下人劝告萧锵先行解决肖鸾，而且路数都给安排好了，但萧锵一则有点不忍，二则也是书生气贵族气太重，搞政变弄得拖拖拉拉，又是告别，又是敬酒的，结果被肖鸾抢了先，破墙而入，杀得一个不剩，而且从这件事起，肖鸾宰杀高、武（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的子孙，都是采取这种大制作的方式。

肖鸾给肖宝卷选了六位顾命大臣，肖宝卷不愧是他爹的好儿子，这六个人一个都没糟践，全给他宰了，其中包括他的堂兄、舅舅、表叔。只是肖宝卷乃至肖鸾都没有承想，同族的萧衍起兵，灭了肖齐。

最后我们来看金熙宗，金熙宗完颜亶（女真名合剌）即位不久就杀了完颜宗翰（即粘罕），起初还是粘罕拥立了完颜亶，要不然金太宗本意是准备改立自己儿子完颜宗磐（蒲卢虎）的。杀戒一开就不太容易收起来，宗翰死后不久，完颜昌（挾懒）也死于非命，这之后完颜希尹等人也掉了脑袋，等到完颜宗弼（兀术）、完颜宗干（斡本）这些元老死后，完颜亶杀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连自己的老婆裴满氏也不能幸免于难。杀到最后却忽略了最该杀的完颜亮。

举这三位割据政权的暴君下场的例子有些代表性和一定的历史、现实意义。首先这三个人都是“不当立”的主儿，也就是说本来皇位并不是绝对赋予他们的，苻生就不用说了，肖宝卷的太子位也有点悬，肖鸾原来属意于肖宝玄，后来觉得废长立幼说不过去，这才选中肖宝卷。至于金熙宗更是如此，女真族内部“兄终弟及”的规矩因为金太宗的老弟完颜杲（斜也）提前去世，这才在粘罕等人的干预下，帝系重又转回太祖一支，因为金太祖长子宗隲早死，于是由宗隲的长子完颜亶即位。其次，老皇身后都给选了一大批顾命大臣，对于这些顾命大臣，老皇是既想利用又不放心，所以，给儿子都下了死命令，“保权第一”，所以，这些顾命大臣的结局也都很惨。第三，人算不如天算，这三位暴君杀来杀去，都没有杀对路子，真正要他们皇位要他们性命的人他们都没有发现，这

些个“赫鲁晓夫”们在他们的身边睡得呼呼的，睡醒了以后养足了精神就把他们都给干废了。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厉王苻生、东昏侯肖宝卷和金熙宗完颜亶就是绝好的说明。这三人中除开苻生还算是上过战场，握过刀把子以外，剩下的两位都是长于“深宫妇人之手”，没见过什么大阵仗，猛一抓到大权，很快昏了头，把“杀人立威”当成“诀窍，动辄屠刀复指、血流成河，其结果非但没有将人们吓住，反而让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他们三人身边都豢养了一批佞幸，像苻生的亲信董荣、肖宝卷殿前的“刀敕”以及金熙宗完颜亶手下的李老僧、大兴国奴、徒单阿里出虎等。这些佞幸平素吮痂舐痔、吹拍溜捧，久而久之，助长了这几个生瓜蛋子本已昏愤头脑向更加狂热的方向滑去。

孔子说过：“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杀掉苻生、肖宝卷和完颜亶的都是他们的亲戚，有的甚至是直系亲属，比如苻坚，我们前面提到了，作为救过苻生一命的亲叔叔苻雄的儿子，比如完颜亮，金熙宗为完颜亮亲爹完颜宗干一手抚养大的，他和完颜亮名义上是堂兄弟，实则不在亲兄弟之下，而完颜亮的谋反集团的骨干成员唐括辩就是金熙宗的女婿。这种内忧外患旋踵而至的割据政权内部最大的隐患就是宗族势力，而宗族势力其本身所隐藏的巨大的反弹能力往往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轻举妄动并乐此不疲，那么，苻生、肖宝卷、完颜亶就是他们未来的“同道”。

95. 乡勇和临时工

前一段时间，“临时工”很忙也很火，现在听说“临时工”要被调离重要岗位和部门了。由“临时工”想起了清末的“乡勇”，按照清军的体制，“乡勇”相对于八旗和绿营来说，也是“临时工”。但当年，这些“临时工”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一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派遣世袭的铁帽子王怡亲王载垣“办理夷务”，因为英法两国很强硬，坚持入京换约，咸丰那边又不同意，载垣憋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主张来，他决定用军队敲打一下英法联军，如果事情泄露了，就说是“乡勇”所为，反正“乡勇”也不占清朝的正式编制，属于“临时工”。同时帮办“夷务”的郭嵩焘不同意，老郭在日记中记载这一段并且评价载垣是“愤愤可笑”，意即昏愤无能的意思。

郭嵩焘向载垣解释说，即便说是乡勇所为，可在“夷人”眼中，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正式编制，反正都是中国人干的，既然是中国人干的，就要找清政府算账。载垣听完以后，不以为然，反笑郭嵩焘“书呆子”。

若干年后，李鸿章倚老卖老的同曾纪泽的后人吴永谈及办理洋务的经验时说过这么一番话：“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道破的呢？”李鸿章这里所谓的“诚”是曾国藩给他的提醒，在李二先生看来，办理洋务无外乎皖北乡下的“打痞子腔”，而曾国藩则授之以“诚”字。

当日郭嵩焘被载垣嘲笑，而载垣被历史嘲笑，甚至说李鸿章的“打痞子腔”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毕竟那时节海通不久，人们不识外务。然而，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愿意用“临时工”来装傻充愣，拿历史潮流当阿斗，那么由此惹出的笑话想必最终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收场。

96. 明清两朝覆灭的历史推手

前苏联覆灭的责任，一般人都喜欢嫁祸给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认为这三个“叛徒”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在广袤的大地上的戛然而止。不过，纵观中国的封建专制史，此类人物的出现基本为零，盐碱地某种意义上是民主和自由的绝缘体，它的垮台和崩溃自有其一定的轨迹，明、清两朝的覆灭过程中的最后的历史推手的作用即可证明。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往往被看作是亡国之君的“异数”。他的祖父、父亲、兄长都沉湎于女色、金钱和外加工，也都长期不理朝政甚至大权旁落。可崇祯一上台，立刻矫枉过正，干掉了气焰熏天的魏忠贤，大搞政治翻案，赢得了宇内一片喝彩，以为中兴降临。然而，也是这个一生标榜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时时刻刻宵衣旰食、朝乾夕惕的朱由检断送了明末赖以支撑的基石如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卢象升等，也是他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练饷”和“剿饷”，明末最大弊政之一的“三饷”，朱由检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人相食”的惨状有明一代也是发生在崇祯年间。

比较元顺帝、宋度宗、宋徽宗、辽天祚、隋炀帝、唐僖宗、晋惠帝、蜀后主这些搭乘末班车的皇帝们，朱由检无疑是他们中间的“亮点”，在他

的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荒淫无度，看不到太阿倒持，看不到游猎巡幸，看不到怯懦软弱。崇祯一朝有“五十相”之说，可见直到死他都是“乾纲独断”，而且，朱由检死后的一个庙号是“毅宗”，包括他的对手满清的爱新觉罗·福临在内的人都承认他性情刚毅。

可就是这么一位刚毅、果敢的皇帝让大明王朝走上了绝路。

让我们不妨将历史的镜头对准清末，清朝的末代摄政王载沣据说是一个很简朴的人，他的名言叫做“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载沣他们请他吃饭，他竟然连“鸭架汤”都不知道，朴实地叫它“熏小鸡炖白菜”。但他甫一上台就把大权在握的北洋领袖袁世凯打发回了老家，本来是准备令老袁回真正意义上的“老家”的，如果不是张之洞等人插了一杠子的话。自同治、光绪以来的督抚尾大不掉的态势以及皇威不振的局面，在载沣手中都有了改观，他成立了连那拉氏活着都不敢走的一步棋——皇族内阁。顺治入关以来，皇族的权威达到顶峰的阶段不在乾隆朝，而在载沣朝。

可也就是这么一位早早玩玩都替皇族打算的摄政王，给爱新觉罗家族带来了灭顶的厄运。

集权体制宛如手中握着一堆游离的沙子，握的过紧，注定会分崩离析。封建程度较高的一元化社会的崩溃并非来自于柔弱，而恰恰来源于刚暴。

97. 在欢呼声中灭亡——北宋“靖康之乱”的点滴回想

读过《东京梦华录》的人都可以想见北宋末年那种繁华似锦、烈火烹油的局面；看过《清明上河图》的人也应该可以知道那个时代宏大辉煌、海内升平的背景。然而，行情就是在这不断的欢呼声中灭亡了。

公元1123年，北宋完成对燕京等地的最后接管工作，其疆土已经拓展到全国二十六路、四京、三十府、一千二百三十四县的极盛程度，其总人口应在一亿人以上，《宋史》上说这时的北宋，虽然在疆域上无法同前代相比拟，但前代的“户口皆有所不及”。虽然爆发了宋江、方腊等人的起义，那不过是癣疥之患而已，其规模较之后面的明清农民起义百不足一。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北宋灭亡了。

女真人自1125年冬分东西两路南下侵宋到1127年春俘获宋徽宗、宋钦宗北返，前后不到两年，所遣兵马也不过六万人左右，其精锐铁骑也不过一万六千而已。而北宋宋哲宗年间，宋军禁卒已在五十万以上，厢军在三十万以上，宋徽宗接位后军队人数继续上升，应在百万附近。即以驰援东京的兵力而言，就在二十万以上，女真人北返时，负责堵截的北宋兵力也在二十万以上。可是，就在如此悬殊的差距下，被打得抱头鼠窜的不是女真人，而是北宋自己。女真人入侵后，北宋除开太原一战组织了有效的抵抗外（也并非由中央政府亲自安排，系由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组织），再无一场值得一书的硬仗，其时名将者如种师道等俱在，却仍旧兵败如山倒。最为可怖的是，尚书右丞范致虚率领勤王兵马号称“健卒”的陕西兵马二十万追堵北返的女真人时竟被粘罕（完颜宗翰）麾下三千人一战击破。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女真人作战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女真人死伤数字非常有限，而北宋朝廷在镇压方腊农民暴动时所谓“杀贼七万”，而后坑杀三万余降卒，连同无辜百姓被杀者在二十万众上下。可是，当这些凶恶的嘴脸面对女真人的金戈铁马时其所表现出的狼奔豕突却为历史所罕见。只是诸如此类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悲剧此后不止一次地在中国大地上轮番上演，久演不衰，成为这个伟大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一个保留曲目之一。

北宋末年，统治上层高速腐化，权力减宋徽宗一等的六人执政小组均深度贪污，蔡京父子、王黼、童贯、梁师成等人声名狼藉、恶名布满人口。随之而来的是中下层官员的争相师法，比较凶蛮者如朱勔父子在东南以“花石纲”起家，营造“小朝廷”，以致激变方腊。宋钦宗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向“六贼”开刀，可非但没有解决长期以来的痼疾，却再度引发上层的内外交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再度尖锐，直至崩溃前夜。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靖康之乱让这种灿烂的文明毁于一旦，其后虽经南宋整合，但终究一蹶不振，北方长期处在低素质低水平的奴役之下，女真人之后底子更潮文明程度更低的蒙元接手，盐碱地的板结进一步加厚加深，至于近现代终于底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北宋的灭亡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开明的一部分的基本丧失。

相对于唐代而言，北宋在强化中央集团统治的“强干弱枝”的路上走得更远且走出了此后致力于这种建设的各种政治团队可以为之参照的模式。可是，就是这所谓壮丽的大厦不断强化权力布控不断填充各种空隙的同时，它也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权力的愈来愈集中，矛盾的焦点也就愈来愈统一，它的覆灭的时间表也就愈来愈提前。可惜的是，北宋之后，这样的提醒却也愈来愈微弱，自然悲剧来得也就愈来愈“壮阔”。

98. 话说愚昧

之前我也一直认为经济上的贫穷是导致思想上的愚昧的主要原因。而这一话题也是上个世纪很多试图准备拯救民族时深刻思考的重点所在。

可是，这种思考始终碰壁，正是因为跑题，或者说部分跑题，背离了文化历史的根源，自然也就会跑题。

“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由于文化基因的扭曲和变异，必然导致愚昧的沿袭乃至世袭。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经常讲，缺乏凝聚力，那么怎样才能有凝聚力呢？我们的通常理解是这样的：首先推出一位领袖，一定要英明神武的那种；其次，无条件的服从崇拜这位领袖；第三，按照这位领袖的指引去做。可是，有没有人想过，假如英明神武的领袖有一天哪怕有半天犯了错误怎么办？他有了私欲怎么办？他不能战胜他的家属怎么办？没想过，凡是想过的也早就给别人或者自己掐死了。

当这位英明神武的领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后，经历过这些事的人们开始有限度地反思了，反思的结果是领袖没错，错的是领袖没有按照他既定的正确的思想一直走下去。于是，在这些有限度反思的人有朝一日也囫圇以后，那么新生代们再度产生了“失去了凝聚力咋办？”的问题，也就再度产生了继续锻造一位英明神武的领袖的念头。这时候，领袖又一次不可逆转的出现在了起跑线上。尽管他不再是英明神武，但人们一定要确认他是英明神武的。

如此的活话剧演了一代又一代，且爆棚满座，个别少数要求退票的都在起身的那一刻被唾沫淹死了。

99. “巴黎今天下雨了”——新闻报道中的“返祖”现象

最近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中，有些网民会注意到国内的几个大的新闻媒体只会追踪诸如美联社、法新社、塔斯社、共同社等国外媒体的消息，而绝少自己的采集。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党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比较正常的“返祖”现象罢了。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有位著名的“娱记”，官方最高新闻媒体发言人——塔斯社社长巴列古诺夫。他留给世间最有名的段子便是“巴黎下雨了”。

巴列古诺夫原系塔斯社驻法国的记者，他始终不折不扣地忠实地执行者莫斯科的指令，当莫斯科要求他必须提供情报来源之后，他立刻落实指示不过夜。他发给莫斯科的一个消息是这么写的：“据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报道，巴黎今天下雨了。”

这则消息在当时就被看作是笑料而流传于苏共外交领域的上层。然而，巴列古诺夫本人却没有在“主人”的眼中成为“笑料”，而是一路扶摇一直被提拔到塔斯社社长的位置上来。甚至在日后诸多重要的外事活动中，人们总能看到这位幽默地报道“巴黎下雨了”了的“娱记”的矫健的身影穿梭于斯大林、毛泽东等国际顶尖政要的中间。

毛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提出批判“党八股”，反对“洋教条”。倒是少数经历了不断的洗刷和磨难的党内高级干部看透了这一点，例如钟期光就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不过是以“土教条”代替“洋教条”而已。至于所谓“党八股”也不过是换作“毛八股”而已。由此可见，新闻报道中的“返祖”是与政治上的“返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

当年叶利钦肢解苏联时，有些人如丧考妣，对叶利钦又恨又怕。后来发现叶利钦虽然满嘴的“民主自由”，但其人的“道德文章”只是旨在重新构建个人崇拜的体制，其之所以分解苏联也仅仅是因为无法鲸吞这一巨大政治果实所不得不采取的迂回策略，于是，叶利钦又被“回归”了，特别是他的继任者普京上台后更加勒紧马脖子上的皮带的时候，欢呼声开始此起彼伏起来。由此也可见，“返祖”现象一样带有国际背景。

100. 封建专制时代的“巡按”制度为何以“爱民始”而又以“害民终”？

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老子的任务就是折腾各级官吏，各级官吏的任务则是折腾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任务便只好是互相折腾了。而“巡按”制度就是这若干折腾中比较著名的一项运动。历史上，不论是昏暴专制还

是开明专制，皇帝老儿都喜欢玩“巡狩”，布置“巡按”，借以显示他的“不测之威”。同时，额外地抓捕一些背景较浅、根基不深、关联不广的“小爬虫”开刀祭旗借以显示他的“人文情怀”也是必要的。

秦始皇设立的监察御史就有开“巡按”制度先河的意思。“祖龙”嗝屁以后，汉武帝又把它捡了起来，“刺史”便是汉武的发明，刺史有“六条问事”之权，各地封疆大吏的前程一半都掌握在刺史的手中。跟汉武帝同样具有“皇二代”身份的唐玄宗对于这些玩意儿更为关注。唐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以礼部尚书分道巡按天下，至此，“巡按”一词正式诞生。

真正将“巡按”落实到骨子里的首推朱元璋。还在称吴王时，朱便已经重视地方上的管控了。目前有史料记载的是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已经大派监察御史去地方“巡按”。“遣御史分巡天下，为定制”的是朱元璋的宝贝儿子朱棣，这也是一个标准的“皇二代”。

巡按御史的权限相当之大，《明史·职官志》上介绍：“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这是皇帝老儿的“一杆子捅到底”的一柄利器。

应该说，巡按制度一开始也办了一些人事，也说过一些人话。可是越到后期，该制度所呈现出的腐烂和变质也就越加明显。最后，本来是一个本着“查检官吏风宪”的制度却成了官场上的“太上贪污犯”。地方官员为了长保禄位，必须事前重贿巡按御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中张献忠招安后黄金白银送给巡按御史林铭球的那段便是真实的写照。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干儿子崔呈秀做巡按御史的时候，盗贼每名收取3000两白银的贿赂然后放行，通缉犯收授1000两白银的贿赂然后放行，且经常任意透支公款，一次可以高达14000两之巨。后人因此说：“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巡按制度竟然成了著名的“害人精”。

巡按御史的派头极大，“高牙大纛，气凌巡抚”，地方官员迎接巡按御史必得“跪接”、“跪迎”，而且不论寒暑，不论天气。专制时代的等级是金

字塔形的，对官员尚且如此，对屁民们的态度也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明经世文编》中说巡按们“视生民之饥困，若见驿马之疲瘠”。

巡按制度非但没有完成皇帝老儿们的初衷，反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作为首推“巡按”制度的唐代为例，天宝五载设立巡按，天宝十四载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藩镇割据的怪圈，始终难以拔脚。而将巡按制度板上钉钉的明王朝，其后期因巡按制度的变异所激变的农民起义不知凡几，其中包括规模最大的张献忠一支。

事实上，巡按制度落到如此境地也是可想而知的。究其内里便是集权专制的本质使之然。在一个没有足够民主监督的一元化社会中，任何一项打着“爱民始”旗号的制度最终都会沦落到“害民终”的下场，这已经被历史上无数的先例所证明了的，巡按制度何能例外？

101. 台湾式民主不可复制

台湾式民主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抑或将来的走向看，其实都是不可复制的。

眼下有不少人喜欢吹捧蒋经国的转型手术。实际上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强人最终做出“卷旗交枪”的举动绝不会是自愿的。这同样也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

在苏联之际，蒋经国本人曾一度被卷入“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去，据一些人讲，蒋经国甚至成为某些人眼中既定的党的未来的总书记的人选之一，用当时的话说：“很红的”。而若干年在蒋经国“一朝权在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身上的某些早年的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在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力主镇压力主强权的不是别人，正是蒋经国。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蒋经国怎么会主动放下杀人的屠刀了呢？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

先谈内在的因素。台湾在小蒋时代实现转型的根本一点就是镇压机器的松懈，林彪说过一句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句话姑且不论对与不对，但至少道明传统政治中的政权的部分属性或者关键属性。蒋经国受命组建情治系统，不遗余力，但是，这套机器转动到中后期明显出现失

灵。道理很简单，台湾地盘小，回旋余地也就小。说得更彻底一点，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调动大批军警进行弹压，可这些军警必然都是台湾土生土长出来的，面对本乡本土的百姓，他们不可能常年如一日的下狠手下黑手，这也就是类似“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政权会从内陆调派人马赶赴台湾镇暴的缘故。

蒋介石逃台形如刘备入川，从国内带来的干部必将日渐凋零，本土干部必然凌驾其上。干部队伍是镇压机器最为重要的环节。当本土干部与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利益发生纠葛时，机器松扣了。

而“强人政治”的核心就是镇压机器的飞快运转，一俟这部机器开始失灵，那就意味着强人不强。

国民党政权退保台湾，同李宗仁据有广西，阎锡山据有山西是一个道理，他们固有镇压的大权，却也有不得不维护桑梓的苦衷。所以，谢泳那些人发掘了阎锡山治理山西的一些旧账，以为如获至宝，实则是他们不得不放弃涸泽而渔的形势使然。

台湾长期以来孤悬海外，台岛居民被洗脑的程度远较封建时代的大陆居民差得多，所以，他们相对抗暴的意识也比较深，本土的意识也比较深。而当镇压机器失灵以及必须迁就岛内民生这两项因素和这一先天条件合并在一起时，内力就起作用了。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国民党政权起家源自海外，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受到中国传统政治的浸淫程度较之朱元璋辈实在不可以道里计，这也是他们最终硬不起心肠的原因。

至于外力因素，大家都清楚，是台湾的“共管模式”，即有美帝插手，不容国民党政权肆意妄为。还在蒋介石时代，美帝就有意培养一些异己力量对冲台湾岛内的专制的蔓延。“江南事件”发生后，美帝逼迫蒋经国放弃传子的打算，最终让权力的交接按照一定的程序走了下去。

最后谈谈蒋经国个人的因素，蒋纬国曾披露一段颇有价值的回忆，蒋经国问他一个问题，是先有国民党还是先有台湾？换言之，只有保住了台湾，才有保住国民党。这一点真正意义上地折射出蒋经国内心的想法，国民党必须扎根在台湾才可能有生存下去的价值，或可说惟其如此也才能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经国晚年培植李登辉也就可以理解了。蒋

经国和李登辉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背叛了早年的信仰和组织。

102. 西晋司徒何曾的“远见卓识”——有空多去读点《晋书》和《隋书》

按照孙登的意见，嵇康大抵属于“才大于识”，那么如此一说阮籍则才大识也大，他用放浪形骸来躲避屠刀和收买，司马昭没啥具体感觉，可司马昭身边的何曾却要拍案而起了。何曾说：“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可见其人“清污”力度之大。这条是《晋书》中记载的，《通鉴》记载的更多了一句话，是何曾说给司马昭听的：“（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晋书》中不载“何以训人”这句话，《通鉴》则提到了。如此可以看出，何曾多少还有点“春秋责备贤者”的意图。

至于司马昭的态度，《通鉴》中说：“昭爱籍才，常拥护之。”而《晋书》则多了一句话：“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显然，司马昭对于何曾的“撒娇”是很满意的，事实上，只有宠臣才能在主子面前这般撒娇。正因为有了司马昭对于士林人物的整肃运动的全面提升的大背景，何曾凡事左三分才会恰到好处以至于“青史留名”。

不过，如果仅仅有了撒娇的记录的何曾或许还没有到了让司马温公“垂笔”的地步，关键在于何曾党的晚年的“预见”的准确性已经到了“一语成谶”的地步。

在司马炎称帝并且平天下后，何曾位极人臣，成为“八公”之一。他在朝堂上歌功颂德之余回到家里却大吐真言：“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貽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

何曾作为核心层成员，亲眼看到开国皇帝司马炎在他们面前谈论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鸡毛蒜皮，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昭示着晋国未来的走向，他何曾已然老了，可子孙后代的隐忧则摆在眼前。因此，何曾又对孙子辈的说了一句狠话：“此等必遇乱亡也。”翻译过来就是说：“你们就等死吧！”

何曾的孙子何绥后来果然死于非命，而史书上记载：“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难怪何曾的后代何嵩哭着喊着称赞他的祖宗何曾：“我祖其大圣乎！”在《通鉴》中，司马温公则给改为：“我祖其殆圣乎！”虽

然一字之差，虽然司马温公将其降级为“殆圣”，但老头子也承认何曾：“何曾讥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

也正是这位“远见卓识”的何曾，虽然眼见着晋武帝一天天烂下去，自己竟也乐此不疲，所谓“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一天吃饭钱上万，竟然说没啥吃的？他儿子何劭比他还要猛，翻上一倍，一天两万。到了孙子何绥这一代，仍旧奢侈过度，王尼总结道：“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有人劝王尼小点声，免得被何绥给算计，王尼笑道：“何绥听到我这话的时候，已经囁屁了。”后来发展的形势跟王尼说的一样。而王尼本人虽然志趣高洁，最终也没有逃脱跟儿子一道饿死的悲剧。可见，乱世来临之际，不论公子王孙还布衣百姓，都是一个下场。

10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唤作：“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什么叫“现象”？其实就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尺度的拿捏。

“文革”发动前夕，有一场运动叫“四清”，今年也是四清运动的五十周年，没看见谁大张旗鼓地纪念，实在是有很多难言之隐，更不可能“一洗了之”。当年的“四清”从一开始就不怎么“过瘾”，抓的泰半是小爬虫，虽然中学生也可以定“右派”，到底不如“敲山震虎”来得威猛。所以，伟大领袖巨手一挥，四清运动夭折了，代之而起的是名震天下的“文化大革命”。

早在这场运动紧锣密鼓准备阶段，就推出了第一道菜，因为是拼盘，故而，菜名长了点，叫“彭罗陆杨”，彭真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红人儿”，罗瑞卿更是领袖身边须臾不可少有的“大警卫员”兼“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功臣，他们的忽然落马，让很多人大吃一惊，感觉这“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真不是闹着玩的。

这道拼盘出来不久，刘少奇就如释重负地对国际战友说中国的赫鲁晓夫揪出来了，他叫彭真。可是，刘少奇实在高兴地太早了。

很快第二道拼盘又推出来了，叫“刘邓陶”。较之上次更让大家感到震怖，封了二十四年的“接班人”竟然是“赫鲁晓夫”，如非领袖巨眼识人，“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刘少奇被用飞机用到开封的时候，也是林彪一生中的巅峰阶段，谁也没想到这一时刻居然只持续了一年多，而后又不足一年，林彪一家都葬身野外，这次推出的不再是拼盘，而是大菜。

接下来的岁月里，忽而批周，忽而批邓，直到有一天，四个人被摠住了，紧接着推出了这十余年中的压轴菜，自然还是拼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审。

为了发动文革，准备了很多充分的理由，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句“不搞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问题是搞了文革以后又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文革启动的生力军是青少年，用现在的话说是五毛或自干五以及大小愤青们。可运动进行了一小半，这里面有人分化了，提出了“出身论”，提出了异议，怀疑“红旗能打多久”了？于是就又有了“上山下乡”。

外表上看起来花里胡哨的东西，究其内里，不过两个字而已：“夺权”，这点“九大”的政治报告也算“磊落”，直接点了出来，“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这话现在人已经不敢直接说出来了，可见对不起祖宗。

而“夺权”的过程忽而“红卫兵”，忽而“工宣队”，又忽而“清理阶级队伍”，再忽而“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包里归堆就是四个字：“不择手段”。“再加四个字：“没有底线”。

所以，尽管“乱花渐欲迷人眼”，可毕竟“浅草才能没马蹄”，前戏固然铺垫够多，但到底不过是操逼。

专制大幕下的所谓大戏究不过尔尔，道理很简单，因为你追求的只是一姓的尊容富贵，目的浅薄得很，所以，最终都将以惨淡收场，古今中外，几乎很少例外，除非那片土地上可供驱使的不是人，而是猪狗牛羊。

104. 富不过三代—闲谈魏晋政治更替

老百姓常说：“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如果放眼望去，中国传统政治上的诸多更替正好为此做了充分的注脚，例如魏晋。

陆机评价曹魏政权：“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曹操那么大的本领占据北方，也只是传了三代，曹叡之后，曹魏皇帝便已不能威福自专了。曹芳之后的曹髦、曹奂说起来也只是曹操的孙子辈，因此，曹魏号称传了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五个皇帝，说起来也就是三代而亡。

取代曹魏而起的西晋政权同样覆辙难逃，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始终成为各派势力的傀儡。如果从司马炎算起，到晋愍帝其实也只是三代（晋愍帝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

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东晋虽然传了103年，差不多是西晋的两倍年份，可仍旧逃不脱三代的厄运。晋元帝司马睿传到晋成帝刚好三代，却迎来苏峻的变乱，苏峻之后庾亮兄弟先后执政，司马氏托名而已。如果从晋明帝司马绍算起到海西公也正好是三代（晋废帝即海西公是司马绍之孙），其间桓温专政，司马氏几乎皮毛不存。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是元帝的儿子，他传了两代，东晋便灭亡了。事实上，简文帝之后也只有晋孝武帝司马曜和他弟弟司马道子在部分时间内颇有些威权，到了简文帝的孙子司马德宗和德文手中时，东晋已然离囫圇不远了。

东吴末代丞相张悌有过一段名言：“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权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曹操死日，其赖以起家的“青州军”已经人心骚然，若非秘不发丧，后果不堪逆料。惊人相似的是晋武帝司马炎身后遭遇到同样的结果。而最为讽刺的则是自曹魏以来奉行的“九品中正制度”本意是维护皇权不堕，可结果偏偏相反，皇室暗弱，门阀崛起，各争雄长，内讧不已。

魏晋之后，“富不过三代”这个类似于梦魇一流的俗语仍旧笼罩在其他王朝的头上，挥之不去。大一统著称的元、明、清三代尤其明显。其实，人治社会必然逃不过此中法则，只有民主才能走出怪圈已属不争。

105. 清代意识形态管控漫谈

经济上的富足不能说明或者说不能完全说明进步。只有意识形态上的民主和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即便是西方社会，他们也是通过先行解放思想，然后才达到物质极大丰富。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思想，而人的思想只有在不受束缚的前提下才能称之为。否则，人与猪狗牛羊并无实质性区别。

由此，想到裴多菲的那首诗，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没有自由、民主作为前提下的生命必然是猪狗牛羊的圈养，没有民主、自由作为前提下的爱情也必然是习惯性交配。

所以，从来不会有一人会羡慕猪圈和狗窝有多么豪奢，也不会因为猪圈和狗窝的豪奢进而准备去当猪狗。

清军入关的结果是从根本上对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的管控。

明代搞文字狱的主要是朱元璋、朱棣父子，朱元璋本人文化知识不高，他搞的几起文字狱同他的文化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朱棣属于得国不正，担心有人在背后指桑骂槐。自明宣宗以后，文字狱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日渐稀少。

但清朝则不同，努尔哈赤时代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主要是以杀为主，入关后，则以奸杀为主，或诱奸、或强奸、或轮奸，当然在奸后再决定是否杀掉。而且，随着满清的统治的逐渐深入，文字狱逐渐扩大。

朱元璋当初要杀郭宁妃的兄长，因其装疯，故而放过。但清代乾隆对于疯子干犯文字狱有过多次数专门具体细致的指示，其结果无非都是杀，连疯子都不放过，可见其凶残程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对意识形态的全面管制为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后来者竟然做出了很多令雍正、乾隆都瞠目结舌的勾当且从不脸红，从这个角度看，清代是中国文字狱的近现代的鼻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进步，只有彻底解放思想，否则即便有过曾经的所谓的辉煌，也最终走向停滞以至于嗝屁朝凉。关于这一点，才是马嘎尔尼一书中的关键所在。

106. 杨广·张学良·林立果

当年，刘邦看到“虎视何雄哉”的秦皇嬴政时便说：“大丈夫当如是耶。”而贵族子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两个人的愿望后来都实现了。这也就应了那个规律，中国历史上能够问鼎轻重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游走江湖的流氓头子，一种是出身豪门的贵戚子弟。

隋文帝杨坚靠政变起家，心狠手辣、眼明手快。可是，老了老了却栽在了儿子杨广手里。一场“仁寿宫变”，杨广把“快打慢”施之于老爹而丝毫不手软。然而也就是这个暴君杨广，晚年同样断送到四个贵戚子弟的手中。他们分别是杨玄感、李密、李渊、宇文文化及。

杨玄感在黎阳扯旗造反，“天下胆裂”。等到李密造反，直接就给杨广定性了，而且还流传千古一罄竹难书。接着，杨广的头号亲信武将宇文述的三个儿子“策划于密室”，宇文智及、宇文文化及、宇文士及三兄弟脚踩两只船，左右都押。最后，李渊出面为隋朝“送终”。从杨玄感开始，这四个贵戚子弟下手一个比一个狠，做事一个比一个绝，自然胆子也越来越大。

最高当局在古代被称作“至尊”，他们的出生和死亡都有专门的字眼来形容，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这也只是在普通百姓眼中的形象。在高层的贵戚子弟眼中，他们更多的时候也只是一堆肉而已。寻常人家对于宫闱秘闻虽然心向往之，但究竟是“瞎子摸象”。然而，在这批贵戚子弟的心目中，“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才是最硬的道理。

“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威风的毛自称“动一个小手指头”便可以打倒刘少奇。却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一度成为林立果这个“超天才”的猎杀的对象，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并不礼貌的外号——B-52。“文化大革命”被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勾勒得玄乎其玄，可林立果之流的理解却异常简单，不过是你黄袍加身，我备位东宫的相互利用、利益交换的把戏。所以，当一方过河拆桥，另一方自然也就图穷匕见。

不论是“四大金刚”还是“三老四帅”，老大一发脾气，马上缩成一团，或请假检讨、或痛哭流涕，且不要说对抗，连想都不敢想，而人家林立果则直扑主题，刺王杀驾。今人为林彪家族翻案，试图通过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来否认林立果的行刺。其实，这实在是离题万里，如果在1971的时候还看不清林立果的话，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果郡王事件也就不难理解了。

说到林立果，必然会勾起对另外一个“公子哥儿”的记忆，那就是张学良。张学良这辈子有三件事让天下人大跌眼镜，说起来这三件事假如按照正常逻辑论，怎么也不该由张学良来唱主角，可历史就是跟大家开了这么一个玩笑，张少帅愣是上场了。“杨常事件”和“西安事变”在手段上如出一辙，都是“快打慢”，作为挨打对象，不论是杨宇霆还是蒋介石，应该说半拉眼珠子都没有夹张学良一下，更不会料到这个“虎哥们儿”居然敢下这般狠手。特别是蒋介石，连冯玉祥、阎锡山这种同袁世凯尚能周旋到底的老狐狸都是蒋的手下败将，何曾想过张学良能在眼皮底下抄他的被窝？

而近代史上能够将最高骑在胯下，哪怕是暂时的，也真就只有张学良一人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们一次军事冒险竟也意外得逞进而霸占中国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对于这件悬案，“千古功臣”的张学良晚年接受台湾记者采访，轻飘飘的一句：“是我判断失误”便一笔带过，这样“雄奇”、“伟岸”的解释也恐怕只有张学良才能说得出口。

顺便说一下，当日迎接清军入关并订立城下之盟的吴三桂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豪门贵戚子弟。

清末醇亲王奕譞为了警醒后代曾经搞过一个小段子，上谕道：“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只是老头子万万没想到，他这话还没有传过两代就应验了，他儿子载沣将爱新觉罗王朝画上了句号，他孙子溥仪甘为外虏的傀儡，连作人的底线都丢了。

上个世纪曾经有个命题，争论历史是奴隶创造的还是英雄创造的，据我看，至少历史的拐点是贵戚子弟们创造的。诸如魏晋禅代的拐点是贾充（贾谊的若干代孙子，贾逵的儿子）、东晋南北朝的拐点是桓玄、隋杨

的拐点是字文化及……。历史是一条长河，它将奔流不息的流淌下去，那些循环往复的场景会不会在某些神奇的土地上再度上演，也许只有天知道。

107. “中兴”的小名

昨天有人提到“中兴”一词，以为历史上中兴之主后面都是中衰的局面。这倒引起我的回忆，貌似中兴还有两个小名，文绉绉一点的叫“中衰”，通俗点的叫“中风”。

秦就不谈了，两代而亡。两汉四百年天下，有两个“中兴”，一个是“汉宣中兴”，一个是“光武中兴”。其实后者毋宁说叫“光武再造”。所以，东晋、南宋播迁，“中兴”的调门便没有先前那么高。虽然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曾一度被唤作“中兴四大将”的。

即便是打头的“汉宣中兴”其实也是可以计较一番的。汉宣以察察为明，为政深刻。特别是他开了一个重用无尺寸功劳的外戚的恶劣的先例，给王莽提供了晋身的机会。他这个中兴在重振家业的同时也埋下了定时炸弹。

汉宣的庙号叫“中宗”，顾名思义，中者，中兴也。可他后面的两位“中宗”便没有他这么好的运气了。晋中宗也就是晋元帝司马睿是给王敦活活气死的，而唐中宗直接就是给老婆孩子害死的。所以，唐中宗以后，历任皇帝对“中宗”的庙号一律“敬谢不敏”，拜拜吧您呐。

唐代有两个“中兴”，一个是唐玄宗，准确的说应该算是“继兴”，承继唐高宗以来的稳定局面又上了一个台阶。可上台容易，下台阶也容易。一场“安史之乱”过后，大唐变成了“大堂”，谁都可以进。再一个是唐宣宗，外号“小太宗”，只不过只有误服丹药这点跟他祖宗很相近，在他身后也只传了两代，黄巢就杀进来了。

明朝也有一个“中兴”，即“弘治中兴”。但这个“弘治中兴”属于“盗版”，也属于“假冒伪劣”。明朝进入到明孝宗这一代已经深刻介入转型社会，朱祐樘是一个乖孩子却不是一个好孩子，他没有能力（事实上就是他的二祖朱元璋、朱棣复活也不可能会有这种能力）扮演好这种角色。所以，他也只能“守摊”，可惜的是守摊工作也很落伍。最滑稽的是他生前秀恩爱，只有一个老婆张皇后，只有一个儿子朱厚照。然而，身后却被揭发

出仅此一子也并非出于张皇后名下，而是出自一个姓郑的人家。时至今日还有人怀疑《水浒传》应该是张皇后托人写的，否则第一回何以叫做“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偏偏跟姓郑的玩命？

至于清代的“同治中兴”就更加不堪了。而且这位“中兴之主”比起他的前辈，连下场都透着股幽默。

只要稍微总结一下所谓“中兴”的特点便可看出，举凡一个封建王朝忽悠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几个“誓死捍卫”的主儿冒出来，搞搞震，勉强将局面维持下去。搞得好的，还可以接茬传几代，搞的不好的，直接就玩现了。从上面几位“中兴之主”重用的小圈子来看，“外戚”无疑是首选，可见人主当年也真是“孤独”得很。

事实上，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中兴”，即便出现了一帮子御用文人吹捧的“中兴”也只是他们互相撻管对射的小把戏，意即“中风前兆”。

108. 中国历史上的“小舰队”情结

遥想当年，林立果这个“超天才”炮制出一个“小舰队”，设若林彪顺利接班的话，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小舰队”的未来必将成为中国政坛上难以逾越的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不过，历史可以回放，林立果麾下的“小舰队”在传统中国政治上可以找出无数个难兄难弟，而“小舰队”充其量只是这棵大树上生出的若干支派之一而已。

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你或许还可以看到分权同集权之间的争斗，或可说是一条“分权—集权—再分权”的路子。而在中国的传统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你所能看到的永远只是“集权、再集权、再再集权”的模板。自秦灭六国以后，专制的锁链就套在了所有人的头上，日后统治者几乎连做梦都没想过是否应该松一松锁链，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一直都是如何锁紧这条铁链，难能可贵的是，被锁住的那些人们也在与统治者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地想着同样的话题，如何锁得更巧妙，更紧一些呢？无疑，正是这种神奇的思维让类似“小舰队”一类的政治怪胎始终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当然只是名目的更新）。

汉武用“内朝”取代相权，发展到东汉时，形成了尚书独大的现象，魏晋中，“录尚书事”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甚至到了唐代，

尚书令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作为那种“大功不赏”的特殊标识。可是，问题也由此来了，丞相固然被干废了，但尚书却因此坐大，小舰队成了航母，咋办？统治者又依样画葫芦，继续炮制新的“小舰队”。

南北朝时期，出身微寒的诸如阮佃夫、杨运长、茹法亮、吕僧珍、朱异等人被分别冠以“中书通事舍人”、“侍中”、“领军将军”等中下级头衔，便可以“势倾天下”，正如宋文帝刘义隆所说：“侍中、领、卫俱为优重，此盖宰相便坐，”刘湛说的更明白：“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刘湛的本缺是太子詹事，加了一个“给事中”的头衔变成了宰执。明清两代的内阁、军机处实际也是据此而来。袁世凯的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和蒋介石的侍从室等等以及后来者也都是参详了内中的精要提炼而成，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因为这些人的出身和资历的限制，注定不可能拥有派系，而他们也唯有依附在人主的身上，才能得到荣宠。因此，人主不必担忧他们会据要津而坐大。可是，他们虽然不具备“坐大”的条件，但却拥有了“乱政”的基础。道理很简单，人主要的是集权的工具，要做到集权就必须打破旧有的藩篱，也就必须要“大提一批、大罢一批”，虽然决策权在人主，可过程中的操作却可以任由这些鼠辈播弄。而且，从历史上看，举凡要搞这种“小舰队”，多半用作“阴事”。即“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行径。故而，乱政是必然的，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也是必然的。发展到最后就连人主也可能被裹挟其中，或者断送半世声名，或者一条老命。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小舰队”一流的“小圈子”给历史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但仍旧有很多人乐此不疲，不断希冀从中找出新的花样，并试图用这种新花样让自己及追随者们走进自以为崭新的时代。可惜的是，要做到后者，恐怕只有靠做梦了。

109. “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当年说过“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黑话，陈伯达也讲过跟对一个人一类的语录。后来，林、陈二人先“反党集团”后“反革命集团”，至今未能翻身。可这种黑话的实际效用到底如何，却有可能是“商君虽死法未变”。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那天起，中国的政治其实就已经是十足的宫廷政治了。宫廷政治的核心便是“得一人而得天下”。政治成败的酝酿只在少数人或者极个别人手中，如果有可能的话，抓住这个人或者抓住这个人的

活思想，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纯技术性质的了。

因此，千百年来，大家看到的是，绝大多数人的脑袋瓜子都拴在一个人的裤腰带上。如果哪一天这个人松懈了，那么“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不再是遥远的事。奇怪的是，当“千百万人头落地”之后，新长出的诸多人头还希望继续将爹娘给的这份最可宝贵的礼物送给下一位，拴在下一位的裤腰带上。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或景观便出现了，也是千百年来，每当这个群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把自己的脑袋瓜子交出去，交给一个团伙甚至一个团伙中的某个顶尖人物。而接下来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如何向这个老大效忠或者如何增强这个老大的权威进行的。

久而久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几乎每一次打着各色旗号的变法、变器最终也都是为了强化一个人的腰围而周转。而每当一个自称是大腰围的人出现时，人们只剩下欢呼了，自己的脑袋终于有落脚之地了。

110. 胡惟庸是如何成为明代的“大叛徒”的

朱元璋总结元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时说过两段非常有名的话，一段是认为元朝法度不够森严，另一段则认为人主独裁力度不足。所谓“人君不得独揽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严礼提出“臣民不得隔越中书奏事”，被朱元璋骂作“书生之见”。好彩严礼提出异议的时间是洪武三年，老朱的脾气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放在后来那必将祸连九族。然而，即便如此，16天后，朱元璋还是下旨撤换了跟随他多年奋战的老同志兼老战友李善长的中书左丞相的职务，当然，理由很冠冕堂皇，而代之而起的是两个“儿童团”，一个叫汪广洋，任中书右丞相，一个叫胡惟庸，任中书右丞，“总理军国重事焉”。

元代中央有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实际是行政大区。到了老朱执政时，便不允许了，改名叫“承宣布政使司”，“承宣”者，照章办事而已，这还不算完，并行的还有按察使、都指挥使两家，三权分立的结果是皇帝老儿一杆子捅到底。这叫釜底抽薪，没有了行中书省的烘托，中书省也就成了空中阁楼。接下来，老朱又把中书省的助理班子一撸到底，撤销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编制，中书丞相成了光杆司令。洪武十年，朱元璋重新任命胡惟庸和汪广洋为中书省一、二把手，但第二年便专门打了招呼：“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

昏蔽，所以于民情不通，以至大乱，深可为戒。”

汪广洋已经知道了老头子的真实目的，于是“耽于酒色，荒于政事”，可胡惟庸还有点幻想和幻觉，自以为在清洗老同志的过程中立下很多新功，老头子或不至于将其“一棍子打死”。虽不可能“接班”，但至少应该老死沧州。史称“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也就是这个意思。没想到的是，在朱元璋眼中，一干臣下其实都是妨碍他子孙后代“永建磐石之基”的杂草，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开始做掉胡惟庸的罪名是“谋逆”，可这个罪名经不起推敲，日后据传是解缙代笔的王国用的那篇大作中说得分明：“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齏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王国用的这份章奏虽说是给李善长开脱，但说的却是普遍真理。说胡惟庸专擅可以，要说他谋逆造反当皇帝，那就跟说苍老湿是处女一样滑稽。

所以，朱元璋对自己祭出的这个猎物的帽子并不满意，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找到了一个杀手锏，“叛徒”。给胡惟庸扣上“通倭”的罪名，“南倭北虏”指的是南边的倭寇，北边的蒙古，当时蒙古是明朝的大敌，朱元璋不说他“通虏”，却指斥他“通倭”，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难怪爱新觉罗·玄烨夸老朱是“治隆唐宋”，说他的办法管中国五百年，实际从胡惟庸坐定的罪名“通倭”来看，老朱的办法管五百年都不止，怎么着也要管上一千年，甚至可能管到天荒地老。

“通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即便放在今天也很难平反，老朱在五六百年前就能看到这一罪名的巨大杀伤力，唐宗宋祖又算个屁呢？只是盐碱地素来人才辈出，老朱之后还有胜于蓝者，不由得不称许“祖宗在天有灵”啊。

111. 读史札记—不足则夸

宋人范镇写的《东斋记事补遗》中有这么一段话：“欧阳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则夸也。”

欧阳修以“八大家”之一从不自诩文章若何，而蔡襄则不谈书法，吕溱不

论棋艺，何中立不言酒量，司马温公不议节操。由此可见，从来都是有所不足才会有所谈论。

这种见解方之古人，怕今人看了未必清楚。但举现代发生的几件事，或可进一步明了。

陈伯达当日从不提自己文章如何，也更不提别人文章如何，在外人面前，陈谈论乃至有点小小自诩的是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而以内战见长的林彪也极少人前人后说什么战争啊战役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毛主席的。他的法子有效，我学他的法子。”

而事实证明，陈伯达的“行政管理能力”显然不那么及格，林彪爱搞政治的结果则是“满门抄斩”。不足则夸于此可见一斑。

内中强大，对外却以“哀兵”示人，此为“绵里藏针”；内中虚弱，对外却每以横暴示人，此为“外强中干”。

112. 叶利钦就是隋文帝

拿叶利钦同隋文帝杨坚相提并论，未必完全准确，但二者却有相通之处。

隋文帝杨坚猎取皇位可谓轻巧，用赵翼的话说便是：“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攘帝位。”其实，叶利钦夺取最高权力也很容易，想当年，“十月革命”好歹还有几声炮响，革命战士好歹还在沙皇的“牙床”上滚了一滚。可人家叶利钦只站在坦克上讲了一些“屁话”便立马应者云集了。前者毕竟“爆菊”，后者仅为“口交”。

隋朝因为未经大手术而安坐天下，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始终没有较大程度的改观，甚至隋文帝上台伊始就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苏威立议减少对功臣勋旧的赏赐，很快就遭致否决。《隋书》中记载世勋韦艺时写道：“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韦艺在北周时爵职至上仪同，封县侯，入隋仍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仍旧收刮殆尽，仍旧荣宠不衰。在这一点上，苏联剧变后俄罗斯的新贵们颇多相似之处。

戈尔巴乔夫晚年接受采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往事，他讲在他执政期间，曾经下过很大功夫惩治党内的贪腐，但州一级的党政首长 in 腐败问题上却很有早期革命时的“前仆后继”的劲头，往往一个州长刚被处理掉，继任者就很快承其衣钵乃至青出于蓝。而作为国民经济主干的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们似乎比他这位总书记更愿意“变天”，因为谁都知道一旦变天，化国为家即属合法。叶利钦也正是依托于这样一大批旧时代的“蛀虫”进而赢得近十年的统治且将这一模式延续了下去。

有隋一代，经济发家的手段比较单一，所谓“咱村致富基本靠抢”，隋朝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对民众的掠夺和对资源的浮冒，有人就北魏、北齐、北周和唐代的税赋与隋朝做过对比发现，隋朝民众的负担最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隋朝国库最为充裕，“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以至于后人感慨“隋文得仓廩而失百姓”。

前苏联的经济走到1973年就已经走不下去了，万幸的是，这一年爆发了中东战争，欧佩克为了对付西方，将石油大幅提价，苏联借秋明油田的开发，大发战争财，从而令其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俄罗斯史》一书记录以下数字足资证明：“1974-1984年，苏联政府仅从出卖石油和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估计也达到了1760亿外汇卢布。”当俄罗斯进入叶利钦时代后，这一单一的经济发家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变化，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无他，唯手熟尔“的卖油翁的伎俩到底能撑持多久，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

前苏联的“剧变”并非脱胎换骨，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诚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官僚进行着彻底的抵抗并最终走上叛乱之路。……而这些人仍然是官僚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北周的权贵们李穆等人宁可背负”欺君罔上“的罪名也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同杨坚绑在一起自然顺理成章了。叶利钦就是这些官僚们的杨坚。众所周知的是，隋文帝杨坚在接班人问题上搞得一团糟，自己也深受其害。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权力交接走的应该是民选而非钦定，这是举世通义。可叶利钦依旧换马频频，在他终于选定继承人并准备交出权杖时，他说了一句话：“看护好俄罗斯”。在这些人的眼中，俄罗斯更像是他们的庄园，无疑他们便是当仁不让的领主。

《隋书》总结杨坚的功罪，颇有点睛之笔：“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

未为不幸也。“据此，我们可知，这个国家的大戏才刚刚开始，不妨拭目以待。

113. “俄罗斯又发现钻石了”——历史上的惊人相似的一幕

前几天，有个国家的邸报上转载了英国《每日电讯》的消息称俄罗斯又发现钻石了。查看《每日电讯》以后得知这则消息的原始发言人还是俄罗斯自己。等到查看历史以后，就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大规模的钻石了。上一次俄罗斯发现钻石的时间是在1855年，也就是第一次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第一次克里米亚战争被马克思定义成沙俄为了完成祖训而发动的——“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抱定必胜信心的俄帝国上下为此殚精竭虑，调动各方力量，动员兵额高达百万。然而，战争的结果并不理想。从1854年开战到1856年收尾，俄军损失军队52.2万人，耗资8亿卢布，外贸锐减四分之三，而由此滥发纸币高达7亿多。因国库枯竭，民怨沸腾，沙俄的皇帝不由得突发奇想，他通过他的喉舌向外界散布了一条消息——俄罗斯帝国彼得堡银行发现地下宝藏。

紧接着，一车又一车的所谓的“钻石”被堂而皇之地从彼得堡银行的正门运出，有意让大家看到它们矫健的身影和绚烂的外观。可是，不论是民众还是贵族，似乎都不买账，农奴愤而起义，贵族则跳脚大骂。诚如恩格斯所说：“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

不过，“天不灭曹”，俄罗斯帝国到底还是发现了地下宝藏和数也数不清的“钻石”。当然，肯定不是在彼得堡银行的地下室，而是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的东北部。

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打响之初，穆拉维约夫就向沙皇积极建议，拿下黑龙江，引起沙皇的高度重视，日后成为沙皇的亚历山大皇太子专门组织会议听取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并且批准了它。到得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际，穆拉维约夫已经组织了三次强行武装入侵，收获颇“丰”。在英法面前跌了跟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着“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想法决定大举入侵，一方面迅速撤销现任总理大臣兼外交大臣的职务代之以标准的

鹰派人物，另一方面则批准穆拉维约夫扩大“战果”。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俄罗斯扩大“战果”的同时，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扩大战果”。而且，这对几个月前还是冤家的侵略者们在对付中国的态度上却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英法两国带话给沙皇说他们入侵中国“不会妨碍贵国取得黑龙江”，穆拉维约夫也投桃报李地表示：“英国人焚烧广州，我丝毫不感到遗憾。”

就这样，本年度翻脸的对手们分别在中国的南方和东北找到了和好的本钱。接下来的事实，稍微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中俄签署了《瑷珲条约》，沙俄一次性地割走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费一枪一弹拿下《瑷珲条约》让俄帝国举国上下都陷入狂欢的状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给穆拉维约夫的批示中用了“谢天谢地”的字眼，下令将中国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即“报喜城”。

这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恩格斯有过一段话足资证明：“（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而这一块土地和稍后的其他领土的价值在哪里呢？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

被列宁形容为“笨重、无力、荒唐、怪诞”的俄罗斯帝国在攫取中国的合法领土上却丝毫看不出它的这一特点，反倒是映射出清帝国的“笨重、无力、荒唐、怪诞”。难怪连斯大林都不得不承认：“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的策源地。”

当俄罗斯帝国在陷入第一次克里米亚战争窘境的时候，它发现了“地下宝藏”。而今在卢布暴跌、油价狂泻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又发现了“钻石”。而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第一次它的所谓“地下宝藏”来自于俄罗斯之外的黑龙江。那么，这一次的“钻石”的产地又将在何方呢？不妨也拭目以待。

114. “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爹是爹来儿是儿——赵构们与岳飞们的“代沟”

岳飞的《满江红》数百年来一直被仁人志士所诵唱，其中“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句更成为激励人心的良药。只是在朗读这篇

雄伟词作的时候，不妨也同时读一读明代文徵明的另一篇“古风”——“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如果读懂了文徵明的这首词，大抵也就知道了赵构们与岳飞们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代沟”，其实这也是所有“慷慨激烈”的屁民们同“朕即国家”的上层之间存在的永远的填不平的“鸿沟”——爹是爹来儿是儿。

在岳飞们和一大批“满腔热血、爱国无门”的屁民们看来，“指日迎二圣、痛饮黄龙府”才是人间正道。而且，“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后，还要“朝天阙”，将功劳“归美于上”，如此才不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的大道理。可是，这些东西与赵构们的想法往往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

赵构他爹他哥甚至他妈被女真族凌辱但并不妨碍他与女真人媾和，因为他要坐稳皇帝的宝座。是不是只有赵构才这么混蛋？也不是，往上追一追，那位被称作“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打着“殄灭暴隋”旗号发轫却以重蹈隋炀帝杨广部分覆辙告终。是不是只有皇帝老儿才会“认贼作父”？也不是，往上再追一追，“竹林七贤”的嵇康被司马昭杀掉，可他的儿子嵇绍却成了司马昭的孙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忠臣”，这位“何不食肉糜乎”的白痴皇帝当溅满人血的外衣行将被浣洗之际却道出一番令后代“跪舔”的史学者吃惊的“人话”——“此嵇侍中血，勿去。”

由此可见，在专制制度下，“认贼作父”是常态。经常鼓动人家报什么“杀父之仇”才是十足的傻*。这就是为什么当南宋的张伯麟在墙壁上题写“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后马上被干废的缘由，因为他不顾全“大菊”。

即以夫差而言，他一样也不杀有着“杀父之仇”的勾践，而杀了天天提醒聒噪他的伍子胥。即以勾践而言，他也一样杀了越国的伍子胥——文种。

倒是范蠡事前看得分明，可惜年深日久，范蠡越来越少，傻X们则越来越多。难怪古人说：“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115. 走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历史阴影的蒋经国

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有人奉送他一副对联，上联叫“独裁无胆”，下联

叫“民主无量”，横批“中正不正”。奇怪的是老蒋看后虽然勃然大怒却并没有深挖“阶级异己分子”，更没有株连九族。于此可证，在有的神奇的国家里，像蒋介石这套号的丢掉江山是很自然的，因为在那里最受欢迎的是“铁腕”。

顶着这个帽子的老蒋到了台湾以后，仍旧享受这种待遇，因为我们今天都可以看到那个叫李敖的哈尔滨人气势轩昂地咒骂过蒋家父子后仍旧活蹦乱跳地抖着他的老鸡巴幸福地活着，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有享用到作家江南的待遇。

其实，“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并非蒋介石的专利，这是一切专制王朝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杀人的时候，何尝有过什么“独裁无胆”的讥议？爱新觉罗·玄烨称颂朱重八是“治隆唐宋”，治人，隆凶，所以，简称“治隆”。唐宋固然牛逼，可何曾因为一首跪舔的歪诗就送掉了“卿卿性命”？然而，老朱做到了，刀把子永远掌握在自己人手中，难怪后代史学者说朱元璋的一竿子捅了五百年之久。

老朱囫圇，自朱棣以降，杀人的手段不再如先前那般威猛、凌厉，乃至到了万历朱翊钧，尽管此公很少上朝却忽然间冒出一句人话：“顾朝议何？”祖宗以杀伐起家，到了子孙这一茬居然想到了舆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为“独裁无胆”。即便取代明朝的清代其高压程度远迈“胜国”，但延至王朝中后期，皇帝老儿也“雄风不再”。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到了“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际，大一统王朝便开始走了下坡路，后面的局势就跟黄炎培当年讲的一样了——其亡也忽焉。而且，如果中间有哪个愣头青横插一杠子非要扎紧裤腰带的话，那么下坡路只会走得更快。

本来，这一周期律在蒋介石“私相授受”的套路上也该奏效。可是，竟意外地被蒋经国给打断了，且一直还没有连接上的可能。

蒋经国自江西起步就一直将从苏联学来的那套斗争哲学视之为“圭臬”。即便如章亚若死因也一样脱不了干系，这样一个血管里半流淌着“格伯乌”血液的“国二代”如何成为民主政制的上位者呢？源自于形势。

经纶天下，无非两条道，一条专制，一条宪政，妄图走第三条路的诸如顾孟余等人最后都只好去摸麻将。摆在蒋经国面前的也是这两条路，存

党为先还是存台为先？蒋经国选择了“存台”，他很清楚，只有保存台湾，国民党以及蒋氏宗祠的香火才可能绵延，否则，求作郑克塽犹不可能。

即便如此，在蒋经国默许民主化进程在台岛铺开前后，其内心的挣扎仍可以通过例如“中坜事件”、“江南血案”等枝节凸显出来。尤其是江南之死更能将“小蒋”的所谓“开明”诠释得一清二楚，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蒋经国授意儿子痛下杀手，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老话恰好提供足够的注脚。而血案澄清之日，蒋经国被迫答允美国人不再考虑由蒋姓人等接掌大权也是另一明证。

正是依靠了台湾局促一隅，回旋余地小的内因和美国人极力打破专制僵局的外因，才使得蒋经国一旦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就再无反顾的可能。经他培养和推举的李登辉很快利用“共管”的办法将蒋经国生前未能一气呵成的意志继承并落实下去。在李登辉看来，传统的“共和（读音为”胡“）体制很容易滑向独霸，即使是暂时走出原有体制的沼泽，如果不引入”共管“机制，则很有可能走回头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登辉应该算是吃透了郑孝胥的”三共论“且发扬光大了。李登辉认为，郑孝胥当日之所以栽在东北的泥淖中，是因郑孝胥超阶段发展”国际共管“，或者说过于迷信”国际共管“。从此后李登辉的种种行径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把”共管“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是”政党共管“，这也是他分化国民党的初衷。只不过，李登辉也没有完成，稍后的任务由台湾的”石达开“宋楚瑜接力。

台岛虽然还没有完整地走上西方的宪政体系甚至连日本都没有赶上，但却永远告别了蒋介石时代和蒋经国”初政“，基本走出了”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历史阴影。至于蒋经国、李登辉、宋楚瑜三个人的历史地位与荣辱究竟如何，相信历史自会作出真实的判定。

116. 持续的低烧—历史上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阶段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专制的低烧阶段。高烧可怕又不可怕，容易找寻病灶，低烧不断是要出大事的。

高烧要么很快烧死，要么很快找到原因，因为高烧不可能持久。

但低烧则不同。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就是典型的低烧。

你让它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去，它不干，因为高速的财富积累和转化已经让它吃够了甜头，可进一步化鱼为龙，它也不干，因为那样可能失去控制。

因此只能在一个怪圈里打转转，而转的越久，底层就越痛苦。

鞭打慢牛，你可以理解，但要到了鞭打病牛的时候，你怎么看？

咱们就说点历史吧。《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晚清挣回了一丝余温，同时也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列强要钱不要权，至少可以保障你在满足他们的利益之后稳稳地坐在紫禁城里不动。而“乱党”则不同，既要钱又要权。所以，枪口必须一致对外，不是对准列强的外，而是对准凡是敌视爱新觉罗家族的“外”。

可以去看看自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的社会状况，用当年的《闽报》上刊登的《论变法宜自变官始》中的话说便是：“豺狼当道，雀鼠为灾。铜山可倾，欲壑无底。”

与清政府的狂捞遥相呼应的是，清军的大肆扩编，1905年，计划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限期完成，袁世凯率先告捷，很快编成北洋六镇。要知道，这三十六镇的武装到牙齿的新军绝不是对外抵御列强的利刃，而是宰杀“不从命”者的屠刀。

在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公开收入大大增加，“国力”明显提升。所谓“新政”的推出，令之前苟延残喘的经济忽然注射了强心剂。

可惜的是，这一切的枢纽都系在了一个叫那拉氏的女人的裤腰上，她的风烛残年没有帮大清王朝继续走下去，特别是她死前的“私心自用”及时了断了爱新觉罗·载湫的小命，更让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注】（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中国法医根据现代科学手段检验，已经得出其人死于砷中毒的结论。此前，启功的口碑资料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只是中国的某些历史研究者一直没有正视启功的旁证，不知是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让这些历史研究者总喜欢给独裁者们穿上不该有的底裤而自鸣得意。）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那拉氏的手段明显在载沣、奕劻、那桐等人之上，大局是否彻底糜烂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这一偶然性。其实，溯至白莲教川陕大起义那天起，清王朝就已经处于低烧阶段了，之所以始终维持局面，端赖于诸如德楞泰、勒保、林则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肃顺、文祥、荣禄这些退烧药们的支撑。如果不是那拉氏和载湉脚前脚后的膈屁，如果不是载沣等人未能拖住立宪派，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辛亥革命一定不是这副模样。退一步说，即便是今天这副模样，武昌起义打枪的乱兵们何尝不是来自于清王朝体制内的力量？最终为清王朝送终的袁世凯、徐世昌们何尝不是清王朝体制内的核心层？且袁世凯接手后又何曾停止过低烧？

顺便说一句，袁世凯称帝不是错，错只在非要“皇帝”这个虚名，后人将袁说成“操莽”之流，不够准确，至少与曹操无法比，曹操说：“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还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道理很简单，“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想要鱼和熊掌兼得，最终也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挑出袁世凯的这个例子还是在说明一个话题，内因不起作用的话，一切外因都只能算作幻觉。

117. 多一只眼睛有碍大菊—庸才辈出是维系封建专制王朝的“正能量”

日本以前有个寓言，说是一个岛上，有一群人都是一只眼睛，后来有几个两只眼睛的坐船来到了这个岛上，引发了惊恐，一只眼的人们将这几个两只眼珠子的“怪物”关到了笼子里，供大家赏玩。然而，到了最后，很多一只眼睛的开始反思，为啥自己一只眼睛而这几个则两只眼睛，于是决定将这个“怪物”的另外一只眼睛也挖掉，彻底变成和他们一样的，都是一只眼睛的。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多一只眼睛真的容易影响大菊啊。

封建专制王朝起家的时候往往所谓“人才辈出”，其后便开始逐渐衰落，庸才辈出或者奴才辈出，以至于最后狗才辈出、杀才辈出。一些经历了盛世与中衰过程的文人们开始慨叹，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殊不知，“天公”如果真的“重抖擞”的话，对于封建专制社会的继续延续未必是一件幸事。

老人们在开创事业之初需要有棱有角有性格的，因为平庸成不了事。可一旦屁股坐稳了，他讲究的是“顺守”，选听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选择接班人之际统治者都喜欢“儿童团”的缘故，孩儿小，可塑性强，任由你的摆弄，任由你的塑造，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李世民那样被吹捧为“千古一帝”的人最终还要选择李治这类的窝囊废的基本理由所在。

武二郎开店，他会让武二郎、西门庆这种人当伙计吗？他只能选郗哥甚至比郗哥还不如的。庸才治下必然出现奴才，奴才治下必然出现狗才，狗才治下必然出现杀才，就如九斤老太所说“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这几乎就是规律，更是一切专制王朝的必由之路。如果有一天，这个规律被破坏了或者被局面修订了，那么，王朝也就距离崩盘不远了。

我们就以清王朝为例，嘉道两朝配备的班子成员基本都是前朝遗老遗少，出了两个“名相”，不过是曹振鏞和穆彰阿，一个是“多磕头少说话”，一个是“皇上圣明”。朝廷说白了就是维持会，这种现象遭致很多人的悲愤，他们暗地里痛斥维持会会长“无作为”云云，像龚自珍这些在野的大牌知识分子们干脆不点名的谩骂当局。好了，终于等到老皇帝嗝屁，新皇登基，一登基就收拾了穆彰阿，启用了姚莹、林则徐，可是，太平天国也来了，自然又出现了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流的“可人儿”。正是有了曾左李他们湘淮系军阀的帮忙，太平天国覆灭于血泊中的同时大清王朝也开始棺材盖覆顶了。

清末的中国可谓“人才辈出”，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也有，自然也有继续唱白脸的，可也就这么大声歌唱着，就把大清给唱垮了，“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好歹火烧阿房宫的还是正规武装，武昌起义的那帮子人算是十足的乱兵吧？再然后就有了被许之为“当世俊才”的袁世凯将“祖宗三百年基业”垫到屁股底下的那一幕，史称“辛亥革命”。

其实，初装版的“辛亥革命”早就上演过了。在清人说梦话的“同治中兴”的年代里，曾国藩这位“勋高柱石”的顶尖人才便和他的助手赵烈文探讨咱大清到底还能活多久的问题，最后居然得出结论，至多五十年。而在朝廷倚为长城的北洋六镇军中，也“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这些自嘉道以来难得一见的明星级政治人物彻底将大清王朝送上了不归路。真是“人才难得”啊。

或许有人要问，如果没有曾左李，太平军岂不早就灭了咱大清？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结合我们上面谈到的，可以试着得出以下一段结果，即没有曾左李，太平天国灭了大清朝；有了曾左李，曾左李灭了大清朝。左右都是被灭，反倒是老百姓那句话说得好：“早死早托生”。

由此可见，庸才辈出实在算得上封建专制王朝的“续命汤”和“正能量”，上面平庸，下面也平庸，大家都庸庸碌碌混日子，谁也别笑话谁，谁也别不满意谁，结局或者像曹雪芹说的那样——“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或者像鲁迅说的那样——玉石俱“坟”。

可惜的是，这种顾全大菊的应景社会按照封建文人的设计，只有在三代以上才会有，这也是他们无穷追思尧舜禹的根由。

118. 封建王朝“官二代”们发动宫廷政变的千古榜样——略谈司马师

最早知道司马师的大名全拜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第40集《政归司马氏》。记得那是司马师挡了姜维的去路，姜维很生气，把枪一摆，骂了几句，翻译出互联网时代的语言便是：“马币，找死啊。”于是乎，司马师抱头鼠窜。当年觉得司马师真是自不量力，你怎么也敢拿枪跟使枪的祖宗之一的姜伯约叫板呢？（听《隋唐演义》的评书时知道打败罗家枪的是姜家枪，也就是姜维的后裔）

后来做了历史票友以后，读了一些书，这才知道这位抱头鼠窜的司马师实在是大有来头且大有嚼头，说他是封建王朝“官二代”们发动宫廷政变的千古榜样基本没大错，加上之一也不减损他应得的分数。关于这一点，他老弟司马昭说得很清楚：“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景王是司马师暂时的谥号，西晋建立后谥为世宗景皇帝。从他晋世宗这个庙号来看，也能品味到司马昭的那番话的真实含义。

司马懿也不是一开始就要搞政变的，他装逼装了很长时间，要说没人看出来也是假的，至少曹操、曹植、高堂隆、陈矫这些人都看出点苗头来了，像蒋济是后来看出来了，虽然晚了，但也挺深刻。偏偏管事的曹丕、曹叡父子愣是没看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司马懿的政治运气跟杨坚有些类似，北周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轨都向周武帝宇文邕反映过杨坚的“反骨”，可宇文邕说：“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完全是不以为然的态度，周天元暴则暴矣，但却是典型的昏暴，嘴上说要杀杨坚，实际上

竟在囫圇前让杨坚的密友郑译主持大计。事实上，曹丕、曹叡父子连周天元的智商都没赶上，别说杀司马懿，想都没想过。

司马懿也有像郑译、刘昉那种小人般的密友，即刘放、孙资。不过，刘放、孙资毕竟没有刘昉那么胆肥，准备自己黄袍加身。曹魏以诈伪取天下，加之盘剥深重，所谓“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曹操死后，赖以起家的“青州军”都有异动，于此可见一斑。张悌曾经评论道：“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特别是曹叡，在诸葛亮死后，自觉大敌已去，四方宴然，以至于游幸无度。加之后嗣凋零，接班乏人，这就给外在势力平添了可乘之机。

如果仅仅有了刘放、孙资，而没有内里的得力助手，司马懿一样不敢放胆自为。就这样，司马师应运而生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史比一般意义上的远要凶暴得多，因此，搞宫廷政变的凶险系数也就水涨船高。策划如何掌控曹魏大局的计划只在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两人中产生，连后来成为西晋的“周文王”的司马昭都没有给打招呼。最关键的是，这对政治父子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集中先行清理门户，就这点来说，司马师比他老爹司马懿下手狠多了。

司马懿的老伴张春华看出老头子的“心事”，史称“尝省懿病”，气得司马懿大骂“老物可憎”，并说：“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这里的“好儿”指的就是司马师。但老头子明显多虑了，“好儿”何曾“虑困”，一俟发现自己的枕边人夏侯徽也觉察到苗头时，果断地将其毒死，夏侯徽是夏侯尚的女儿，尽管人也机敏，到底慢了一步，让司马师一招制敌。司马懿管老伴叫“老物”，可憎也罢，可恼也好，到底没有“好儿”下手快。从司马懿恨妻不死到司马师毒毙发妻这两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老百姓所说“家有贤妻，丈夫不做横事”大概也是一厢情愿。至于现代史上有人感叹如果毛不是娶了江青，林不是娶了叶群，其人事业或许不同云云，更是鬼扯。曹操、司马懿一流的人物，为政治而生，休说老婆挡不了他的道，即便亲爹娘如果条件允许也一样开办。无独有偶的是，千年过后的吴三桂西南起反，老婆也姓张也苦口婆心规劝，仍旧屁也不顶，说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只有傻逼才愿意相信。即便同心同德的老婆在这些入等的眼中至多也是工具，应该承认还是江青自我定位比较准确——“一条狗”。

在诛杀曹爽案中，司马懿屠刀翻飞，几乎杀红了眼。但是，他还是不如他”好儿“，这从何晏的命运就能管窥一二。何晏曹操的姑爷子，曹操很重视他，拿他当儿子待，司马懿也很重视他，拿他当干儿子待。司马师更重视他，拿他当敌人待。据方诗铭考证，何晏不是死于司马懿之手，而是死于司马师之手。

司马懿死后，许允跟夏侯玄说：“没啥可忧虑的了。老鳖嗝屁了。“夏侯玄批评他”二逼“，然后说了一段颇有预见性的名言：“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夏侯玄的意思是说，司马懿尚能把夏侯玄当做子侄辈看待，而司马师、司马昭肯定不能容他。夏侯玄的这番话不是没有来由的。遥想当年，何晏品评当下巨头，点了三个人的名，一个是夏侯玄，说夏侯太初”深“，一个是司马师，说司马子元”几“，剩下的就是他自己，虽不点名，却自命”神“。想想看，司马师连”神“一般的何晏都给宰了，还有啥顾虑”深“一般的夏侯玄呢？

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司马师都做到了，而且不声不响，所谓”润物细无声“，他自己亲手组建的”小舰队“，三千多号人，散出去连个屁都没有，聚拢来，连司马懿都懵了——”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像林立果那套号的连司马师一根鸡巴毛都赶不上竟然也想搞政变，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人将其比作”博浪一槌“。妈的，谁是张良啊，笑死人不偿命吗？

何晏评价司马师”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说的是司马师洞察微细，见微知著的典故。事实上，司马师自视甚高，王弼死后，司马师说：“天丧予“，口气跟孔夫子感喟颜渊之死一个腔调，俨然以”素王“自居，较之何晏还要狂傲几分。一手持屠刀，一手握经书，一面披儒术，一面着法家，完全是”内圣外王“的架子。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曹叡不死，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当不敢轻动，这从司马氏父子隐忍曹爽尚且十年之久便能掂出分量。而机议未熟就满世界嚷嚷，那不是搞宫廷政变，是卖烤地瓜的。

119. 江青炫耀她的小学学历

花副主席千芳自活学活用司马昭之心后开始酷炫他的”初中文化“。这或许是因为花副主席尚未进入党校进修，尚不知”我党“的历史所致，因为

四十九年前，文化旗手江青就酷炫过她的小学学历了。

1965年，江青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陈丕显、谢志成、张春桥吃饭。席间，江青询问陈丕显是什么学历，陈丕显回答是小学，张春桥回答是中学，谢志成是中专回答说也算是中学。江青立刻引陈丕显为“同道”，颇为感慨地说：“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并表示：“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陈丕显回忆道：“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注】（《陈丕显回忆录》第16、17页）

只是江青这段酷炫也是山寨版。因为早在一年前，她的丈夫就公开表示过这样一番道理：“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注】（穆欣《林枫传略》第284、285页）

看到了这个原创版以后，很多事情也就幡然理解了。今天重新翻检出这节史料，目的也就是告诉大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放映工作队们为了不让后来者漏掉精彩的情节，总不惮以播放若干循环场的。因此，大家不用担心好戏会被拉下。所以，花副主席千芳自爆即将被选送进入鲁迅文学院，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冷静的头脑直到花副主席被选送进入中央党校进修的那一刻仍旧不必“莫名惊诧”。

历史告诉我们，江青他们的征途是“星沉大海”。

120. 中国通奸史简明教程—前言：秦始皇与孔夫子都是通奸的产物

有道是：“生命在于运动，淫生在于通奸”。一部中国封建专制史其实就是一部通奸史。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者历来只披两张皮，一张曰秦始皇，一张曰孔夫子。有时候秦始皇当外衣，孔夫子做内裤；有时候则相反。套用古人的话说叫“内儒外法”或“内法外儒”。

窃取天下时往往用秦始皇，不用孔夫子，即所谓不穿底裤，法国人叫“无套裤党”，实际较之中国，相去万里之远，连他妈内裤都不穿，还用套裤？等到坐天下时，总不能仍旧一副贼模样，所以，把孔夫子穿在外面，秦始皇套在里面。美其名曰：“逆取顺守”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关于这两件套的作用，汉宣说得很明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诸葛亮更进一步说明：“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因此，一旦天下有变，便脱下孔夫子，露出秦始皇，这在古代叫“赤膊上阵”。

偏偏孔夫子又被尊为“素王”，无疑，嬴政则是荤菜了。于是乎——“荤素搭配，干活不累”。（所谓素王用冯友兰娜的解释是“孔夫子属于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

说了半天，有人或问关通奸屁事啊？实不知，盐碱地上的这两位祖宗秦始皇、孔夫子都是由通奸而来。

春秋有个猛将叫叔梁纥，登城楼如履平地，后来知道此公不但武功了得，床第之间的功夫更加了得。看过《红高粱》的都知道“野合”二字。而当日叔梁纥与颜氏野合有孔夫子，只是不知有人是否考证此颜氏是否为颜回的先人？如是，则皆大欢喜。前世为夫妻，后代论师生，前世整野合，后代玩论道。剩咸（圣贤）、大湿（大师），合起来唤作——咸湿（先师）。而且还至圣（致胜）。

至于嬴政的老娘赵妈的野合史或通奸史，就更加不用细说了。想当年，吕不韦问他爹干什么最赚钱，他爹说出了个“奇货可居”的成语。然而，他爹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一种办法更驴，那就是“空手套白狼”，用鸡X开道，一路绿灯。

由于乱翻书的缘故，有些人又忽然看到恩格斯死前对战友马克思的回忆，方才明白，老马活着的时候与仆从通奸，却提起裤子不认账，将此事记在恩格斯名下，恩格斯即将“面圣”之际，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比起周恩来夫妇“我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和“我也有一肚子话没有对你说呢”的千古对白，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盐碱地传统祖宗嬴政与夫子都自有通奸的背景。不过，也只是背景而

己，自己却不曾亲手操刀。而国际共运的两位祖宗马克思、列宁则身体力行，别开生面。上个世纪所谓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纶音”之感。好在也仅仅为“纶音”，而非“轮奸”。

121. 梦回大清

列宁多少年前就说过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而事实证明，谁独裁都不行，都要垮台。

中国不是因为没有了满清才导致了上个世纪初的贫弱和混乱。恰恰是因为满清的皇权观念死而不僵让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沉痛的代价，以至于有些人至今不醒。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被误判入狱八年如今平反昭雪的女性公民给法庭上的法官磕头鸣谢。类似的行为和思想想必不用更多举例了吧？

有什么样的土壤，也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庄稼。

应该清楚一点，现代民主政治不允许社会体制中存在任何一个可以一手遮天、一股独大的政治力量的存在。所以，也就不存在大清亡了该咋办的命题，即便有，也是伪命题。

清政府被名义上推翻以后，各方势力首先想到的不是积极寻求民主政府的成立，而是寄希望于复制满清的部分结果以期借尸还魂。事后证明，这种借尸还魂的行动还是成功了的。

为何成功？道理很简单，因为多数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固定的理念：“没有奴隶主的奴隶社会是真不行啊。”

就是没有人问一句：“啥年头了，还需要当奴隶吗？”

在清代，中国人连思想、言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样的鸡巴国家里，其谁能信尚有“主权”可言？

等到外强入寇的时候，撒丫子跑的最快的难道是卖烤地瓜的吗？还不是那些个平日间忠孝仁义挂在嘴边的帝王将相们？

可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有人鸡巴给你洗脑说，君可以不君，但民决不能不民。

也就是说当皇帝的可以跑，但做百姓的必须殉节。

也有人因此大骂皇帝无能，以为换了一个皇帝，或者换了一个团伙就会变好。

又是一个鸡巴噩梦的开始。

不彻底倾覆皇权，就不会有出路。

孙中山说“颠覆满洲专制政府”，他只说对了一半。

在大清朝，经常有人提出一个话题，叫万一没有了皇上，天下会大乱，没有大清，百姓会更遭殃。

这话不见得都错，因为事后的发展部分地验证了这段话。

但几乎从没有人认真地想过，为啥没有了大清以后，天下会大乱？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大清活着的时候霸占了中国所有的政治空间和生存空间。朕即国家，大清即中国。

所以，当大清衰弱的时候，百姓的日子就开始走下坡路，当大清完蛋的时候，百姓开始六神无主。

一国的生命统统被捆绑在一个政府和一个家族的裤腰带上，这种现象正常吗？

也所以，当大清完蛋的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清醒的人应该说的不是“可惜”，而应当是“活该！”。

当初大清覆灭之后随之而来的混乱的根子就在于表面文章做了，但实际内容却没有填充。换句话说，清政府颠仆了，可皇权犹在。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民族的老根的问题了。

晏阳初当日说中国人的四个劣根性，其中有一条叫“狭”，即狭隘，说白了，就是急功近利。

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何成功，美帝为何能建立民主政治，日本为何战后迅速崛起。等等，包括我们素来视之为“藩属国”的南韩一旦走上了民主政治以后都很快扭转了昔日的败局。

土壤改造至为关键。

英美等国正是改良、改造土壤等项工作的几乎同时跟进才动了打倒专制政府的念头，意即水到渠成。而日韩则因为国际共管的力量进一步催生了民主力量。

然而，满清覆灭前夕，几乎所有势力（除开爱新觉罗家族掌权派外）都不同程度地做着一件事，赶快推翻大清，赶紧地。

推翻以后咋办？如何整理头绪，如何布置重建，从未仔细想过，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合计过。

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急功近利”。

打倒满清政府是目的吗？显然不是，只是手段。而最后，手段居然成了目的。那么，目的呢？最后变成了换一伙儿再来的局面。从而再度走上循环的老路。

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那时节像英美那样一方面做了培育民主的工作，一方面做着倾覆满清的计划，可行吗？同样也是不可行。

所以，这就等同于陷入了一个怪圈。

这个怪圈是必须打倒满清政府——打倒之后大乱——必须结束大乱——结束大乱就必须选出一个老大——选出一个老大就必须绝对服从——一个老大带领大家重建秩序——老大成功了，他也走向了专制——为了让老大结

束专制，就必须寄希望于新老大。

本来，民主要有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但几乎所有的国人都等不及了，失去了耐心。满清覆灭前失去了耐心，却迎来了洪宪帝制；思想解放失去了耐心，却迎来了“砸烂孔家店”；抗战胜利后也失去了耐心，却迎来了内战。

郭嵩焘曾经展望中国追勉西方社会的时间表是480年，事实上，我们谁有这个耐心？谁又有这份耐力？

没啥悬念了，洗洗睡吧。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

122. 嫖娼汉

一度喧嚣一时的话题莫过于“通奸”和“嫖娼”。说起来虽然都是非法操逼，但级别待遇还是有区别的，非民间人士的一般套用“通奸”，民间人士则使用“嫖娼”。这比起多年前统一使用“搞破鞋”显得产权明晰多了。

组织貌似一直对生活作风问题很关注，经常拿它说事。比如后来批林彪，萧克在回忆录中就幽幽地提了一句，林彪还在红军时期就有梅毒。后来非官方的网站上说革命导师列宁也得过梅毒，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是联共（布）党员，我真的相信了。

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近山因为和小姨子关系超越了跟老婆的关系就给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由此引发轩然大波。组织指派刘少奇处理此事，说起来组织也是知人善用，只是这件事不知为何请刘少奇出面？让一个结过五次婚的去和一个正在搞移情别恋的人谈什么？谈爱情的忠贞不渝抑或其他什么？总不至于谈金鞋拔子吧？

文革中，出面处理王近山的刘少奇也被贴了大字报，并被当场质问五次结婚的事，刘很生气表态说那都是明媒正娶，明着来的，这一说，算是炸了庙。

后来有人考证说这张大字报以及这样的质问来自于江青。好吧，我们姑且就算是江青吧。

疑问同时也来了，一个搞破鞋的女人要质问一个男人为何离婚结婚五次之多，她的强大的道德制高点又在哪儿呢？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很清楚为什么管经常喜欢被人乱操的女性叫“破鞋”，这其实还要从咱们老祖宗伟大的“和鞋”文化说起。

清代张云璈《四寸学》中说：“今俗新婚之夕，取新妇鞋，以帕包裹，夫妇交递之，名曰‘和谐’。”所以，前几年大家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事物都跟“鞋”有着密切的渊源以至于发出“皮鞋很忙”的感慨，其来有自了，在“和谐（鞋）”社会中，鞋当然很忙了。

北京城原来赫赫有名的“八大胡同”里盛传过一段关于“鞋”的术语。

数人同识一妓或数妓同识一客称“靴子”；挑友人所识之妓，称“割靴子”；同靴之人称“靴兄靴弟”；同靴之人互相会面称“会靴子”。

按照刘瑞明在《鞋与古今民俗》中的解释，靴就是鞋。

那么，引申一下，同靴就是同鞋。现在小屁孩们上网喜欢管同学叫“童鞋”，真是早熟的很啊。

而鞋口象形女人的牝户，所以，破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即人人皆可插入。

江青得势之际，她早年被若干人插入的历史素来是最高机密，下课后则广为流传。其实不独江青，现在算起来，几乎每一个被宣布腐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部大同小异的“通奸史”，只是这些“通奸”的东西在台上的时候，百姓们都需仰望才是，哪里还能暗自想到大人们也居然属于“破鞋”一列呢？

谢觉斋当年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违犯决定的，每是参加决定的人。犯法的是有势力的人。”

回望谢的这段话，再回望一下层出不穷的通奸事件和被嫖娼的悲喜剧，也就都一目了然了。

123. 欲为耳目，无非小人

东晋的徐邈给朋友范宁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借小信而成其大不信。

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

“可怜东晋最风流”，大谈君子小人的东晋只存在了区区一百年挂零，而提倡告密、小人大用以至于“君子道消，善人舆尸”的明清两朝却足足活了五百多年，甚至还做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徐邈泉下有知，岂不要活活气死？

明代设置厂、卫，窥伺阴私，总还不敢公开来，等到发出“东厂逮人，哪个敢问”的声音时已然是明末了。满清入关，表面上祛除厂卫制度，实则将其深入骨髓，清世宗首开密折制度，以天下官僚皆为厂卫，扩大会议的威力果然无比。

上个世纪发生的那场浩劫，让告密成为“人间正道”，其升华程度，令前人望洋兴叹。

梁晓声在他的回忆录《从复旦到北影》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后期，他们同宿舍的某人平素经常做两件

事。一件是往笔记本上频繁地记录；另一件事则是跑到宿舍窗户对应的操场那块地挖坑，不断挖，不断将挖出的土拍松拍软，当时大家都不解其意。后来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高喊：“地震了！”大家慌忙出逃，途中发现某人不见了，提议回去找。等到找到某人时，某人已经跳进了他平常认认真真挖的那个对着宿舍窗户的操场上的土坑里，因为半夜，因为动作急躁，因为事起突然，等等吧，某人的头先行落地，性命无恙，但脖子受损，乃至瘫痪。在整理此人的“遗物”时发现了那个神秘的笔记本。后来大家才知道，那个笔记本上记载的都是同宿舍其他人的往日间的“不慎”言行。

欲为耳目者，无非小人；欲用小人者，无非侏儒。

124. 大清摄政王载沣惹毛了庆亲王奕劻—砸锅的序曲

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覆灭一定是由“内外交讧”作为开场白的，也一定是由一个大佬开始砸锅作为伴奏的。

老佛爷当初不是不懂奕劻，但终于不动奕劻，并非全由瞿鸿禨“事机不秘”，而是炮打双灯，动作实在太大，大清朝风烛残年实在经不起这轮

折腾了。事后证明老佛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甚至有些烛见的味道。

精明一点的统治者搞宫廷斗争从来都是拉一派打一派，从没见过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自己则避免不吃水的主儿。

然而，这种精明看起来并不遗传，老佛爷钦定的接班人载沣就不是这路人，他太急于成功了。

奕劻的祖宗和载沣的祖宗是哥们儿，传到载沣这一代，他们早就出了“五服”，所以，你载沣拉你的至亲骨肉进门一般人没话说，但你要因为你的至亲骨肉的进门让老庆这样的老资格滚蛋，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说起来，庆记公司的当家人奕劻也不是白玩的，野史上说他最穷的时候居然四处告债。从底层爬起来的几十年就坐到铁帽子王的奕劻自然不比一生长下来就可以穿“四团龙补褂”的载沣，如果仅仅把老庆看作是破抹布，那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智商问题了。

载沣们恰恰犯的是智商上的错误，对于一个可以左右大局的人，能力的错误已经不可饶恕了，智商的错误则彻底断送一切。

“不让我吃好，咱们大家就都别吃”，这应该是庆亲王奕劻的心里话，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一定会藏着这句话，但事实证明了他后来行事的风格应该是照着这句话去的。

光有老庆一个人砸锅还不行，偏偏还多了一个类似司马师一流的“官二代”袁世凯。

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这时东风偏偏来了，他就是摄政王载沣以及他的拥趸们。

全都是那么应景，全都是那么的寸。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125. 读李新达的《洪承畴传》

对比王宏志和杨海英的那两本书，这本李新达的《洪传》很有点深度。王宏志的那本其实是垃圾，乱七八糟地写了一大堆，最后还用孙中山的一首歪诗给洪承畴盖棺论定，开追悼会呢？杨海英的那本书呢，资料很多，但不知道怎么搞，最后搞成了拼盘，都给罗列出来，这样要你搞历史研究的干嘛啊？直接找一个切菜的不就完了吗？

相比之下，李新达的这本书写出了洪承畴的一个本来面目，志大才疏，名不副实。

早年阅读洪承畴援锦之役始终囿于一个误区，那就是由于崇祯的瞎指挥导致了洪的覆灭。而李新达的这本书则告诉你，客观因素有之，但主观因素即洪承畴本人水平能力其实是占有主要份额的。

这就令人联想起裴潜同曹操的一番对话来了。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这段原文载于《世说》，不排除裴潜拍曹孟德的马屁，但的确道出了一个大道理，即个人的局限性也就是能力范畴。其实，曹操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当初乔玄、老许他们说他是“清平之奸贼”。同样也是道出他的局限性。善于破坏一个旧物件，也就是拆迁队的，但要他们按照图纸施工建造一个新大厦的时候，都他妈的傻眼了。不会看啊，或者看个半吊子。后人专司崇拜曹操，作诗曰“魏武”云云，其实也是半斤对八两而已。

这里引出以上这番议论的目的就是说洪承畴本人如果在承平时代做个太平宰相，应该没啥问题，但让他这样的去干拨乱反正、奇正相生的买卖，那就不灵了。当然，朱由检环顾左右，也的确没有超过老洪的，说起来这也许只能用宿命来解释了。

之后满清让洪承畴去经营南边，也同援锦之役一样，不死不活，直到他熬不住了，孙可望出来投降了，这时，洪承畴本人已经被获准回京休养了。在主子和实力都发生变化以后，唯一不变的还是洪承畴自己的路数，于此可见援锦之役如果真的打赢了，那真是只有在梦中了。

126.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读余世存《大民小国》

余世存在这本名叫《大民小国》的书中被冠以“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所以，自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但读后又自感作者似乎同“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这一名头实在相距太远，理由如下。

该书实际上是余世存本人的专栏单篇的合集，内中一篇介绍邵飘萍的文字，余世存先是转引了散木（邵飘萍的外孙子）的原话：“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对于散木的这一说法，余世存肯定地说：“散木说得对。”紧接着有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张作霖没有道理可言，但他对文化是有底线，他对文人的敬重有目共睹，关键是文化人自身越过了这一底线。”（《大民小国》第15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

首先来看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底线“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底线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底线？如果这也算是“底线”的话，那么，请问什么叫“没有底线”呢？然而，这样的底线在余世存看来则是“他对文化是有底线，他对文人的敬重有目共睹”，邵飘萍的死至少在余氏看来属于“文化人自身越过了这一底线”，意即活该被杀，因为找死。

或许余氏本人要否认这一初衷。不过，他的这一看法委实算不得新鲜。前一段，恐怖分子袭杀法国漫画周刊的诸多人士之际，苏区就弥漫一种声音，认为被杀者属于“自取其辱”，全是因为他们先行侮辱了对方，所以才让对方屠刀相向。包括鼎鼎大名的新华网颁发的那一篇打着《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旗号的短评也属类似调门。只不过，他们都比余世存晚了三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氏的“非常道”却也真是“不可道”。

由邵飘萍的话题引发了余世存的另一番议论，他写道：“蒋廷黻曾对军阀不满，他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责备他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有贡献。’”

应该说，余氏转引丁文江的议论或可说也代表了他的看法。丁文江的这种论调延伸开来完全可以轻易地将自秦始皇以来的一系列暴政都归结到“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层面上来，轻而易举地将

这些帝王将相、军阀诸侯们解脱出来。余世存们没有经历过诡谲多变的政治运动，却能在二十一世纪仍旧自觉地同“工农兵”结合得如此完美概非无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带有替统治集团鸣锣开道、帮凶杀人的基因的说法于此也可见一斑。事实上，像余世存这类的知识分子，未必就完全混同于网上那些个五毛们，但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东西同样映射出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残酷的事实即“伯仁虽非我杀，却由我而死”。

在《大民小国》的若干篇章中，同为湖北籍的黎元洪、汤化龙均在余世存（余世存也是湖北人）笔下“正义凛然”起来，如果写书不是为了道义而是为了给同乡会凑份子的话，这样的书或者文章亦可休矣。

还是在这本书里，余世存”歌颂“宋耀如有诸多孝子贤孙，有诸多光耀门楣的子女姑爷子，借用宋耀如的话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宋耀如的”膝下“的”超人“的确不少，只是让我们困惑的是在这些”超人“的统治下，中国也好，中华民族也罢，哪一个走出了低谷？哦，或许还是由于”超人“不够多？因为”太阳“太少的缘故？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超人式的伟大人才“可谓”辈出“，结果又如何呢？单纯地将所谓”家教“提出来作为讴歌历史人物的证据，不免单薄了点。

顺便再说一句，本以为余世存笔下的陈寅恪会有振聋发聩的新意迸出，没想到仍旧是老套路的散文，余世存说：“这位不世出的中国人物“，陈寅恪文章道德自不必说，但要讲”不世出“，恐怕还算不上。邓康延诸人搞的《先生》一书中对于陈寅恪晚年撰述《柳如是传》曾评论如下：“对于陈寅恪花了这么大的精力用85万字来写一个名妓，很多人十分不解，而陈寅恪却用大手笔写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就想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这层意思，通过这部著作写出来。”

余世存也好，邓康延也罢，他们只顾着吹捧陈寅恪，却独独忘了一点，天底下最理解柳如是的应该谁？首推钱谦益。一生秉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人最终留在了没法独立思想也无自由精神的家园坐困愁城只能从柳如是身上找到排遣，与其说陈寅恪写柳如是乃”布道“，莫不如说

是在“自况”，自况钱谦益而已。所以，陈寅恪并非“不世出”，中国没有不世出的知识分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始终走不出循环圈的根本缘由。

同样，余世存之流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他们各自的“先烈”，他们偶尔会写点东西，与当局唱点反调，但决非反对当局，不过是卖弄一下身段让当局看到他们的存在进而投怀送抱。可惜时下的当局既有钱又任性，眼珠里并没有他们的位置，悲夫？

127. 别有用心与没心没肺的交合——读叶兆言《一号命令》有感

很久不看小说了，一个逐渐封堵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家园往往是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而这两点无疑是小说的两翼。

前一段章诒和在网上说叶兆言的《一号命令》终于送审通过得以出版，叶兆言本人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刚好昨天在图书馆里闲逛，看到有这本书，于是就借来于是就读了一遍。

读书喜欢先看《后记》一类的，该书也不例外，在《后记》中，叶兆言引了他在微博上的一段话，内中说：“为‘文革’翻案者，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没心没肺。”

二十出头的时候看了很多叶兆言的作品，可以用“几乎”两个字形容，至今还记得躺在宾馆的大床上，嘴里嚼着“白云凤爪”翻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兆言作品集的片段。从那个集子里知道了叶兆言笔下的小说中的女人的名字出现较多的首推“张英”，也知道了有一种写作叫“从容”。

叶兆言的作品就有些从容，永远都是不紧不慢的。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部作品叫《走进夜晚》，不知为何，叶兆言本人罗列的简历中始终没有摆放这部作品的位置，就像罗义俊的简介中始终没有《太平风云》这本书一样。而他们作为作者本身或许没有想到，正是这两本书给很多后来者以无数的启迪和启沃。用孙楠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出场演唱的第一首歌的形容便是“沧海遗珠”，只不过孙楠那是“自况”，而叶兆言这本书则多少有点“众议”。

在《走进夜晚》中有一个情节至今记忆深刻。养父老马与养女蕾蕾夜深

乱伦，蕾蕾之前虽被老马多次强暴，但都属于被迫，而这次则不同，蕾蕾孤身一人带着孩子临时寄养在生母家中，久旱不逢雨，老马的出现自然可以聊以充饥，就这样，乱伦中产生出的快感及其副产品——呻吟终于惊动了蕾蕾的生母。

《一号命令》的结局也有性的描写，男主人公赵文麟白日里目睹了前女友沈介眉的裸体，半夜里便将发妻紫曼暴插一顿。在赵文麟原本的情爱设计中没有紫曼的身影，至于紫曼更是很少将赵文麟视为“真爱”。然而，“紫曼半推半就，自始到终捂住他的嘴。紫曼使劲捂着他的嘴，害得他都透不过气来。那一夜足够疯狂，那一夜惊心动魄，那一夜如鱼之乐水，那一夜的结果，便是有了可爱的女儿天天。到最后，到了最后，他们不可抑制，都爆发了，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叹气，终于肆无忌惮，终于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

回到叶兆言后记中的那句话“为‘文革’翻案者，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没心没肺。”再结合一下《走进夜晚》与《一号命令》中这两场性爱游戏，你就会发现，当“别有用心”和“没心没肺”交合时才会产生“足够疯狂”、“惊心动魄”、“如鱼之乐水”，才或许会射出新的产物，而且也才会“不可抑制，都爆发了，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叹气，终于肆无忌惮，终于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

叶兆言曾经奉命抄写“讲话”，事后挨骂，自己表示“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蕾蕾当日同老马苟合，事后也很悔恨，但过程却很“嗨”；紫曼临死前痛骂赵文麟，不知是否还记得那个湿漉漉的夜晚。从这个角度上看，《一号命令》到底是记录了高潮还是记录了惭愧呢？

128. 唐高祖李渊的所谓“晋阳起反”

读《唐史》，我历来有个个人标准，只要拿《大唐创业起居注》给李渊翻案的主儿的东西，基本可以忽略，第一没啥新意，第二纯属扯蛋。有人或许以为武断，但我个人则屡试不爽，从《唐高祖传》到老墨笔下的这位“黄永年先生”。

温大雅是世民一党，这且不说了，单说《起居注》的起止时间是从隋杨大业十三年五月到李唐武德元年五月共357天的事情，明代胡震亨所著《起居注跋》中写得很清楚：“大抵载笔时，建成方为太子”。

换句话说，这部《起居注》从一开始就是在李渊在位，李建成气势嚣张的背景下完成的，他不敢也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告诉给读者，或者说不敢将相当一大部分的真实情况说出来。

今人王素、邵干才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出一个可议之处，即《起居注》中提到世民和建成，一定是建成在前，世民在后，提到裴寂和刘文静时，也一定是裴寂在前，刘文静在后。而刘文静敢于争功，若非事实，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如此。由此可见，晋阳首义的内幕是被层层迷雾掩盖的。为尊者讳的“尊者”是谁？首先是李渊。

李渊安排李建成、李世民点火于基层的时间是隋杨大业十三年，即617年，这时，李渊已经51岁。刘备说过：“人五十不称夭”，可见，活到五十岁在古人看来基本够本。在当时的标准，这已经是晚年岁月了，在这样的年龄段上起反，做杀头灭门的买卖的，帝王将相中可有几人？南北朝的南齐的王敬则算一个，六七十岁了还拖着铁锹造反，但那是给肖鸾杀到头上来了。615年，李渊49岁时，隋炀帝杨广开始对讖记中提及的“李姓”中人大开杀戒，比如这一年杀了李金才，李渊虽然也感到有点威胁，却没有任何动作。

有人举《旧唐书·宇文士及传》中李渊的那段话：“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作为证据。所谓“已六七年矣”指的时间点是大业九年。同样在这一年中，窦抗劝李渊举事，李渊反而说：“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

从上述这两件事上看，所谓的“与我言天下事”，更多的是李渊同宇文士及之间议论时局的变化乃至趋势，距离“举事”、“起兵”还远得很。应该说，直到隋杨大业十二年，在一小撮人的鼓动下，最主要的是整体政治形势明朗后，李渊这才被真正地架到了前台。因而，晋阳首义的老大判定为李渊，理由实在牵强。

司马光说：“起兵晋阳，皆秦王世民之谋”。司马温公本人对玄武门之变并不以为然，却能说出这番话，可知历史真相本来如此。后人治学深厚者如陈寅恪等前辈也均无异议。

129. 口味

经常能听到人们说，一个人的口味从四岁开始便逐渐固定了。是否有啥

科学依据，没有调查过，但固定后的口味确实很难改变倒也是事实。

比如说皮蛋，北边的都叫它松花蛋，南方人喜欢叫皮蛋，当初在武汉时，当地人喜欢的一道小凉菜就是“皮蛋豆腐”，上面盖浇了很厚的麻油，大抵跟湖北产芝麻有关，武汉人打牌管“Q”就叫“皮蛋”，也很形象，试想，“皇后”若无“皮蛋”，何以解忧？

后来到广东工作，皮蛋更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早晨的早茶，通常都要一碗皮蛋粥，一盘肠粉，再加上一小笼的百叶、凤爪、牛筋，等等吧。

到了国外以后，实地看到一个关于检测皮蛋的现场，知道了为啥美帝如此仇视皮蛋的理由。尽管如此，每年下来，总要吃上一次皮蛋粥（只吃一次了），口味改也难。

口味是食欲的折射，那么，制度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口味呢？

以前教科书上喜欢讲，统治阶级绑架了民众云云。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确立什么样的制度，又何尝不是民众口味的集中？

封建史翻开，每逢末世来临，民不聊生，大家统一想到的是“天降伟人”，所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咋办？那就有请“明王”出世了。蒙元的统治者够恶，那就找一个比他们还要恶的来镇恶，至于镇恶以后咋办，估计没想过。于是，元明清三代，一代比一代恶，一代比一代血腥。但反过来，却一代比一代长寿。

130. 新故事

现在常常念叨的“新常态”，其实说得很明白了。

就国内而言，没有成型的反动派，用老蒋当年的话说，就是飞上天，打下来，闹独立，摠下去。个别少数人在网上喊两嗓子，轻的封杀，重的带走。其他人谁还敢放个屁？不论哪个领域，一律管控，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步子也越迈越大，道理明摆着，谁能说个不字？谁敢说个不字？当年文革不都发动了吗？二十六年不也勾通过了吗？不都通了吗？

对外呢，大把撒钱，见钱眼开的比比皆是，外国人就能例外？当年千里

迢迢，又是鸦片，又是坚船利炮的，为了啥，通商，不就是要钱吗？现在不用你们来要了，主动送过去，傻了吧？美帝给巴基斯坦300亿，算速啊，这边直接给460亿。而且也想明白了，美帝也好，日本也罢，谁敢来出兵打我？经济制裁，不过雷声大雨点小而已，舍得你们白花花的银子吗？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应对经济制裁，怕你们吗？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任何悬念，屁民除了洗洗睡根本没研究。

以前总说知识分子的良知云云，实际上现在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哪有的良知？

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关注的是吃喝玩乐，什么兴衰荣辱有个吊毛灰的用。

故而，没有任何可怕的，就一直这么任性下去好了。

毛当初敢于直接发动文革，就在于看透了苏区人性的三点要素：第一怕死；第二怕脏；第三怕断后。

怕死首先就让一批人站过来；

不怕死的怕脏，什么叫怕脏？怕身后被污名，被批臭。而生前就被批臭，同时再被搞死，就更怕了。

如果既不怕死，也不怕脏的，总要顾虑子女吧，顾虑后代吧，这就是怕断后。

如果上述三者都不怕，那也不用担心，因为毕竟没有几个，就把这几个凤毛麟角交给群众开练好了。所谓掉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最后打死都白打死，法不责众啊。

131. 苏区式沟通

2013年，发生了两件事，让人觉得很接近。一个是成都男性司机打女人；一个是黑省警察击毙贫民。前者，民间舆论一边倒，后者官方舆论一边倒，都很符合苏区的特色。

原来视频刚公布时，大家也是一边倒，认为男司机不对，后来公布了行

车记录，发现了女司机别车在前，于是一片喊打。为什么喊打呢？因为这个女司机据说被搜出多次违章的前科，等于是惯犯。对于惯犯，喊打的人的头脑中普遍认为没啥值得解释的，照打就好了，打一下就记住了。记得多年前，伟大领袖说过：“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伟大领袖还相对文明一点，只是强调臭骂，而伟大领袖驭下的平民则需要臭打了。这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的那段之于“暴民”的评论。

现在不妨假设一下，如果男司机打开车门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外国金发碧眼的女人，他还会这么殴打吗？或者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比他还要威猛的男性的时候，他还会这么殴打吗？或者，他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特殊制服的人的时候，他还会殴打吗？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的另外一句话了：“怯者愤怒，挥刀向更弱者。”

由此想起了“沟通”的话题。其实我觉得“沟通”这个词中的“沟”应该写作“勾”，尤其在苏区，勾通似乎更准确。什么叫“勾通”呢？在苏区的理解是，如果你不通，我一个勾拳过去，你便通了。简称勾通。

当初，清军入关要求剃发，很多人不通，结果发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以后，基本都通了。等到大清朝嗝屁之际，恢复蓄发，很多人并不愿意剪辫子，居然把辫子当做了一种信仰，比如王国维。

革命领袖对于苏区式的“勾通”也有非常“发人深省”的解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张金保回忆刘少奇在建国初期针对某些党员想不通的情况说过这么一句名言：“现在想不通，将来开除你的党籍就想通了。”这句话说得很有水平，而且还很有预见。十多年后，刘少奇面对文革，他坦言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想不通，后来革命群众一起来，一勾通，他就想通了，他向领袖表示他承认错误的责任，放他回乡务农，可惜时间不等人啊。想通得明显有点晚了。

继刘少奇之后的新大副林彪也说过一句名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也是一句名言，当然更是预言。第三次庐山会议时，林彪就不理解，为啥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就一定要被追究责任呢？他一直不理解，也没执行，这样一来，勾通的地点选在北京就明显不合适了，也就这样，温都尔汗便出现了。现在看，林彪的后人以及拥趸们是想通了，所以，他们拼命做的一件事是试图告诉大家，林彪还是准备把勾通

的地点放在北京而非境外，至于为啥去了温都尔汗，那都是别人干的。

伟大领袖生前打倒的最后一个接班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总设计师，他曾经一直教导大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很多人还是不通，坚持喊了一些诸如反腐败啊反官倒之类的口号，而且愈演愈烈，这就需要勾通一下了。在勾通结束的二十多年后，很多人顿时通了，他们都认为如果没有那场勾通，不会有后来这么稳定的几十年发展，大家普遍认为勾通很好，很及时。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黑省火车站的那一幕，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徐姓贫民不理解警察的行为，需要勾通一下，勾通的结果是徐姓平民身后子女得到寄养，老人得到赡养，徐生前的希望或许都将实现。显然，有一部分人目前还不能理解勾通的方式和手段。但就像大家不理解总设计师当年的勾通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都会通的。甚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徐姓平民的子女万一某一天受到开枪的警察的资助乃至抚育，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时，他写了一篇歌颂他这个警察干爹的文章，并且立志像这位警察干爹一样继续同广大群众勾通呢？

历史上大名士嵇康面对司马昭的橄榄枝，他不通，司马昭就跟他勾通了一下；他被勾通后，他儿子嵇绍则为司马昭的孙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不能在勾通之后实现的。

一句话，勾通很重要。

132. 朱明王朝是怎么走到崇祯这一步的？

明朝什么时候才到了崇祯这一步？

《明史》上说过，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是作为胜利者的眼光和结论。

那么，万历又是从啥地方来的呢？

明中后期张居正参与乃至主导的“隆万大改革”（隆庆、万历）是怎么来的？

很简单，是给嘉靖朝擦屁股的。

嘉靖朝的屁股为啥这么多屎？表面上看是明武宗朱厚照乱搞造成的。但究其内里则是朱厚照的老爹号称“中兴令主”的明孝宗朱祐樞转型失败得来的。

然而，朱祐樞难道是闲得发慌非得转型？其实，自他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算起，明王朝就必须转型了。

朱祁镇这个宝贝是怎么来的呢？那是他干妈孙太后逼着他亲爹明宣宗朱瞻基必须选择的。

而这位朱瞻基就是明太宗朱棣做梦他爹朱元璋送给他一大白圭从而确立皇太孙地位的。

这么算起来，就该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明朝的坑不是别人挖的，而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一开始就给自己挖好了的，一代沿着一代继续挖，到了崇祯这一代，进入狂挖状态，然后就掉进去了。

朱由检的结局单独地看，明显很惨，但要纵着一比，明显不错。

朱由检不管怎么说，叫身死社稷，现在话说是因公殉职。

朱由检死了以后，南明确确实实折腾了二十年，如果把孤悬海外的郑经也算在内的话，差不多四十年的光景。

而满清呢？赵烈文早就告诉曾国藩了，死心吧，根本不可能成为东晋和南宋，就是一崩到底的结局。

明末死于反抗的朱明的宗室颇有一批，而满清最后完蛋呢，有一个宗室贵族为之杀身成仁的吗？

朱由检时至今日至少还博得了一点点历史的糊涂式的惋惜，而爱新觉罗·溥仪呢？历史上做过实实在在的汉奸，且是傀儡。就这个污点，他能跟朱由检比吗？

所谓一蟹不如一蟹。

朱由检吊死煤山可能是中国进入十七世纪以后末代皇帝最好的结局了。

如果明朝从明英宗直接就到崇祯这一代了，就嘎巴一下完蛋了，老百姓们或许还能减少很多痛苦。问题在于，它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就是死了，还不僵硬。这才透着难受。

举一个例子，清末，那拉氏卖外国人的面子，不得不赐死军机大臣赵舒翘。

赵舒翘平素身体底子很好，先是吞金，没死，咋办，一边给揉肚子，一边灌人参汤。

好，不吞金了，改吞鸦片吧，吞了烟泡以后还是不死。

那就自缢吧，脖子粗，把缎子给磨断了。

最后不好办。那就最原始的吧，开加官。

也就是用纸浸水，然后一层一层地往脸上贴，直到活活闷死。

换句话说，类似明清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在走向自杀的道路时，往往拖得时间很久，但这个久，对于屁民来说就如同赵舒翘自绝的那一瞬间，谁难受谁知道。而且，拖得越久，打回原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明朝的灭亡，顾炎武他们为啥总说天崩地陷，就是被打回了原形，人成了野兽，仁义充塞，率而相食。

133. “敬天法祖”迷梦的破灭—推荐阅读晁中辰《崇祯大传》

晁中辰当年写的《明成祖传》相当一般，比如他在该书第182页中转述《明史·景清传》的附录里的连楹的事迹时的评论，连楹行刺朱棣，人死了，尸体僵立不倒。晁中辰认为“人被杀了，尸体还直立着，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实则是不仅可能，且还有后来者。“文化大革命”中，《阿诗玛》的作者、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于1968年11月2日被害身亡，尸体就僵立不倒达数个小时之久，目击者有多人在场，且有目击证词传世。于此可见，晁中辰的论断较为武断，反映出该作者并非“通

史”之才。

不过，他后来写的《崇祯大传》一书虽然很有情节与他的另一本著作《李自成大传》雷同处颇多，但仍旧值得一读，可以通过这本书读到一个三百七十多年前的“敬天法祖”迷梦是如何破灭的过程。

何谓“敬天法祖”，按照传统的解释，“天”就是“昊天上帝”，俗称“老天爷”，“祖”自然是祖宗了。然而，在专制统治者眼中，本没有什么“老天爷”，他们的“天”就是一个字—权。没有了权，他们连人都做不成，所以，宋顺帝这些人要感慨说来世不要生在帝王家，也就是说除开权，他们别无一物。

敬天在封建帝王及其追随者的字典里就是权力崇拜，牢牢地控制各种权力，一竿子捅到底。法祖呢？很简单，具体到明朝，就是师法“二祖”，明太祖，明成祖，“伟大领袖”不是说过嘛：“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一个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朱棣起反之际，他的秘书长道衍请他不要杀了方孝孺，说那样一来，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可在朱棣的脑海里，除了他以外，地球缺了谁都照转，所以，他不但杀了方孝孺，而且还灭了方孝孺的家族，“灭十族”。其实，集权统治者哪里需要什么“读书种子”，天下只要有奴隶和奴才两种就够了，奴才留着张牙舞爪，奴隶留着当牛做马。

对于崇祯来说，想要保持朱明的江山不完蛋，只有走向他的太祖爷爷、成祖爷爷的老路，因为他无新路可走。但是，历史就是喜欢跟人开玩笑，朱由检要走向回头路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能够，因为后来的满清辫子兵的回头路比他走的快多了，一走就是小三百年。问题在于朱由检的能力、水平导致了朱明王朝这辆破车尽管走在回头的路上却意外翻车了。

翻车的原因也很简单，朱由检是属于那种“器小易盈”的主儿，照猫画虎已经很难看了，可他连照猫画猫的本领都奇缺，想不翻车能行吗？

“形势比人强”，他的祖宗朱元璋、朱棣之所以不可学，根子还在于各自所处的形势和背景已经全然不同。朱元璋、朱棣是农村包工头，带着一帮子土鳖是来拆大楼的，搞破坏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胆子大，没底线，就足够了。可朱由检则是负责补漏的，补漏最基本的就是技术，

手轻了补不成，手重了，漏的更狠，可偏偏这门技术是祖传绝技中独独没有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孩儿是好孩儿，可惜命苦”。

命苦不能怨政府，也不能怨二祖。

其实，朱由检多多少少还有点自知之明，即位之初，礼部进呈年号供御笔圈阅，按照《典礼记》的记载，一共搞了四个，乾圣、兴福、咸嘉、崇贞，（《烈皇小识》中对这四个年号有另一种说法）朱由检看了以后说：“乾者为天，圣则安敢当？中兴甚好亦不敢当。”可见，他知道他能够面对的职务只有一个——维持会会长。只是没想到这个职务也没完成。更没想到的是，后面的统治者居然连他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比如清末居然哭着喊着说什么“同治中兴”。

《崇祯大传》这本书的点睛之笔在书尾的一段话：“他在位的17年间,对老百姓加征再加征,逼迫千千万万老百姓背井离乡,饿死沟壑,上演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人间悲剧。其惨象大概只有秦末可与之相比,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却被他的几句好话所迷惑,总认为他不坏,似乎还是个好皇帝。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悲剧的话,这应该说是最大的悲剧之一。”

作者还是客气了，实际上，不存在“之一”，这就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更大的悲剧则在于这最大的悲剧没有了局。

134. 从顾颉刚的“三不死”看股市里的几副嘴脸

顾颉刚的女儿顾湏回忆乃父在“文革”中虽然遭受凌辱却始终未能选择轻生的原因大抵有三，此为“三不死”。

第一，顾颉刚自谓：“我是研究历史的，什么人没见过？王关戚等人都是活跃一时的小丑，那些气势汹汹的话是站不住脚的，随便他们怎么骂，我也不往心里去。”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守正”的情愫。

第二，毛死后，顾颉刚正在住院，对女儿说：“我为主席哭了两天，几乎要哭死了，幸而有医生保护才没有犯心脏病。主席去世前晚是中秋节，那天的月亮多亮，多美啊。主席如果有灵魂的话，他的灵魂一定是

经过新华门、天安门，升到月亮里去了一杨开慧、嫦娥、吴刚在那里等他，他也变成仙人了。”事实上，顾颉刚的“中国梦”早在文革初期就有片段了，据他自己的《日记》中记载，1967年，“余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守灵”的情愫。

第三，顾颉刚幼年，有人给他算命，说他八十岁后有“好命”，因此他女儿说他“无论多难也要活到八十岁”。

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守缺”的情愫。

对于乱臣贼子，持身守正；对于雄主人君，膜拜守灵；对于怪力乱神，抱残守缺。有此三点，就会明白中国礼教为何可以吃人，而吃人之后仍旧死而不僵，且总要借尸还魂。

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当初要看不上顾颉刚诸人的缘由了。

为啥会有“乱臣贼子”，持身守正的士大夫们并不关心，只希望“俟我后，后来其苏”；而雄主人君一旦撒手，那是一定要擗踊嚎啕、痛哭失声的，否则何以称得上“持身守正”？既无法面对“乱臣贼子”，又惑于雄主人君，无奈无聊之际只好借问“天道”何在，这时候，怪力乱神也就派上了用场。

士民工商，传统政治轮回中，士居于首位，士本身尚且处在三点支撑的循环烂泥潭中不能自拔，又岂能指望他们点破迷津呢？

135. 宋徽宗轻启边衅是其自掘坟墓的开端

宋徽宗赵佶以端王入承大统，一开始搞得威望挺高，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大家都很兴奋，奔走相告，说官家的新政真是牛逼啊。史书上评价道：“徽祖自藩王入继大统，虚心纳谏，弊政大革，海内颀想，庶几庆历、元祐之治。”把他比作宋仁宗。连一向比较激愤的王夫之后来说：“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然而，仅仅一年多以后，新政便告终结，随之而来的则是弥天大祸。

以往总是愿意把相当大的罪责推给“六贼”他们，诚然，蔡京、童贯等人

的作恶对于靖康落败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又是谁引狼入室呢？无疑就是赵佶本人。那么，赵佶所用非人，又是什么原因呢？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到底，赵佶和蔡京、童贯他们都是臭味相投、惺惺相惜的一路货色。这还只是偶然性。必然性则是专制集权体制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变质，也就是说它必然会吸收大量的蛆虫进入体内，帮助它溃烂。蔡京等人既是应运而生，也是必然产物。

宋徽宗、蔡京君臣对内搞搞震倒也罢了，偏偏还要玩大的，把眼光放到了宋朝的境外。

他们首先挑起了对西夏的战争。宋夏结仇甚深，宋徽宗想要以北宋积贫积弱的态势想毕其功于一役，则未免玩笑开得太大。虽然，宋军以极大的代价获得了两国战争中难得一见的所谓胜利，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之巨，却是有目共睹。史称“诸路所筑城砦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关于震武城的军事能效，目前尚有争议。可宋朝君臣孤注一掷的作法实在不可取，特别是童贯恃胜轻出，白白损失了刘法这样的名将，更是得不偿失。

其次，宋徽宗还相继对吐蕃发动了战争。这场战役表面上看，“拓地千里”，其实是一笔烂帐。知凤翔府冯懈上书敢言：“窃以湟、廓、西宁三州，本不毛之地，在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数路，耗内帑，竭生灵膏血而取之，何尝得一金一缕入府库，一甲一马备行陈，而三州岁用以亿万计，仰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为计。塞下无十日之积，战士饥馁，人有菜色。”而且，西夏借机打出“复仇牌”，帮助吐蕃首领“复国”，河湟地区出现拉锯战，一直延伸到公元1116年，而这时距离北宋灭亡也就十年的光景。

“望乡台上敲鼓—不知死的鬼”，赵佶大抵还嫌自己死的慢，终于打起了海上结盟的念头，联金灭辽，把这场根本毫无胜算的赌博玩到了极致。王夫之说：“靖康之祸，自童贯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于必亡之契丹，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直。”如果把“童贯”的名字换成宋徽宗赵佶，这段评价完全称得上定评了。

“隳坏军政，构造边隙，弃盟启戎，招寇胎祸”。用这十六个字形容宋徽宗轻启边衅相当合适。我们都读过《黔驴技穷》的寓言故事，老虎在试

探了黔之驴的本领之后决定干掉它。不过，黔之驴毕竟是被动嗝屁，而宋徽宗赵佶则是主动上门请死。本来，女真人对于北宋这一庞然大物并无太深的了解，一直拿它当大国供着。但是，在对辽作战的过程中，北宋的腐朽、怯懦暴露无遗，自然给以扩张为己任的女真人提供了狮子大张嘴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宋徽宗还不如黔之驴。

封建专制集权国家到了晚期，一般都是这副德行：文恬武嬉、上下交蔽、侈然自大、不识外务。因内政的败坏希冀跨出国门捞稻草，哪知道却把狼给引来。狼早不来晚不来，却一定要在王朝快完蛋时来，不为别的，只为补上这临死一咬。

靖康耻，犹未雪。北宋灭亡一百多年后，宋理宗再次玩弄祖宗玩剩下的把戏，联蒙灭金，也跟他祖宗一样将江山社稷送入万劫不复之地。如此的祖宗，如此的子孙，如此的心甘情愿地重蹈覆辙。

地球人是不是都因此而醉了？

136. 市场的儿子爱砸锅

讲个故事吧，关于市场的一个传说。

话说有哥俩，老大和老二，各自生了两个儿子，按顺序排，大毛、二毛、三毛、四毛。还集体收养了一个孤儿，叫五毛。

哥俩开了个市场，老大在幕后主管全局，老二在前台主管日常。

有一天，负责管理市场的五毛告诉干爹老二说有人砸场子，老二生气了，带人去查，查完以后就去找老大。

他跟老大说：“最近大毛、二毛总带人砸场子，这是咱们自家的买卖啊，这么做不合适啊。”

老大说：“马勒戈壁，这两个熊孩子，我一准锤死他们。”

老二放心了。

可是，第二天，大毛、二毛照砸不误。老二火了，上去揪住大毛二毛，大毛二毛说：“二叔，你别瞎忙乎了，我爹他都知道。”

老二气疯了，回家跟老婆说了，老婆一撇嘴，领着他去仓库，他一看更疯了，原来自己的两个儿子三毛和四毛正帮着大毛二毛销赃呢。

老二的老婆说：“大哥早就看出来，市场为毛火？因为总是有人进来做生意，它才火。但如果他们都赚到钱了，也就留不住他们了，所以，要让他们永远滴呆在市场里面才行，也所以，大毛他们哥几个要定期去砸去抢，把好货都屯到咱们自家来。”

老二：“大哥太高了。”

老二回到市场后告诉五毛，加固栏杆，增收安全保护费，并且大力宣传防范风险意识教育，开办讲座，主讲人就是大哥和大嫂。

于是，市场越来越火了。

137. 谁在做空大清？—清末长沙抢米事件回放

大清走到彻底崩盘一般都被认为发轫自“四川保路运动”，这是其一。另外一件事同样值得关注，即“长沙抢米事件”，前者“保路运动”等于说是朝廷断了有钱人的财路；后者“抢米事件”等于说是朝廷断了有情人（对大清朝一腔忠悃之情的屁民们）的生路。没有了财路的有钱人和没有了生路的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终成眷属”，用梁启超的话说：“故今日中国人民之必出于作乱之一途，实为生计学之原则所支配，无所逃避。”

湖南素称鱼米之乡，大米足以养活湖南、湖北、广西三省用度。但延至1909、1910年之际，天灾频仍，灾民四出。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于以清朝湖南当局为代表的一大批官员利用灾荒发国难财，暗中操纵湖南各地米店囤聚居奇，谋夺暴利。退隐乡间后来被柳直荀等人封为“土豪劣绅”的王先谦、叶德辉也看不过眼去，联名上书给湖南巡抚岑春蓂，他们举例说，清光绪三十二年，湖南闹水灾，米价也不过每石四千余文，现在居然飙升到七八千文，且还没有播种，价格便已翻了数倍，“实为百数年所未见”。王先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其实就叫“期货”。而湖南巡抚岑春蓂正是大清期交所湖南分所的前台掌柜。

岑春蓂是何许人也？他是总督岑毓英的儿子，是后来名震民国初年政坛

的岑春煊的老哥。岑氏父子是清末“有权任性”的典范级人物。岑毓英有个幕僚叫赵藩，四川武侯祠门口的那副著名对联即是出自此人名下，他在名义上还做过岑春煊的老师，他写这副对子实际上也是讽谏岑春煊做事别太过火，哪知道学生的“三爷”脾气犯了（岑春煊行三，人称三爷），一蹶子将老师给撂倒了。比起乃弟岑春煊的风格，岑春莫丝毫不逊色。他拿到王先谦等人的联名书信，嘿嘿冷笑道：“升米八九十钱，何足为奇？”也就是说每石七千文，小意思。

说起来，每石七千文对于屁民们来说是了不得的天文数字，但对于大清朝湖南期货交易分所的总经理的岑春莫来说，确实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意思了。英国、日本的商人自1908年开始逐年加大在湖南收购稻米的数量和价格，内中大量的回佣进入了湖南省主要官员的腰包。这也只是表面的，因为湖南省主要官员要把这笔巨款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递交给北京，交给主管财政的黄带子、辅国公载泽，载泽是那拉氏三个侄女婿的“硕果仅存”者，前两个侄女婿一个叫载湫，即光绪，被老太太给弄死了，另外一个侄女婿叫载漪，本来是半拉子太上皇，后来也被老太太给弄残了。如今就剩下载泽主持老太太身后的财政局面，且兼任新军训练事宜，相当于朝鲜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

载泽拿了这笔钱也不能独吞，他上面还有主顾，即摄政王载沣的老婆，前首席军机大臣荣禄的女儿。如此一来，湖南的米价便是到了天边也不会有回头的余地。毕竟黄带子们的胃口已经给培训得足以张嘴吞天了。

1910年4月11日，长沙普通屁民黄贵荪的老婆买米，米价是八十文一升，老黄的老婆因为带的钱被挑剔，回家继续凑份子，等到凑足了所需款项后，米价忽然又涨了五文，老黄的老婆一时想不开，投老龙潭自尽。黄贵荪得信后赶到事发现场，也一时想不开，带着两个孩子一道自尽。这件事发生以后，湖南地方当局很快平息事态，各方貌似情绪都很平静。但接下来的第二天，又来了新情况。

4月12日上午，湖南当局贴出告示，要求平抑米价，但连半天都不到，米价照涨不误。黄昏时分，一个老太太要买米，因为米价腾贵的原因同米店发生激烈争吵，一大批屁民愤怒了，其中还有个喝多的屁民嘴巴尤其不干净，米店的人也是急糊涂了，居然泄露了“天机”，“巡抚准洋人购米，屯积出口，故粮价奇昂耳”。喝多的屁民一听更火了，张嘴就骂巡抚，这还得了？马上就有巡警出来抓捕，屁民们一看，都来脾气了，

一举捣毁米店，当然，屁民还是有分寸地，始终没有影响警局的日常办公。这时，长沙首县善化县县政府的老大郭中广出面了，一看知县出面，屁民们果然训练有素，立刻跪成一排，高呼青天大老爷请求做主云云，郭老大也很有气派，大笔一挥说以后就平价吧，屁民们顿时欢呼作鸟兽散。

哪知道，郭中广回到办公室不出半个小时，就遭到一顿又一顿的臭骂，“草泥马”之声不绝于耳。英国、日本的商人的回佣既然百分之八十需要上缴，那么，湖南地方当局的分肥从哪里出？就从米店的价格中回扣，郭中广这个傻逼当众放空炮，等于让集体坐蜡，这是吃湖南的饭，砸巡抚的锅的节奏，婶可忍，叔不可忍。于是，4月13日，长沙所有米店一律停业，黑市米价狂飙。屁民坐不住了。

岑春蓂得知屁民们坐不住的消息，仍旧很淡然，他召见湖南巡警道赖承裕说：“民至不法，乃敢行劫城厢。果尔，即诛数人以警后”，直接下令开枪杀人。如果忠实地按照岑春蓂的指示办，事情也许就会平息下去，毕竟屁民们最爱惜生命，也最爱护朝廷。可赖承裕偏偏多了句嘴。

在私下里，岑春蓂跟赖承裕说了一段话，纯属彼此之间的闲聊，岑春蓂的话的大意是：马勒戈壁，这帮子穷鬼们到天然台喝上一壶茶都得一百文以上，怎么吃点大米七八十文就叫唤呢？这个天然台相当于长沙的“天上人间”。赖承裕落实指示不过夜的精神可嘉，但他把巡抚和他说的上述的私人谈话也给端了出来，后面还搞了个外加工，“今米价钱未百，即不安其处，亦顾首领否耶？”翻译过来就是米价没过百就鸡X闹事，找死是不是？这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屁民们不干了，假如说闹事格杀勿论的话，屁民还不敢闹腾，可居然说他们没事就到天然台喝茶去，这不是拿穷人寻开心吗？民不患贫患不均，屁民们揪住赖承裕问他都看见哪个屁民到天然台喝茶了，都点了什么小点心，都花了几多钱？赖承裕就此被暴打。

抓人就抓人，杀人就杀人，说鸡毛的天然台喝茶啊。不过，在内部传达情况通报时，不少官员还都为老赖喊冤，认为是巡抚没有交待清楚哪句可以传达，哪句不可以传达，哪句可以传达到某一级，哪句不可以传达到某一级。大清朝的各级官员发展到了宣统年间，已然不是能力、水平问题，纯然是智商问题了。

由此引发了长沙抢米事件，岑春煊断然下令镇压，前后枪杀、刑讯逼死多人，清政府也从外地调来了一个团的兵力协同镇压，由旅长（协统）亲自带队。

大清朝高层在总结这场乱局的教训时，贝子载振埋怨载泽他们做事不讲究，英国、日本两国的商人上送给湖南地方当局的回佣他们提留太多，而载泽便在摄政王面前诉苦说载振因为没有分到钱发牢骚，胳膊肘往外拐，摄政王的老婆力挺载泽。事后亲贵大佬也指出载泽的不足，没有及时将钱款送到花旗或其他洋人银行去，完全提用现银，过于招摇。此为将来必须改正处。

然而，外界却对长沙抢米事件有着另外一层的理解，简单归结为八个字：“土崩之势，今已见端”。

本来一场吃饭的小格局最终发展成为大变乱，做空大清朝的不是外寇，也不是屁民，正是大清朝自己。而这个信息直到大清朝灭亡那一天都被严格地屏蔽着。

138. 三十元一顿午餐和五角钱一个包子的故事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最喜欢说的一句套话就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具体问起来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不得要领。后来看了两部老电影，知道了这句“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深水程度。

一部是马晓伟主演的《开枪为他送行》，里面有一组镜头，说是在上海的某地，突然因为要抓捕某个要犯，封锁了几条街道，被堵在街道不能回家的人们饥肠辘辘，这时候，伪警察出现了，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了大饼和油条，一根油条要一块钱，一个大饼也很贵，人言啧啧，可伪警察不在乎，不吃你们就饿着。

再一部是赵尔康主演的《归心似箭》，里面也有一组镜头，说的是在窑下干活的穷工人们到了发工钱之际，工头一改往日狰狞的面孔，拿着几包香烟来兜售，于是刚刚发到手里还没来得及热乎的那点子工钱又将给拿走了一半。

事实上，“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同样也时时刻刻地体现在历史的进程当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

具体怎么拿呢？就在存量和增量上想办法。陈云提出三个办法，其中第三条比较显著，拿出大约价值4000-5000万元人民币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去卖，价格要贵一点。陈云说“贵一点”，实际上就不是“贵一点”了。

原司法部副部长李运昌的儿子李惠仁（后任中纪委委员）在六十年代初是中尉军衔，职务是某军工厂的军代表，当时找军人做对象是非常时髦和实惠的事，街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大尉太老，少尉太小，上尉难找，中尉正好。”李惠仁和他的未婚妻到哈尔滨太阳岛去玩，吃了一顿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几两米饭，一个拳头大小的‘鸡’（很有可能是乌鸦做的冒牌货）和两碗汤”。感觉则是“花钱买罪受”，吃的不好是肯定的，花钱之多也很让人咋舌。究竟花了多少钱呢？李惠仁没说，但按照1962年太阳岛公园饭店的牌价推断，这顿饭的总价格应该在25元-30元左右。也就是说一顿饭干掉了一个一般工人的一个月工资。所以，今天有人在惊叹青岛大虾如何昂贵时，我们只能笑话他们“数典忘祖”了。毕竟一只深度怀疑为乌鸦的拳头鸡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攀爬到大虾之上的价格了。

其实，李惠仁的“拳头鸡”如果放在徐铸成面前的花生米，恐怕又要落败了。也是在组织一直贯彻号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徐铸成（《文汇报》总主笔）领着大孙子逛街，孙子要吃花生，老徐一问，两毛钱一包，孙子实际是祖宗，祖宗发话了，爷爷自然要照办，老徐后来回忆说：“咬咬牙，摸出两角钱，给他买了一包。”老徐自己还数一数，一共十五粒半，老徐是一个爱吃花生的主儿，面对如此奇货可居的花生米，居然强忍口水。哪知道吃了花生米的大孙子吃高兴了，还要吃静安寺的肉馅包子，老徐再一问，区区一个肉馅包子要半两粮票，五毛钱，这样子，即便祖宗再不高兴，爷爷也强行将其拉走。

陈云的这一招让很多人的钱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手中。后来谢富治公开批陈云：“陈云懂什么经济？还不是卖花布、炒肉片。”可是，老谢话音未落，上边飘来一句“纶音”，——“还是这个办法好”。文革中，干部降价，但物价持续高涨，既然没有了增量，“盘活存量”就成了唯一，而且，越盘越多，几乎成了盘丝洞。

要不怎么说苏区的语言就是牛呢，盘活存量，最要紧的是一个“盘”字，武功中最高最狠的一招就叫“枯树盘根”，也就是连根拔起的意思。想想看，连根都拔起来了，你还能剩下什么呢？以前总有人说怪话说输的就剩下一条裤衩了，可枯树盘根之后还有裤衩吗？就剩下一根几把了还有几根毛了。江西人说：“剩个吊毛灰啊。”就是啥也没剩下的意思。多么神奇的语言啊。

如今，“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再次出现在大舞台上，不由得不佩服雷锋精神之遍地开花，说白了雷锋精神不就是不忘本吗？

139. 清朝末年智障们的慌不择路

封建王朝搞愚民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必须调低屁民们的智商，只有智商调低以后才能进行安全、完整、系统地洗脑。不过，有一点是王朝的霸权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在一个智商普遍调低、管制非常到位、封闭基本成功的大闷罐里，霸权者们的子孙们也不例外地变成了智障。俗称“脑残”。

“何不食肉糜乎？”、“本是彼物，任其去取”，司马衷、高纬这些傻蛋固然是皇朝末代子孙中的“极品”。但类似昏话或者昏事在那些自诩为“中兴之主”的皇帝堆里也不罕见。

集权社会能够维持下去的关键在于“上智下愚”，有朝一日，变成了“丧智下愚”，麻烦就大了。

一般说来，封建集团的老大的智力在高层也往往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因为传统的看法认为既然上一个老大指定了当今“皇上”，那么“今上”应该有不同寻常的地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盘很大的棋被下成了烂局，当今皇上的智商的疑问随之也就被提上了质询的日程中来。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清末摄政王载沣同老臣张之洞之间的一段对话。

张之洞担忧运动过猛恐激起民变，哪知道载沣说了一句：“不怕，有兵在。”张之洞说这是“亡国之言”，这爷俩的话其实都是“一语成讖”。我们都知道，清王朝入关之际，民间有个顺口溜，叫“朱家面，李家磨，送给隔壁的赵二哥”，意思是说辫子兵属于“渔人得利”，伸手摘了个又大又便宜的桃子。而这个桃子的一半就是李自成、大顺军的覆灭。就在大顺军追赃助饷的时候，也有人提醒第二号人物，被教科书封为“农民起

义领袖之一”的刘宗敏，说这么干容易激起民变，刘宗敏也是一样的不含糊，说了句：“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还有一个版本是“此时只忧兵变，民何足言？”两者虽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是一致的。

清军就是踩着刘宗敏的这句混蛋话以及做的那些混蛋事走进了北京城的，一呆就是两百多年，两百多年后，锦衣玉食、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的载沣说出了跟打铁匠刘宗敏一样的语言。看来，载沣还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上的“领军人物”。

执政者的智商其实也是纸里包不住火的，很快从高层传递下去，民间的智商本来就低，如今看到高层也是这么低，顿时凌乱了，凌乱之后就不免乱开枪或者乱打炮。所谓慌不择路。

慌不择路的结果是大家都无路可走。因此，为了逃生，硬是在生命的前沿挤出了两道“乳沟”。一条是重新推戴一名独裁者出山，领导大家走回头路，毕竟路数熟；一条则是玉石俱焚，智障们一起玩完。前一条路为中国人贡献了袁世凯及其后来者，后面那条路貌似还没有走过，或者说当袁世凯不出现时，也只好那么走了。诚如鲁迅所说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

盐碱地就必然出现集体脑残，集体脑残就必然慌不择路，慌不择路就必然推倒重来或玉石俱焚。封建集权统治的全套行头都在这里了。

140. 套在袁世凯身上的乾坤圈

网上有个叫端木赐香的老娘们儿写了本涉及袁世凯的书，里面对老袁的吹捧让习惯于跪舔的官方学者大为不满。于是就在官方媒体上发表看法予以反击，结果自取其辱。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来自于官方层面学者的评论抱着逆反心理，本能上就反感他们的任何说教。以往对于历史研究是只看重观点或立论，只要政治上可靠、“正确”，史料反倒是无关紧要的。如今又有了翻案的苗头，即观点无所谓与官方是否一致，只要史料够多够猛，哪怕观点凶一点也不怕。实际上，这两种倾向都是偏颇的，都忽略了历史研究中最关键的一条，即史识。没有站在高处的史识，是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即便史料众多，也不过是做了一把寻章摘句的活儿而已。端木赐香和反击她的学者们犯了都是这路子毛病。

具体说到袁世凯这个人，当年陈伯达奉命写了一个小册子，叫《窃国大

盗袁世凯》，属于影射史学一类的，根本目的在于攻击蒋介石。但是，“窃国大盗”的这顶帽子扣的极好。只是这个帽子号码小了不少，古往今来，举凡行专制之实以达奴役群氓、攫取暴利目标的统治者无一不是窃国大盗，不独袁世凯一人。

在袁世凯的评价问题上，今天的翻案派和以往的传统派都是半斤对八两，就像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一样，从圈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自然而然地会师了。一个保大清，一个保北洋，殊不知，大清不过是北洋的亲爹，北洋不过是大清的余孽。

而这个让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带有启蒙使命的知识分子们走了一遭又一遭始终走不出去的乾坤圈也不仅仅套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身上，也套在全体中国人的身上，是为宿命。

“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是袁嗝屁朝凉的两副补药。但根子还是那句老话，“做绝了”。袁最后称帝实际上同某人晚年发动浩劫是一个脉络，都是进一步强化集权体制。老袁知道只有称帝才能让他的江山万世一系，而某人也知道只有让群氓始终处于半饥半饱，国家处于基本封闭的状态中，江山才可能不变任何颜色。

目前一直有个说法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破坏了袁世凯准备推动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这种梦呓似的论调其实并不显现，当初胡适就是这个看法。且不论孙黄等人的半吊子搞政变的水平是否已然达标，就算是他们中断了民主化进程，袁世凯迈出的大步岂不是比他们走的更远？袁世凯称帝前夕，一干人等为了能够感动老袁，居然拿出一个总统可以世袭的方案希望挽回仅存的一点点手纸一般的“脸面”，说穿了，只要老袁还戴着总统这顶帽子，里面爱穿啥穿啥吧。其实，袁世凯这一步也早就走出去了，比如追封郑汝成为一等侯，这是大总统能干的勾当？同样的道理，某人发动晚年大浩劫之际，组织内部已经毫无任何抵御能力，只希冀他能给大家留个把吃饭的余地。唯一不同的是，老袁死于他亲手提拔的部将的合伙算计，实际也是一种必然的反弹。而某人则是死于自然规律。

然而，这两个人类型相同的人物在今天的某些学者眼中却成了一道分水岭，一方面有些人号称觉醒的同时批判某人而玩命地鼓吹老袁的“功业”，一方面有些人继续以前的陈词滥调维护某人这面大旗。这类情形

也不是新鲜事，在历史上，康梁师徒就有过类似的演绎。

康有为死保大清，具体就是死保载湉。梁启超比他师傅聪明点，看明白大清这张牌太过老套，人们已经看腻了，因此便转向，投了袁世凯。袁世凯在戊戌政变的过程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别说今天，即便是那时节也不是什么新闻。稍微有些变动的是，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而经过杨天石等人论证后发现那拉氏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至少是同步进行的。但是，结果都是一样。而且，后者比前者更糟糕。因为那拉氏发动政变并无夯实的证据链，说到底有些心虚，只是由于强权在手。可是，袁世凯的告密即“围园杀后”的“密谋”揭露后，那拉氏的“霸王硬上弓”就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成了顺理成章的必然行为。梁启超在哀痛他的亲密战友“戊戌六君子”的墨迹尚未干涸，大脑和身体便扑向了新生实力派袁世凯的怀抱中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的本来嘴脸。所以，我一直说，在中国，在盐碱地上，没有启蒙，只有起夜。

再回到袁世凯的身上，再来看看这个神奇的乾坤圈。

孙黄宋搞对立面，袁要镇压，北洋派内部有分歧，袁也要拿下，总之，要袁做出前进的代价就是要赋予他全权，而没有比皇帝的宝座更能说明一切的了。这就是这枚乾坤圈的基本内容。

在盐碱地遇到灾难时，人们幻想要出一位大救星领头走出困境。而这个大救星需要授权，需要无条件的牺牲和服从。于是，所有人就认为必须要做出此类选择。而当选择做出以后，当大救星带领群氓暂时走出困境以后，新的问题又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或许群氓也根本没想过还有送神的规矩，自然也就更没想过有朝一日这个神要是走向了反面，人们拿什么制约他的无限力量？

可惜的是，群氓并不懂的道理，在跟随“神”前进的小鬼们却从“神”的行径中悟到了，他们起而效仿，或者直接扳倒神，或者假冒神的旨意借尸还魂。

神依靠镇压和欺骗获取了能量，而扳倒神或者造新神同样也要祭起这两个法宝。几千年下来，大家演的都是同一场戏，同一个背景，同样的台词却始终浑然不觉，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神。

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拿破仑真的说过那段名言：“这头狮子一旦醒来会震惊世界”。茅海建说科学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当一头愚昧的狮子醒来以后，的确会震惊动物世界的。

141. 寿则多辱—中国古代集权者的长寿问题

钱理群用“寿则多辱”来形容周作人的晚年比较恰当。如果扩大开来，长寿对于很多集权统治者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既毁了自己，也毁了历史，所谓“毁人不倦”。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大权独揽且寿命过长，其所造成的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的重创是外部任何力量都无法企及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中国古代的皇帝当中，寿命超过七十岁的并不多，比如汉武帝刘彻、吴大帝孙权、梁武帝萧衍、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慈禧太后那拉氏。

在这个人群中间，属于“开创”的大抵包括吴大帝孙权、梁武帝萧衍、宋高宗赵构、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

我们先来看孙权，当年孙策说保有江东，我不如弟。也确如所言，“生子当如孙仲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但这也是孙权前半生的买卖。到了他的后半生，其阴暗面大举出动，所作所为之于吴国的衰败乃至灭亡息息相关，或者说其人一手断送了吴国的前途命运。而且，由于他的有权、任性，膝下五个儿子除了吴景帝孙休、故太子孙登外，无一善终。（有学者考证，孙登后期已然失宠，他的死可能也与抑郁有直接关系，如此也不能算是善终，最多不过是枕上死而已。）

再来看梁武帝萧衍，王俭说萧郎以后贵不可言，萧衍自己也自负比作光武刘秀，后来的发展也一一验证。然而，当侯景的铁骑横踏台城之际，梁武帝以垂垂老矣的身躯做最低的请求而不可得，以至于不得不发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哀嚎。此情此景是何等的讽刺？萧梁一朝四个皇帝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梁敬帝都是死于非命，其中三人被处以绞绝，这又是何等的悲凉？

宋高宗赵构开启南宋“三朝内禅”的大门，退位不退权，继续把持大政，从而使得宋孝宗赵昚不得不通过矫枉过正的强化集权来应对，让南宋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滥权的怪圈。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比肩秦始皇、隋文帝一统天下，但在他身后三十年间，蒙元帝国的最高统治圈居然换庄高达八次之多，内中半数皇帝属于“非正常死亡”，平均在位时间不过三年多一点。即便是被爱新觉罗·玄烨恭维为“治隆唐宋”的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他的私心自用，死后不过几个月，南北中国便被拖入战火长达四年。而生前推行的暴政更是遗祸千秋，包括明朝遗民自己都说“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相始”。

剩下的几位诸如唐玄宗李隆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以及那拉氏，他们无疑都是他们各自所在发的统治集团的最大祸根，李隆基和弘历直接导致了王朝的中衰，那拉氏则干脆敲响了爱新觉罗王朝的丧钟。

通过对上述历史人物的回顾，发现了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寿命过长的统治者破坏力惊人且无法规避，只能寄希望于已然屈从于“恶人”的“昊天上帝”早点将其“收走”。而可悲的是，这一点竟然成了千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唯一救命稻草。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恶贯满盈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且是最高追求标志；第二，此类现象往往伴随着王朝的开创、盛世和中兴同步，也就是说在人们为所谓的“胜利”欢呼时，已经被埋下的即将遭致“气化”命运的定时炸弹，定时炸弹的引爆器又偏偏就在这位寿数偏长的高龄统治者手中，他一旦撒手西归，连同引爆器也葬身泉下，届时人们必然无法破解引爆装置的密码，至此也只能自求多福；第三，当这种巨大的破坏发生后，人们很快将其忘却，而继续努力创造下一个奇迹。

事实上，民主社会传达的“将老大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限定任期即限定实质性权力的延伸期，也就是说即便发生不讳，也有可能将其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这一点恰恰是封建集权社会永远也做不到的，自然也是他们永远不想做到的。

民间老百姓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寿数过长的老大对于后代不利，“鸠占鹊巢”，占的不仅是位子，更是命数。说起来也并非无稽之谈，刘彻、孙权、萧衍、李隆基、武则天、忽必烈、朱元璋、弘历、那拉氏等人死后的统治者不论从在位时间还是生命时间都比前任大大降低了。如果从撼动封建王朝统治基础的角度出发，统治者的“寿则多辱”相对于

力图摆脱压迫的人们来说，貌似更像是喜讯。

142. 废师改旅—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掌控军队的必由之路

1931年3月11日，仅仅沉寂了半年左右的昆明又成了众矢之的，时任云南省主席兼十三路军总指挥的龙云突然赶回老家扫墓。而拥戴他最力的四位师长卢汉、张冲、朱旭、张凤春则公开打出旗号要求逮捕法办此前龙云深深倚赖的参谋长孙渡、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张维翰等人，甚至还将矛头直接对准了龙云的妻弟李培天。

更戏剧化的是两天后，四位师长亲飞昭通，向龙云劝驾，请龙云回省继续主持政务，龙云面对下跪的四人，态度异常高亢。四天后才返回昆明，随即而来的是四位师长相继受到惩处。

这一周的局势在云南的历史上被叫做“3.11政变”，是仅次于1927年的“6.14政变”的又一场大闹剧。闹剧的起首便是龙云、孙渡策划的改革军队的“废师改旅”。

龙云以唐继尧的伙飞军大队长的身份起家，深知军队之于统治者的重要性。他利用滇军内犯广西失败的机会，采纳十三路军参谋长孙渡的建议，“废师改旅”，将指挥棒一竿子捅到了团一级，这就让卢汉、张凤春等心腹大将大为光火，由此演出三月十一日逼宫的一幕大戏。

说起来，龙云玩弄的“废师改旅”的手法并不是啥新鲜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掌控军队的必由之路。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不论是宫闱惊变，还是沙场喋血，都离不开枪杆子。所以，如何掌控军队，让它做到如臂使指是统治者们面对的最重要的一门功课，这门课不及格，统治者轻者下课，重者灭门。

而这门课的关键环节就是两个，一曰扩大，二曰缩编。

扩大和缩编往往是交替使用的，扩大用于统治者准备突破的领域，即扩大会议，掺沙子、挖墙脚、扔石头；缩编则是被统治者用于强化的角落，“废师改旅”即其经典范例。

缩编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减少层次，提升统治者干预、影响军队的力度。以龙云的云南省为例，在推翻唐继尧的斗争中，孟坤等人是很出了一番力的。可一旦不对他们的胃口，转而翻脸不认人。孟坤等之所欲敢于这么快同龙云分庭抗礼，正在于云南省军的管理层次上，龙云作为三十八军军长，传达命令要经过师、旅、团三级，孟坤本人就是师长，他完全有条件按照自己的口径向旅长、团长们发话。所以，废师改旅改的不是部队的建制，改的是对主公效忠的程度。

通过废师改旅，团一级直属十三路军总部，龙云可以直接对团长乃至营长们发号施令，旅长的职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旅长在名义上也远不能同师长相比，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四位师长，卢汉被剥夺实际军权，不久重获启用；张冲降为旅长；最惨的莫过于张凤春，张属于“螟蛉子”，本不在嫡系之列，偏偏实力又最强（稍逊于卢汉所部），因此，一直受到关押和迫害，释放后便暴死，死因至今不清不楚。

龙云的买卖有限，充其量只能在云南省内摆摆阔气。北洋军阀的老祖宗袁世凯就把废师改旅玩得更大一些，他成立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模仿前清的军机处，实则也有所损益。将各路军头都集中到门下，成为他眼皮底下可供随意拨弄的棋子，不论是陆军总长还是参谋总长，在办事处里统称为办事员，虽有“大”、“小”之分，但实则与奴仆无异。后来帝制失败，袁世凯不得不请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老段首先准备干掉的就是这个办事处，袁世凯则顶住不办，两人最终闹僵。由此可见，袁世凯能拿老命去跟人家拼，所为者何？办事处的来头和用处也就不言自明了。

假如将袁世的统率办事处往上数一数，什么军机处啊、什么中书门下啊、什么尚书省啊，等等，以及日后的什么侍从室啊、什么小组啊，等等，都是孪生兄弟，在基因上是雷同的。

事实上，废师改旅对于军队的建设包括战斗力的加强并无正面作用，而且，废师改旅以后，办事效率也没有实质性提高。但这些都不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内，他最看重的是废师改旅后手中的权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个集权团伙尽管在谋求掌控军队方面得逞于一时，可最终却无法阻止这支为专制提供最大限度服务的“利刃”的逐渐“卷边”。

143. 《人证》和自民党

咱们这代人对于日本电影《人证》都是很熟悉的，里面的《草帽歌》不少人都会哼唱。这部日本电影因为内中有美军强暴日民的镜头得以在苏区公映，借以控诉美帝的暴行。电影看完，有两个地方一直印象很深，一个是美军的暴行的片段被指可能给“掐了一段”以至于不完整；再一个是电影的名字，既然叫人证，到底是谁？是女主人公还是那个日本警察抑或给生母弄死的黑鬼？

若干年后，看了原版的才知道人家原来的名字居然叫《人性的证明》，翻译过来就给直接简化为“人证”。这样的简化翻译还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日本自民党，实际上人家全称是日本自由民主党。可是，自由、民主二字到了苏区就给一律改编为“自民”。有时候就想，为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能简化翻译成“朝鲜党中央政委”呢？为啥最高领导人一出镜，就一定要把全部头衔，“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人民军元帅”都一个不拉地开列呢？

不过，由此也知道了，自由、民主这两个词汇是不好随意全面铺陈开来的。以后乱翻书更知道，这个规矩几乎从“祖宗”时便开始了。号称“横刀立马”的彭德怀曾在194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民主教育的讲话》，内中使用了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字眼，据此在华北座谈会上受到批判，这三个词组就成了罪状之一。可见，从1943年起，这类词汇就已经封存在册了。这也就难怪“人性的证明”要改成人证，自由民主党要长期使用简称，“祖宗家法”嘛。

新近又知道，字典里“民主”二字也基本找不到了。如此，“祖龙泉下堪笑慰”啊。终于可以放心了，毕竟“擎旗自有后来人”。

144. 无作为与瞎折腾——明王朝这艘大船是如何沉没的

封建集权专制在开国的头两代人物走后，为继任者留下了两个选择，一个是无作为，一个是瞎折腾。舍此，并无他法。

户枢不蠹，流水不腐。这是天下的通义。集权体制一样也要遵循这个道理。这也就是开国时代，雄主们为何总要不断诛杀功臣宿旧的全部含义。

“咱村致富基本靠抢”，追随开国雄主的泥腿子们泰半出身微寒，因为跟对了老大，一夜之间成了贵族豪门。可是，问题也就随即而来。老大当初领着这帮子人闹事的时候，前呼后拥，如坐云端。一旦搞掂大局，各安天命，这些昔日的泥腿子今朝的贵族们偏偏要当起老爷来了，磕头下跪也不那么利索了，山呼万岁也不那么感动了。总之，脸上流露出懈怠的表情。老大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他知道，咱村要想继续走下去，靠这些暮气深沉的贵族老爷们明显不行了。于是，老大重操旧业，又把屠刀捡了起来。

这次老大带领的队伍自然是不谙世事的“儿童团”，这些愤青们由于地势低微、资历浅薄，想要用毕生的精力熬到“三公九卿”简直是做梦。就这样，老大告诉他们，只要把台上的那些老爷们赶下来，你们便可以坐上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切都很现实，自然一切也都很血腥。

在这种血雨腥风的屠杀中完成了新陈代谢，达到了吐故纳新。但老大也心力衰竭了，他临死前告诉他的继承人：“你们怎么办？恐怕只有天知道。”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也因此他选择的太子爷既没有那么强势，也没有那么干练，窝窝囊囊，平平庸庸。因为，任务很简单，两个字：守摊。

有明一代，守摊的帝王包括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穆宗等。这里如明英宗（天顺年间）、明宪宗、明穆宗就很清楚自己的命运，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集体选择了无作为。这座集权大厦虽然在他们的手中日渐破败，但仍旧能够勉强维持。而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则一开始都认命，都以为自己很牛逼，结果要么短命而终，要么头破血流，要么见硬就回。最后也就选择了无作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愿意单选，无作为和瞎折腾宛如一母同胞，很多情况下连亲娘都很难识别他们的本来面目。而这两个选项更像我们少年时代玩的一种游戏—憋水牛：水牛要么转晕以后跳井，要么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永远转下去。

在经历了明孝宗以及他的祖宗的狂转之后，明王朝终于迎来了两位难得一见的“顽主”，明武宗和明世宗。

明武宗是通奸的产物，明世宗是典型的外来户。这类不洁的出身很容易让执政者由自卑转化为倨傲甚至上升到狂悖的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

的背景，他们往往迫不及待要做出令世人震惊的勾当，且很少顾虑此种勾当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被集权笼罩本来密不透风，外来的压力也很难撼动其根本的天下国家却轻而易举地为来自内部高层的瞎折腾摧毁了半壁江山。

在翻本机会已经越来越小的时候，明王朝又迎来了另外两个装逼犯——明神宗和张居正。他们忘我地日以继夜地干着同一件事，即将明王朝这艘大船往凿穿方向发展：张居正带头打破官场的平衡，表面上一条鞭法是在改革，其实站在明朝的角度看这是找死。而万历却一错再错，在张居正的基础上继续瞎折腾。而后长时期的休眠又让瞎折腾带来的裂痕无限度地延伸开来。

崇祯一场瞌睡起来，对老太妃刘氏道出心曲：“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可惜，他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是瞎折腾，一直到把自己送到歪脖树下。

开国雄主的折腾目的性很明确，为了以新换旧，为了让戏法常变常新。由于雄主们通常都是作案老手，每次作案后又都很注意毁尸灭迹。所以，他们折腾的往事至今还有很多地方形不成有力的证据链，只是存疑而已。可后面的傻逼们的“邯郸学步”表面上是为了所谓“创新”，但因为手段过于拙劣，能力过于低下，以至于经常在当代就被戳破西洋镜，留下无数笑柄。因此，我们现在看明朝中后期的宫廷变局，热闹归热闹，但丝毫没有回味，宛如快餐。到了王朝的晚期，瞎折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倒不再是为了创新，而是为了保命。也所以，这样的折腾的唯一结局就是加速灭亡。

从摆摊开始到守摊凝固再到收摊折腾，两千年的集权大戏演下来的不过是这些玩意儿。

145. 从《平原游击队》到《亮剑》——抗日神剧产生的历史土壤

宋丹丹有句名言：“盐碱地长不出大苞米。”但是，盐碱地总该长出点其他的玩意儿吧？

我们现在经常谈论抗日神剧，一些年轻人认为现在荧幕上的这类东西太操蛋。这是他们年轻的缘故，也是他们被隔绝在历史之外的缘故。不光他们，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未必清楚，抗日神剧的历史委实悠久，从组

织正式步入政治舞台的那一天便已经开始了。

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吧，《平原游击队》这部老电影是七零后（七五年之前出生的可定义为七零后）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之一，内中塑造的李向阳在若干年后还能持续影响作家们的创作“性高潮”，比如八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新星》的主人公叫李向南，所谓“向南”其实还是“向阳”。

文化大革命期间，多部电影被禁映，《平原游击队》也不例外。但例外的例外是江青一直惦记它，江青认为《平原游击队》的“底色”不错，值得改编，只是扮演李向阳的演员郭振清已然被打倒，自然不能用了，就只能启用新人。这个新人的人选也就是后来因主演《高山下的花环》出名的吕晓禾。据吕晓禾自己回忆说，江青很喜欢他的形象，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嘴巴太大，上演的时候只好用胶水粘补一下，哪知道一张嘴说话，胶水就开了，大嘴巴子又跳了出来，于此，主演《平原游击队》山寨版的愿望也就破灭了。

原创版的《平原游击队》中游击队长李向阳带领着“土八路”整整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并击毙了中队长松井。对此，陈毅发表过个人看法。陈毅对《平原游击队》作者邢野说：“你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呀？写得还可以。但是我提点意见：你这个剧本最后把敌人都消灭了，还把松井打死了，这是把敌人估计得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个弱点。”对于陈毅的意见，作者邢野表示：“陈毅说得对。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还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认为打死松井，消灭日寇，一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陈毅提出来了，可见他是有艺术见解的知识分子。”

明明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搞成电影时就变成了一个中队，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话真是领教了。

实际上邢野他们这茬人当时还不敢过多的追求“革命浪漫主义”，（管造假叫“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也是一个传奇，一个时代的传奇）比如他笔下的这位游击队长李向阳取材于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时任王平所在的第三军分区铁道支队支队长，手下二十多号人，甄凤山本人是土匪出身，枪法好。定县的警备队带人把甄凤山的老婆王均给抓走了，甄凤山就以

眼还眼将定县的公安局局长（王平回忆时在“公安局局长”前面加了一个“伪”字）康翔远的老婆李秀玲给弄来了，以此做交换。邢野回忆说甄凤山把日军中队长的老婆给搞来了，这是不准确的，日军中队长这一级的其时第一不准带家属，第二不准在当地就地取材，这是载于日本军史的。关于甄凤山换老婆这件事引起了江青的愤怒，后来作品中也就必须删除了。由此看，邢野他们至少还是部分地遵循了历史的本源。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大手笔”就纷纷粉墨登场了。2005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亮剑》无疑是他们中的所谓“亮点”。里面塑造了一个骂骂咧咧却又常胜不衰的团长李云龙的抗日形象。电视剧一开篇就告诉我们李云龙率领八路军新一团正面突围，击毙日军联队长，击垮日军坂田联队。虽然主演李幼斌的嘴里经常把“独立团”和“新一团”搞混，却丝毫不影响五毛们的欢呼。

然而，历史却这样记载过一段战役——关家垸之战。1940年10月30日，彭德怀调集重兵向日军冈崎大队发起猛攻。八路军总部的军力部署如下：刘伯承率129师386旅、新10旅各一部；陈赓率385旅、决死一纵25、38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率总部炮兵团山炮连。而日军冈崎大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武装呢？彭德怀晚年自述中说：“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总人数在500余人左右，这是官修本《刘伯承传》提供的数据，关家垸战役后，日军死亡人数据《刘伯承传》中记载是“遗尸280余具”。而另一个官修本的《左权传》则进一步证实“关家垸之战……从而基本停止了日军一个大队可以在抗日根据地横冲直闯的局面”。

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有一个团可以击溃日军一个联队（联队建制类似于团）的事实，岂不早就锣鼓喧天、大肆宣扬了吗？可是，谁见过啊？大概只有这部作品的作者见过。

拿破仑说：“民众只为胜利者欢呼”。为了让民众欢呼，也就必须胜利。小胜利还不行，还要有大胜利。所以，每逢“盛况”来临，我们都会听到，这是“胜利的大会”，每逢“灾异”解除，我们也会听到，这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如果没有大胜利只有小胜利咋办？那就只好改编了，即“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有人还说：“撒了第一个谎以后，就必须准备十个谎言来弥补之前的漏洞。而十个谎言之后，也就只好用漫天的谎言来解读了。”信夫？

较之《平原游击队》，《亮剑》无疑再上新台阶。而《亮剑》之后的作品出现的神语言诸如“抗战还剩下一年”、“我爷爷九岁就被日寇给杀害了”等等更加不堪，一蟹不如一蟹，“浪漫主义”开始进入“烂漫主义”。

所以，眼下的中国，民众最需要补充的不是知识，而是常识；最需要掌握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相。

当然，这也只是做梦而已。

146. 政治运气—让崇祯想死的一句话

毛生前最爱说过的一句话是：“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手气说白了就是运气。如果在在特定的语境下，“运气”也可以被称作“政治运气”。有些民俗的玩意儿，一旦按上了“政治”二字，立刻形象高大起来，须得“仰望才行”。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崇祯于老太妃处睡醒了说过的一段话：“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这是朱由检感慨自己的“政治运气”不如他爷爷朱翊钧。其实，不仅不如他爷爷朱翊钧，就连他发牢骚的对象，这位年迈的刘太妃的运气也不是朱由检可以望其项背的。老太太只是因为同朱由检的奶奶并肩战斗过，因而在天启、崇祯两朝受命护理“皇太后印玺”，成了代理奶奶。老太太死于崇祯十五年，享年八十六岁，比武则天还能活，且提前两年告别了风雨飘摇的大明朝。这运气，朱由检能比吗？

但朱由检没有想到，他的运气如此之糟，竟然还有人羡慕他。南明的“开国皇帝”朱由崧就很羡慕崇祯。南京被干废以后，朱由崧给手下田雄背着送到清军帐下，一路上，任凭朱由崧哀求还是唾骂，田雄就是那么一路小跑，朱由崧在田雄脖子那里狠狠咬了一口，就这一口居然成全了田雄的后代的政治待遇。田雄死后，清廷给他的规格一般，追悼会上明显没啥大人物出席。后来到了乾隆时代，爱新觉罗·弘历不干了，马上追封田雄为一等侯，而且世袭。

满清本来答应说一旦发现了朱明王朝的嫡派子孙都可以“一体恩养”。事实上差距很大，崇祯的太子朱慈烺被找到后连同朱由崧以及南边投降的潞王等人一道给砍了脑袋。朱由崧死后被南明第二代皇帝追谥为“安宗简皇帝”。连同帝号和庙号也不如朱由检，朱由检死后有好几个谥号和

庙号，比如庄烈帝，比如怀宗，比如思宗，比如毅宗，这在末代皇帝里属于头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溥仪死的时候虽然身边的人比朱由检囮屁时多了两个，但没有举行任何规模的追悼仪式，主任提出要给修个陵墓，被溥仪的亲属给否决了。追悼会是1980年5月补办的，且参加的人员中没有“常委”。

可是，朱由崧的运气又让人羡慕了。他的下一任皇帝朱聿键就很羡慕朱由崧。朱由崧好歹在北京城里给“恩养”了一段时间，养的不错，最后尽管是杀掉，可满清的刽子手很讲究，动作很快，几乎没有痛感，就一命呜呼了。这运气，朱聿键就没有享受过。首先，干掉朱聿键的不是满洲人，而是汉奸，侦缉队那路子的。其次，朱聿键不是一刀毙命（朱由崧的死法还有一种说是被弓弦勒毙的，类似于中国人民前老朋友萨达姆），而是乱箭穿身。朱聿键生前多年被崇祯给高墙圈禁，一朝放出来了，不学好，非要跟志在统一中华大地的先进生产力——大清朝对抗，结果下场很惨。不过，还有谥号和庙号。绍宗襄皇帝。绍是继承的意思，襄是动武的意思，虽然朱聿键生前给郑芝龙家族搞的窝窝囊囊，死后又是继承，又是动武的表彰，貌似在末代皇帝中也不多见。

然而，这样的运气还不算最坏的，至少年号永历的永明王朱由榔就很羡慕他。朱由榔当了号称十几年的皇帝，但始终处于颠沛流离状态中，朱由崧好歹端坐在南京城里，朱聿键好歹端坐在福州城里，可朱由榔最后终于找到了可以端坐的地方——缅甸。可惜缅甸军方发生了政变，掌权的新老大把他给办了移交，因为清朝开展了“猎猪行动”，负责总行动组的是吴三桂，吴三桂就把朱由榔送回国去，游了一趟街，朱由榔没有烈士的风采，既没有大骂敌人，也没有作诗，诸如什么“带镣长街行”一类的作品。吴三桂的意见是砍头，清廷的特派员们觉得还是勒毙比较好。朱由崧当年是给田雄送到清军门前的，清军也暂时按照恩养的制度给收下了；朱聿键是被汉奸侦缉队追杀的，到底属于因公殉职；唯独这位永历皇帝朱由榔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引渡回来的犯罪嫌疑人且回来就给直接弄死，连程序都不走，窝囊到了家。而且，引渡他回国的也不是什么“大国崛起”，居然是蕞尔小邦的缅甸。

本来朱由榔这般厄运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哪知道，若干年后，他的大侄子的点子更背。清康熙四十五年，化名王士元的朱慈焕被捕，其年已然七十多岁，子孙满堂。经过指认和比对后，被儿子们封为“仁皇帝”的玄烨老儿也赤膊上阵了，将朱慈焕凌迟处死，子孙一律斩决。行刑之

日，让王士元先看子孙死在他的面前，这待遇跟朱由榔一比，朱由榔是不是该觉得倍儿幸运？

朱明王朝的皇帝的政治运气为何越来越差？一句话，形势比人强。在封建集权制度下生存的所有人等，其实都是平等的，他们唯一的政治运气就是先走一步。“寿则多辱”正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因此，朱由检应该永远感谢景山那棵歪脖子树，朱由崧应该永远感谢那刽子手挥舞的屠刀，朱聿键应该永远感谢那飞来的横箭，朱由榔应该永远感谢那细腻的弓弦。到了王士元这里就不好具体感谢谁了，只好感谢那苍天，那大地，那浮满浓雾的苍天，那四处盐碱的大地。

147. “政治第一”引出的话题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只要政治挂帅，一切都灵。

在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很多国家会乱作一团。但中国不会，上下五千年，无不如此。政治是纲，剩下的都是目。

为啥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民的素质是超强的。

像黄仁宇他们用什么“大历史”的角度观察经济，观察农田水利，观察疾疫，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中国历史上，封建集权社会的崩溃和重组只跟一件事有关，即政治，具体地说就是高层政治。

一旦高层出现内讧或者崩盘，整个社会自动走向分化重组。其他的都不起关键作用。

毛当初夸赞林彪搞四个第一，认为是发明。至少对政治第一的表扬未必都是虚妄。

以元明清三朝为例，这三个朝代无一例外都是大一统思想贯彻地比较好的时期，集权统治比较到位的阶段。所以，它们的覆灭往往更有警示效果。

元代从元世祖忽必烈膺屁到元顺帝即位，期间不过三十七八年的光景，

居然换了十个皇帝，平均3.7年一届，最长的元成宗在位也就是十年挂零，最短的元宁宗仅仅六个多星期就完蛋。而且，这十个皇帝中，有三个属于非正常死亡。由此可见，蒙元帝国高层是大打出手，毫无顾忌。这自然也造成了它的短命。

明代的覆灭源于党争，表面上看是朝野各派势力的纠结，实际上则是皇帝老儿长期以来玩弄南面之术的结果。就崇祯一朝来说，表面上看是东虏西寇，女真人和农民军两肋夹击的结果，实际上却是朱由检频繁折腾的必然产物。“崇祯五十相”，这是破了历史记录，而且后来者也没有赶上过。短短十七年，正副秘书长换了五十个人，这是什么节奏？作死的节奏啊。搞到最后还是把家奴抬了出来，你这么搞来搞去，到头来换到手的就一定是消极怠工，大家都坐进观天，屁事不干，等着看你的笑话，而且是大笑话。所以，崇祯骂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已肥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局面，因为大家知道你这么折腾就快嗝屁了，不抓紧捞点稻草，一旦变天，咋办？

而清代的完蛋又是另一番景色，即“清一色”。越到后期越明显，搞出来个皇族内阁，包括袁世凯这样的“官二代”、“官三代”都扔一边了，就是黄带子、红带子最亲。同时又把科举给废了，等于宣告中下层的效忠分子们彻底没戏，绝对无缘于高层政治生活了。左右开弓，四处树敌，你不死谁死啊？

封建王朝只有这样“中心溃烂”才可能导致大局最终的变异。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或许多多少少起点旁敲侧击的作用，但炸不到要害处，也就自然不会轻易崩溃。随着集权统治的逐步完善，其核心政治也就越来越庞杂，越来越肿大，外界想要通过其他的努力来对它进行消化、腐蚀，功力非常有限。只有等待他们自己“抽心一烂”，这也就是赵烈文同曾国藩谈论的“黑话”的部分实质性内容所在。

148.林立果式的人物

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中将毛比喻为“B-52”。其实，林立果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何尝不是“B-52”，活生生地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炸出了一个大坑，基本宣告了它的破产，而正是它的破产直接导致了这场运动的正副舵手的生命的终结。

老牌自干五舒芜回忆说他们在听到传达“九一三事件”后，一个晚上没有

睡觉，一直聊到东方发白。可见，这件事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应该不是悲痛，而是兴奋。林彪、林立果父子亲手炮制的悲剧最后居然以喜剧收场，这也是他们至死没有料到的。

在当时那种背景下，毛的声望和权威如日中天，不论能力还是资历都在林立果之上的“四大金刚”对毛除了崇拜就是恐惧，遑论刺王杀驾了。但林立果居然干出了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一时间被描画为“魔鬼”。

实际上，诸如林立果式的人物在历史上就层出不穷。

“虎视何雄哉”的秦王朝就是在两个青年贵族的夹击下嗝屁朝凉的。作为这个大一统王朝的创始人秦始皇生前就受到这两位青年贵族的追杀和蔑视。一个买凶杀人，一个当道讥讽。而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成了又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的杰出人物，一个则成了覆灭秦王朝的掘墓人。

在集权社会中，最高当局往往要披两件外套，一个是神圣，一个是神秘，两者缺一不可。他高高在上，无所不包且无所不能。然而，这两件华贵的外套的内里却绝不是出身底层的人们可以随便窥知的。换句话说，在其他人看来神圣、神秘的地方在贵族圈子内却通常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绝非浪语。

身处上层或者顶层的青年亲贵们自幼养成骄横、霸道的作风，他们目空一切，目无余子，视江山如蔽履，视民众为草芥。即便是君王，一旦挡了他们的道，一样干掉。

比如倾覆隋王朝的三个关键性人物：杨玄感、李密、李渊，无一例外都是重量级贵族。在外人眼里，杨素兄弟父子那是皇帝老儿的亲密战友，是铁杆保皇派、老同志。可谁曾想到大胡子杨玄感的“国恨家仇”呢？老爹杨素病了不敢吃药，以死在枕上为荣，老叔杨约已然断子绝孙却还被杨广迫害致死。杨玄感恨啊，一般人恨皇帝，且不说有没有这个胆子，就是有这个胆子，也只能暗恨。杨玄感是不但恨，还把恨付诸行动。当日里追随杨玄感造反的几乎清一色都是青年亲贵们。杨玄感虽然死掉了，但由他引发的变乱将隋王朝内部戳了一个天大的窟窿。在杨玄感之后，李密继之而起，在李密之后，李渊继之而起，血缘关系一层密似一层，下手也一个赛一个地黑。最终在南方亲手结束杨广老命的竟然又是一个青年贵族，宇文文化及。宇文文化及的老爹宇文述是杨广的“小舰队”大

副兼儿女亲家兼中央警卫部队司令，这个玩笑开得实在让人笑不起来。

林立果式的人物诞生于集权的襁褓中，在它成型以后却又成为猎杀集权者的狙击手。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或许还将继续证明下去。

149. 时无英雄：一个昏招频出的年代

一个貌似风光、威风八面的集权国家在经历了头几代人的整治以后，很快就会进入昏招频出的年代。几乎毫无例外。

人治社会看的是统治者的力度。何谓力度？两件事，一曰眼光，二曰胆量。眼光在于识别人，在于判断形势；胆量在于敢拼、敢闯。

三国的蜀汉，诸葛亮算是一个有眼光也有些胆量的人，尽管并不擅长奇谋，但到底还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至少没吃大亏。到了蒋琬、费祎时代，眼光也差了，胆量也不足了，可毕竟抱残守缺，足以自守。等到姜维上台，眼光就不必说了，胆量倒是大了很多，可惜是“傻大胆”，所谓胆大心粗。一旦对手方面也出现了比他胆子还要大，比他心还要细的人物，这个国家的厄运自然也就临头了。

从以上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即创业的家长一般来说都具备一定的眼光和足够的胆量。接下来守业的人尽管胆气差了点意思，毕竟还有些眼光，知道要学点好。再接下来碰到砸锅的出场时，眼光那是标准的斜视，胆量那是超标的二逼。用清末醇亲王奕譞的警句说便是：“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本来就是一个危房，别说“牵一发动全身”，就是挪动一把扫帚，可能会导致坍塌。可偏偏就有人贼胆包天，偏偏就要搞什么翻建，这不是作死又是啥？奕譞没想到的是，他的警句在他的几个宝贝儿子身上就兑现了。

载沣哥几个上台，当时就有顺口溜冒出来：“不用掐，不用算，宣统最多两年半”。这样的顺口溜未必出自民间，极有可能就是统治核心内部飘出来的。只是这个顺口溜不仅顺口，也很顺当地实现了。为啥实现的这么快，这么准？道理很简单，当这一拨人把所有的权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时，也就等于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谁见过一身绑着炸药包还直往火堆跟前凑的主儿有幸免于难的可能的？

最可怕的其实还不在于这座破房子的新租客の颀颀与凶暴，而是这座房子真正的主人们的愚昧和怯懦。从后来的历史看，当这两股力量会师的时候，破房子的塌陷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看着遍地竖子们的胡闹，旁观者也只剩下感慨的份儿了。

150.盐碱地

中国人传统的说法都是“顺守逆取”，流氓出身的可以打天下，但不能坐天下，否则朱元璋这些人为什么广延人才到宫里去教习皇子们读书？而满清一直以皇子读书刻苦为荣宣讲后世？就是说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坐天下要靠学问，不能靠蛮力，否则朱元璋怎么不让他儿子朱标去皇觉寺出家然后再去要饭呢？

中国封建时代有科举取士制度，这也正是为了稳定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办法。西方社会搞出了文官制度，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况且，就以攻陷巴士底狱为例，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的保存不是靠着这些泥腿子一时的牛逼哄哄，而是靠了拿破仑的民法典。

时至今日，科学昌明，民主进步，已然是世界潮流，还在这儿逼扯什么“刘项原来不读书”吗？

真是可笑的很。

暴力革命早已经是被淘汰的东西，只有盐碱地上的某些猪狗牛羊对它还恋恋不舍，以为内中仍旧可以长出大苞米呢。

也就是说，暴力革命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接力，最终就是一场闹剧，而闹剧必然要以扯鸡巴蛋收尾。

行文到此，深觉这片土地上的某些人的可悲。都到了二十一世纪了，一脑袋瓜子的还是扯旗造反、江湖流氓那套，还在以为读书可笑，规矩可怜的样子。

以前郭嵩焘还在努力地让大清朝向英美诸国看齐，现在看起来，北朝鲜

就是拍马去追台湾都要追上四五个世纪才行。

几千年下来，盐碱地上最不缺的就是无底线的暴力侵夺，这玩意儿的确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只要够狠，够黑，够绝，一般人都不会是你的对手。

而要把这种东西当作祖宗家法、世袭圭臬来供奉，这就是集体的脑残了。

让人倍感吃惊的是，有人居然管这东西叫“财富”。服了。

151.“玩忽职守”

当年雷某一案的涉案人员被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提起诉讼进而引发争议。一些屁民认为村民杀村长算故意杀人，“差拨哥哥”杀雷某何以就“玩忽职守”？

其实只要稍微仔细地回顾一下劳动党历史上发生的某些事件，你便会发现，他们使用“玩忽职守”这个名词真的是恰如其分。

1956年，毛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大毛也强调一点：“我们杀了4500人，但是，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他管杀人叫犯了错误，管杀多了叫保存了大多数。你能管这叫“故意杀人”吗？他最多就是“玩忽职守”而已；

江西之后是陕北，审干运动后期，毛再度上台道歉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

他管整人叫洗澡，管整得过狠叫灰锰氧放多了，管挨整的人之所以喊冤叫屈是由于有着“娇嫩的皮肤”。于是，你还能管这叫故意整人吗？你只好叫玩忽职守了。

若干年后，当那场浩劫暂告段落时，劳动党为其遮羞而发布的公告称：“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看见没有？挨整人数过亿，

死亡人数至今统计不明白的人间灾难也成了“错误”，而且还被利用了，说到底又是一场玩忽职守。

那么，这样看起来，你还会对雷某一案使用“玩忽职守”表示诧异吗？

那么，玩忽职守的定义是如何下的呢？邓为之总结道：“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

也就是说，整你是必须地，但整到什么程度是通盘的考虑的，整过了就是玩忽职守，但也不能叫一个人负责，谁让你有着娇嫩的皮肤了呢？谁让那灰锰氧忽然放多了呢？谁让那野心家突然利用了呢？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点背不能赖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

152. “纵做鬼，也幸福”

2008年地震之际，御用文人王兆山写了一首歪词，内中一句“纵做鬼，也幸福”遭致多人痛骂，至今余怒未消。当局那时也憾于救灾过程中种种黑幕需要一头替罪羊作为遮羞布或承骂的载体，因而也就未揭穿谜底，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提到这句词还是义愤满腔。

然而，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句话，“纵做鬼也幸福”，它的确是一句实话，是一个对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前一段，聂树斌一案给翻了过来，顿时互联网上好评如潮，连“正义可以迟到但不会缺席”一类的话都冒了出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忽然间没了，而且没的那么彻底，可谓尸骨无存、毁尸灭迹，一没就是二十多年。这样的迟到如果还不能用缺席来表达，那就只剩下缺德二字了。

可是，御用媒体们的报道说聂树斌的老母在得知这翻案的消息后脸上露出了笑容，且不论这样的报道是否真实。但我们确曾看到内蒙冤案呼格的老母与聂树斌的老母在天安门大毛的画像下的光荣合影，也听到了聂树斌老爹那一句“感谢政府”的话。

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纵做鬼也幸福”吗？

事实上，“纵做鬼也幸福”的不仅仅是猪狗牛羊们，同样也是身居上层们的共鸣。刘少奇死后若干年，担任过他保健的某位顾姓医生在《炎黄》上撰文说刘生前未受到凌虐，虽然也遭致了批判。可随后刘少奇的直系亲属们的表演则基本证实了刘少奇“含笑于九泉之下”的“事实”。

徐友渔以前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只要可爱，不要可信”。换句话说，这个种族的骨子里是不容许真相出现的，不但高层不允许，底层同样拒绝。这也就是为啥盐碱地能够如此板结，如此坚固的原因。

王兆山的那首歪词中还有一句“十三亿人共一哭”，不由得令人想到《红楼梦》里的那个“千红一哭”，只不过这个“哭”字是不是隐喻了“窟”，那就需要历史来验证了。

153. 端平入洛—赵家王朝作死的节奏

记得当年看《霜重色愈浓》时，内中有陈毅表扬大毛的话，说大毛“不贰过”，就是说不犯重复的错误。后来读书读多了，这才明白，这叫“讽谏”，从江西到延安再到北京，低级重复的错误不知犯了多少次，而且每次都是故意犯，当然那玩意儿也只能叫“错误”，如果叫“罪责”，有人该找你麻烦了。再后来也就知道为啥陈毅晚年患病就硬给拖延治疗拖死了。自然，死后还是很客气的，追封为“陈毅是个好同志”。

事实上，这类低级重复的错误放在大毛身上，高层中也只有陈毅这样的人或多或少还敢放个屁出来。假如彼此间的智商、胆量基本为零的时候，那就只好等死了。

话题不妨扯远一点，先来看看两宋覆灭的旧辙。

北宋与女真人约为海上之盟，共同灭辽。第二次燕山战役，北宋被本已筋疲力竭的辽军打得大败，日后成为南宋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跟着老爹刘延庆一起狼奔豕突，慌不择路。接着，张觉以平州归宋，遂成金人南侵的借口。有意思的是，粘罕、斡离不各一路进入汴梁后，被侮辱被糟践的宋人（一直觉得宋人是不是怂人的谐音？宋朝是不是就是怂朝？）竟然还在狼堆里找那条“善良的狼”，他们最后普遍公认“二太子”斡离不比粘罕好说话、通人情。殊不知，正是这位二太子极力劝说金太宗吴乞买南下的。宋人找到这条善良的狼还不作罢，南渡后还编出斡离不相貌肖似赵匡胤的传说，愣是把靖康耻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如果北宋的灭亡尚可以用蔡京、童贯等“六贼”以及王安石变法这类东西来说事的话，那么，南宋的“端平入洛”就是纯粹的作死了。

南宋联蒙灭金，走的几乎又是北宋的老路，蒙元早晚灭宋几乎也是板上钉钉。但这一切为什么都提前到来了呢？都是由于端平入洛的失败。这次朝廷上有郑清之，边境上有大将赵氏兄弟，似乎都找不到六贼当年的影子。可依旧重蹈了北宋的覆辙。南北宋相距一百多年，先后陷入同一个大坑，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非常简单，两个字：装逼。

那么又为什么会这样装逼呢？答案也很简单：揽权。

缔造海上之盟和端平入洛的两位皇帝，宋徽宗和宋理宗都是有宋一代揽权、集权的能手。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在位时间偏长，宋徽宗在位25年，在北宋诸帝中仅次于宋仁宗，与宋真宗一起并列第二，如果加上太上皇的两年时间，那就超过宋真宗了。宋理宗则是两宋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长达42年，跟刘阿斗有一拼（《三国演义》长坂坡那段有首诗说刘禅是“四十二年真命主”），比宋仁宗多出一年。我们要是把目光再往后扫一下，就会发现有个潜在的规律，那就是在王朝即将覆灭前夕，总要出一个在位时间非常久的执政者，元朝的元顺帝，这个人有点身兼两职。（元朝完蛋后还有北元，元顺帝死后还有儿子爱猷识理达腊接班，又搞了8年。）明朝是万历，《明史》说朱明伪朝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不是没有道理的。满清呢，就是那拉氏了，执政超过45年，差一点半个世纪。

其次，他们都有些“来路不正”。宋徽宗被章惇说成“轻佻不可君天下”，宋理宗赵昀干脆就是史弥远玩的李代桃僵的把戏。正因为来路不正，所以，都要揽权，都要装逼，表明他们继位是必然滴。

再有，他们身边的所谓智囊团说穿了就是阴囊团，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软。不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阴囊团，主要是宋徽宗、宋理宗他们本身就是一条几把，除了大量的海绵体以外，并无一根硬骨头。

北宋的战斗力的本不如辽军，却要和消灭辽军的女真人结梁子；南宋一直都是金国欺压的对象，金哀宗都穷途末路了还吹牛逼说只要给他三千人马便可纵横江淮。可是，就这样的水平的军队却要和蒙元比划比划。这

样的智商不能说不低。

但是，不论北宋还是南宋，毕竟还可以打着报仇雪恨的旗号忽悠傻逼们冲锋陷阵。倘若有一类二逼货色硬是要把一个本来对自己有利的大国逼成头号敌人且专门武装到牙齿来对付自己。那么，这种智商就是连宋徽宗和宋理宗都不如了。自然，靖康之乱和崖山跳海估计也将成为最好的结局而不可得了。

154. 遮羞布

现在有些人还在为所谓“改革已死”的伪命题而愤愤不平。这个喧嚣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它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什么？

好听点的，当然可以叫改革开放，如果复古一点，就叫洋务运动也行。但最真实的还是应该叫“二次文革”或经济文革。

第一次“文革”是政治文革，第二次文革则是经济文革。

政治文革就是从政治上获得了一次最大的解放，组织可以为所欲为，权力可以大到无边，即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猪狗牛羊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古人所说的“天怒人怨”，其表现形式无非是一个唐山没了，一棒子人在广场哭那个帮狗吃屎的主任牧师。于是，就有了经济文革。经济文革的结果是从经济上将组织彻底解放了出来，他们不但掌握了政治的主动权，顺带着也把经济命脉掐在手中。

邓的本意之所以要搞这起运动，首先是保卫他们的江山，这点是肯定的，捎带着把猪狗牛羊们的饲料提高了一些，原来是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现在是让马儿跑可以吃饱。可要想挣到做人的资格，那是白日做梦。

从那个时候的条件看，清算文革的基础是有的，然而，邓绝不做赫鲁晓夫，眼下有些人或许要说不要苛责前人。这种典型的傻X语言多年来一直不绝种，一个永远能够谅解执政当局，一个永远能够理解政治强人的种族注定就要永远被压榨，永远被凌辱。几乎没有任何例外。

那么，邓为何不做赫鲁晓夫呢？说到底，邓最担心的是民间意识的觉醒。因此，他很早就警告对民主墙的事不能掉以轻心，又很快炮制出四

个坚持，就此给猪狗牛羊们戴上紧箍咒。

晚年邓巡幸南方，李慎之他们居然用赞叹的口吻说：“总算扳回了一局”。事实上，这是邓最后一次挥舞他的遮羞布。

毛周邓各有一个遮羞布，毛的是一统江湖，讲究的是武功盖世，这点很对猪狗牛羊们的口味，圈扎结实了，可以踏踏实实当牛做马了。邓的遮羞布则是饲料深加工，三个饱一个倒的猪狗牛羊彻底没啥想法了。周的遮羞布是遛狗，耐心地引导猪狗牛羊们排泄，听他们哼哼，官修本管这叫倾诉和倾听，少数叫唤的难听的就直接给拉到肉联厂去了。

如今猪圈卫生太差，生猪出栏数锐减，这样一来就影响了东家的生意，少东家也有一块遮羞布，那就把一些工作服比较脏，看上去明显比较胖的饲养员们抓起来。

若干年后，倘若有人试图揭开历史的迷雾时，猪狗牛羊的剩余产品还会用这几块遮羞布为他们解释。

人们习惯说重要的事说三遍，论起来，很多重要的事也要来三遍。因此，第三次应该在途中了。

155. 襄阳之战与汇率管控

蒙元灭宋，原本采用所谓斡腹战术，袭西晋故智，先搞四川再出京湖。可钓鱼城一战，蒙哥完蛋，蒙元被迫另辟蹊径。这时，南宋降将刘整献策，发动第二次襄阳之战，摆出中央突破的架势，直捣腹心。

历史如果不能还原现实，那么它的科学能效一定会大大降低。

第二次襄阳之战自1268年开始，至1273年结束，前后差不多六年的时间。一旦襄阳陷落，不过三年的光景，临安也被攻陷，南宋覆灭。

在这场襄阳攻守战役中，宋元两国均调动大量有生力量，襄樊两城一时系天下存亡。这种情况大概只有后世的安庆保卫战差可比拟。

襄阳保卫战最后功亏一篑，南宋中小地主面对异族入侵，不但不予以抵抗，反而纷纷投靠，这里的原因主要是南宋统治者推行的公田法和打算

法所致。公田法名义上是扩大公用土地，控制纸币发行，实则将天下财富收归国有，说穿了就是一律姓赵。而打算法利用审计账目反贪腐排斥异己力量，使得很多本来可以效命沙场的骨干或被捕或闲置。公田法是搞钱，打算法是整人。其后果可想而知。

支撑盐碱地财政体系的是四大力柱，一个是楼市，相当于临安；一个是股市，相当于扬州（或建康府）；一个是债市，相当于四川；一个是汇市，则相当于襄阳。

债市因为萝卜章的事故首先被踢爆，类似于“天下为乱蜀先乱”，所以，拟之于四川。汇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眼下出台的几条核心提示无一不与外储锐减有关，可知汇市所系匪浅。楼市是核心所在，所谓国家者实则已经是建筑工程总公司，各级机构无非是包工头，因此不能不用临安相比。

楼市所以不垮，全赖债市股市汇市撑持，这里汇市的功劳最大，可以说汇市一日无事，楼市一日安稳。

然而，宋人说：“竭天下财力而不能救一州（襄阳）”，首先是形势，应战双方力量发生根本变化；其次是人力，猪脑子永远想不明白人脑子琢磨的问题。

一句话：大势去矣。

156. 继嗣与继统

何谓继嗣？就是给人家当儿子；何谓继统？就是承接统治。

在专制王朝中，很多时候继嗣和继统是一脉相承的。但也有少数时候，继嗣与继统成为统治者摆弄方向盘的两个坐标。

就先举明朝的例子吧。

明武宗朱厚照死后，因为没有子嗣，张太后和杨廷和这些人便按照北宋的成例和封建宗法排序，推立明孝宗的弟弟封在湖北的兴王的儿子朱厚熜做皇帝。不过，朱厚熜的这个皇帝是要继承明孝宗这一支派的，也就是说朱厚熜要给明孝宗当儿子，算作明武宗朱厚照的弟弟，这就引出了

继嗣说。

然而，朱厚熹虽只15岁，却并非刘盆子一流。他和老娘蒋氏早就商量好了，当皇帝行，当儿子不行。因此，朱厚熹给北京高层的第一个下马威即提出他是以嗣皇帝身份入主紫禁城，而非皇太子。这就是继统说。

日后，朱厚熹大大张扬了继统，不但将杨廷和等人赶出了权力中枢，还把一天都没当过皇帝的老爹兴献王弄成了明睿宗献皇帝。倘若不是朱厚熹自己相中了“世宗”这个庙号的话，那么他老爹就是明世宗了。

这件事在明史上被称之为“大礼议事件”，是明朝中衰走向衰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满清覆灭朱明，处处提点自己别照着明朝的样子学。可惜，清代一样也出现了类似继嗣与继统的争执。即光绪、宣统两朝。单独看光绪、宣统年号的最后两个字也能明白内中的弯弯绕，一个统，一个绪，合起来就是统绪，而且还专门用了诸如“光”、“宣”这类明晃晃的字眼，其本身就说明是来路不正。

明世宗朱厚熹执政四十五年，那拉氏执政四十八年，这两个人对于盐碱地的作用已经不必介绍了。只是这样的先例却并非绝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因而二毛并不刻意打出大毛的旗号，甚至将大毛闲置了很久。等到胡赵一死一完，二毛自己也沾了一屁股屎，这才又重新回到继嗣和继统的老路上来。最有代表性的是二毛给大毛以及老华包括自己的地位率先定了性，大毛是第一代，他是第二代，老华啥也不是。这就等于明确了二毛既有继统的一面，也有继嗣的一面，为其在皇统内的合法性打下了基础。随着事态的发展，二毛又进一步为三毛明确了地位，提出了“核心”说，这又是一笔双重的继统、继嗣。

大毛生前说过：“核心不是自封的，是斗争中形成的”。（另一版本为：“核心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所谓的“斗争”，所谓的“实践”以及所谓的“群众的公认”说到底都是通过种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打垮对手，诱迫或者强迫他人承认自己的地位。所以，所谓“核心不是自封的”，实际上是抢来的。抢来以后再搞一下自我加冕，跟自封没啥区别，只是这样的话实在不必公开说罢了。

三毛之后四毛出头主导局面，不再提及第四代的字眼，这说明四毛自身

有着严重的不足，在继嗣继统上不敢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号，属于“妾身未明”。等到四毛退下来以后，这种情况立刻被幡然改变，一身兼继嗣与继统的大旗再度扯开，核心再度附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代人基本不提第五代的字样，这说明他们本身是冲着继统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大毛算作第一代，二毛算作第二代的话，他们自认应该是第三代，根本就没准备带三毛和四毛。自然，这样的语言过于刺激，所以，亦不必提，做就是了。

157. “每逢万寿必无疆”-也说转型

盐碱地历史上有过几次重要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这个种族的命运，也部分影响了地区的格局。

1644年，当时盐碱地同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几乎为零，这也就是为什么郑成功能够一举击溃荷兰人的缘故。可惜的是，在这次选择中，集体投向一个奴隶制的统治集团，一条辫子拖在脑后，拖在心里，一拖就是几乎三百年的光景，把盐碱地直接拖到崩溃的边缘。

1912年，一个老大帝国坍塌了，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间。各方势力角逐的结果是穿新鞋走老路，继续前清的遗泽，只不过要贴上共和的标签。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都在重建，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回归到专制独裁，盐碱地的选择是后者，而且是整体的大义凛然以及义不容辞。

1966年，当工业革命的号角再度吹响之际，日本这些本来已经奋起直追几十年的国家仍旧不敢稍停脚步，玩命跟上。而盐碱地也在玩命，玩命沉沦，他们搞了另外一场据说是跟文化有关的革命，一场操蛋的浩劫，至今还不准人开口议论。

1988年，这应该是盐碱地倒数第二次的机会了，经过了大折腾之后的人们喘息未定，到底是做人还是当狗？没想到或者说早就应该想到，选择的还是最糟的。

2012年，最末一班车终于来临了，这次是没有任何悬念的稳稳地心安理得地走上了回头路，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来越来劲。

当年，那拉氏庆生，林白水讥讽她“每逢万寿必无疆”。就盐碱地来说，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每逢转型必走偏。

两个字：活该。

158. 崖山之后更中国—盐碱地的固化过程

网上有一种论调叫“崖山之后无中国，煤山之后无华夏”。该说法说穿了就是给盐碱地找一块遮羞布，找两头替罪羊。事实上，崖山之后非但不存在什么“无中国”，反而更中国，更纯粹的步入盐碱化了。我们称之为固化的渐进过程。

因为明清两朝以及现代版的文字狱让一部分人开始怀念宋鼻涕的时代，仿佛宋朝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岁月，当然这其中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缘故，就跟眼下有人怀念蛤蟆时代一样。

之所以想念宋朝，原因无外乎几条，关键的有两点，一个是皇帝老儿公开提出“朕与士大夫共天下”；第二个是不杀知识分子。

咱们先来说第一条，首先要搞清楚一点，什么是封建士大夫？这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的意思，一般说来，封建士大夫有两层含义，一层代表贵族，一层代表官员。联系到宋朝皇帝说这番话的特殊语境，这里的士大夫应该具体指的是已经归化皈依朝廷的官员们。

我们都知道，从宋太宗开始，大面积扩充官员队伍，这是延续宋太祖赵匡胤守内虚外政策的关键步骤。宋太宗赵光义本人还专门放出口风，说他如何艳羡翰林官员的清要。说到底就是让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爬进朝廷的体制内，患上“软骨病”，什么是清要？一方面放屁扯蛋，一方面无比重要，有了这两条，哪个不是上赶着跑进来？

虽然官员群体与皇帝老儿并非完全穿一条腿裤子，但在对付老百姓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天然的一致，换句话说他们中间尽管也闹矛盾，但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俟遇到老百姓，便马上枪口对外了。什么叫“守内”？这就是。

那么什么又是“虚外”呢？用钱财换消停，对辽国，对金国，对西夏，包括后来对蒙元都是这套办法。这套办法的最大好处是让朝廷避免两面作

战，避免伸出两个胳膊露出胸膛让人打。而这个所谓的“虚外”实际上还是为“守内”服务，守内虚外是两句话一层意思。

自宋以后，守内虚外成为中国的国策，执行的越来越好，执行的越来越到位，自然统治时间也就绵延的越来越久，具体谁遭罪谁享福谁知道。

接下来再说第二条，即不杀知识分子，没错，有宋一代，杀知识分子是屈指可数的，包括文字狱搞的也是轻飘飘，什么庆元党禁啊，这些东西放在明清以及劳动党时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就是杀了一个陈东，后来也赶紧给平反了。猛看上去，真的很美的说。然而，这只是表象，一个时代要办好一个时代的事情，要完成这部绞肉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代的任务就是要把螺丝开始拧紧。

杀人，杀的是人，才叫杀人，如果把人变成听话和驯服的猪狗牛羊，那就不叫杀人，而叫屠宰。宋代就是把人变成猪狗牛羊的第一步，这里说的人，不单纯是普通百姓，主要是知识分子。

大毛搞肃反发明了一句自鸣得意的话，“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除开江西肃反，之后的延安整风北京反右以及晚年文革，的确很少公开抓捕，都叫配合调查，都叫隔离审查，都叫停职反省，都叫请假检讨，而且也的确没有公开宣判过谁谁死刑，像彭那样的专戳他肺管子的也判无期徒刑。可是，还有一个词叫“被迫害致死”，也就是说这些没有明着给宣判死刑的最后都无缘于善终二字，更多的是遭受了比枪决还要惨痛数倍的活死刑。从这个节点看回去，宋朝就是完成这些缺德冒烟程序的第一步。

北宋的王安石弄了一种东西叫变法，说白了，就是变着法搞你，搞谁呢？搞老百姓；朱熹弄了一套东西叫四书集注，说白了，就是孔选，就是孔子语录。冲着谁呢？冲着读书人。前面一条是扒皮吃肉，后面一条是抽筋洗脑。对付老百姓就是压榨，对付读书人就是灌输。之后王朝和组织所重复也都是这两点，只是不断地完善而已。

顺便说一句，凌迟这类极刑，也是从北宋开始，尤其是从宋仁宗开始，进入常刑的，一开始说的很好听说是用来对付最坏的那类人，可满清辫子兵用凌迟对付的何尝不是他们眼中最为“大逆不道”的？

对于宋朝，我们有些人还有一种误读，宋代迫害武人是比较凶的，于是

就有人经常把这点和不够尚武联系起来作为黠武的出发点。宋代迫害武人就实际效果来说与明清大搞文字狱以及劳动党搞清洗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孪生玩意儿。宋代被迫害的武人比较有代表性的北宋的杨业、狄青，南宋的岳飞、王坚等。这些人的致死的核心因素跟技术因素无关，主要是不听话。宋朝给后代统治者立了一个“很好”的规矩，那就是不管你本事多大，功劳多高，只要你不听话，立马弄死。

即使是从政治香火来说，两宋也从未断绝给它磕头的子孙们。比如元末农民暴动，韩林儿这些人就公开打出旗号叫“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朱重八是以明王出世忽悠大家的，自然也就顺承了“重开大宋之天”的衣钵。满清灭明，有些人嚎啕大哭，如丧考妣，殊不知，爱新觉罗之觉罗就是汉字“赵”的意思，老赵家又以一条辫子继续统治了盐碱地近三百年。

时至今日，这天下又岂能不是赵家的？又岂能不是“领导集体与公务员共天下”的？又岂能不是“核心与红色贵族们共天下”的？

所以，崖山之后更中国，且更操蛋。

159. 袁世凯“洪宪梦”中的某些杂音

老袁准备沐猴而冠，窃号自娱，招来不同杂音，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孙文旧党；第二，梁启超、汤化龙等立宪派；第三，劳乃宣等复辟派。

对待上述三种不同声音，老袁分别予以不同方式的处理。

孙文旧党是能抓就抓，能杀就杀，比如陈其美就噶屁了。而梁启超、汤化龙则基本处于屏蔽状态，劳乃宣、宋育仁这些可人儿，表面上吓唬一番，实则礼送出境。

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孙文旧党是要真共和的，既不要皇帝，也不要假总统真皇帝，那就只好弄死。

梁启超他们不要皇帝，只要总统，不论总统是不是总统都无所谓，老梁在所谓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大总统创业未半”，这简直是

武侯《出师表》的口气了，不过，也让老梁说对了，“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在老梁给袁世凯的信中还有这么一段话：“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连“千金之躯”都用上了，也就差喊万万岁了。

对于这样的死忠派或可说另类的忠犬，老袁也只能敬谢不敏。

至于劳乃宣、宋育仁他们，老袁是极爱的，这是一群彻底的奴才，要过磕头的瘾，只是他们寻错了主子，摆着一个现成的袁皇帝不拜，非要去给紫禁城下课的宣统长跪不起。这就需要敲打一下了。名义上将鼓吹复辟的宋育仁“递解回籍”，其实是护送。派了一个科长八个护兵，还给1000元路费，每月还给300元生活补助。劳乃宣是更高层次的复辟头面人物，老袁除开花钱，还要语重心长地表态：“玉初（劳乃宣字玉初）极有作为，为余特拔之人。”劳乃宣闻听此言，真正是感铭肺腑。

老袁并非不需要吹鼓手，但他需要的是类似“旷代逸才”的杨度，需要的是筹安会。这里需要提一提杨度其人，此公前半生皈依袁皇帝，后半生皈依***，以不俗的开场配合诡异的收局，的确称得上旷代逸才了。如果将来史书单辟一章《列男传》，想必一定要大大将杨度称表一番，至少是主席台落座吧。

事实上，何止杨度，梁启超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日后将袁皇帝换作了段总理，吹捧则是必须滴。

洪宪旧事倏忽百年，很多事物非但没有更新，反而循着轨迹走回了起点。眼下很多可人儿再度粉墨登场，直看得眼熟的很。比如司马南等人何尝不是劳乃宣、宋育仁的翻版？比如《炎黄》的老头们又何尝不是苦心孤诣的梁任公？而乌央乌央的杨哲子们更是奋勇向后转。

此梦，彼梦，俱是洪宪梦。

160. 逸政多忠犬，劳政多乱人

何谓逸政？也就是俗称的“不折腾”；何谓劳政？自然是瞎折腾了。

逸政多半发生在权力基础不够稳固或者权力制衡比较完备时期。而劳政多半出于一股独大或者变乱将至时期。在盐碱地历史上推行逸政的屈指

可数，属于濒危物种。相反，劳政则比比皆是，甚至成了主流。

例如汉文帝搞的休养生息就是典型的逸政，可汉文帝是打了催产针的，先天不足，封在代地，没有根基，母家也不横，周勃等人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选他上位。汉文帝在位期间，高吕时代的影响还在，封建诸王也很强悍，淮南王刘长如果不是公开叛乱也不至于丢了性命，即便如此，他死后几个儿子还是袭了王爵。汉景帝也好不到哪儿去，早年是吴楚七国之乱，晚年是太后掌权。总之，个人空间比较有限。当然，这与文、景两代皇帝的个人气质、修养以及文化背景也都有直接关系。

文景之后是刘彻，逸政宣告结束了，劳政时代降临了。

事实上，类似刘彻、朱棣这类劳政在盐碱地也不多见，因为他们尽管有致人过劳死的一面，但也有纠偏的另一面，特别是他们屁股很大，基本可以坐稳天下，不至于活着就看见大乱发于肘腋且制止不住。更多的劳政多半像明世宗嘉靖那类的，天下凋敝，民生艰辛，上层昏乱，外患频仍。

逸政时代，各安天命。因此，忠犬也就俯仰皆是。鲁迅说中国人是从未争到过做人的权利的，只有做奴隶坐得稳的时候和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候，即俗称的“猪狗牛羊”。所以，用忠犬来形容逸政时代的奴隶还是比较恰当的。再者说，由于逸政，各个层面的利益的归属划分也相对明确，大家都揣着一颗狗一般的忠心，希望继续维持大局不变，从这个角度上说，用忠犬二字也不为过。

等到了劳政时代，老大乾纲独断，他需要用不停的折腾来维系他的权力脉门，大换血、大封拜、大杀伐这些都成了新常态。目的却始终未变，也只有在不断地折腾当中，老大才能稳稳地抓住权力的缰绳。换句话说，你们下层当奴才的坐稳了，老大才会火燎屁股；反过来，奴才们狼奔豕突，疲于奔命，才不会“合而谋我”。

然而，人治的算盘打得再精也有疏漏的地方。正是有了瞎折腾的前提，本已浑浊不堪的一池污水更加沉渣泛起。那些毫无底线毫无良知毫无价值的吮痂舐痔之徒必将蜂拥而至。投个机、过把瘾、装回逼成了社会的最大亮点。而这一切也就距离整体的崩溃又迈进了一大步。所谓嘉靖，家家皆净是也；所谓稳定，舔舔屁股罢了。

劳政打乱了人心，也就打乱了格局，乱人多了，想冒大风险攫取大果实的也就开始露头了，他们当中总会有一个最终敲响这个时代的丧钟，也总会有一个最终把压在这个时代身上的棺材板钉结实。

161. “天下惶惶，有何可‘庆’？”——封建年号小议

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年号叫“乾德”。宋乾德三年赵匡胤灭后蜀，得到的一个战利品背后有篆文，写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赵很惊讶，因为目下也才乾德三年，何来乾德四年？宰相赵普不能答，后来才知道原来亡国之主王衍也用过乾德这个年号，赵匡胤因此发了感慨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年号对于专制王朝是多么的重要。一般来说，亡国皇帝或者短命王朝的年号都是要被刻意回避的。然而，千挑万选之后，还是有漏网之鱼。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带“庆”这个字眼的年号及其主人命运。

盐碱地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带庆的当属唐高宗李治，显庆。此公死后，老婆武则天就革唐命，李唐子孙差一点几无噍类。唐代第二个年号中带庆的是唐穆宗李恒，长庆。唐穆宗在位很短，仅有四年，实际是三年多一点，李恒本人好击球，别人击球图个乐呵，他击球竟然中风，中风之后服食丹药进而中毒。

唐之后年号带庆的首推宋仁宗赵祯，庆历。宋仁宗是一个名声好的皇帝，可在他身后有两件事成为最大的隐患，一个是北宋的中衰，一个是他本人绝嗣。南宋年号中带庆的有两位，一位是宋宁宗赵扩，庆元。大家都知道的臭名昭著的“庆元党禁”；再一位是宋理宗赵昀，宝庆、开庆。赵昀在南宋大抵相当于万历朱翊钧在明朝的作用。

契丹辽国也有一个使用带庆的年号的皇帝，他叫耶律延禧，年号天庆，耶律延禧还有个谥号，天祚帝，看到这个谥号大家也就清楚了，此公是亡国之君。金国卫王完颜永济有一个年号叫崇庆，完颜永济本人生前被羽翼未丰的铁木真唾骂，而后他自己也被暗杀。而且他还是金国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如果以灭辽、灭宋为分界线的话，完颜永济是在位时间最短的；如果以立国计算的话，金太祖完颜旻是在位最短的。）。

元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有一个带庆的年号，皇庆。他和宋仁宗一

样，都是绝嗣。（长子即元英宗，死于南坡之变；次子被长子赐死。）

明清两代大家都很熟悉了，一个是明穆宗朱载堉，隆庆；一个是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孟森评价隆庆是“亡国之间的酝酿”。而嘉庆则是清代走向衰亡的序曲。

稍微总结一下，带庆的年号的主子们轻则本人绝嗣，重则江山绝种。内中“双庆”字样的尤其狠，比如宋理宗一个人就用了两个带庆的年号。所以，他不仅本人绝嗣，而且祖宗江山也彻底完蛋，近年来有人说：“崖山之后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用绝种是比较恰当的。

嘉庆实际上也是双庆，他本人用了嘉庆这个年号还不算，又封了同母弟永璘为庆郡王，永璘的后人奕劻中兴家业，捞了一个铁帽子王的待遇，人称“庆记公司”，这位亲贵们称呼为“老庆”的奕劻是断送爱新觉罗江山的主要合伙人。

其实，年号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魔力，实际问题还是拥有年号的主子以及主子们脚踏的那块盐碱地，推行的那套缺德的制度。所谓天下惶惶，有何可庆？他们所谓的“庆”，就是普通民众的“悲”。

用一句粗话形容就是：“庆你马勒戈壁。”

162. 先有桓玄，后有刘裕

东晋南渡，维持一百余年天下，几乎可以与南宋相捋。期间多次北伐，不论是阵容还是力度，不用说南宋，就是南朝四家也都无法比拟。晋元帝司马睿为人庸碌，比不得晋武帝司马炎，最后虽然郁闷而死，却能避免两代而亡的西晋的命运，说到底还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功劳。说到底还是东晋皇室与豪门之间都懂得政治规矩的功劳。

支撑东晋天下的无外乎三股力量，一股是皇室，一股是豪门，一股是民帅。国初王敦抗命，苏峻造反，但都因为当局者的明智，化险为夷。这样的格局维持了很久，才又出现了桓温，可桓温终究还算是按捺住了不羁的情绪，当然这也要说他寿禄将近的缘故。

等到谢安、桓冲（桓冲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几乎就是缓冲的谐音）这一代人的相继谢世。王谢豪门中出了王国宝这样的“国宝”，皇室中出

了道子、元显父子这样的可人儿。大灾难自说自话地降临了。

道子、元显父子独霸朝纲，等于开启了破坏共治格局的大门。而后桓玄走的更远。

然而，不论是王敦、桓温还是桓玄，他们毕竟都不是草根出身，亡命之际的狠忍程度远不及生来挨饿的刘裕。桓玄虽说“篡逆”，可还没把司马氏怎么样，刘裕亲手弄死了孝武帝两个儿子，皇室就此绝宗。同时，刘裕对王谢豪门也大开杀戒，虽说这样的大杀大砍比起他的孙子刘骏等人逊色得多，但毕竟也算是开了先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共治天下的崩坏一定是皇室内部有人先不守政治规矩，挑战大局，试图做到一股独大。随即又被豪门扑灭。就在双方用尽力气的时候，草根残忍之辈粉墨登场，用屠杀收买开道，完成新一代独裁体系的确立。

这样的把戏久演不衰。

163. 海陵王完颜亮败亡的一个主要诱因

海陵王完颜亮是金国十个皇帝中汉化程度最高的，号称读书最多，诗词最猛的一位。同时也是集权化最严重的一位。只是他的结局显得与上述事实明显不搭，值得玩味。

完颜亮的集权之路也就是清洗之路，从杀掉金熙宗完颜亶开始，这部机器就停不下来了，宗室内凡是有威胁或者潜在威胁的都干掉，斜也、吴乞买、粘罕这些爷爷叔叔大爷的家族一律杀光且不说，连跟他一起搞政变的哥们儿也都干掉，临出发前考虑到后妈也不让他省心，于是也给勒死。

对内的屠杀导致人心崩溃，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明显不干事了，等着看热闹，看笑话。这也是一股暗流，而且是最大的暗流。

通过屠杀，完颜亮身边已经较少能够说点人话的人，包括张浩这样的老滑头也不敢张嘴了。剩下的都是李通这套号的，跪舔型。也就是防御能力明显衰退。

再看进攻能力吧，宋金两国消停了十来年，完颜亮一上来不干了，他要“万里车书一混同”，还要“立马吴山第一峰”，要在对外问题上搞大题材大动作大影响。

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敢做他前任不敢做的勾当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政权的不合法性，他本人得位不正，需要用武功来标榜自己的能力是本来就该当皇帝的。历史上凡是得位不正的都喜欢在对外战争上搞动静，无一例外。这里面搞的动静比较好的也就是唐太宗和明太宗，不过，李世民与朱棣的对外战争也有很多败笔，只是因为他们的站住脚了，这些话题也就被淹没了。

剩下的搞砸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金海陵王完颜亮和隋炀帝杨广。

完颜亮的六十万大军一旦杀出去，辽阳那边就闹翻了天，同是金太祖阿骨打孙子的完颜雍造反了。其实完颜雍敢于扯旗造反就是因为看准了时机，他判断完颜亮一去再也不会回头，也回不了头。像完颜亮这种类型的独裁者，往往是一条道走到黑的。而且，随着宋金两国战事的推进，加入完颜雍的造反大军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前面我们就说过，大家都在等待一个破冰的时机，那就是独裁者完颜亮本人终于作出大事来了，大到他自己都收不了场下不了台的境地。这时候，李通又出现了，他反对退兵平叛，主张继续对南宋加紧进攻。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叫“蒙蔽圣聪”，说的就是李通这类人。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洗地”，为独裁者开脱。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蒙蔽的概念，这些李通一流的佞幸们只不过是说出了独裁者自己心中想说而不便说的那些话，所谓搔到痒处。这也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得宠的原因。

完颜雍即位改元大定的消息一到，完颜亮就坐不住了，他扯开自己的战袍给大家看，原来他在出征前夕就写下宏愿，一俟对南宋战争胜利，他就改年号为大定，现在这个年号被完颜雍给占先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完颜亮一方面是对前景充满了部分悲观，另一方面则是不服输的劲头占了上风。

完颜亮、杨广这些人最后走到死胡同里，有个共同点就是自予予雄。在集权时代，最大的胜利莫过于夺取最高权力核心，而他们两个人都是一

路顺风，从装逼开始，一直到牛逼哄哄。这一路走来，他们有的是胜利的喜悦和得意的快感，这些东西只能用来歌颂的。而这些赞歌又让他们将这类货色彻底固步自封起来。也就是说，他们从不认为天底下还能有能够打败他们的人存在。

有了这样的铺垫以后，完颜亮终于决定死不回头了。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对内屠杀已经让完颜亮政权失衡，对外战争则让这种失衡加剧发展。而对外战争必然是与对内屠杀同步进行的，这是完颜亮政权的基础常态。

完颜亮对南宋动手那是因为南宋一贯是金的手下败将。从这点上看，完颜亮的智商尚不存在太大问题。如果对一个明显比自己强大很多倍的对手动手，那就是连完颜亮都不如了。这类蠢货在完颜亮身后还是层出不穷的，这也就难怪九斤老太唠唠叨叨说：“一代不如一代了”。

164. 话说“爱国”

最近爱国这个话题又给翻出来了，还挺热闹。有位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表态说：“我爱国，但反对脑残式的爱国”。我回复他说：“某种意义上说，爱国就是吃屎，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吃屎。”之所以加了“某种意义上说”这句废话，其实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刺激傻逼们的心脏，他们的确太几把脆弱了。

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国家是为人而成立，人不必为国家而生存。中国的老祖宗也说过，心安之处即我家。什么是心安呢？罗斯福解释的很清楚，四大自由，避免匮乏的自由，避免恐惧的自由，等等。包括毛在抗战期间也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可见，不论古今中外，对于国的概念实际上是位于人之下，除开利欲熏心的人才会假借所谓“爱国”的名义驱使愿意或者被迫接受愚弄的民众去为少数人心目中的“国”而牺牲和抛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起来，这类的“爱国”不仅是伪命题，而且就是吃屎，甚至是故意杀人。

接下来，咱们就说点老百姓的话吧。你买了一个房子，很喜欢，这是一

个很私人的事，没必要见天嚷嚷我爱我家，对不对？因为有朝一日，你一旦看到另外一处更好的房子，更好的价钱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地搬过去。国家也是一样，就是一个给你提供衣食住行的地方，你在这个国家住的不习惯，就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即便是你在另外一个国家住的很舒服，也没有义务就一定要热爱这个国家。“爱”这个词是很神圣的，通常也很狭隘，可能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够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而随便挂在嘴边的要么不够真诚，要么别有用心，仅此而已。

国家的主权是政府的事，老百姓选举政府是干嘛的？就是让它为百姓出头的。所以说主权是政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也不为过。假如有人要把这个东西一定强加在人类自由、民主、平等的基础权利之上，那么它一定是法西斯。

165. 王秋赦喊道：“运动了，运动了”

电影《芙蓉镇》里最精彩的莫过于片尾王秋赦敲着破锣喊上的那一嗓子：“运动了，运动了”。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不免会心一笑，泰半是嘲笑，很少人会苦笑，更不会有心酸的一笑。其实，这不是王秋赦的呓语，而是历史的预言。

的确又要“运动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江青就把眼珠子盯到了文艺界，准备搞出点动静来，毛曾表扬江青眼光很敏锐，周扬也这么夸过江青。但康生明显比江青还要敏锐那么一点点，他对江青说，现在不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都还饿着肚子。过两年，只要一吃饱饭，就可以了。

果然，过了三四年，就又运动了。

大家管文革叫浩劫，类似这样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远的不说，就是太平天国那一场闹剧，死了多少人，两千多万，这还是官方统计数字，实际远不止。就算是两千多万，也相当于一场抗日战争了。别忘了，抗战是同外人打，太平天国是十足的内讧。

但人们似乎觉得血远远没有流够，1864年天京陷落，1964年，四清就鸣锣登场了。也才一百年而已。

文革结束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应该消停消停过日子了。可也才仅仅三四年的功夫，清污运动又来了，这就好比让一个处女交代她卖淫的经历一样滑稽。但问题是大家似乎都觉得不够过瘾，终于在春夏之交时，脱光了。都脱光了，上上下下一律都脱。

这次舒服了，全球都看明白了。

可也才过了二十几年，又春心萌动了，又躁动不安了，又造神出山了，于是，就又运动了。

伯恩斯坦说：“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因为他们的平衡必须建立在下层永远的不安和运动中，也只有下层不断的反复地折腾自己，才会让独立思考的空间腾出来给他们集中播放新闻联播。

166. 一次耐人寻味的请客吃饭

王光美生前忽然搞了一次毛刘两家的聚会，其乐融融，而其所要昭示的内容也远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范围。本来这是权贵们的家事，不关我等屁民半毛钱，只是它所透露的最终含义却应该让屁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免得日后表错情硬碰壁时不知到底撞了谁家的南墙。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覆灭后曾经面对媒体自述少年时代的一段心路，说的是他外祖父在大清洗年代被捕的那血腥的一幕。其实，这已然不是新闻，老戈本人在做总秘书的时候就说过这件事。只是因为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老戈的这番道白很容易与那镰刀斧头的坠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引起了另外一个执政党的高度关注，在拼命总结各类经验教训时，这条回忆成为首播内容。

应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明确了一条约定俗成的家法，那就是原则上不提拨与当局有血仇的干部子女进入到副高一级的位置，即便进入一定程度的阶层，也不能安排正职。这条家法的成型应该是在二毛之后，这倒不是为二毛本人开脱，而是二毛由于儿子的缘故，对血统论这套东西的热度远没有会计和木匠他们那么热衷。

如果进一步归纳总结一下，很多事情就更加明了。贺龙的子女，陶铸的

孩子，甚至邓拓的子女，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惟其如此，作为浩劫中高层里最大的受害者的王光美才更清楚要想让宝宝儿子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走出“血海深仇”的阴影。于是，就有了这一次耐人寻味的请客吃饭，也就有了他宝贝儿子一副戎装在大毛像前瞩目凝神的那一幕。

甚至一些虽未被整死但深受其害的亲王郡王们的子女为了避免受到仕途上的影响，也都一律地向大毛靠拢，开口领袖，闭口万岁，这也就是相当一部分人感到大惑不解即老爹明明挨整儿子却异常孝顺的症结所在。

关于这一点，还是大毛本人看得透彻些，他在给江青的那封信里早就说了：“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也就是说，不论左派还是右派，谁上台都要打着大毛的旗号，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说得再直白一点，这个组织与大毛本人已经融为一体，任何试图分割他们的作法都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过去，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一贯正确，一贯高举，这才是纲。作为屁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匍匐磕头，山呼万岁。

还是那句老话：“没啥悬念了，洗洗睡吧。”

167. 有感于某国外长斥责女记者的一幕闹剧

当加拿大女记者提问的时候，注意一点是女记者，在西方文明社会中，对老幼妇孺的尊重着重体现了文明程度。加拿大外长相当严肃和正规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女记者，表示起码的礼貌和规矩。而某国外长一手插着兜，晃里晃荡地转悠，脑袋也跟着转悠，眼珠子恨不得朝天。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目空一切吧。

如此傲慢不受监督的权力留下的后遗症也只有在某国和北朝鲜才会畅行无阻。假设这位外长拉着这一副驴脸在欧洲或者北美任何一个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度，即便不被赶下台来也会被骂个不休，比如前一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肘击事件”就是很好的一例。

等到女记者提问结束后，这位外长更加牛逼地比比划划，如果不是在这么一个外交场合下，很有可能再度上演“youaretooyoung”的那丑陋的一幕。

老实讲，当年主任主管某国外交时，尽管充满了谎言和诡辩，但好歹起码的风度还是有的。如今是一蟹不如一蟹，到了这一茬知青上马小红卫兵当权之际，简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用冯玉祥当年骂吴稚晖那句话说便是：“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见先人于地下乎？”

冯虽是丘八出身，到底受了点民国风气的熏染，骂人还讲究了一点言辞。假如套用北朝鲜劳动党惯用的话说那就更直接了：“X他妈”。

168.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很多内容又在重复，很多丑剧又在重演。事实上，五千年都是这么过来的，遑论五十年。

以前李耳说：“自胜者强”。的确如此，只要过了自己心理这道关，剩下的也就都好办了，作恶尤其如此。

徐友渔说过一件事，文革初期，西安武斗，红卫兵打死一大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看到尸横遍野的样子，这些年轻的刽子手们一下子也“跪了”。就在他们惶恐不安之际，一个成年人出现了，他告诉他们伟大领袖最近的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做斗争的过程云云。如此一来，这批刚才还在大脑一片空白的年轻的刽子手们立刻重新昂起头来，全然不顾自己脸上个个沾满了血污，他们的斗志又被重新鼓舞起来了，心理关口一跃而过。

凌迟作为“大辟”在封建王朝是被多方诟病的。宋仁宗号称“明君圣主”，却为人们开启了凌迟作为一般刑事案件的最终介入手段的先例。当然，在宋仁宗看来，他所动用的终极手段是用来威慑罪大恶极的罪犯的。可是，随着专制制度的深入和普及，凌迟很快成为“新常态”。明清两代，凌迟的刀口直接插入寻常百姓的胸膛。在专制集权体系下，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

而这黑暗的一切都因为作恶和受恶的双方都迈过了至关重要的心理关口，也就是俗称的底线。

没有了底线的人们，都是禽兽。所以，禽兽是没有思维的，自然也就不会有长久的痛苦以及由痛苦滋生出来的反省。

五十年不算短，但对于作恶者来说也并不长，因为他们有理由看到下一个五十年还将这么走过。

没有任何悬念了，都洗洗睡吧。

169. “全盘”与“彻底”

几天前，碍于面子，人报和它的小帮闲环球不得不发了两篇短文应付差事，说那场浩劫已经被彻底否定。人报历来都是讲规格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都没有舍得用，仅仅用了一个所谓“任平”的假署名文章而已。即便这样，也仍旧在字眼上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请注意，他们用的是“彻底否定”这个词。

关于这一点，多年前，徐友渔就注意到了，他曾经提醒过读者注意，为什么他们使用彻底否定而不使用全盘否定呢？

从表面含义上看，这两个词并无太大的区别。不过，当我们透过对这两个词在其他层面上的使用效果看，他们的实质性区别也就出现了。

比如他们最痛恨的一个词叫“全盘西化”，在“西化”的前面用了“全盘”而非“彻底”，说明了程度。

反过来再看为何只用“彻底否定”而非“全盘否定”，答案应该已经揭晓了。

170. 写在这一天

距今230年前的5月，在美国的费城，一堆人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来争吵，随后诞育了一部空前的民主宪法，正是这部宪法让美国走到了今天，也让世界见证了民主的雏形。也是一个5月，被很多傻逼五毛们称之为“蕞尔小岛”的地区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民主换届，虽然比

起同属亚洲的日本战后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整整晚了六十年。

与之相比的是其他两件小事，一个是北朝鲜新当选的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手一本主题思想小册子，用它向新的委座发誓效忠，这是当朝的一幕；而另一个是一对新婚夫妇利用洞房花烛夜的机会手抄党章，从而带动了手抄运动的开启，这是在野的一幕。

范伟说：“人和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是人，也是制度。

为什么说人呢？因为是人就应该知道，人一生中最可宝贵的财富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几样东西是不可以随意出让不可以随意赋予他人主宰的。

而要保证上述权利不被随意剥夺，只有依靠制度，依靠众志成城建立起来的又都必须人人尊奉的民主制度。

在搞清楚这两件事之前还需要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什么是政权，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党。

这三样东西说穿了都是人们最可宝贵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天敌。然而，人们之所以需要它们是因为现阶段无法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对上述三种权利的追求和维护。可是，为了不让天敌祸乱自身，所以，这才发明了民主制度用民主的力量约束或者捆绑它们。

什么是政权？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党？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工具，都是为了完成人类保障自由保障平等保障幸福的工具。

工具不合适，怎么办？很简单，换掉。遗弃。损毁。这都是人类天赋的权利，也是不容剥夺的。

所以，说热爱工具的不是脑残就是二逼。你会热爱你们家大镰刀或者大锤子吗？你会每天对它们磕头吗？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常德抢劫案中的张君，每次作案之前都要用舌尖舔一遍他的作案工具。不过，这类人叫歹徒。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人。

把这点琢磨明白以后再来看这一天，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这么值得注意，这么值得思考。

事实上，不论蔡英文是否能够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或者是否能够带领台湾走向新的繁荣都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话题了，问题的关键是台湾迈出了作为人类新纪元的第一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行程。而有些地区有些人们则大踏步地倒退，如果说差距是永恒的，那么这就是。

5月20日的前一天是5月19日，“蕞尔小岛”也曾有过若干个5月19日，但他们终于走出了5月19日，走到了5月20日。而“泱泱大国”则继续停留在5月19日，甚至还准备走回5月16日。

历史就在那里站着，无情地嘲弄着这些人。

171. 好胃口

一个长租房都能炒的这么火，苏区的屁民们真是牛逼到底啊。

别人祸害还不够，还要自己祸害自己。

七十年长租房，而且仅仅是公寓房，既没有庭院，也没有绿地，居然价格直逼纽约。卧槽。而且，公摊面积全球罕见。

这个民族的致命弱点就是六个字：怯懦，残忍，自私。

这六个字是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

有人雷洋一案没有摊到某些人身上，摊到他们身上，他们一样会愤怒的。

这话说的不对，即便是愤怒也一定是敢怒不敢言的那种。

事实上，上个世纪轮到国人头上的大灾大难还少吗？除了极少数的天灾外，泰半为人祸，可是他们又如何面对呢？文革五十年了，无一人敢公开出来要求国家赔偿。相反还有人做梦要回去。

正因为自私才怯懦才残忍。

即使是人家杀掉你的子女，你也会因为自己暂时的苟活而隐忍。

类似的场景不就是文革中很多父母面对自己的子女被打死，以及很多的子女面对自己的父母被自杀，要么沉默，要么景从，最悲壮的莫过于自己疯掉。

有了这么多的铺垫也就有了这么多年的苦难，居然还能有人编造苦难创造辉煌的狗屁神话出来。

一句话：祝尔等好胃口。

172. 三个半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辽宁人

近代中国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五个浙江人，蒋介石，鲁迅，周恩来，汪精卫，毛泽东。

这里面汪精卫、周恩来都是祖籍浙江，毛何以从湖南人变成了浙江人，关于这一点，组织编撰的《党的文献》1997年第三期发表的《毛泽东祖籍浙江衢州》可资佐证。当然，这点还是有很大争论空间的，姑且这么算吧。

不过，在我看来，这五个人同三个辽宁人或者说三个半辽宁人根本无法相比，他们五人小组决定的只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辽宁三人团则是决定了中国泰半历史进程或者历史命运。

这三个半辽宁人分别是：安禄山（辽宁朝阳人），吴三桂（辽宁绥中人），张学良（辽宁海城人），王立军（内蒙人，但长期在辽宁地区工作，且成名在辽宁境内的铁岭和锦州）。

安禄山一举将唐朝由盛世变成了中衰，而且直接导致了自五胡乱华以后更大一轮的外族入侵高潮并且最终在女真人手中完成了大燕帝国的梦想。其实要是从安禄山改号为燕国的这点看，当年五燕乱华的鼻祖前燕也是龙飞辽宁的。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直接导致了文明由相近西方变成了一落千里的

局面，满清的二百六十年大倒退以及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骨至今“余音绕梁”。（满清只是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骨，而文革和后文革则是直接抽掉了中国人的脊梁骨，从此再无脊梁，只剩下倪萍等“中华脊梁”等改良品种）

张学良不战而逃让日本轻而易举地深入腹地，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更主要的一点是渔人得利。这且不多说了。地球人都知道了。

王立军本来也是一个有可能地动山摇的人物，可惜他不是正宗的辽宁人，自然也就不能同以上三位相提并论，故而称之为半个。

前几天，全国的鸡的屁公布，辽宁省叨陪末座。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兆。

常说世界大戏看朝鲜。那么，中国大戏呢？要看辽宁。

辽宁人还会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拭目以待吧。

173. 解释一个历史现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

1.毛泽东的一句话：“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

这句话是毛在延安时期说的，一直以来就很重视这句话，为什么重视呢？因为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毛的“雄图伟略”，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话形容的：“把地球管起来”。

说到底，这个地球是什么？在东方，这个地球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人。把中国人管起来，一直管到五脏六腑四肢百态。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计划生育啊，房产开发啊，股市买卖啊，等等吧，实际上都是从这一思路过来的。

我以前就说过，中国历代统治者接受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往往是从反人类价值这方面入手的。比如明朝认为元朝的灭亡是“纲纪废弛”，清朝认为明朝的灭亡是“抓而不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陈云当年反对出台《新闻法》就是引用他们在白区工作的例子，说国民党搞了新闻检查办法，结果中共地下党就去钻他们的空子，搞了很

多“自留地”，因此，《新闻法》不宜早出台，给自己留下管控的最大的余地。

说到管控，毛游走江湖，体会最深的就是“肚子问题”。老百姓必须处于为温饱奔波的状态，才能老实地听招呼。所谓“饱暖思淫欲”，这里的“淫”不是“淫荡”、“淫秽”的意思，而是更多的想法。老百姓想法多了，就不好管了。

什么时候吃干饭什么时候吃稀饭，什么时候半干饭半稀饭都要由政府来把持刻度。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空间无形中缩小了。

五十年代后期，毛到四川，对李井泉说，喝茶太浪费时间。李于是照办，将成都的很多茶馆都取缔了。这个思想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半干半稀”的基础逻辑。

毛死后，邓接掌大权，并没有改变毛的基本思路，或者说政治思路。因此，毛线没有到头，还是在继续缠绕，且越绕越长。

邓搞的计划生育还是围绕“半干半稀”做文章。邓之后的“土地财政”，包括大名鼎鼎的所谓“股份制”，都是半干半稀的翻版。

如今，在城市里，一套房子就把中国人搞掂了。

以前反右把人轰到农村去，没了城市的保障，顿时落魄困顿；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只要把房子一收，立马狗屁不是。

为什么苏区的人还是这么唯马首是瞻（马克思之首）？就是因为半干半稀的理论控制了你的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半干半稀的理论搅浑了你的基本思绪。一个大脑被看住，一个手脚被捆住的人还能出格吗？

极权是目的，皇权是步骤。

一步接一步，从未落空过。

174. 毛泽东说：“我姓毛，叫我毛主席就行了”

文革初期，“四个伟大”甚嚣尘上。到了1967年9月，他在武汉东湖住处接见刘丰、曾思玉等人时，进一步半公开地提出：“我姓毛，是党的主

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你们封我的四个官很不喜欢。”这次“很不喜欢”延续到1969年5月，毛再度来到武汉时，又为“四个伟大”发了脾气，这次说的比较狠一些：“四个伟大，太讨厌。”

等到见了斯诺以后，“四个伟大，讨嫌”成了口头语。

如果把时间罗列一下，就可以发现，“四个伟大”从“不喜欢”到“太讨厌”的跨度恰好与中共“九大”前后密云不雨、诡谲的政治形势相关联。第一次在东湖发飙那是在做摸底工作，对四方面军的人主要是拉；第二次就更明显了，“九大”之后，重新洗牌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中央文革”已经被批准“靠边站”，可军委办事组却迟迟得不到解散，老大焉能不火？赫鲁晓夫为何总要睡在身边呢？

既然已经圈定了赫鲁晓夫的下一个入选，四个伟大当然“太讨厌”。质言之，不是“四个伟大”太讨厌，而是发明四个伟大的人太讨厌。之前他讲过“四个第一是一个发明创造”，现在连顶级版的“四个伟大”都成了靶子，更遑论“四个第一”了。

1976年，毛死后，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标语称毛为“伟大领袖和导师”，可见，“四个伟大”并非全都“讨厌”，至少还有两个硕果仅存。而那个发明四个伟大的人已经“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荒冢向黄昏”了。

由此可见，个人崇拜在不同时期要有不同的口号标志，有的因为过时了，就要及时废除，有的是因为提出的人出了问题，也要暂时废弃。然而，“四个伟大”只是一个形式，反对形式而不反对实质，而这些形式的倒掉并不影响个人崇拜的大旗永远飘扬。记住这一点，再回过头来看有些人的表演也就很清楚了。

175. 读《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我在有关顾颉刚的那篇文章里专门提到过，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如果做不成帮凶的话，只好去做帮忙，如果连帮忙也做不了的话，那就只好去帮闲了。

遇罗克看不出来那种形势是正常的，但也不必苛求，因为他毕竟只有只有一步之遥。但我个人觉得遇罗克还是对中国的历史看的不够多，没看出来那就是一个黑乎乎地龙潭虎穴，没必要跟它较劲，留着力气出去，

为自己活一把。惟其如此，才更觉遇罗克可惜也可悲。

再推荐一本书，《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嘴脸，他们是盐碱地的帮凶之一。

老赵算不上很左，但正如书中美国人说的那样，当年追求民主的赵俪生不见了，只看见一个破落的地主的赵俪生。

老赵有个学生，去年因为书的被禁搞得沸沸扬扬，秦晖。

高昭一的回忆就是老赵的一个补充。赵俪生本人的回忆部分中的那段旅美日记很有意思，颇能反映出这些人的真实心态。

如果不是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仅仅是简单地看他的这段日记，很容易引发共鸣，可惜的是，如今再看赵俪生当年的这段日记（98年时老头子还重新补写修订，可见很多观点在98年时再度确认），感到的是阵阵可笑。

杨联升在电话里骂赵俪生的那段话其实一点都没骂错。赵俪生这批帮闲文人或者说无聊文人（研究农民起义的几乎无不如此）的本来嘴脸就是这样。

赵的这本回忆录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赵三言两语刻画了很多过去的形象，非常有意思，有几个知识点，像韩钧、华岗都可以补正史的不足。

赵俪生的回忆还有一段挺有意思，他到美帝那里去，看见有《阁楼》和《花花公子》的杂志，老头子翻看了一下，得出结论是很泛泛，而且还拿“口交”举例说，在中国早已有之，都叫“品箫”。“祖上都曾阔气过”，仅此而已啊。

从幼儿园时代就已经死气沉沉了。

赵俪生的这本书里的访美日记中自然流露出一段，就可以看见苏区的普遍心态了。

赵俪生到一个美国人的家庭里，亲眼目睹了一个小孩儿穿成阿拉伯式武士的模样，在家里用玩具乱挥乱动，在赵俪生笔下，这个孩子（也就是

五六岁的光景），已经非常“不堪”了。而且还老赵自己还颇为得意地说这就是美国孩子的景象。

事实上，赵俪生本人还不算是“极左”，充其量不过是个落伍的老五毛。在他们眼中，孩子本来就该规规矩矩，尤其在有客人的时候，一定要装的跟木偶差不多，这才算是“孩子”。

至于什么“天真”、“幼稚”等等本属于孩子的东西实在是应该让他们提前剥夺的。

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

看看有的国家里的孩子，就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什么，看看有的国家里的青年，也就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还有希望。

有一年，我儿子六岁，带他去看尼亚加拉，在回来的通道里，他因为兴奋发出一阵阵叫声，身边的几个老外回头看，一看是孩子，马上浮起笑容。这情景其实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这边的老移民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倒是把我身边的一个从某国来观光的人给了点些许的惊讶，他说，这笑真是来的太容易了。

一个连经常性的笑容都看不到的地方，还遑论希望啊。

176. “大公无私”的背后

《漫长的一年》这本书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作者袁敏的母亲的人性的堕落。

这位母亲从这本书一开始就给交待出她的“不平凡”与“勇敢”，如果不是后面的一个细节，我几乎轻信了作者的论断。然而，作者到底是被洗过脑的，至今脑残痕迹仍旧很深，于是，马脚露出来了。

袁敏的老娘是出身富贵人家转投“革命”的，在“革命”的洪流中痛洗自身的“泥污”以至于要做到涅槃重生。这个重生的法宝便是所谓的“大公无私”，那么，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境界了呢？

她有一个小儿子，年仅一岁多，因为辗转的原因患了重病，作为人母的

她非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在孩子最需要之际将帮助留给了其他人。猛一看，这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提倡的事啊？可是，有没有想过，这种悖离常理的东西到底是因何而作怪呢？

袁敏老娘的出身不够那么纯粹，即非工农，也非造反，她的一举一动都要超越常规才能得到组织内部的认可以及舆情的赞同。但凡有一点的“私心杂念”，立刻被视之为“改造失败”。而正是由于恐惧“改造失败”失宠于或者不见容于组织，因而，即便将亲生骨肉付之一炬也在所不惜，这正是人性最为卑污的地方，却被作者无意间作为那个时代特有的灵魂提了出来。

后来，还是袁敏老娘的警卫员看不过眼去，硬是拿了东西给了那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岁半的年龄，还不大会说话，临终前眼泪汪汪地看了那个警卫员一眼，却拒绝生母的怀抱。由是可知，最装逼的东西在最纯真的眼中仍旧是一团垃圾而已。

即便从救援的生理顺序讲，也应该是妇孺老幼排第一，基督教民主所提倡的“女士优先”也是这个范畴之内，惜乎，盐碱地到底生不出这类光辉。

连起码的人性都谈不到，还谈个鸡毛的大公无私？大公无私不过是大伪似真、大诈似信、大奸似忠的翻版。

177. 该混搭的单打，该单打的混搭——话说北朝鲜

咱们今个儿就说说北朝鲜吧。

该分开的东西它偏合并，该合并的东西它偏分开。

比如党政，比如医药，本来就该分开，可偏偏不分开，搞一块堆儿；

比如人性，人和性，性格、性欲，本来就该弄一块堆去，偏偏分开。

党是什么？就是竞选的工具，表示谁谁是一伙的，等到竞选结束就该一边凉快去。以党代政或者党政不分，其结果只能人为制造政治腐败。

医药呢？医生是医生，可以开处方，却不能跟抓药连在一起，否则就会

滋生腐败，这是一望便知的道理。可在北朝鲜，医药愣是不分家，而且还搞出医药代表这个怪胎。

是人就该有性格，但是北朝鲜例外，除了最高统治者可以喜怒哀乐为所欲为，剩下的所有人都不能随意调配自己的表情，更别说自己的性情了。至于性欲，那更得憋着了。老百姓自娱自乐，除非你用手，否则夫妻间在家里观看本校教学片都算犯罪，更别说用自己的血汗钱到社会上换点快乐。

人如果没有了性，那还叫人性？

该混搭的它单打，妮玛北朝鲜；

该单打的它混搭，妮玛北朝鲜；

总之，就是妮玛北朝鲜。

哈哈。

178. 新桂系史上的“王公度事件”之悬揣

新桂系历史上最值得玩味的一件大案——王公度事件。这件事琢磨明白了，也就琢磨明白了新桂系同中共的实质性关系。

当年杀王公度用的罪名，李宗仁非常头疼，还是有人建议他用“托派”这个名头，于是老李很高兴，照办。

晚年李宗仁回到大陆，刘斐专门问过李宗仁，地点貌似在北戴河吧，刘斐问王公度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宗仁避而不答。

这两点综合起来看，有些意思就在里头了。

首先，王公度必死，何以要用“托派”的名义？是难于对蒋介石交代吗？只要是杀共党，蒋介石才懒得管你是斯派还是托派呢？于是，这个罪名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便于同中共继续周旋下去。那么，王公度何许人也，也就不难明了；

其次，如果王公度真的属于不得已迫于国民党一方的压力或者新桂系内

部压力杀掉的话，李宗仁晚年身在大陆，何以不能对刘斐畅所欲言？其时，白崇禧远遁，黄旭初南下，人都不在境内。但李宗仁仍旧不谈，成为被彻底带走的谜团，于此可见，王公度的身份已经非常清晰了；

再有，当年杀掉王公度时，黄旭初认为其功业不在1927年首轮清党之下，认为是“二次清党”。

新桂系初期以李黄白为首，后来以李白黄为首，其实为李白二人，而到最后实则就是白崇禧一人当家，李宗仁不过挂名而已。作为新桂系晚期首脑的白崇禧宁死不留大陆，其他如黄旭初、夏威等人也都南逃香港，李宗仁归来之后曾有信给黄旭初、夏威，等到文革起来，老李不免喟叹，说不如不写信给他们了。

胡兰畦回忆说她负责运动军阀杨森留在大陆，杨森说中共不可能不念旧恶。同样，也有人劝何健留下，何健表达的也是同一层意思。夏威更是如此，宁死车轮之下，也不回大陆。

事后证明，何健的女婿汤非凡死于非命，以何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地位，其能善终否？

179. 冰冻三尺—重庆公交车事件有感

这件事放在盐碱地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因为劳动党方面已经公布了所谓权威视频，谁再瞎逼逼估计就该喝茶的干活了。但事情实际上却远远没有结束。若干年后，我们回头再看看这件事时，或许还会产生诸如：“难怪啊……”之类神奇的想法。

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是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十几年前的老段子。

当时加拿大多伦多的公交车月票出示给司机时需要同时提供一个PhotoID，也就是带有近照的有效证件，因为月票本身没有照片。所以，多数人都是把驾照同时拿给司机看的。可麻烦也就出在这里。

有位来自辽宁的盐碱地新移民，他当时还没有办理驾照，就拿着自己的护照给司机看，多数司机也都认同。然而偏偏碰上一个矫情的老白，这个老白人司机认为护照不算有效证件，新移民自然不干了，语言也不是很好，两下就有了冲突。然后，老白司机停车报警，警察来了以后不由

分说立马抓捕新移民。

这件事出来以后在华人堆里有些反响，大家普遍认为老白司机缺德。事实证明也是这个老白司机缺德。可是，这个过程中透露了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司机的权益是受到全程保护的，一旦遭遇特殊情况，政府会立刻出手。当然，有个背景也必须说清楚，多伦多公交系统本身就是政府卵翼下的狼羔子，它们身后的工会更是黑社会团体的前台组织。每年选举之际，公交系统的选票都是政客垂涎的“金带鱼”。

现在回到重庆事件上来。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乘客打骂司机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且很少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惩戒。至于公交车公司自身，他们对待自己的员工到底怎么样，恐怕也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说穿了，今天的公交车司机也就是一“祥子”的待遇。

而作为公共治理的掌门人的政府更是大爷一个，他们绝不会为了屁民们间的撕咬而滋生出任何积极有效的举措，他们唯一最喜欢做的就是管控屁民的牙不要咬到涉及政府层面的各个角落。

于是，悲剧当然就产生了。

祥子们积郁已久的愤怒得不到伸张和解决，他们也就只能采取下下策。

反过来看，作为乘客，同样来自于底层，他们同样每日都有大量的苦水要吐，只有在乘坐公交车时才或多或少找到了出气的下家——司机。

这样一来，鲁迅曾经描述的场景也就应运而生了：“弱者拔刀向更弱者”。

坐在这辆公交车上的所有人其实都是弱者，都是受害者，但同时也都是施虐者，害人者。如果轻率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劳动党看来，实在是太妙了，妙不可言，这才是他们努力公开视频的主要目的。

只有大家在互相怨艾时才会忘了谁才是幕后的真凶。这叫乱中取胜，虽然不在三十六计之中，却也是传家宝。你们只有在这种无休止的缠斗中耗尽气力，才不会“合而谋我”。

一直以来提的口号叫“依法治国”。老实说，这话一点都没错，只是这

个“法”是家法的“法”。

上层觊觎储位的要按家法处置，下层殴打舵手的也要照家法办理。不过，殊途同归，用家法的结果是大家都玩完。

180. 五世而斩的历史周期律

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沉浮。

而且，从历史上看，往往还用不了五世，仅仅是五任就足以说明问题。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除汉、唐有些个别，其他各代都概莫能外。其实就是汉、唐两朝其实也是没有脱离这个轨道。汉朝第五任皇帝是汉武帝，汉武晚年昏聩残暴，不但民间反对情绪溢于言表，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也被汉武的胡作非为所激怒。不过，汉武毕竟不同一般的帝王可比，他很快察觉了自己的危险的处境，他一面通过轮台悔过书对外表达自己的政治姿态收买人心，一面杀掉李广利、刘屈氂（即牦的繁体字）给自己在巫蛊之祸中扮演的黑手角色予以全部洗刷。正因为老于权谋的汉武的种种做作表演和他逐渐调整过正的法家思路得以让汉朝没有一蹶不振，通过汉昭帝、汉宣帝的两朝努力，汉朝居然维持到了破纪录的七任不败。比至唐代，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再到唐玄宗，这里面经历了七任统治者，和前汉相埒。但是，唐高宗中后期，实际是武则天在执政，而唐中宗、唐睿宗的统治时间不但短暂而且了无新意，其中中宗本人也被韦后所害，唐睿宗的皇位来自儿子，所以一旦即位三品以下的升赏都交给太子处理，未几又把皇位让给儿子，自己退居太上皇。所以，唐代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任皇帝就是唐玄宗。也就是在唐玄宗这一代，唐朝走向衰落，而且李隆基的某些消极做法直接影响到五代时期。从这个角度上说，唐代其实也没有逃过五世（五任）而斩的周期律。

五代十国结束，中原以北宋为正统，北方则先后有辽、金崛起，西部则以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为主。北宋前五任皇帝分别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到了宋英宗执政期间，北宋的衰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宋英宗一死，宋神宗就公开打出改良的旗号。而少数民族政权如金国也一样没有走脱这一规律，金的前五任皇帝分别是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到了金世宗末造，衰败的现象已

经露出端倪，金章宗即位后不仅没有纠正金世宗弊政，反而掩耳盗铃，坐视蒙元的尾大不掉。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封建文化走向烂熟的最后阶段，其中元世祖改蒙古为“大元”，这是元朝名实俱在的开端。忽必烈一死，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居然先后有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元明宗、元文宗、元宁宗、元顺帝等十个统治者登场，可见政局之乱，其中像元明宗、天顺帝、元宁宗在位连一年都不到就不明不白的死了。而元英宗公开遭到保守贵族的杀戮，幕后真正的肇事者竟然南下称帝（即泰定帝）。明朝前五任皇帝分别是明太祖、明惠帝、明太宗（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其中明惠帝在以明成祖为法统的这一支派中并不得到承认，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即便是这样，明朝的衰落从蟋蟀皇帝朱瞻基时代也开始了它的前行路程。朱瞻基死后，明英宗即立，土木之变不久发生，明朝就此步入中衰。清朝如果从第一代算起（即清太宗，因为努尔哈赤的国号是金），第五任皇帝恰好是清高宗也就是乾隆帝，此人对于满清的全面衰落所作出的贡献自不必多说。

历代王朝的创立者栉风沐雨、艰苦倍尝乃有天下，所以经营起来无不万分小心，像唐太宗、朱元璋都是一生勤政、宵衣旰食，至少在他们统治前期是这样的。然而到了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这种作风已经渐行渐远，像金世宗、明宣宗（前期）、清高宗（前期）这几位第五任皇帝还能有些许作为甚至在任期间创造了小康局面或者延续了盛世，这都和他们在青年时代的教育区别不开的，即以明宣宗为例，他深得乃祖明太宗的喜爱，经常耳提面命、指授方略，并且加以实战的锻炼，因此他在即位前后很快击败叔父汉王高煦的叛乱并非偶然。乾隆的境遇和明宣宗有些类似，他的祖、父两代都是治世能手。至于金世宗属于亲藩入主且使用非正统的手段，其人如果本领泛泛想来不会荣登宝座。然而，就是这些亲手制造小康局面、延续盛世生命的统治者，在他们统治的后期自身的缺陷已经给王朝的整体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像乾隆就自己布置了王朝衰亡的陷阱。他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181. 袁崇焕

《明史》是奴才修史，但或多或少也说了一两句人话，比如“崇焕死，明亡无征矣”。就是说袁崇焕一死，明朝的灭亡已经没啥悬念了。

事实上，袁崇焕现象不是个别的，举凡人治社会，一旦顶梁柱没了，立

马坍塌，几乎没有任何例外。

当初，日军决定发动对东北的偷袭，一般说都是关东军个别人等的冒险行动。然而，即便是冒险，也不是在完全不具备考量的情况下胡搞出来的。

奉系军阀自张作霖以下，有三个人物是日军比较忌惮的，即杨宇霆、郭松龄、王永江。

王永江是力主割据自雄、休养生息，这是一个杨增新一流的人物，如果他的主张得以实现，那么，关外的形势无疑将有天壤之别。

杨宇霆、郭松龄各有优点，但集中的缺点就是器宇太窄，不能容物，这也是他们的取祸之道。前年给广州《同舟共进》写过一篇约稿，就是写杨宇霆的，自然不能不提郭松龄，郭松龄反奉并不是传统中所表彰的那样，郭松龄同样在反奉的过程中力求得到日本朝野的支持，甚至在郭松龄兵败之后，他本人也逃亡日本的领事馆祈求庇护。可惜，这段考证内容在发表时给删除了，过后，我会在这里如实登出，供大家参详。

在这三人中，杨宇霆死的最晚，可是，杨宇霆一旦噶屁，日本军政两界很快做出同样的判断：“满洲无人矣。”

总之，此类体系崩盘的先兆都是八个字：“人物凋零，经济凋敝。”

182. 消毒

老舍旧作《四世同堂》中塑造了一个五毛形象——冠晓荷。

本来，冠晓荷还算是“体制内”五毛，老婆做着日军的妓女运动检查所所长，后来丢官丢命，冠晓荷便成了“自干五”。虽然女儿冠招弟一度做了日军雇佣特务人员，冠逢人便说自己是“家属”，还准备将自己放回体制内，争奈时运不济，终未能如愿。

值得关注的是冠晓荷的结局，这么一位忠心耿耿的“自干五”最后居然被主子给“消毒”处理了。

《四世同堂》尽管是小说，却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日本占领中国期

间，“消毒”一词成为中国人谈虎色变的玩意儿。

“消毒”本意应该是消灭病毒或者消灭毒害，属于高大上一类题材。可惜手段非常毒辣，以至于遗臭万年。

当年，日军遇到有传染疾病或者感染类似疾疫的一律以两种方式处决，一种是活埋，即冠晓荷的去处；一种是焚烧。城市里多半采用活埋，乡村结合部则采用焚烧。

少年时代听老辈人讲过有关“消毒”的往事。有一次，日军突击检查，邻居的一个小孩患过荨麻疹，已经好了，留下点痕迹，家里人没注意，放在外边玩耍，被日军看到，旋即抓到车上带走，“消毒”了。给我讲这个故事的长辈自己家里也有人得了荨麻疹，也有瘢痕，只是隐藏的好，加上家里收拾的比较干净齐整，日军居然没有进屋仔细搜索，万幸逃过。

在日军看来，患上疾疫的都属于“废料”，用咱们有些人的话形容，便是“低端人口”，自然“不配”活着，只能消毒一了百了。

问题是日军乃侵略者，他们是兽兵，对付的是他们眼中的“外国人”、“外族人”。有朝一日，如果哪个国家这么对付自己人，对付自己治下的民众，是不是连日军都不如呢？

183. 看门人

一家医院里躺着一个高烧不退的病人。很多人都为他忙乎，也有很多人来探望他，还有很多人在关注他。院方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让他退烧。这时候，院长出现了，院长掷地有声的说：“不能让病人死，这是我们医院的底线！”大家都一起鼓掌，说院长太有人性了，医院太好了。

也在这个时候，有个年轻的医生嘟囔了一句：“用青霉素不就行了吗？还费那么大劲干嘛？”于是，这位嘟囔的医生被宣布下岗。

年轻的医生觉得很窝囊，院长走了过来，语重心长的对他说：“年轻人，你太不了解医院了，也太不了解患者家属了，让我来告诉你吧。”

病人发高烧，物理降温，这就等于养活了一个毛巾厂和一个冰块厂。那么多人来探望，就等于养活了门口那么多的摊贩和商店。那么多人对

家属关注，就等于让家属理所当然的收取社会捐赠，也理所当然的养活了一批基金会。而这个病人在这里住一天，也就为医院创造了巨大的存在下去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提出用“青霉素”治疗，那么，毛巾厂、冰块厂、摊贩、商店、基金会、医院乃至病人家属，都将被矮化甚至被干掉。所以，我只好请你走人。

年轻人点点头：“院长，你说的太对了，我错了。”

院长说：“你提出用‘青霉素’尽管不合时宜，尽管犯了众怒，但毕竟也还为医院药局做了一丁点的贡献，再加上你及时承认了错误，所以，我还把你留在医院里，去做一个看门的吧。”

这位年轻的医生从此当上了收发室老大爷，每天不说一句话，多年以后，他成了哑巴，院长每次看到他都笑的很甜。他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若干年过去了，收发室老大爷死了，他的儿子接班当了看门人，院长也死了，他的儿子也接班当了院长。有一天这两个人碰到了一起，新看门人说：“老院长对我们一家有恩啊。”年轻的院长则意味深长的说：“一个人一天不说话容易，一年不说话也比较容易，难就难在一辈子不说话。但你爸爸他竟然做到了。”新看门人说：“我一定要把我爸爸的光荣传统继承下去。”新院长像老院长一样笑得很甜。

184. 朱元璋

朱元璋夺江山前后花了十六年的功夫，比起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这些前辈来都不容易。刘邦虽然跟老朱是一个档次的，可老刘毕竟当过村委会主任，手下还有帮子铁磁，而且已经自成一军，号“沛公”，刘秀就不用说，打着“皇二代”的旗号，且借着他大哥的力气。李世民的背景更硬，跟一把手是亲属关系，赵匡胤是“军二代”。刘邦打天下花了四年时间，李世民花了八九年的时间且不能都算在他头上，赵匡胤最快个把礼拜就搞掂了。刘秀在公元24年离开虎笼子，到25年就称帝了，前后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他们打天下的难度都不可能跟老朱比。

实际上也不是说老朱多么英明神武，而是越到后期，这夺天下也就越来越不好忽悠。老朱怎么也算是自己独立拿下的吧，可到了满清辫子兵时就得满汉结合、理应外联才行，等到了伟大光荣正确那个时代，就要拼

国际背景了。

刘邦、刘秀、赵匡胤、李世民这几位是很早就明确上下级关系了，而老朱则不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老朱和功臣们的磨合期要长一点，彼此都觉得更不适应一些。只要是人治社会，功臣的下场始终是个头疼的问题，要么恩养，像赵匡胤那种，但老赵有个前提，那是北有契丹，南有十国，所谓兔子没死，飞鸟在飞的环境，功臣们还有用途，即便如此，救命恩人也让赵匡胤给宰了。要么弄死，像刘邦。要么就教育，比如李世民和刘秀，但李世民、刘秀也有特殊的地方，李世民、刘秀手下的功臣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自觉性较强，皇帝老儿一暗示就乖乖闭嘴，比如邓禹、贾复就属于主动闭嘴型。而李世民实际属于自己核心层的人数并不多，有点跟井冈山类似，后来治天下都要花插着用，连魏征这些人都得启用，要不然不够，而且像杜如晦这样的主儿有眼力见，死得早。要么锻炼，比如完颜金的开国功臣什么粘罕、斡离不、娄室等等吧，都出去打仗去，打死了算，打不死的怎么办呢？最后也得一勾烩了。

老朱手下这帮子弟兄就不同了。各个能活，而且不听招呼的也居多，像朱亮祖，还算不上老朱起家的本班人马，愣是敢杀了县令道同。老朱本人阴谋诡计一肚皮，深知取天下的不易，闹不好就可能被人给算计了，他身边这些人个顶个都是人尖子，不杀何以安枕？再加上皇太子死得早，孙子又太孙子了，只好大开杀戒。只不过，老朱这人底子太潮，别人杀功臣杀了也就杀了，他杀功臣，先让功臣把自己儿子给杀了，谁要是下不了手，正好有理由弄死。

所以，伟大领袖当年说得好：“中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像朱元璋这样教育不好的农民虽然不能说杀就杀，可怎么也不能轻易让进城，流氓有了文化，那可真叫一个灾难啊。

185. 茅于軾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坐车睡觉，这时另外一个人告诉他前方到站是八宝山，这个人醒了也慌了，跳车来不及了，而且跳车也是一个死，不跳车的话送到八宝山也给炼了。情急之下，他怎么办？只能痛骂叫醒他的人，马勒戈壁的，为啥叫醒我？

所以，有人夜观天象之后主张“洗洗睡吧”，道理就在这儿。

而《星跳水立方》、《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节目的出现则显示了另外一种境界，你可以叫醒他，但不必告诉他前方到站是八宝山，而是给他好吃好喝让他高兴，所谓临头不做饿死鬼。于是，大家都高兴，因为没人愿意真正去探求谜底。

可有人还是忍不住断喝一声，八宝山快到了！

因而，不免挨骂，甚至不免挨打。

在一元化的体系下，两代或者三代之后，庸才遍地，奴才遍地，人才不但绝迹甚至歪才都难以找寻。

龚自珍说过：“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186. 饲养员的故事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李易安鼓吹北伐的例子。但今人则比较神奇，他们不怀念项羽，反而怀念袁世凯。说袁大总统是最好的，没有之一，甚至认为大总统生前干的那些个事都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如此一来，倒让我们不得不回眸一下这位洪宪皇帝了。以往为文经常谈到一个字眼：常识。那么，放在这位洪宪皇帝身上的常识是什么呢？一位公器私用，准备或者试图将天下囊括回他们家的人；一位干了终身制还意犹未尽准备传之子孙的人。试问，这样的人会带领盐碱地走出死循环吗？这样的人不正是把盐碱地继续放在死循环中胡搅蛮缠的榜样吗？可是，这样的人要被怀念。这就引出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饲养员的故事。有一群猪狗牛羊，当他们受难时，他们不痛恨这个圈养的制度，只是痛恨现在的饲养员不够好，不够耐心，乃至不够会装X。于是，它们愤而造反，要求换掉饲养员以至于同时端掉这个农场。可别忘了，那就是这些猪狗牛羊并非要走出圈养的圈子，而是继续营造下一个农场，迎接下一位饲养员。两千年的历史说穿了，就是换掉饲养员，迎接饲养员的轨迹。说到这里，再看看今天走到这一步还觉得偶然吗？连袁世凯都会被追思的盐碱地凭啥不走进新时代呢？如果不走进，岂非辜负？

187.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略谈所谓“盛世”

近来在网上有人谈论关于“盛世”的话题。认为自1979年以来，盐碱地已经经历了几乎四十年的和平时期，这在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但同时也不无忧虑的认为，此等境遇原非天经地义。由此引发对“盛世”的一点看法，写将出来，供大家参详。

事实上，尽管1979年至今四十年中基本呼喊的都是以所谓和平建设为主的口号。但这四十年的渐进过程也需要细化。1979年至1988年的十年属于恢复期。社会由频繁不休的政治运动中刚刚挣扎般的解脱出来，还处于惊魂未定、百废待兴的境地。票证制度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彻底废除，平民的生活也只是从1987年左右开始有所好转。当年让人们钦羨并为之多方搜求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大件家私，其实在西方一些国家里的住房中已然是房产商买房时必备的条件之一。由此可见悬殊所在。

1989年之后至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虽然大张旗鼓的开足马力大搞其“市场经济”。可收效并不大，经济还在爬行中。只有到了美国人放水，准许盐碱地加入牌局，这才有了第二次“咸鱼翻生”的机会。于是，一直到2008年，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开始全面改观，特别是住房条件。当然，也是在这个时候，某些危机的苗头已经暗自埋下。

从2008年到今天，这段时间里，盐碱地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属不争，可其内在的危险与漏洞也获得了不小的“进步”，以至于未来究竟“鹿死谁手”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人。尽管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

如果把这个四十年的光景放进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比量。我们将会进一步看清它的本来面目。

即以满清王朝而言，自1644年入关至1912年被迫让位止。其间历十帝，凡268年。而众所周知的康乾盛世的三位主角康熙、雍正、乾隆就占据了134年的时间，正好一半。具体说到康乾盛世，康熙朝，玄烨以冲幼即位，到得废杀鳌拜才亲裁大政。清王朝也只有和平灭三藩和底定台海后，才开始生聚教训、教养民生。所以，康熙朝的盛世时间实际应该从清康熙二十四年算起，到清康熙四十七年“帐殿夜警”事件收局，屈指算来也才二十三年而已。康熙身后的雍正在位十三年，没有做到藏富于民，倒是经常性收刮民财充盈国库。所以，其人抄家皇帝并非仅仅针对

政治对手而言，之于民间也实在乏善可陈。只是不知道何以今人要对此公吹捧上天？乾隆接手政权，在乾隆四年前后彻底消解自康熙四十二年以来的宫廷内讧后逐渐推进盛世进程。如此，在清乾隆二十四年左右，清王朝终于迎来其全盛局面。而这个局面也仅仅维系了不到十年，清乾隆三十三年，王朝逐渐显露颓态。乾隆晚年，英国人甫一登陆就发觉这个老大帝国早已“向后转”了。

综合上述的种种说法。我们不妨得出一个由历史事实堆积成的现象，即人治社会造就的盛世，撑死也就二十多年的天下。一旦跨出时间门槛，盛世便危如累卵，稍有不慎，即有倾覆的可能，即便有人拯救其于一时，但一蹶不振的形势则毋庸置疑的降临了。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专制王朝的盛世的筵席散的越晚，喝死和撑死在席间的人也就越多。偶有幸免者，也是苟延残喘、来日无多。

188. 艰辛探索

每逢运动来临之际，都要恭逢“改名”的热潮。名义上说改天换地，其实换汤不换药。但究其内里，改名不过是因循的另一个套路。而之所以因循，实在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走老路的缘故。

不知从何时算起，网上开始有一批人吹捧“满洲国”的“德政”。似乎历史上的这个“怪胎”带给中国人以无穷的福祉以至于实在忽略了它唐突了它甚至这种忽略和唐突都跟它曾经的“恶名”一样“恶”。

当年，家里的长辈时常说起大舅能够死里逃生的一件小事。那时节，外祖父外祖母从河北到“满洲国”借住到亲戚家里。大舅不过7岁的光景，患了感冒，外祖母不知道在这个号称“新京”的地界，患了感冒是要被消毒的。关于“消毒”最初的印象大家或许来自于老舍的《四世同堂》里的描述。但那个毕竟是小说，而眼下我们说的是历史，是事实。

好在“新京”的亲戚是很清楚“感冒”的“应得之咎”。因此，始终不让大舅出门，关在屋子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登场了，惯例是检查卫生。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素来爱清洁，满映的当家人甘粕正彦到满映视察，先去厕所观礼，稍有不如意就破口大骂。因此，满映的厕所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革了命了。

日本人检查卫生很“讲究”，看到乖巧的小孩子，干净的儿童，照例都给

糖吃。可看见了让他们心生疑窦的孩子，那就是断然“消毒”。住在对面的一家邻居的孩子之前出“麻疹”，已经痊愈了，家里人就放他在街头玩耍，被日本人看到了，虽然也给了糖豆，但却把孩子给带走了，带到了啥地方，大家没人敢问，回头就有管地面的人通知说已经给消毒处理了。让家里人稍安勿躁，跟今天新闻媒体说的“遇难家属很平静”差不多。

日本人也“光顾”我们这家亲戚，本来大舅也应该难免“消毒”的厄运。但是，这家亲戚家里相当干净，这还在其次，关键是这家亲戚的男人在省警务厅供职，警衔是警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没有像关注那个出了麻疹的孩子那样关注大舅，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就离开了。（“新京”明明是“心惊”的谐音，却也被戴上一顶“新”的帽子。忽然想到，貌似历史上凡是要搞搞震的年代都逃不过一个“新”字，从新王莽到新华宫再到新……。真的是“心惊肉跳”了。）

在满洲国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家有警宪补，赛过做知府”，警宪补这个警衔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警员。这样一个顺口溜的形成与背景也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当警察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时，当普通警员成为被崇拜的势力时，这个社会到底是啥货色也就一清二楚了。

顺便提一句，这位做了省警务厅警佐的亲戚在无意当中掩护了一位劳动党在满洲地区的重要人物。这位重要人物后来还专门写了感谢信给他，派人到给他送了一些钱和食品表达慰问。可是，这些都没有挡得住这位亲戚在“肃反”运动中遭到清算的命运。据说他被“消毒”之前还给执行部门的执行人展示过这封首长来信，可惜还是被“消毒”了。一个在满洲国掩护过满洲国死敌的人在新社会被新阶级给“消毒”了。也许这才是有些人至今“感念”满洲国的地方吧？

让一亿多中国人挨整，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十年浩劫忽如一夜春风来给改成了艰辛探索的一部分内容。那么，怀念或者追思一下满洲国的荣光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健忘的最大好处当然是忘却昔日的苦楚，但却无法挡得住即将到来的厄运。只是那时候，是不是还有“消毒”这么好的待遇呢？于此，真的要怀旧一下“满洲帝国”了。

189. 历史的死循环格局

每当一个新建的王朝兴起之际，都要装模作样的宵衣旰食、业精于勤。

因为他们知道脚下的这片废墟尽管精疲力竭，如稍有不慎，仍将引发余震。但后来者就没有这种耐心了。他们自以为天下就是活该是他们的掌中物，百姓驯化的活该就是他们圈养的牛和羊。因此，王朝的堕落也就是扑面而来。

一旦陷入堕落，滑行速度自然加快。朝野内外也有些不死心的主儿幻想重蹈盛世。于是就想出诸多办法来进行改良。可偏偏统治者认为改良纯属脱裤子放屁，老子有刀在手，有钱在腰，屁民算个毬？

本来屁民也把自己当成毬来着，愿意一直匍匐在地、山呼万岁的。但骑在脖子上拉屎的这位实在太不讲究了，因而就哼哼了两声。哪知道，不是一头猪在受难，而是很多猪都有哼哼的欲望。这样一来，猪圈管理明显遇到空前的危机。

在危机中，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马上扑火，一种是希望大火燎原。前者是张居正类型的，后者是李自成类型的。张居正的下场是抄家灭门，李自成的发迹是开了城门迎闯王。何去何从，一时间就有些明了。

可是，要想避免李自成后来的命运，无疑就要重用两种人。一种是吹喇叭的，是为笔杆子，俗称骗子；另一种是抬轿子的，是为枪杆子，俗称流氓。能够驾驭流氓和骗子的无疑是大流氓与大骗子。那么，当大流氓和大骗子拿到了江山以后，他会去做华盛顿吗？肯定不会。

这样一来，下一场的循环就又开始了。